

编号 000134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送审稿)

(三)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

一九九二年八月

二十八、“九·一三事件”后江青集团 对林彪在上海党羽的所谓清查工作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一些大大小小野心分子、投机分子麇聚到一起后逐渐形成的。在“文革”头几年，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本是一丘之貉。随着林彪与江青各自势力的发展，他们表面上一致，但也发生过不少矛盾和明争暗斗。如他们都争先把自己的党羽亲信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去，又如林彪、叶群、林立果等惊恐林彪若不能抢先接班夺权将被张春桥所取代，等等。但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终究都是趁“文革”的动乱而崛起的，许多事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因此，“九·一三事件”后，张春桥、王洪文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害怕追查林彪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会追到自己的头上来，于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千方百计地阻挠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工作，包庇和收罗林彪在上海的余党，竭力掩盖与林彪集团的勾结，装扮成“反林”的“英雄”。

（一）控制“王维国专案组”，销毁罪证，隐匿材料，包庇林彪党羽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一伙乘飞机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当天，上海市委接到中央通知：“飞机一律停飞，如果有大客机飞来上海，不要让起飞，可报告中央。”14日又接到由陆军进驻机场的通知。15日，王洪文接到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打来的电话说：“你们那个姓王的（指王维国）上级的上级掉下来了。”王洪文听不懂，又问了一遍，许世友重复了一遍，并要王洪文注意王维国的动向。王洪文认为：“王维国的上级是‘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部队），上级的上级就是空军了，看样子吴法宪出事了。”王洪文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议论时说：“吴法宪可能乘飞机逃跑掉下来了。”以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建议王洪文到北京去了解情况。王去后接受了中央交给的任务，即协助许世友，依靠上海警备区的力量，逮捕林彪死党王维国、陈励耘，押解至北京审查。1971年10月初，成立了“上海市委王维国专案组”。按中央规定，这个专案组由南京军区和上海市委共同负责。但张春桥、王洪文不让南京军区插手“王维国专案组”的领导工作，而由王洪文直接领导操纵。这个组共由31人组成，张春桥、王洪文派去的干部就有20人之多，部队干部只有11人。王洪文指派他手下的“五虎将”之一的戴立清总负责，并以王的亲信祝家耀和市委写作组的王知常等人为核心，控制了上海的清查工作。1972年9月王洪文调北京，他把这个专案组交给马天水、王秀珍代

管，他自己则在北京通过秘书廖祖康和戴立清直接联系，加以遥控。当时南京军区曾派了工作组到上海对王维国一伙人的罪行进行清查，王洪文下令他所控制的“王维国专案组”不得向南京军区工作组介绍情况，说这是为了“保密”需要，使南京军区工作组无法开展工作。

张春桥、王洪文把持了“王维国专案组”以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扣压和销毁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行材料，并隐匿了和他们自己有关的材料，达到包庇坏人、保护自己的目的。这个专案组把一大批应该上报中央的材料扣压在自己手中，据统计，有关这类的材料计70卷，14000多份，这些材料涉及的人和事，大都是属于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的。其中，有林立果于1971年7月6日从汕头飞往广州，在香港一侧“静态飞行”察看地形的材料；有江腾蛟多次去杭州指使陈励耘画的两张招待所（毛泽东去杭州时住宿地点）详细地图的材料；有江腾蛟1971年4月向王维国了解毛泽东座车进出规律情况的材料；还有王维国和郑长华、姬应伍等人在“九·一三事件”前后活动情况等材料。对于这些材料，王洪文等既没有派人进行过调查，也没有上报中央专案组，而被他们一直扣留到“王维国专案组”结束时，经王洪文、马天水、王秀珍批准，作为“一般材料”移交给空四军“保存”。此外，还有林彪死党的一些罪行材料竟被他们销毁，内容已无法查清。

王洪文等还把王维国把持的“八一〇专案组”（原名“防扩散小组”）内涉及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所谓“防扩散”材料隐匿起来，以保护他们自己。如王洪文把关于江青三十年代丑恶历史的报刊资料1卷和他自己的材料3卷，隐藏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内。他又把有关张春桥及其老婆李文静、姚文元及其父亲姚蓬子等人历史问题的材料11卷，以及他的小兄弟们有关材料2卷，都称之为“防扩散”材料，放在市委办公室内藏匿起来。王维国搞的这些“防扩散材料，其中有的原是张春桥、王洪文等人表态同意由王维国保管的。而“九·一三事件”后，张春桥、王洪文倒过来说，这些是王维国反市委、反中央领导而整理的材料。张春桥说：“这是王维国要搞我们。”王洪文则说什么“王维国利用公、检、法搞我们‘工总司’”，“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把徐景贤打成‘五·一六’”，等等。王洪文还就此借口提出“要对（‘工总司’）这批老头头的案子进行复查”，乘机翻案。

王洪文所把持的“王维国专案组”，千方百计地包庇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党羽和有关人员。“王维国专案组”前后共审查了56人，其中除4人上送中央“林彪专案组”审查外，其余人员经过一段时间审查后，均无正式结论。说是移交给空四军负责继续审查、处理，后来发现对有些人是明显包庇的。

原空四军军长郑长华，在空四军内积极配合王维国吹捧林

彪父子，接受反革命“路线交底”。林立果对他许愿说：“老郑有更重要的任务，准备去北京空军任副司令员，最好能是副司令兼（空）六军军长。”郑听后感激不尽地表示：“我选定了林副部长，就是粉身碎骨，掉脑袋也要跟。”1971年4月后，他积极支持王维国私调部队，改变空军训练的主要课目，大量分发武器和制造微型冲锋枪，组织反革命武装力量“教导队”，修建黑据点，为林彪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效劳。“九·一三”后他伙同王维国等人策划、烧毁大量罪行材料，毁灭罪证，还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王维国坐牢，我陪他去。”王维国被捕后，王洪文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却对郑说：“我还是信任你的……，你大胆的工作。”王洪文让他继续主持空四军的领导工作和清查运动。王洪文在1971年9月29日和11月4日，两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谎报：“军长郑长华……，过去受王维国的打击，现在能够站出来抓运动”，在“林、陈反党集团揭发后，转变较快，态度较好，敢于揭露矛盾，大胆工作，看来不属于王维国的死党。”后来，郑的问题在空四军越揭越深，南京军区决定将郑调到军区去审查，王洪文拒不肯放，他说“在空四军保留这么一个人有好处”，主张让郑“继续当军长”。1972年2月，中央决定将郑长华由中央专案组审查，王洪文哀叹道：“这样一来，我想保留郑长华当军长又不成了。”王布置专案组突击整理有关郑的上报材料，只说郑曾吹捧过林彪父子等，而对郑是否参加了林彪

父子反革命政变活动等严重问题，都推说查无实据，为郑开脱，王洪文等还将广大指战员揭发郑长华的材料扣压，不上报中央专案组。粉碎“四人帮”后，空四军党委对郑长华重新作出了严肃处理，开除了郑的党籍。

林彪死党李伟信之弟李伟隼，积极为林立果研制和安装特务通讯工具，并多次去过林彪家里修理特务通讯工具。林立果一伙策划谋害毛泽东时，把他从广州叫到北京，向他传达了9月8日林彪的手令，并要他研究延时、遥控爆炸等技术。9月12日晚，李在林彪家里为林立果准备外逃的行装，并帮助销毁罪证。对这么一个作恶多端的人，王洪文却说他年青、肯钻研、有技术，可用他一技之长，要从宽处理。当有人对王洪文说，中央专案组说李伟隼是林立果信任的人，“联合舰队”内有他的名字，在林彪拟定外逃人员的名单中也有他。王洪文听后竟说：“是‘联合舰队’成员放出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李“过去为林贼一伙搞了许多坏事，只是路线问题”，“这种人我还是敢用的”。最后，王洪文把李伟隼作复员处理，安置到工厂搞技术工作，不作结论。粉碎“四人帮”后，空四军党委对李伟隼重新作出结论，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团籍，监督劳动。

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积极参与林彪一伙的反党活动，为王维国出谋献策。他曾在北京、广州两地当面接受林立果、周宇驰的反革命指令。王洪文亲自找他谈话，说要“拉他一把”。

有人提出要定他是林彪死党，王洪文却说他的态度好，“死党可以变为活党”，最后只给予党纪处分，作复员处理。粉碎“四人帮”后，空四军党委开除了他的党籍。

原进驻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的一个副主任，在军管期间，执行张春桥、王维国的旨意，搜集了诬陷21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残酷迫害广大公安干警。张春桥、王洪文对他百般包庇，保护他过关，让他回部队继续任军政治部副主任。粉碎“四人帮”后，被停职审查，重新作了处理。还有王维国的老婆杜贵珍，参与了王维国的一系列反党活动，却被王洪文一放了事。粉碎“四人帮”后，空四军党委开除了她的党籍。

张春桥、王洪文之所以千方百计包庇这些人，目的是乘机拉拢他们，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里，去篡夺军队的权力。他们一度还企图控制驻浙江的空五军，因南京军区的坚决抵制，未能得逞。

（二）阻挠、压制群众的揭发批判

张春桥一伙害怕群众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揭发、批判，会把火烧到自己身上。因为林彪一伙的所做所为，很多事他们也是参与的。张春桥在上海企图转移“批林”目标，到处讲：“林彪是叛国投敌，全国人民一看就清楚，没有什么好批判的，今后真正危险的还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舒舒服服的和平

演变，因此重点还是批刘，而不是批林。”张春桥还为林彪脸上贴金，说什么：“比较起来，他（指林彪）的错误比较少一点，也做了一些好事。”群众的揭发、批判，很多方面把张春桥等人也捎带进去了，张春桥更是气急败坏，四处堵截。如群众提出要批判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政变经”。张春桥说林彪那个讲话是他帮助起草、整理的，“在那时只能整理成这样”。群众要批判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十六字方针，张春桥说：“这个《再版前言》林彪一个字也没有写，还是鄙人代笔的。”堵住人家的口，不准批判。有人要批判林彪在“九大”作的《政治报告》，张春桥急着说：“‘九大’政治报告仍然是正确的，不能因林彪叛国投敌，而把政治报告也否定了。这个报告是我和文元执笔的，林彪不过是宣读一下罢了！”有人提出，为什么在林彪仓惶出逃的前夕，《人民画报》上还刊印了林彪读“毛选”的照片。张春桥说：“那张照片嘛，是江青拍的。”接着又补上一句：“我们都是好心人。”张春桥企图用上述一些话来搪塞，逃避干部、群众对他们的批判。但这些话是不能长期骗人的。最后张春桥杀气腾腾地说：“林彪虽然自我爆炸了，但过去反对林彪的人仍然是反革命，当时他是林副主席嘛！不能因为林彪垮台了，过去反对他而受审的人今天都成为对的了。”

对于不听张春桥的招呼，坚持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并因而触及到张春桥等人痛处的人，则想方设法加以迫害。1972年10月，上海广大公安干警揭发了王维国等一伙人大量搜集诬陷中央和各省市领导同志的材料，并制造大批冤假错案迫害广大公安干警的罪行。张春桥知悉后立即批示：“是否把军管以来公检法说成了漆黑一团？！”“侦控案件（指“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假案）是我亲自交办的，与王维国的阴谋无关。”王洪文说：“是王维国对侦控案件查办不力，包庇了不少坏人，要深入查下去。”马天水下令：“请公安局党委再仔细从各个角度复查一下。”他们对王维国一伙制造的冤假错案非但不予复查平反，还变本加厉地扩大案情，加重对被害人的迫害。

（三）夺取林彪死党王维国所把持的部门的领导权

王维国掌权时，主要由空四军派人组成上海市政法指挥部以及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霸占了专政机关的权力。他们还控制了上海市委警卫处和招待处等要害部门，又派人参加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的工作，参与控制上海市的“清队”工作。王维国还派出军宣队进驻《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和复旦大学等重要单位。王维国等人积极参加“改朝换代”的阴谋活动，实质上成为张春桥手中的“枪杆子”和“刀把子”。林彪垮台后，张春桥既对失去王维国这支有力的臂膀感到痛惜，又怕原由王维国所控制的部门大权旁落，于是使用各种伎俩，迅速将王维

国手中的权力向自己手中转移。“九·一三事件”后，群众揭发出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的许多问题。照理，改组军管会应由部队派人，而张春桥提出：“这次抽调进驻公、检、法的联络员，要‘各党各派’的”。主张由上海市委和上海警备区共同派人进驻。但实际上他们又极力排斥上海警备区。王洪文在从各区、局抽调进驻人员时，就明确对被派去的人说，你们去的任务是“揭盖子，搭班子”，“要夺这‘刀把子’”。你们要“有思想准备，长期留在那里”。他把他的亲信、原机电一局“革委会”副主任薛干青派去当联络员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把128个“工人代表”之一的徐成虎派为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为原空四军军管人员举办的“学习班”的支部书记，把持清查工作权力。在对市公、检、法派驻联络员小组和以后组建党委过程中，张春桥、王洪文采取“蚕食政策”，逐步排斥上海警备区人员。开始，他们确定进驻公、检、法联络员小组中各类人员比例是4:3:3，即军队干部4人，地方干部3人，原“公检法”军管会和“公检法”机关干部3人。在“公检法”组建党委时，比例改为3:3:3，军队干部减少1人。以后军队干部调动时，缺额不补，逐步增加地方干部和机关干部的人数。最后，军队干部只剩下1人，地方干部增加到5人，“公检法”机关人员增加到6人。“文革”中被称为“王洪文的公安局”——杨浦分局的造反派头头宋桂生也作为机关人员拉了进去，形成了他们的“多数”。党

委组建后设5名书记，王洪文的亲信薛干青、徐成虎都成了副书记，实现了他们对“刀把子”的所谓“全面接管”。上海警备区的领导同志曾多次提出要改组市委警卫处，都遭到王洪文的阻挠。王洪文把亲信康宁一派到警卫处当政委，严密控制警卫处；连情况也不让上海警备区领导同志知道。张春桥则更露骨地讲：“由军队管这项工作要出问题，应由市委直接管。”就这样，张春桥、王洪文一步步把原由王维国把持的“地盘”，夺到了自己手中。

（四）把自己装扮成“反林”的“英雄”

林彪自我爆炸后，张春桥、王洪文等一伙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使出他们惯用的两面派手法，粉饰自己，隐瞒与林彪一伙相互勾结的罪行，百般狡辩，甚至制造伪证。昨日还是尾随“林副主席”的吹鼓手，今日摇身一变成了“反林”的“英雄”。

1972年中共中央陆续公布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二、三后，张春桥立即指令在上海的党羽们炮制一份《林彪死党王维国的罪证材料》来，说“要象林彪罪证材料那样搞，有照片、有文字说明，要把上海大的事件与王维国罪行挂上钩。”同年年底，王洪文又授意空四军举办一个所谓的《林彪死党王维国的罪证材料》展览会，在展览会上塞进许多他们制造的伪证，混淆视听，并采取骗、哄、压等手段，“组织”了全市43万余人去参观。他们将炮制的伪证材料

以市委文件上报中央、下发基层，欺骗党中央和全市人民。下面举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件事。

一件是掩饰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参与林彪、陈伯达反党活动的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江青在上海的党羽们积极响应林彪、陈伯达抛出的“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经王洪文提议、由徐景贤执笔写了《我们的态度》一文，准备由王洪文代表上海小组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这篇发言稿，对林彪的讲话大肆吹捧，说林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讲话”，讲话“使我们头脑进一步清醒起来”，表示“积极拥护”；说“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伟大功绩。”由于江青事先知晓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向王洪文等人打过“招呼”，因此稿子上加了一句：“不设国家主席，同意（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但紧接着对中央和毛泽东施加压力，又说“上海同志和上海一千万军民，殷切希望伟大领袖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副主席”。这就是徐景贤执笔起草准备叫王洪文代表上海小组去发言的“态度”。王维国看了这个发言稿，由于他事先接到吴法宪的电话旨意，急于跟随林彪向党进攻，于是他在发言稿上写了“不搞集体发言，谁有什么想法，谁就发什么为好”的意见。后来他在华东大组上作了个人发言，讲“不承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就是不承认党的几十年革命斗争史，实质上就是否定毛

主席的领导地位。”“从我们的愿望讲，是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瞧，这两份发言稿，何其相似乃尔！所不同的，只是为王洪文准备的代表集体的发言稿中，口是心非地加了一句“同意（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而实质上，两个发言都是贩卖林彪、陈伯达的私货，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清查王维国的罪行时，王洪文等大做文章。王洪文说：“王维国在庐山接受了林立果和吴法宪的指令，在华东大组会上突然推翻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当时我们是反对设国家主席的，王维国却撇开我们，主张各发各的，他在大组会上抢先发言，主张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徐景贤说：“王维国的批语（指王维国在王洪文发言稿上写的意见）很有用”，一定要把这个批语搞到王维国的罪证材料中去。那个负责整理王维国罪证材料的干部看了徐景贤转来的原件后，对王知常说：“这份发言稿怎么能用？里面都是吹捧林彪‘称天才’的话！”王知常看了原件后说：“徐景贤真是的，连他自己原来写了些什么内容都忘掉了。”可是徐景贤一再催促要整理，于是他们在王洪文、徐景贤的示意下，想方设法进行“技术处理”，王维国的批语全部影印，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作为“重要罪证”；而对王洪文的发言稿，则改头换面，只突出“不设国家主席，同意（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这句话，其与林彪遥相呼应的话则全部被删除。于是他们这篇紧跟林彪的反党发言稿，一变成为他们在庐山与

王维国进行“斗争”的证据了。

另一件事是张春桥指定要把“四·一二炮打事件”和王维国挂上钩。张春桥说：“‘四·一二’炮打是林彪集团的人搞的，当时（我）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江青知道有部队的背景，就立即找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来，逼他们表态。”“王维国专案组”的人，按照张春桥的这个讲法到处去找王维国插手的材料，但哪里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材料。最后，他们只好采取逼供信的办法，逼原空四军驻复旦大学军宣队的方耀华提供假材料。经专案组的人一次又一次逼供，一遍又一遍地要方修改供词，把“炮打”张春桥说成主要是林彪死党叶群、吴法宪、邱会作为后台，由王维国组织策划的，最后炮制了一份材料，塞进了《林彪死党王维国的罪证材料》中去。然而，当“四·一二炮打”事件发生时，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关系正搞得火热，后来正是叶群、吴法宪等帮助张春桥渡过了难关。张春桥说王维国插手要打倒他，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他想以此说明他早就与林彪集团坚决作斗争，这是徒劳的。

二十九、江青集团从上海抽调帮派骨干 去中央领导机构的猖狂活动

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长期以来，从不放松在中央机关中安插亲信的阴谋活动。尤其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变本加厉地推行“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加紧了以上海为基地，选派“真正能起作用”的“干部”去中央一些部门按放“钉子”，伺机夺权。他们在内部曾扬言要“象林彪培养周宇驰、于新野那样”，在上海培养一批骨干，送到中央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忠实秉承“四人帮”意旨，伙同金祖敏、王日初、黄涛等人，按照“四人帮”选“苗”标准，物色对象，精心培养，竭力想把那些所谓对“四人帮”有感情、“老造反”，“路线斗争觉悟高”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物，塞到中央、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岗位上去。他们为此进行了猖狂的活动。

（一）挑选亲信党羽为“十届中委”候选对象

党中央决定在1973年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四人帮”把它看作是在中央领导机构扩张帮派势力的关键性时机。1973年年初，他们就关照上海的党羽们从选拔“工人新干部”方

面作准备了。

1973年8月初，王洪文利用他担任“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的职权，竭力为上海争取增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分配名额，以便乘机把他们的党羽塞进中央领导机构，扩大他们的帮派势力。“九大”时，由上海提名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6人，候补中央委员有3人，共9人。“十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中分配由上海提名的分别为11人和5人，共计16人，比“九大”时增加7人。“九大”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陈敢峰，由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追随林彪一伙向党进攻，“十大”不能再当中央候补委员了，因此，除原来中委、候补中委8人外，还要新增选8人。“四人帮”为了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十届中央委员会里去，开始了紧张的密谋策划。

同年8月中旬，党中央通知“十大”各代表组就地召开“十大”预备会议，讨论“十大”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等草案文件。上海的“十大”代表集中住到锦江饭店南楼开会。预备会中途，王洪文打来电话，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先到北京去。马、徐、王到京的当天晚上，张春桥就到他们住处京西宾馆来，密商从上海抽调干部到中央工作的问题。张春桥说：“我本来不大愿意从上海抽干部，多抽了又要说是‘上海帮’，现在想通了，反正有需要，就要抽，顾不得避嫌了。”还说：“我和文元、洪文商量，准备抽一个工人中央委员到《人民日报》社

当社长。他不管编辑业务，那些知识分子也攻不着他，他在那里至少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情况。”“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老奸巨猾的张春桥也“顾不得避嫌”了。

张春桥前脚走，王洪文踉踵而来，他是来和马、徐、王具体商量在“十大”上安插亲信问题的。王洪文首先给马、徐、王各吃了一颗“定心丸”，向他们交底说：“这次马老（马天水）和金祖敏要从候补中委提为正式中委，徐景贤、王秀珍二人仍然是中委。杨富珍要从中委改为候补中委，你们要和她谈一下。这次上海不算春桥、文元和我，要进中委、候补中委的有13人，在全国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省市。本来考虑黄涛进中委的，因为全国老干部很多，安排起来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考虑以后让黄涛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这次就不进中委了，等黄涛来开‘十大’时，我准备找他谈一下。”

接着，这伙人就议论上海增补中委、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王洪文接过王秀珍递上的上海“十大”代表名册，翻阅一遍后说：“周纯麟和周丽琴可以定下来。”周纯麟当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他们虽然对周纯麟是不满意的（我们将在后面“四人帮”马、徐、王等阴谋搞乱上海警备区一章里讲这个问题），但也不得不把周摆进去。而周丽琴原来是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大队长、党支部书记，1968年经张宜爱推荐，由张春桥亲自谈话“相面”看中，被选为“九大”代表，后担任“市革会”副

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列席常委，因此这次又被王洪文看中。王洪文将“十大”上海代表名单逐个看了一遍，问了一些人的情况，皱着眉头，表示不满说：“这些人都不行。他们工作上还可以，政治上大部分是中间派，老好人，有些人是老劳动模范，从这里选不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王洪文越看越恼火，批评马、徐、王说：“你们这次选‘十大’代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选的标准有问题。这次主要应选新干部，这不仅是为了上海的需要，也是为了中央的需要。”后又说“在‘十大’代表中选不出人来，就从‘十大’代表以外选。”王洪文急不可耐地说：“今天晚上就要选出人来。通知上海的金祖敏、黄涛今晚不要睡觉，我睡不着觉，也不许你们睡觉，你们必须连夜给我找出人来。”王秀珍马上打电话找了金祖敏，传达王洪文的命令，金祖敏又于凌晨3时把市委组织组的王日初等人叫到机关等候命令。

接下来，王洪文问“十大”代表之外，还有什么人选？王洪文旋即自己推荐了两个对象，说：“冶金系统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周宏宝，一个是×××，哪个好？”提出问题后他又自己回答：“周宏宝造反早，工作也很好。”徐景贤、王秀珍看王洪文的脸色行事，立即附和，一个说：“周在同济大学当工宣团团长时工作扎实”；一个说：“他在民兵指挥部工作表现很好。”王洪文说：“这人抓民兵工作不错，春桥、文元要调个工人到《人

民日报》社去，就定下他当中央委员吧！”王洪文接着又提出机电一局系统要出一个人，这个人要从几个大的造船厂中选。马天水提出一个人来。王洪文摇头说：“恐怕摆不平。”接着他提出：“张国权这个人怎么样？我曾是江南造船厂的工宣团团长，和张国权比较熟悉，将来准备调他出来，这次让他做中央候补委员。”马、徐、王立即表示同意。王洪文又提出国防工业要有一个人，但在机电二局内选不出，“我考虑让5703厂祝家耀当中央委员。这人是造反派中比较好的，又有能力。”王秀珍马上附和叫好，说：“这个人好，他在王维国专案组和市委组织组表现都有路线斗争觉悟。”王洪文提出商业系统中要选出一个店员或工作人员，王秀珍讲她和金祖敏商量过，想提豫园商场的陈佩珍说：“这个人前几年我接触过几次，工作不错，敢于斗争，有斗争性。”最后，王洪文说：“这里面女的少了，再要选一个女的，最好是工会的。”马天水立即凑上去说：“汪湘君怎样？”徐景贤跟着说：“她在群众中有影响，将来可以搞市妇联工作。”王洪文表示同意。另外，还议到了一些人。有的王洪文不表态，有的王洪文说“要再了解、了解”，都作罢了。这样，以上海代表团名义推荐的“十届中委、候补中委”候选名单，就由这一伙人密议策划，主要根据王洪文的意见定下来了。

王秀珍立即打电话给金祖敏，由王洪文亲自布置，要他们当天将定下来对象的单项材料上报给他。材料上报时，王洪文

又问金祖敏：“陈佩珍什么时候参加造反的？”金说是1967年1月。这就意味着陈是“一月风暴”中杀出来的“老造反”。后来有人反映陈佩珍造反时间是1967年2、3月份。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差”，据说是属于响当当的“老造反”还是“随大流造反”的分界线，在帮体系内部对陈“啧有烦言”。金听后大为恼火，派人下去调查，开座谈会统一思想，说：“王洪文授权我，就这样定了。”但后来在一部分老造反、特别是王洪文那些小兄弟中仍有不满情绪流露。对此，王洪文自己也察觉到了，他对王秀珍说：“上海的一些老头头中没有一个进中委，有点摆不平。”感到是个“问题”。后来，王洪文亲自到总工会安抚那些老头头说：“上海这么多中央委员，中央是考虑调的，但不一定马上调，在座的同志也可能要调（中央）。”以缓和他们内部的矛盾。

投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定于8月28日进行，“十大”代表27日才看到候选人名单，根本谈不上充分酝酿、讨论。27日晚，马天水把上海的代表集中起来，宣布选举注意事项。马天水说：“上海要增加8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产生候选人的行业是中央指定的，具体名单是选举委员会考虑的。”不允许代表们提意见。徐景贤说：“中央给上海增加这么多名额是意料之外的，是对上海工人阶级的关心。因为产生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分布要照顾代表性，所以（有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从

‘十大’代表以外推选。”徐景贤这种语无伦次的话，解释不了为什么要在“十大”代表之外再推选候选人，反而引起代表们更多的意见。有人问，张国权是什么人？怎么成了候选人？徐景贤立即说：“张国权在批林批孔中表现好。”王洪文说：“这人我熟悉。”接着他就把5个不是“十大”代表的候选人吹捧了一番，总之是什么“造反早”、“觉悟高”、“感情深”等等。有的代表听后提出疑问说，这些人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连代表也选不上，就一下子成为“中委”、“候补中委”的候选人？有的代表在背后议论，说这些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真是飞来的洪福”。确实，有几个是睡在半夜里被喊醒送到机场，到了北京，一夜之间稀里糊涂就成了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党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十大”中一大批“四人帮”的骨干和亲信混入中央机构，这从上海来看特别明显。

十届一中全会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党中央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尤其是王洪文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将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们的一些党羽粉墨登场，弹冠相庆，相互吹捧。张春桥对上海“十大”代表吹嘘王洪文，说“上棉十七厂有名气、有贡献，贡献出一个王洪文”。王秀珍吹捧江青，说“人家提江青当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江青不同意，讲不要搞‘家天下’。她的思想境界高。”徐景贤到处宣扬“十大”的政治报告是张春

桥起草的，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姚文元起草的。马天水放风：“徐景贤本来要调中央的，我不同意，上海干部抽得太多了。”为徐景贤和自己脸上贴金。徐景贤又制造谎言说：“王秀珍够条件进政治局的，因为上海的人多了，就让给吴桂贤了。”这些“帮话”，既反映了他们的得意忘形，更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篡党野心。

（二）从上海密选帮派骨干去中央当部长

“四人帮”从上海“基地”抽调、派遣帮派骨干去篡夺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权，蓄谋已久。党的“十大”前后，他们的阴谋活动日益加紧。到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夜，江青阴谋组阁时，他们已经秘密准备了一大批去中央担任部长、副部长以及司、局长的人选，只等调令下达，就可以走马上任。江青的阴谋活动被毛泽东识破，组阁失败，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野心不死，仍然千方百计把他们密选对象中的某些人塞进了中央一些部门。

1973年初，王洪文迫不及待地要上海党羽们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1月24日，他亲自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大讲“培养新干部”的问题。他说：“上（海）、青（岛）、天（津）、辽（宁）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要为中央输送工人新干部。”“毛泽东考虑选拔优秀的年轻工农干部，培养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军委主席。”“各级搞组织工作的干部要深入下去，发现新生力

量。”王洪文下令要上海突击选拔一批“新干部”，随时准备调用。当时市委组织组头头金祖敏、王日初抽调大批人力，分赴工厂、农村基层单位进行选拔。到同年4月份，物色了200余名干部，从中选出100人，集中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办“选苗”学习班。王日初说：“这是王洪文亲自交办的任务，要在1个月内完成，考察这些人，从中选官。”市委组织组一些人则宣扬：“这些人要派大用场，都是去（中央）部以上（单位）的，100人马上派用场，100人作储备。”不料名单报送给王洪文后，王大为不满，责备上海的党羽们没有完全按照他和张春桥讲的标准去选拔，且没有多少人是他们“熟悉”的。密令金祖敏等抓紧重选。同年5月，金祖敏在全市组织工作座谈会上，大讲特讲选拔“工人新干部”的迫切性。他按照“四人帮”的调子，特别强调“现在要掌握一批优秀人员名单，以应急需。”

1973年8月底党的“十大”闭幕，上海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十届一中全会时，张春桥对他们说：“要你们当中委干什么？当中委就是要调你们到中央工作。”王洪文说：“上海要多培养人，准备调往（中央）各部。”张春桥露骨地说：“要选那些斗争觉悟高的造反派新干部，派到各部，闹个天翻地覆！”

“十大”以后，中央酝酿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青、张春桥一伙人通过“十大”已经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加强

了自己的势力，气焰更加嚣张。他们认为“四届人大”是进一步篡夺权力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江青蠢蠢而动，妄图由她“组阁”。于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加紧驱使上海党羽们挑选骨干力量，迫不及待地为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作准备。1973年9月，张春桥和王洪文指示王秀珍、金祖敏，马上“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准备到中央各部当部长，公开打出了“选部长”的旗号。王洪文强调指出：“‘十大’你们选了一批人，结果没有用”，“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是方向、路线性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张春桥也反复叮嘱：“要吸取‘十大’的教训”，“不要错过当前的时机”。王秀珍回到上海，召开会议传达张、王旨意，宣扬“要选部长，到中央去”，并立即伙同金祖敏、王日初等人具体进行向中央“输送部长”的选拔工作。9月29日，在王秀珍的主持下，经市委组织组核心组会议研究，首次确定7名“输送”到中央当副部长级干部的名单。同年10月起，专门办了“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对选中的对象进行考察，培养所谓“感情”。

1974年3月，王秀珍和王日初去北京，借口汇报“批林批孔”情况，刺探情报，了解“气候”。王秀珍在京的7天中，多次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谈。王、张、姚对她作了一系列“指示”，具体部署了密选部长、阴谋组阁的计划。粉碎“四人帮”后，从王秀珍处查出的她的笔记本，有她在北京与王洪

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的亲笔记录（节录）：

1974. 3. 23 下午 2: 30—2: 50

洪文××：

5、上海工作：上海这个地方相当重要，对全国影响大，各方面工作要作好，无非是抓两条，一条是抓阶级斗争，一条是培养干部，林贼一伙都能培养周宇驰、于新野，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一些年青干部呢？

7、关于干部问题，上海要准备二十几个人。

江青××要上海两个工人（从基层支部书记也可以）到文化组（部）工作。

要我们选一点人，抽上来考查，到各组、办来工作。

周宏宝、万桂红、陈佩珍、金祖敏、……。

1974. 3. 24. 下午 4: 50—8: 10

张：关于干部问题：

市革委要开个会。工会，各方面锻炼干部，可能比在市委好。

干部人员的安排市委可以先安排，调时再安排。

文元：关于中央各部跟我们要干部，要多少心里（还）没有数。

在与王秀珍的密谈中，张春桥一再叮嘱：“上海市委开个会，

抓紧部署”，“作出全面规划”，“对干部问题（要）有战略的设想”，“不仅考虑上海本市的需要，还要考虑全国的需要”，“这件事要不失时机！”“在京读书班的几位（指金祖敏等人）不回去了，你们怎么办？把列席常委调出来。我们要准备人选，扩大列席常委”。姚文元叫嚷“要注意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林贼和小林贼，他们是非常关心要害部门的。上海也要抓要害部门，抓好电台、报社、机场、铁路、电厂以及港口等单位。”王洪文说：“市委的常委、列席常委，准备全部调出来，你们思想上、组织上都要有这个准备。”他布置王秀珍准备好从上海调20个去中央任副部长的干部，提到要派人的中央部门有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人民日报》社、公安部、卫生部、一机部、六机部、冶金部、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等。

王秀珍3月29日回沪，急急忙忙跑到组织组传达“四人帮”的指示。她强调这次从上海调“部长”的条件必须符合王洪文、张春桥的具体规定；总的要求，要选信得过的人。首先，“要路线斗争觉悟高的”，“要老造反，不要保守派，老好人”；其次，在选拔过程中，“只要对‘工总司’有感情，社会关系复杂也不要紧”，“档案只能作参考”。王秀珍还一再强调任务的紧迫性，“当前最急的问题是干部问题，选择新干部不能再拖了”，“这个事情不搞好是罪过”。她和王日初、徐世玉等人研究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4月28日，市委组织组提出了一个88名中

央部长的备选名单，并将这些人的材料铅印成册，报送给正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金祖敏。

1974年7月间，金祖敏从中央读书班回到上海，带回了王洪文的指令：“国务院各部、委都要‘掺砂子’，都需要人”，上海要再报送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司、局长级干部的“备选名单”。金祖敏亲自连续召开“部长”人选座谈会，听取发言，考察相面，个别谈话。经过一系列活动，于当年10月又排出一份30人的备选名单，其中18名作为参加中央各部正、副部长人选，12人作为参加中央有关部的司、局长人选。这些人的人事材料由金祖敏、王日初直接报送给王洪文、张春桥等人。

1974年10月“四届人大”召开日期临近，“四人帮”进一步加紧了阴谋“组阁”活动。他们一方面背着党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的状，妄图搞倒周恩来，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一方面加紧在中央各部安插亲信，准备组织他们的“内阁”。在王洪文的督促下，马、徐、王等又紧张忙碌了一阵，于12月，搞出一份“拟送参加中央有关部领导工作的干部名单”（21人）和一份“拟送参加中央有关部司、局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名单”（20人）。1974年1月1日那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张敬标、黄涛、金祖敏、王日初等7人顾不得元旦节日，一头扎进锦江饭店小礼堂内又一次秘密策划讨论“组阁”人选名单，对12月份的名单逐个进行研究，最后

确定周宏宝、陈佩珍、陈杏全、张国富、吕广杰、姚富根、杨佩莲、秦宝芝、沈鸿寿、张秀清、万桂红等16人正式作为送中央任部长、副部长的人选上报。还有一些人安排在上海市的各级领导岗位上，进一步“培养”，伺机待命。他们选中的人，按照他们的说法都是“牌子硬”、“老造反”、“路线斗争觉悟高”、“（对‘四人帮’）感情深”绝对可靠的人。连这些人要调到中央哪些部门去都已内定了：十届中委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周宏宝知道自己将要调北京的消息后，曾向“四人帮”表示：“我到《人民日报》社会干什么？”王洪文说：“不是让你去审稿。”明白地指点派周去那里是按个“钉子”。）候补中委陈佩珍去商业部，市冶金局党委副书记陈杏全去冶金部，市邮电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张国富去水电部，5703厂党委书记吕广杰、江南造船厂党委副书记姚富根去六机部，团市委副书记杨佩莲去团中央，耀华玻璃厂党委副书记秦宝芝去建材部，市出版社党委副书记沈鸿寿、市建工局党委副书记张秀清去文化部，原定去团中央的万桂红（原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工人）改为去中央组织部当核心（王秀珍曾关照万桂红说：“你到中组部后，有情况要直接向王洪文汇报”）。这时他们真是忘乎所以，猖狂之极，似乎任命中央各部部长的大权操在他们手中，由他们“组阁”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了。

但是，“四人帮”阴谋“组阁”的活动受到毛泽东的严肃批

评。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王洪文长沙告状碰了个钉子，灰溜溜回京。11月12日，毛泽东又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1975年1月8日至10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全会选举了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支持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并任国务院总理的意见。“四人帮”“组阁”阴谋宣告破产。

“四届人大”一结束，“四人帮”深感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他们哀叹：“国务院只有文化部和国家体委是掌握在左派（即他们）手中。”金祖敏在上海市委组织组内泼口大骂：“他妈的！部长老的都任命了，新的一个也没有。”还散布“北京论资排辈严重，看不起上海在中央部门的新干部”，等等，发泄内心的不满。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们对于这次未能实现其篡权野心，当然是不甘心的。他们一方面窥测方向，等待时机，另一方面，变换手法，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陆续地、个别地向中央有关部安插亲信。除了前一段已安插于会泳（中央文化部）、徐海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金祖敏（全国总工会）、祝家耀（中央公安部）、张国权（第六机械工业部）等人外，从1975年3月至1976年2月间，又先后将周宏宝等5人分别安插进中央部一级单位的领导班子。

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又到，“组阁”活动又死灰复燃。王洪文说：“要注意发展一些骨干”，“要锻炼一支反潮流的干部队伍。”张春桥说：“形势发展很快，你们（指上海市委）要跟上。”马、徐、王在上海立即呼应。王秀珍在组织组的一次会议上，胡说什么“现在中央许多部不行了，7、8、9月，中央各部跟得很紧，只有文化部是顶的”，“各部老爷不好好看看，……。那里有长毒蘑菇的土壤，一下雨就发霉，就长毒蘑菇！”她还说：“辽宁过去中央要人不给，现在是想通了，上海也要准备人”，“今后送干部，要多少给多少。”市委组织组的头头王日初说：“在天安门事件^①中，中央各机关只有两个半单位（文化部一个，全国总工会筹备组一个，卫生部半个）经得起考验，那里都是上海的人在主持工作。”王秀珍布置组织组挑选一批干部，再次准备往外“输送”。“四人帮”及其上海的党羽密选“部长”、阴谋“组阁”的整个活动，直至“四人帮”被彻底粉碎，才以彻底破产而告终。

（三）培养“工人大使”，妄图篡夺外交大权

^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3月中下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在北京，人民群众向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敬献了大量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张贴了悼词、诗歌、祭文等。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引起“四人帮”的震惊。4月5日，他们借助手中的权力，出动武警民兵等进入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天安门事件”的发生，预示着“四人帮”覆灭之日即将来临。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决议，驱逐蒋帮，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国的影响迅速扩大，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在这种历史背景条件下，“四人帮”认为有机可乘，密谋篡夺国家的外交大权。于是，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擅自决定在上海培养所谓“工人大使”。

1971年11月25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关于做好尼克松访沪准备工作时说：“形势发展很快，外事任务重”，“外事干部要掺砂子，不能都是知识分子”。尼克松访华后，张春桥对王秀珍、冯国柱、金祖敏等人正式提出培养工人大使问题。他说：“外交部都是老人马，出席联合国的代表都是戴眼镜的，现在驻外大使没有工人出身的。”他狂妄地提出：上海“要考虑培养工人大使，要物色一批”，“还要培养女大使，苏联派出第一个大使就是女的”。张春桥下令“摸摸情况，作一计划”，对选出来的人，“可以在工作中培养，也可以在学校培养”。他还心怀叵测地说，对此事“要想得远一些”。

会后，掌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市委写作组的头头朱永嘉立即赶到复旦大学，要复旦大学党委马上起草培训“工人大使”的计划，内容包括可承担培训的人数，培训的时间，开设的课程，师资力量配备等。掌管外事工作的市委常委冯国柱表示，如果复旦大学师资力量不足，外事组可以协助解决。“四人帮”在上

海的一些党羽也纷纷亲自出马，拟计划，定名单，一场选拔“工人大使”的闹剧就此鸣锣开场。

11月27日，冯国柱在外事组核心会上传达了张春桥在市委常委会上的讲话。12月5日，他和金祖敏召开了“市革会”外事组、市委组织组有关人员会议，研究贯彻意见。根据张春桥“要想得远一些”的“指示”，初步确定选拔150名可以作为“工人大使”培养的对象。其中100人去复旦大学学习二年，50人去外事单位实习，在工作中培养，两年后相互轮换。当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共有70多个，他们竟然准备培养150名大使，不仅可将已派到建交国家的大使全部换下来，并把随着我国对外关系发展要派出的大使也准备好了，其用心可谓“深远”矣。1972年4月14日，市委组织组向市委提出《关于选拔、培训外事干部的请示报告》。4月17日，张春桥迅即批了同意。张当时在国务院既没有任何职务，在中央又不分管外事工作，不免做贼心虚，于是又加了一段：“我没有很好考虑，请市委先研究一下。外事组还可以非正式地问一问外交部、外经部有何意见。”姚文元也在报告上画了圈。市委常委都表示同意。马天水还要王秀珍在培训班开学时去做动员报告。

选拔任务通过市工交组布置下去，上海许多部门和基层单位，从来没有输送过这样的干部，也不了解当“大使”究竟需要什么条件，接到选拔任务又不得不报名单。12个工业局一下

子上报了2000余人。在基层单位上报的“人员审查表”上，出现了种种可笑的批语：“经党总支讨论，同意×××同志上报为外交大使人员”；有的基层单位觉得实在难觅“大使”人选，就在表上填写：“×××同志可担任参赞”。

基层上报名单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了113人，其中80人进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内开设的工人外事培训班学习，33人分到上海外事部门工作，称之为在实践中“锻炼”。1972年9月，“工人大使”培训班在喧闹的吹捧声中举行了开学典礼。王秀珍、冯国柱、金祖敏、朱永嘉等人亲自到场，由王秀珍作动员，其他人也都讲了话。他们吹捧学员们将是第一代真正工人出身的大使人材，并标榜自己是赞成办这个培训班的“积极分子”，说“我们的立足点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你们将来不可能每个人都当大使，但你们之中肯定会出现很多大使”。1972年10月，张春桥看了外事组送去的关于培养“工人大使”的《简报》。《简报》反映入学的学员感到“光荣”、“高兴”。张春桥说：“光说高兴、光荣还不够。不是叫他们跟在你们后边跑跑腿，不是自然成长的，要好好培养他们，目标是大使。要给他们看材料、订《大参考》，要创造条件。要他们写（接待外宾的）总结。目的是锻炼，不是别人代替他们写。”此后，培养“工人大使”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为此多次召开专门会议，有关培养的进程、情况和问题，都定期向

“四人帮”直接汇报。马、徐、王等多次去培训班做报告，组织“座谈”、“吹风”，说什么“你们这些人，有的要压担子、挑担子，有的要去掺砂子”，还特意安排一次所谓王秀珍的“接见”，培养学员们对“四人帮”的感情。

按照张春桥的意旨，冯国柱将上海举办外事干部培训班一事，非正式的询问过外交部的意见，外交部没有表态。后又以送简报形式逼外交部表态，结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上海办外语（事）培训班中央不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冯国柱碰了一鼻子灰，但“四人帮”置中央的批评而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张春桥对外交部竭尽攻击之能事，说：“外交部是老人马、老作风、老一套。”王洪文在一份简报上狂妄地批道：“外事队伍要更新。”

1974年7月底，所谓“工人大使”的培训班学员结业。“四人帮”一伙既未能把他们送往国外当大使，又无法塞进中央外事部门，于是就变换手法，在上海“储备”起来，以便一旦篡夺外交大权的阴谋得逞，立即抽调使用。8月6日，马、徐、王决定在延安西路200号举办这批学员的“毕业分配学习班”。生活上特别优待，一日3餐由和平饭店包办供应。（人们反映这样的学习班从未见过，真象是“大使级”学习班。）在王秀珍的亲自主持下，由掌管上海组织工作的金祖敏拟订了分配方案，报经王洪文、张春桥批准。有些人的工作还由王洪文指名分配和

安排。张春桥封官许愿说：“这些人暂时不当大使，以后有人还会当大使的”，并嘱咐“不要把学的外语荒废掉”。马、徐、王根据“四人帮”的意旨，强调分配要相对集中，并且不受派去单位原来编制的限制。当时结业的学员80名，都分配去外事部门和少数涉外单位，加上原来已在外事部门“实习”的33名，总数共113名。这批人中先后被提拔为局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23人，科级干部39人，即大多数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以便尽快“熟悉工作”，准备随时抽调出去。

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时，王洪文曾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及金祖敏、冯国柱等人叫到他的住所、特意询问有关“培养”和“储备”“工人大使”的情况，表示“关心这支队伍的成长”。但江青阴谋组阁失败，向上海抽调“工人大使”的计划也就搁浅。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一伙认为时机又到了，王秀珍、冯国柱等炮制了上海工人外事干部成长情况的报告，想把这批“工人大使”以“掺砂子”名义塞进中央有关外事部门去。他们狂妄地说，只要上面一圈，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外交大权一向高度集中统一在党中央，因此，“四人帮”妄图篡夺外交大权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三十、“批林批孔”中的第二次夺权

1974年1月，江青、王洪文向毛泽东建议得到同意，由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就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了。从那时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经过精心策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子，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假批林，真批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他们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搞第二次夺权，阴谋从上海掀起恶浪，进一步搞乱全国，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即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宣布江青“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并且第一次提出了江、张、姚、王搞帮派活动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对“四人帮”也进行了批评和斗争。毛泽东和党中央终究没有让江青、张春桥等人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揭露和严厉批评也为1976年10月能够顺利地彻底地粉碎“四人帮”打下了基础。

(一)“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旗号兴风作浪

1974年1月24、25日，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政治局，在北京擅自召开了两个万人大会，一个是驻京部队干部大会，一个是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大会，都名之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迟群、谢静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借口联系实际进行恶毒的煽动，同时对江青进行肉麻的吹捧。江青、姚文元等不时插话。特别是江青，她主持、操纵了这两个会议，大放厥词，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两个大会的基调是：“‘批林批孔’是当前头等大事”，“这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批林批孔’要联系各条战线批复辟倒退”。他们说，20军的一个防化连的“批林批孔”批不下去了，“遭到抵制了”，是江青亲自写了信，并派迟群、谢静宜专程去那个连队送信、送学习材料，才打开了局面。说江青那封信“不是单单写给一个连队的，也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问题”，“是贯彻‘十大’（精神），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为了说明全国到处都有人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反攻倒算，修正主义路线回潮”，江青、谢静宜大肆渲染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里发生的事情，说那里一个15岁的女学生，“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说那个学校几乎每天有一次考试，搞得学生头昏脑胀，“这个女孩有反潮流精神，她写了一些意见，结果就给逼死了。”又说“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

‘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他们突出地指出要联系“走后门”^①这个实际问题。江青声色俱厉地说：“走后门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走后门，光检讨，不纠正，是屁话！”他们还大谈“斗争哲学”，“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北京的两个万人大会召开后，消息很快传到各省市，上海有人传说“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批林批孔’要解决九次、十次路线斗争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批林批孔’实际上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王洪文的那些小兄弟们讲得特别起劲。粉碎“四人帮”后，从马天水等人的交代中证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②这个词，这股风，起初正是江青放出来的。

^① “走后门”是指一些干部通过某种关系为子女谋求上大学、参军或安排工作等。这种不正之风群众是反对的。但江青一伙在“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搞突然袭击，提出“走后门”问题，借题发挥，是别有用心。他们妄图搞乱局势，整倒反对她们的人。

^② 马天水 1978 年 3 月 27 日《我反对敬爱的周总理所犯罪行的补充交代》中说：“……1975 年 6 月 12 日，邓副主席为了挽救我，找我个别谈话。我当时站在‘四人帮’反革命立场上，采取对抗态度。……邓副主席说，当时你听说过‘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没有？当时我说，我听下边有人说过，我们纠正了。我这样讲，主要指的……总工会叶昌明说下边有人这样说。邓副主席当时又说，不仅下边有说过的，上边也有人说过哟！当时我没再讲。……在 1976 年 2 月打招呼会议时，一天晚上，江青到我住处，（又）把（南京军区）丁盛找到我住处。江青要我讲一下邓副主席对我个别谈话所谓策反问题（按：“四人帮”及其党羽把邓小平当时对马天水的批评教育和挽救诬蔑为“策反”）时，我谈到邓说三箭齐发，毛主席拨正了航向。邓小平同志说，当时有人说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上边还有人说过哟。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当时说过”，又胡说“我已纠正了”。

既然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么，执行“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谁呢？自命为正确路线代表的“四人帮”究竟要打倒谁呢？他们的目标是极明确的，就是要打倒周恩来以及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以进一步清除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通道上的一切障碍。这一点，在“四人帮”的亲信追随者中，都心照不宣；对于他们要拉拢的人，还多方“启发引导”，进行“交底”。^①特别是张春桥、姚文元豢养、控制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报刊杂志上炮制出笼了大量的毒草文章，连篇累牍地批什么“现代大儒”“党内大儒”，批“宰相”，批“折中主义”，批“经验主义”，批“崇洋卖国”，等等，恶毒地进行造谣诽谤、栽赃诬蔑、影射攻击。其主要矛头，就是指向周恩来以及中央、国务院几位领导同志。

关于“四人帮”怎样驱使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

^① 1974 年 2、3 月份，徐景贤因病住在医院，他找上海县“革委会”主任韩增春去，以谈批林批孔为名，进行反周恩来的“交底”。有这样一段对话：

“徐：毛主席为什么现在提出批林批孔？批林批孔总有所指吧？你看指谁？”

韩：是不是指郭老（沫若）？

徐：不是，他主宰不了国家局势！

韩：那我不知道。

徐：你猜猜看，不要怕，说错了我也不会批评你。

韩：是不是李德生同志？

徐：（摇摇头讲）不是！”

两人讲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讲了。韩已心领神会了。“四人帮”粉碎后，在清查中，韩增春揭发交代：“那时我心里很怕，主宰国家局势的人，再往上除了毛主席外，就是周总理了。”

等人，大肆运用影射诬蔑卑劣手段，疯狂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情况，以及“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指使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大反上海警备区，反南京军区的情况，我们将另立专章作详细的记述。下面着重要记述的，是“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如何驱使马、徐、王等搞第二次夺权的情况。这个所谓“第二次夺权”，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暴露了他们的阴险意图。正象他们在“帮”内部普遍公开地谈论的：“批林，批孔，批两个死人有啥意思，重要的是要揪活人！”“要上揪下扫”。他们的本意大概是要再整一整那些靠边后重新恢复工作而又对“四人帮”不够顺从的老干部们，因此，对他们来说，“批林批孔”也就是进一步夺权。对此，马、徐、王确是施尽了浑身解数，全力以赴的。

（二）张春桥、王洪文要马、徐、王带头搞第二次夺权

北京的万人大会刚召开，王洪文就迫不及待地向马、徐、王下达“指示”了。1月24日晚上，他打电话给王秀珍说：“今天在首都体育馆开了军队的大会，明天国家机关还要开，你们为什么不动？”“总工会要抓大事，‘批林批孔’就是大事。”他说“总工会要打头阵，可以召开万人大会，一竿子到群众。”王秀珍问大会如何开法，王洪文说：“要收集材料，联系文化大革命，上海有这方面的典型”，“比如讲文化大革命的怪话，发牢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问题要提得尖锐一点，翻案就是倒退，倒

退就是复辟，就是搞修正主义嘛！”

1月26日，张春桥也打电话给马天水，说北京已开了“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大会的实况录音正在整理，要发到各地去放，时间长约10小时。张春桥说北京的大会批了“走后门”，特别关照马天水“市委常委要检查一下，你们自己有没有‘走后门’的问题？如果有，要赶快解决，争取主动，不然运动一来就被动了。”马天水慌忙召开常委会传达张春桥指示。一查，常委几个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头一名就是张春桥，他的女儿就是“走后门”塞进部队又硬塞到大学里去的。

等了几天，北京的大会实况录音没有发下来。原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江青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大会录音被扣下了，不准下发。“走后门”问题准备放到运动后期去解决。

“四人帮”预定的部署初步受挫，他们当然是不甘心的。王洪文又给王秀珍去电话，说上海的万人大会还是照开，市委不开可以由工会系统出面召开。要大批“两个否定”（指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批复辟倒退。马、徐、王商量后，马天水又请示张春桥，张也同意先由工会召开动员大会，说可以放手让“工、青、妇”去搞，“出点岔子也不要怕”。

张春桥、王洪文等为什么这样急迫地要马、徐、王在上海先搞起来呢？据马天水在“四人帮”垮台后交代，他们的主要

目的是要上海打头阵，做出样子，搞乱一些地方，搞乱军队，整一批反对他们的干部，进一步篡党夺权。

经过紧张的策划，2月2日工会出面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工人‘批林批孔’大会”。“市革会”各组办、各区、县、局党委书记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被通知列席参加。市委的常委们都出席了，马天水、王秀珍讲了话。他们事先挑选了上海铁路局作为复辟倒退的典型，仅仅因为铁路局党委成员中缺少他们所谓的“新干部”。叶昌明等别有用心地安排好铁路局的人在会场递条子要求上台发言揭矛盾，从而把他们事先炮制的发言稿抛了出来。马天水讲话就顺“势”点名狠批了铁路局党委。王秀珍的讲话中点了普陀区骊山中学事件^①和化工局办公室副主任路

佩珊^①的名，说这是“两个否定”的典型。王秀珍要求各级工会“发扬一月革命风暴的精神”，发挥“工人阶级在‘批林批孔’中的主力军作用”，“要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领导群众狠批复辟倒退！”大会的其他发言有的点名批评一些局党委领导不力，有的指责某某人有什么“黑后台”等等。

这个大会既有“声势”又有“典型”；既有市委领导发号召，又有下面响应“揭矛盾”，立即起了煽风点火的样板作用。盘据在各级工会领导岗位上的王洪文小兄弟们，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们，个个欣喜若狂。尤其是一批因本身劣迹昭彰而被群众撵下台的造反派英雄好汉们，现在以受压制的“新生事物”自居，纷纷起来控诉党组织特别是结合进党委的一些老干部的“右倾保守”以及“倒退复辟”言行。他们说：现在又看到了“一月革命”的春光。他们成为批判、打击党委中仅剩的以及一度打倒后又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的急先锋。随着各级“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揭矛盾大会、老造反派座谈会的

^① 市化工局办公室副主任路佩珊，在“文革”中受迫害，被赶出机关，一度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对此，路向上级机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大量地突击式地提拔青年工人到各级领导岗位的同时，对革命的老干部采取了歧视和排斥政策，……把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项经常性的工作，变成了立即进行普遍的换班。”他批评这种做法“是林彪（彪）对干部政策的歪曲”。这一下戳在“四人帮”马、徐、王等痛处，可闯了大祸了，王秀珍在2月2日万人大会上把路说成是“两个否定”的典型。会后，化工局即成立专案组，对路隔离审查，炮制、印发路佩珊“反动言论”的诬陷材料，多次进行残酷的批斗迫害。

^① 1973年9月，当时正在申请入党的普陀区骊山中学教师胡祖丰，向学校党支部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了对“教育革命”的看法。他认为当时教学质量下降，尖锐地指出了“把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中‘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这两个前提取消了”，而且直接揭露了有些谬论就是出自某些领导之口。此事反映到市教卫组，区委某负责人又直接把材料交给徐景贤，徐当即指示“要在小范围批帮”胡祖丰，开始了对胡的迫害。10月批帮会上，该校党员教师刘正龙坚决支持胡祖丰的观点，因此也被批判。“批林批孔”运动中，为与江青提出的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相呼应，马、徐、王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2月2日万人大会上，王秀珍讲话中点了胡祖丰的名，说“骊山中学一个教师写了一份万言书，大肆攻击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想恢复原来的一套教育制度”。2月4日，徐景贤在“市革会”会议上提出胡祖丰的问题要在全市组织批判。“市革会”地区组的头头黄克带人到普陀区编写了《孔孟、林彪、胡祖丰反动言论三对照》材料。王洪文、马天水都作过批示。对胡祖丰、刘正龙的批斗急剧升级，胡、刘除遭受上百次批斗外，还下放劳动。徐景贤等又把骊山中学搞成“反复辟倒退”的典型，当时到骊山中学看大字报的多达11万人次。在全市中、小学里，掀起找“胡祖丰式人物”的恶浪。

召开，许多单位出现了冲击党委的事件。“工会当家，党委靠边”，上海滩又出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势头。例如化工局党委2月中旬召开的干部会上，几个工会干部冲上主席台，抢占了话筒，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无法主持，靠了边。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不仅要领导靠边站，而且提出了“重新夺权”的主张。这股风也开始由上海吹向全国。

面对这样的形势，那个自称“出卖灵魂、出卖原则、卖身投靠”（粉碎“四人帮”后，马天水在多次交代中自己承认这些罪行）的老干部马天水，心中也七上八下，有点“犯疑”。他怕乱了自己，于是与市委常委们商量，打算“适当引导一下”。当时徐景贤因病住在医院，马天水与黄涛去看他，说了准备召开一次工会系统的干部会议，要徐参加。中心意思是批“两个否定”可以，但不赞成重新夺权，不要搞乱了自己。徐景贤领会马天水的意思是由马出面对“新干部”讲这些话不方便，怕有人“不买账”，所以要造反上台当领导的徐来讲。徐也就同意了。

2月23日，在延安西路200号召开了工会干部会议，“市革会”各组、办和各区、县、局党委负责人列席参加。这次会议的精神正如“市革会”办公室编的《简讯》第54期的标题所示，叫做《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决心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说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这次运动的内容和要求，新干部和老干部、干部和群众都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要团结起来，共

同批修，把矛头对准林、孔，对准复辟倒退思潮”。徐景贤发言中提出了“正确理解一月革命精神”，“揭矛盾的积极分子对自己要一分为二”，“党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不要随便宣布靠边”，“不要抢材料”等等。这些就是马天水、黄涛、徐景贤共同商定的所谓“适当引导”的重要内容。24日，《文汇报》根据徐景贤的讲话，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文章。

23日工会干部会议的“精神”明显地不同于20天前文化广场万人大会的“精神”，这对于刚刚被“四人帮”和马、徐、王自己煽动起来的搞第二次夺权的“英雄好汉”们，无异兜头被泼了一瓢凉水。会后，工会那一伙王洪文小兄弟们首先大闹了起来。王秀珍乘机打电话给王洪文告状，攻了徐景贤一下。王洪文打来电话大发脾气。说“谁叫你们发表《文汇报》文章，你们知道在全国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有的省‘批林批孔’运动的火刚刚烧起来，现在就等着《文汇报》文章去把群众运动压下去。”总之，说徐景贤讲话是“灭火”。张春桥知道后也十分恼火。27日，马天水接到张春桥写来的密信，劈头就说《文汇报》的思想评论写得不好。信中强调“从严格意义上讲，一月革命风暴并没有把权完全夺过来，有的夺过来的又被夺回去了。不然，‘批林批孔’还批复辟倒退干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多次呢？”总之，张春桥从“理论”上指出夺权斗争是长期的、有反复，强调“批林批孔”是继续搞夺权斗争。

马天水接到张春桥的信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宣读讨论。马天水那时又变成“坚定的、正确的”了。他与王秀珍、金祖敏“帮助”了徐景贤。徐景贤一看张春桥都下了指示，马上改变腔调，作了“深刻”检讨，说自己的讲话“歪曲了一月革命精神”。他还向张春桥写了一封检查、认错的书。后来的情况发展表明，张春桥那封信对于“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谓联系实际，层层揪人，重新夺权，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马天水急忙利用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大会上讲话的机会，把张春桥来信内容吹了出去。

于是，马、徐、王等一致认为，上海的运动还要升温。

（三）马、徐、王点火基层搞典型

从2月上旬到3月中旬一段时间里，马天水等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到基层去煽风点火，搞“反复辟倒退”的典型，推动一些单位再次夺权。

2月10日马天水、王秀珍、朱永嘉、叶昌明去了上海灯泡厂，缘起于市委组织组编的《组工简报》第7期刊登的一篇报导《上海灯泡厂新干部入党阻力很大》。那里有个“老造反”张灿明，不说自己根本不够条件入党，却到处宣称自己不能入党是厂党委存在“倾向性问题，是一股逆流”。马天水等到厂即表示支持张灿明的“反潮流精神”，严厉批评厂党委一位副书记“右倾保守”。当即决定由市总工会、市委组织组、“市革会”工

交组三方派人成立联合调查组，第二天就进驻这个厂，并且由叶昌明坐镇指挥，反击“右倾翻案”。张灿明则于2月18日被突击发展入党，又于3月16日被突击提拔为厂党委“列席委员”，又去市总工会、市妇联以及市仪表局系统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反潮流”经验，到处吹嘘自己是“不怕枪打出头鸟”的“老造反”。这样，马天水、王秀珍等在上海灯泡厂既“发现”了压制造反派入党即否定“新生事物”的典型，又炮制了“反击两个否定”的典型。

3月1日，马天水、王秀珍又亲自去上海电子管厂点火，叫嚷“要把电子管厂对待‘文革’，对待新生事物，组织路线、建党路线（的问题）揭深揭透”。在此之前，马天水看了“市革会”工交组《批林批孔运动动态》第13期刊登的有关报道，在市委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上叫嚷“电子管厂的问题比上海灯泡厂更严重”。王秀珍接上话茬说“那里实质上是对造反派反攻倒算”。马、王到厂亲自为“造反派”撑腰后，那些老造反进一步揭发控诉厂党委，并揪开党委大整基层干部。这个厂就此被进一步搞乱，几年不得安宁。

马天水、王秀珍又窜到化工局所属上海第九制药厂，搞了一个“反复辟”的典型。这个厂的共产党员孙永健，1973年曾写了一篇文章对《文汇报》上刊载的《破格提拔，大胆使用青年干部》一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市委组织组的联络员发现

了这件事，编发了《组工简报》1974年第23期。2月27日，王秀珍在这期简报上批了“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狠批孙永健的反动文章”。3月2日化工局党委书记等赶到该厂召开职工大会，把王秀珍的批示连续宣读了3遍，当场把孙永健揪出来搞“喷气式”示众，反扭孙的两个胳膊绕场一周。3月16日马天水、王秀珍又直接到第九制药厂召开会议，整整开了3个小时。马、王等叫嚣“不能单打一，要以孙永健为典型，以九药为突破口，在化工局搞第二次夺权”。至于孙永健，立即被停止党的组织生活，对他办了3个月的“学习班”，多次被拉出去批斗。后来在全市组工会议上，厂党总支书记专门介绍了批斗孙永健的经验。

马天水、徐景贤、黄涛还一起到上海第五棉纺织厂去煽风点火。这个厂在1970年曾搞过一次“开门整风”，发布《告全厂职工书》，把造反派煽起的歪风邪气整顿了一下。时隔4年之后，纺织局的唐文兰诬蔑该厂是纺织系统中“右倾复辟”的典型，《告全厂职工书》是“反攻倒算书”。马天水等到厂，责令将早已调离该厂的当年厂党委书记朱仲民揪回来，接受揭发批判。朱被撤销一切职务，下车间劳动，遭迫害8个月之久。

马天水、王秀珍两次窜到上海冶金机修总厂竭力支持几个所谓老造反头头，诬蔑迫害驻该厂的军代表。“文革”初期，那些“老造反”曾冲击军代表室（按此事当时在林彪、江青一伙

人眼里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那里有一份敌伪人员名单一度找不到了，曾对那几个冲军代表室的造反派头头进行了查问，后来名单找到了，没有丢失，这事也就了结了。马天水、王秀珍来厂煽风点火，那几个“老造反”乘机告状，说是军代表伪造丢失文件有意整他们。马天水、王秀珍等正要找“两个否定”的典型，一拍即合。于是大批了军代表一通。说打击造反派，就是打击“新生事物”，就是搞“两个否定”。过了几天马天水、王秀珍又约同徐景贤、黄涛再到冶金机修总厂，先把厂党委几个书记找来，批了一顿，骂他们是“老糊涂”，接着召开了有2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在马、徐、王的煽动下，一个个的发言形成了对厂党委特别是对军代表的控诉。这样，冶金机修总厂作为“用假材料镇压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复辟典型，终于炮制出来了，后来在4月6日召开的全市“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万人大会上，进行了介绍。

除了直接到基层点火搞典型外，马、徐、王还不断在各类《简报》、《情况反映》上写批示，支持各单位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积极分子”，打击老干部，煽动第二次夺权。又怂恿、支持工会系统派出大批“联络员”（有不少人是下台的“老造反”，现在乘机再上台），到区、县、局和重要基层去抓运动。于是，各区、县、局等依样画葫芦，到处找复辟倒退的典型，大搞批判斗争和重新夺权。

(四) 王秀珍秘密赴京串连

为了窥察全国“批林批孔”运动形势，进一步了解、贯彻“四人帮”的意图，王秀珍与马天水商量，由她秘密去北京一次。经电话联系，王洪文同意王秀珍去。这次行动十分诡秘，除马天水外，市委常委们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外界了。同行的有市委组织组的王日初（因王洪文指名要他去参加一个专案组的工作）。3月20日，两人偷偷摸摸上了试飞的波音707客机（不买票）到了北京。王洪文派秘书廖祖康把两人接到钓鱼台王洪文那里，又把正在“工农兵读书班”的金祖敏等人召集来一起吃喝、看电影、密谈。王秀珍就在王洪文处逗留。24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三人一起“接见”王秀珍。25日，王秀珍才回上海。北京之行，实质上是“四人帮”和他们上海党羽的一次反革命串连。

“四人帮”粉碎后，据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的交代，当时在北京密谈阴谋策划的大致有3个内容。一是反军乱军，大肆攻击解放军。二是要上海抓紧所谓干部工作，为篡权夺权作好组织上的准备。王洪文要上海立即提供20个干部的名单，准备调中央各部任部长。三是对于“批林批孔”运动继续鼓劲。张春桥说“要抓一批矛盾尖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单位开刀，否则对中间的震动不大。”“‘批林批孔’运动中，从群众中还会涌现新生事物，要支持，要发扬。”姚文元说“先进厂如上棉十

七厂也要揭矛盾”。他们都强调“上海你们要放手工作，工、青、妇放手让他们去做”。谈到郊县的“批林批孔”运动，张春桥要上海搞个县试点，说什么，“如果乱了也才一个县”。谈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姚文元说“不是经过一、两次路线斗争就能解决的。”张春桥又说“这次运动是发现、锻炼干部的好机会，各组、办、工、青、妇都可以抽人上来锻炼，如中央要，就可以输送”。

王秀珍聆听了这些“指示”，如获至宝，赶回上海后向市委常委会作了传达。市委召开各种会议，积极贯彻。4月6日，市委又在文化广场召开“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进一步强调“一月革命以来，上海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权还不在于无产阶级手里，有的是当时就没有夺过来，有的是夺了又被夺过去了，对这种严重情况要有估计和认识”。“现在运动的情况，群众是发动了，也揭了大量问题，但发展不平衡，有些单位刚开始揭了个头，有些单位还没有动，求稳怕乱，怕烧到自己的头上，就是不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丧失的危险。”

于是，揭矛盾、批“两个否定”的风越刮越猛烈，第二次夺权的火越烧越旺。

(五) 第二次夺权的情况

第二次夺权究竟是怎样进行的？下面介绍一些具体情况。

1、工会打头阵召开动员会。

2月2日王秀珍等控制的总工会召开万人大会后，各系统、局、区纷纷依样画葫芦，由工会出面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如2月3日建工局工会召开的“建工局工人批林批孔大会”，2月4日机电一局工会召开的“机电工人批林批孔大会”，2月7日杨浦区工会召开的“杨浦区工人批林批孔大会”等等。这些大会都有上千人至五六千人参加。各级党组织、“革委会”的负责人被邀请列席会议，其中有些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会议是来“受教育”的。除领导人讲话外，都组织了“自由发言”，一伙人上台抢话筒，嗓门越大越好，慷慨激昂，制造“热烈紧张”气氛。讲话和发言都反复强调“批林批孔”是头等大事，要联系实际批“两个否定”，要发扬“一月革命”造反精神。一些单位被点名，扣上了“复辟倒退”的大帽子；一些干部被指责为“复辟派”“右倾保守”“新生事物促退派”“压制新生力量”“孔老三”等等。

2、召开“老造反”座谈会。

3月以后，全市层层召开“老造反”座谈会。这是运动加温的一个重要措施。这里所说的“老造反”，是指那些“文革”几年来由于犯了政治、经济、生活等各种重大错误而被群众撵下台的造反派头头，不少人曾被专政机关关押、审查过，有的是打、砸、抢成性的人，但现在都被王洪文、王秀珍等说成是“被右倾势力整了下去的新干部”。在座谈会中，主持者启发诱

导，煽动这些人搞第二次夺权。座谈会炮制、传播了大量的谬论：

他们以“帮”划线批“两个否定”。他们说“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要联系对待“一月革命”、对待造反派、对待王、张、江、姚“中央首长”、尤其是对待王洪文“工总司”——“帮”人的态度问题，谁反对、不满这一“帮”子的，谁就是否定“新生事物”、“否定文化大革命”。

他们叫嚷造反派失权受压了，“受压制者要造反”。有些人荒唐地说：搞大联合时，造反派失权50%，搞三结合时失权三分之二；党委会成立时，造反派100%失权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被压制的造反派要重新抬头。

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夺权，‘批林批孔’是自上而下夺权”。

他们认为自己下台是受了党委会特别是那些“老家伙”打击迫害的结果，他们要求“平反”，要求落实“干部政策”，他们责问党委书记和组织人事部门：“为什么老干部犯了‘走资派’大错误还落实政策当干部，而‘新干部’犯些错误就不落实政策了？”

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入党、不能当干部是右倾保守势力对“新生力量”的迫害。有的公然狂妄地叫嚷：“造反派就是要入党，造反派就是要当官！”“造反派就是要掌权！”

他们攻击一大批领导班子有所谓“三个不多，三个不少”，即“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积极的不多，当逍遥派的不少；政治上朝气蓬勃的（按：指头上长角、身上带刺）不多，埋头生产、业务的不少；斗争性强的不多，老好人不少。”他们甚至认为那些单位的“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已经倒退复辟了。

他们提出“现在要重新站队”，“老造反要立新功”。

经过座谈会的串连、煽动、鼓劲，“老造反”们个个磨拳擦掌，趾高气扬，准备冲杀了。

3、多种形式的冲击、夺权。

3、4、5月份是高潮。全市层层召开揭矛盾大会、党委扩大会、工会干部扩大会、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发动“群众”，放火烧荒，写大字报，冲击干部，乱哄哄一片，制造紧张气氛。且举一些单位的事例：

工交系统的机电一局继2月4日5000人动员大会后，2月9日在上海船厂召开批“崇洋复古”现场会，3月4日在江南造船厂再次召开全系统揭矛盾大会。之后，又在3月20日召开200多名工会干部会议，23日扩大到基层厂工会干部1000多人，煽风点火，揪“复辟倒退”代表人物。在工会干部扩大会议上，当场宣布撤销长江电器厂一名党总支委员兼工会主任的职务，罪名是“对‘批林批孔’有抵触情绪”。经过这样一系列活动，由各级工会发号施令，第二次夺权的运动在全局范围猛

烈展开。在2、3个月内，揭出有“两个否定”问题的单位186个，占全局所属工厂单位数的45%。被点名的上千人，其中厂一级领导干部103人。另一方面，又打出“要落实‘老造反’政策”的旗号，限令局的干部人事部门在3天之内起用一批因各种问题下台的“老造反”头头，安插到局和厂的重要岗位上。

冶金局3月18日、23日在上海第二钢铁厂礼堂两次召开全局系统“批林批孔”大会，“老造反”们上主席台“放炮”点了10个局级和厂级领导干部的名，叫嚷“有人执行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攻击局党委利用“一打三反”迫害“新干部”。会后各基层厂工会纷纷仿效，一些作恶多端而下台的“老造反”趁机翻案，一大批基层厂党组织受冲击而处于瘫痪状态。

在纺织局，层层揪“右倾复辟代表人物”。几个月内，全局系统被宣布停职靠边的干部510名，其中厂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99名，中层干部216名。涉及157个部门单位。

在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那个飞扬跋扈的戴立清（王洪文小兄弟“五虎将”之一，窃据局党委副书记之职）等搞得更是杀气腾腾。3月28日，他们在联合机械厂召开“再批克己复礼现场大会”，又在胡乐、东至、绩溪、旌德、贵池、岩寺等地设立分会场，有近万人收听拉线的大会实况广播。他们借口联合机械厂“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压”问题，把这个厂说成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典型”。大会宣布：厂党委、厂

“革委会”停止工作，由另行成立的“厂革命领导小组”接管；原厂级领导干部中有两人被“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审查，并当场由武装民兵反扭胳膊押出会场，关进隔离室；两人“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边劳动边交代问题；一人停职检查。这次大会后，各公司、基层厂纷纷学样，批斗干部，上访告状，起哄闹事。一个时期内，后方基地许多单位陷于瘫痪状态。随后戴立清等有计划地搞了干部大换班，安插亲信，排除异己，特别是搞掉不顺“帮”的老干部。

在江南造船厂，马、徐、王在王洪文指使下，借“批林批孔”刮起反“军宣队”的再夺权，原来的“军宣队”被套上了“两个否定”“复旧复辟”“林彪反党集团死党的黑手”等等帽子。随之在全厂进行大换班。从厂级到科室车间、工段，换了348名干部。与此同时，用点名入党，突击提干的办法，把大批投机分子、打、砸、抢分子等有各种问题的人网罗进来，封官加爵，委以重任。

基本建设系统的建工局，在2月3日大会后，3、4月份召开一系列煽风点火的会议，公开提出“这次运动有个重新站队的问题”，一些下台的“老造反”公开翻案，“杀”出来重新拉队伍，一大批基层单位陷于混乱瘫痪状态。物资局4月份开了4次局系统揭矛盾大会，参加的4000多人次。局党委被指责为运动的“阻力、绊脚石”，“（搞）圈套，（耍）阴谋，转移斗争

大方向”。4月10日晚上，局下属的机电产品管理处一帮“老造反”头头，到局党委哄闹，他们瞪眼拍桌，谩骂局党委搞“修正主义”，威胁要冲砸档案室，要挟局党委交出所谓“黑材料”。他们从晚上7时开始闹，一直闹到次日凌晨4点钟。木材管理处一伙人，公开叫嚷“局党委不得力，我们自己干！”甚至攻击局党委“你们现在还搞一党专政？！”

市“财贸办”3月4日在上海杂技场召开财贸系统“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四人帮”党羽、王洪文小兄弟“五虎将”之一的黄金海在会上点名批评了外贸、水产、粮食、商检等4个局、6个公司、3个批发站和一大批干部，列举了30多个所谓“复辟倒退”的事例，编织罪名，迫害干部群众。如上海酿造五厂共青团支部书记年纪大了一些，黄就指责局与公司一级有人看不起“儿童团”，不选青年人任团支书，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右倾思潮作怪”，就是“否定‘文革’”；供销公司第二批发部“一月革命”老造反40多个，一个都没有入党，黄金海说这“是对‘新生事物’，对‘文革’的态度问题”等等。

财贸系统下属各局也搞得很凶。商业一局从上到下，层层召开揭矛盾会议，一批干部被点名批判。有的干部被作为“否定‘文革’”的典型，在4月20日揭矛盾大会上当场揪上台“示众”，并停职检查。商业二局和所属单位召开所谓揭矛盾会议和各种座谈会1000余次，贴出大字报6万余张。水产局在3

月4日召开3000人参加的“水产工人‘批林批孔’大会”后，专门成立了“‘批林批孔’工作班子”。后来，渔业公司和渔轮厂被作为复辟倒退的典型，说那里的老干部镇压造反派，对造反派进行了“反夺权”，诬称渔轮厂有一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小集团”。4月2日，“市革会财贸办”派出“批林批孔”联络组，根据黄金海的批示，组织内查外调，对18名党员办了两期所谓“专题学习班”，进行迫害。

科技系统从3月起先后召开了9次大会交流所谓批林批孔经验，发动各科研院所层层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1416所、冶金所、1932所、植生所、情报所的党委书记、负责人都被点名批判。

在教卫系统，借“批林批孔”和第二次夺权，搞了不少冤案。如在华东师范大学，搞了三大冤案，一是把地理系中国地理教研室打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的教研组”，列举了76条“罪状”，主要是因为那里的部分教师曾讲了对“四人帮”上海党羽们不满的话；由于同样原因，物理系的911科研组被打成“一个右倾思潮严重的科研组”，被批判一个多月，全校通报；一名政治教师因在讲课中批评了徐景贤，又揭了《解放日报》《文汇报》的一些问题，竟被变相隔离审查数月之久，被批判六七十次。

在市卫生局，一些人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批林批孔’

战斗组”，打着“反复旧”“反对压制新生事物”的旗号，批判局里已经“解放”“结合”的老干部，说他们执行的还是“业务第一”“专家路线”。3月间，王秀珍乘轿车去第二结核病防治医院探望病人，门卫不让进，王大发雷霆，惊动了市文教组和市卫生局一些人，诬称第二结核病防治医院内“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发动那里的医务人员和病员揭矛盾，把这所医院打成“城市老爷医院”的典型；4月4日卫生系统在那里召开现场会，批“克己复礼”，^①迫令医院负责人作检查。

在市区，也都乱起来了。

黄浦区区工会连续在五星剧场、延安剧场、大光明电影院等处召开“‘批林批孔’揭矛盾大会”和“彻底揭开黄浦区阶级斗争盖子大会”。全区各方面的“老造反”头头们麇集一起，有些人不邀自来，台上台下，会内会外，互相呼应。他们乱揪乱斗干部，气焰嚣张。在大光明电影院召开的那次会议上，一个因有错误正在受审查处理的老造反头头窜上台抢话筒，操纵了会场。有14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当场被揪到会场前面“受审”。一些坏头头公开翻案，并且公开要党票。在五星剧场召开

^① “克己复礼”是林彪生前信奉的信条，“9·13”事件后受到群众性的批判。此句出自《论语·颜渊》篇，颜渊问孔子何为“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克己”为克制自己的私欲，实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林彪以这种方法，表面上伪装成道貌岸然，私下里搞阴谋诡计，以掩盖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的揭矛盾大会上，由于各派勾心斗角，互相冲突，几乎引起殴斗，一片乌烟瘴气。

在静安区，叶昌明奉马天水之命去“关心”那里的运动，一到区里，就叫嚷“静安区不安静，有激烈斗争，严重的复辟倒退”。最后把区委书记、区革会主任（“文革”初原为区人武部副政委）赶走，由“工总司”派出的区工会主任钱永年取而代之。

在普陀区，马、徐、王把工会推荐的倪叔英派去任区委副书记“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倪在4月份内连续18天召开多次全区性揭矛盾大会，上至区委书记、常委，下到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大批干部被点名批判，名之为“上揪下扫”。与此同时，网罗了一大批有严重问题的、曾被政法部门关押审查的人，举办“老造反”“新干部”学习班，学习后安插到区委、区革会各组办去掌权。

在闸北区，一伙“老造反”头头公开喊出“我们造反派夺的权，给老干部拿去了”，要把已“解放”的干部重新打倒。在长宁区，区级和基层领导干部60余人被点名批斗。在徐汇区，一名区委副书记（“文革”初的区人民武装部政委）被指责为“全区复辟倒退的总后台”，等等。

有些单位派性发作，打派仗。特别反映在领导班子内部，僵持不下。如郊县的松江县，“文革”初期两派斗争就很剧烈。

（一派称为“支派”，一派称为“袁派”）后来算是联合夺权了。在县委、县“革委会”领导班子中，两派都有人。但是从县级领导到下面干部，派性未泯，一直存在分歧。“批林批孔”中发动群众揭矛盾，派性斗争又表面化了，大字报互相攻讦，甚至在两委会（县委会、“革委会”）上公开责难，剑拔弩张，相持不下。县里解决不了，就往上跑，大字报贴到“市革会”郊区组，强烈要求市委和“市革会”郊区组“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六）“谁叫你们自己搞乱了自己”？

在这场打着“‘批林批孔’联系实际”旗号，搞第二次夺权的过程中，最起劲最活跃的要算王洪文的那帮小兄弟们了。他们造反起家，已经是市委、“市革会”组、办、局等的负责人，但仍然以“帮”工会为他们的大本营，串连频繁，兴风作浪。3、4、5月份，王秀珍经常在东湖招待所，纠集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以及王日初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阴谋策划。他们多方面刺探和交流运动情况，对区、县、局和各系统重要基层单位逐个分析排队。要批判什么人，打倒什么人，撵走什么人，工会如何行动，如何“造”舆论，揭矛盾、开批斗会，有哪些“老造反”头头可以选拔安排到领导职务上去，等等，都由他们秘密商定。有了“四人帮”给的“工会打头阵”的上方宝剑，他们实际上成为第二次夺权的指挥部。

这是又一次的“踢开党委闹革命”。但这一次的客观环境与“文革”初期完全不同。“四人帮”和马、徐、王等篡夺上海的党政大权已经8年。全市各级“革委会”和党组织的建立、恢复都是经他们之手批准的，人员是他们遴选的。至于按照中央政策他们不得不“解放”、“结合”或安排的老干部，即被他们看作是“右倾保守势力的基础”的，除了极少数卖身投靠者外，绝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多少实权的，又何必兴师动众搞第二次夺权呢！

但是，第二次夺权风愈刮愈猛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更加混乱了，许多基层单位的领导搞垮了，工作和生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不满情绪在滋长、蔓延。人们的不满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大多数干部、党员和广大职工群众对于本单位又陷于乱糟糟的局面强烈不满。他们对所谓“批林批孔”、“批复辟倒退”感到厌恶、腻烦，但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绝大多数人采取抵制、不参加的态度。那些自命为“受压制的新生力量”的“老造反”头头们，是第二次夺权运动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但他们也很不满意。因为他们欲壑难填。如原“工总司”轻工业局联络站头头常某，因搞打、砸、抢曾被判刑两年，耀华玻璃厂造反队头头徐某，因陷害“不同观点”的人曾被拘留审查，他们现在喊出“人家造反坐位子，我造反吃官司”，都提出要“落实政策”，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闹。这类人

各单位多少不等，有一个就可以闹得人仰马翻。再一种人是各单位当权的、办事的，他们也不满意。他们反映这种所谓“落实政策”是“烧香引鬼”。他们说：“不讲‘落实政策’蛮太平，一讲‘落实政策’就摆勿平”；“不讲‘落实政策’蛮好办，一讲‘落实政策’倒麻烦！”“你不动他，他就靠边站，你一找他，他就乱捣蛋，你落实了思想，他就和你要位子，你落实了本人，他就和你谈儿子，你落实了钞票，他就和你要房子”。哀叹“解决这些事情实在没法子”。当时许多部门和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着所谓“三难三缺”思想，即“干部难当缺权威，群众难弄缺奖罚，工作难做缺王法”。马天水挖空心思，强词夺理地说这种“三难三缺”思想是复辟倒退思潮，是否定“文革”的思潮，是想恢复“文革”前那种“咳嗽一声、鸦雀无声”的统治。粉碎“四人帮”后，马天水交代，“这是“四人帮”以及我们打击迫害广大革命干部，支持了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造反派新生力量造成的恶果。”

第二次夺权的邪火愈烧愈旺，打击面越来越大。马天水惊呼：“大字报已经贴到（市委、“市革会”）各组、办和市委机关来了”。他感到已乱到自己头上来了。4月中、下旬，杨浦区委召开扩大会议揭矛盾，开了6天，有800多人参加，把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敬标叫去参加，有些事逼着张表态回答问题，会场上高呼“张敬标要老实交代”等口号，搞得张几乎下不了台。

有些“老造反”头头们不仅“踢开党委闹革命，”连“帮”工会的话也不管用了。郊区奉贤县有一批人亮出“一月革命造反派”的名义，以标榜自己是最最革命的“一月革命”的继承者，攻击其他当权的造反派不是“一月革命”派。他们贴大字报，写大幅标语，炮轰奉贤县委。

形势逼得马天水不得不打电话将上海乱况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听着，听着，越听越不是味道，厉声指责马天水：“谁叫你们自己把自己搞乱的？！”马天水慌了，连忙检讨：“我有责任！我有责任！”同时又说“这和你2月底给我写的那封信有很大关系”“是根据你2月来信的精神搞的”；并说“总工会在这里边起了不小作用”。张春桥不曾想到祸根还在于自己的那封信。听了这些话，沉默不语了。

（七）紧急刹车和刹车以后

张春桥接了马天水电话后，与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紧急商量，由王洪文通知王秀珍，叫她先做那帮小兄弟的工作，总的精神要紧急刹车。

火已经烧起来了，要刹车灭火也不那么容易。为此，马、徐、王等也着实伤了一番脑筋。经过紧张策划，他们搞了一个“促转化”的花样。他们说，前一阶段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揭矛盾揭出很多问题，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发展是健康的。但是揭露矛盾后，更重要的是促使矛盾的转化。为此，被批判的同志

要承认错误，检讨改正错误。只要检讨改正了，还是好同志。揭矛盾的积极分子要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同时对自己也要一分为二，学习老同志的优点，加强团结，增强党的观念，等等。总之，在“四人帮”和马、徐、王的葫芦里，两种法宝是常备的，要“乱”，就“揭矛盾”；要“稳”，就“促转化”。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里要提一提的是，4月中旬，党中央曾经发过一个12号文件，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重申毛泽东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文件还规定解放军“三支两军”^①人员不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等等。马、徐、王现在利用“贯彻12号文件精神”的名义来“促转化”了。

王秀珍召开帮工会的常委会，说要学习12号文件，对照文

^① 三支两军：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干部、战士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组织）、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件精神总结前一段的运动。她说前一段运动成绩很大，发展健康，但随着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冲档案材料、封办公室，自己成立组织，不听党委也不听工会的话。她说：“我们的头脑不能发热，揭矛盾只顾揭啊，揭啊，再这样搞下去，要乱了我们自己”，“杨浦区把张敬标叫去参加800人的揭矛盾大会，当场逼着张表态。……今天可以要张敬标到场，明天可以要别人到场，这不是搞到市委头上来了？市委还要不要领导呀！”当时王洪文那帮小兄弟们都嘀咕，看来，要收场了，揭矛盾不能这样再揭下去了，要出问题了。但“放手让工、青、妇去搞，出点乱子也不要紧呀！”“要加温，不是降温”“要发扬一月革命精神，老造反要立新功”“可以召开老造反座谈会，鼓励他们冲锋陷阵呀”等等，都是张春桥、王洪文、马、徐、王提出来的，怎么一下子又翻了？为了安抚这帮小兄弟，王秀珍一再说“马老（指马天水）非常爱护我们工会，一定要我们工会先开会把这个精神（按：指刹车）传下去，做工作，这样比较有利，不会挫伤工会的积极性”。等等。会后，把王秀珍讲话整理后送马天水，徐景贤又作了修改，然后作为“总工会常委会学习12号文件的体会”，印发各级党委“学习讨论”、传达到群众。马天水说：“这个讲话很重要，是工会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很好，这是市委讨论过的。”

但是，各区、县、局和基层单位意见很大。一种反映：前

一段揭矛盾就是错了，王秀珍这个讲话实际上是纠偏的。另一种反映：刚刚开始揭出问题，为何来个急刹车？！有的说：“以后孙子王八蛋再揭矛盾，现在烧了夹生饭，结了怨。”

马天水非常着急。他想来想去，只有加紧迫使那些被揭发到问题的干部承认错误，作检讨，加紧“促转化”。从5月3日到15日，马天水几乎天天召开区、局和基层干部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他反复讲，首先要肯定揭矛盾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目前被揭的不通，认为揭错了，揭的也不通，认为还不够，所以双方僵持着。揭露矛盾，要解决矛盾。怎么解决？首先被揭的要真正认识错误，真正感到群众的揭发帮助是对自己的爱护，犯错误的只要转化得好，仍然可以信任和提拔重用。同时，揭矛盾的积极分子也要对自己一分为二，要有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的胸怀。马天水要求各局、各区抓这两方面的典型，让这两种典型现身说法，然后市里开大会。经过这样的“努力”，马、徐、王等果然物色和“培养”了一些转化的“典型”，其中也确实有人因为“转化”得好，很快得到了提拔。

正当马、徐、王等要召开全市性大会“促转化”时，5月18日党中央又发了〔1974〕17号文件。文件中有一条规定人民解放军军以下的机关和部队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批林批孔”要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搞好。联系12号文件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的规定，下面又纷纷

强烈反映：“中央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领导机关，我们前一段为什么只烧下面？市委及其部门难道就没有问题？”

这一来马、徐、王又大伤脑筋了，如何答复下面提出的问题，安抚下面的不满情绪呢？马、徐、王讨论了几次，总觉得不能“自圆其说”，讲不出比较象样的“理由”。5月底，召开了市委、“市革会”联席会议，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下午，还在研究马天水总结讲话中如何讲这个问题。马天水总感到“说服力不强”。最后马天水又与张春桥通电话请示。张春桥又作了“指点”，说：“首先要分清军队与非军队的区别，军队不搞‘四大’，地方可以搞；机关与基层是重点与一般的区别，不是搞与不搞的区别，因此前一段搞基层也是对的，而且机关也是搞的嘛，局与区不是都搞了？”马天水这才如释重负，对起草讲话稿的人说：“把（张春桥说的）这个意思加进去，再发挥几句，可以说清楚了。”在市委、“市革会”联席会议上，王秀珍大讲新干部要向老干部学习，徐景贤讲“学习理论”问题，马天水首先讲自己在“文革”初如何受到“群众”批判，后来“转变立场”、“改正错误”的体会，接着对运动作了“部署”，实际上就是把张春桥、王洪文关于上海要稳住、上海不能乱了自己、现在这样的第二次夺权要紧急刹车等精神贯彻下去了。（人们分析张春桥等之所以“果断”地来一个急刹车，除了怕搞乱了自己老案以外，还由于他们要上海带头搞第二次夺权，影响、搞乱

全国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了。）这以后虽然广大干部、群众中以及“帮”体系内部还有很多意见，但在上海不再提第二次夺权了。

“第二次夺权”虽然刹车了，但“四人帮”和马、徐、王等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反而更加加紧了，只是方式方法有所改变。在上海，1974年6月以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突出地抓了两件事。

其一是召开组工会议，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6月25日市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后，层层贯彻会议精神，在全市刮起以帮划线、结帮篡党的“双突风”。马、徐、王等提出“要在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批林批孔’的成果”，要“不失时机”，“最重要的是要集中解决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否则充实各级领导班子也是空话。当然，不能再提造反派（这个词），可提九、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于是，点名发展，坐镇压阵，另立标准，相面选苗，“飞过海”，限期提拔，没有“新干部”的领导班子不批准等等花样都用上了。大批投机分子、打砸抢分子、腐化堕落分子、甚至刑事罪犯混入了党内和干部队伍，并被安插到各部门、单位的领导岗位，造成党内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其二是大搞“评法批儒”^①等等所谓理论学习运动，“培养工农兵理论队伍”。实际是用“四人帮”的谬论搞乱人们思想。7月8日、马、徐、王等召开有24万人参加的所谓“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经验交流大会”（设200多个分会场），有上钢五厂、钟表元件厂、沪东造船厂、川沙县六里公社艾南大队的“理论学习小组”的代表发言。诸如此类会议，以后还举行了多次。8月6日，马天水，王秀珍亲自到上钢五厂，送去江青致该厂二车间理论小组的信和《论语》选批、《三字经》选批的修改稿。8月8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张敬标又陪同迟群、谢静宜去上钢五厂召开会议，听取对“修改稿”的意见。马、徐、王等乘机在会议上肉麻地吹捧江青。“四人帮”和马、徐、王等通过这些活动，继续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搞乱人们的思想。

^① 在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借机掀起大反周恩来、吹捧江青的所谓“评法批儒”的恶浪。他们编造了所谓的儒法斗争史，胡说儒家要复辟，法家反复辟，“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此问题”。江青露骨地宣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现代大儒’”，并暗示周恩来就是“现代的大儒”。同时他们以评价法家的进步作用为手段，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上台制造舆论。

三十一、“四人帮”驱策马、徐、王阴谋 搞乱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

党的“十大”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党中央的势力得到加强，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进一步膨胀。篡党必然要篡军。人民解放军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极大障碍。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江青等人就把搞乱军队，趁乱篡军夺权作为运动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江青从1月13日起，接二连三地以她个人的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又派迟群、谢静宜去二十军防化连送“学习材料”，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在1月24日驻京部队干部大会上，她搞突然袭击，肆意攻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王洪文、张春桥一起兴风作浪，叫嚣“批林批孔”“就是要解决军队问题”。他们攻击军委总参谋部领导“右得不能再右了”；胡说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总后勤部的领导“垮得越彻底越好”。3月5日，江青召见于会泳、陈亚丁等人，赤裸裸地叫嚷要“整一整军队”、“放火烧荒”。3月6日，王洪文跑到总参叫嚷要“揭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与此同时，他们迫不及待地驱策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

徐景贤、王秀珍向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发动进攻。

(一) 张春桥、王洪文等早把上海警备区看作敌对势力

张春桥、姚文元等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后不久，张春桥又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洪文任上海警备区政委。他们对人民解放军深具戒心，唯恐部队反对他们搞的篡党夺权的那一套。1967年2月间，张春桥就诬蔑上海警备区是“一小撮”走资派的“避风港、根据地”，指使他豢养的特务组织“扫雷纵队”（后改名为“游雪涛小组”）到警备区进行特务活动。“扫雷纵队”的头目游雪涛派纵队成员夏运开去警备区，勾结军内几个所谓“反廖（政）派”，非法地秘密收集了警备区党委会会议记录及大量机密材料，整理后密报张春桥。1968年春节刚开过全市拥军优属大会，张春桥私下却对王洪文说：“我们的头脑要冷静一些，人家（按指军队）是不是相信我们啊！”王洪文则大骂：“什么解放军，都是老保！”同年4月上海掀起第二次反对张春桥的浪潮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打电话指示三条：一、带好部队；二、不表态；三、听最高（按指中央、毛泽东）的。当江青通过叶群、吴法宪、李作鹏下令三军造反派不得参加反张春桥的行动（这实际上是保张春桥）时，廖政国坚持不表态。张春桥一伙对此很恼火，耿耿于怀。那个时期他们竭力拉拢林彪的党羽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妄图利用王维国等的所谓“支左”部队，加强他们的帮统治。但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张春桥等一方面为消除了争权的强大对手而庆幸，一方面又为失去王维国那个部队“盟友”而惋惜。1970年7月周纯麟接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他坚持原则，同廖政国一样不听张春桥那一套。王秀珍曾恶狠狠地攻击周纯麟：“到上海不久就做了（上海）市委书记，参加‘十大’，选上中央委员，但对市委（按指‘四人帮’、马、徐、王）无感激之情”、“态度很坏”，“执行没有廖政国的廖政国路线”，其“根子在南京军区”。十届二中全会时，张春桥对他同伙哀叹：“我们手里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虽然我是第一政委，王洪文也兼政委，有什么用？他们不听我们的！”，“好多事情不让我知道。”王洪文也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中，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张春桥甚至说过：“我在上海是住在老虎窝里。”他们一伙早就把上海警备区部队看作敌对势力了。张春桥、王洪文等建立和扶植市民兵指挥部，阴谋割断人民解放军领导和管理民兵工作的传统，大搞第二武装，就是直接以上海警备区为“假想敌”的。他们把上海警备区的主要领导干部看作眼中钉，并且认为这些领导干部软硬不吃、不跟他们走的根子在于以许世友为司令员的南京军区。

(二) 派出“记者”、“联络员”，插手上海警备区机关的运动

1974年1月中、下旬，“四人帮”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宣传部门的权力，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单位抽调了80余名记者，举办了一个“批林批孔记者试点学习班”。新华社上海分社有两名记者是这个“学习班”中的“学员”。在10多天时间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多次“亲临”学习班向记者灌输反军乱军思想。他们说什么军队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遇到了“捂盖子”的问题，煽动和利用记者到全国各地的部队中去“揭盖子”。江青气势汹汹地要记者下去向部队的当权派“开炮”，要记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江青还借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句烈士的遗训，让记者为她去卖命。张春桥则要记者象杨子荣那样，“有勇又有智”，敢于为他们搜集军内情况，并当场点了几个大军区司令员的名，恶毒地进行污蔑、诽谤、攻击。姚文元对记者说：“有些材料你们在下面拿不准，就直接送给我们来处理。”王洪文大讲什么“反潮流”精神，“不要怕打击报复”、“中央（指他们那个‘帮中央’）支持你们”等等。迟群、谢静宜、鲁瑛等人，也到学习班上现身说法，传授乱军“经验”。学习班结束后，这些并无军籍的学员就以“中央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许多部队的领导机关，了解“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煽风点火。

2月2日晚，参加“学习班”的新新华社上海分社两名记者刚从北京回到上海，徐景贤便派专车把他们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

紧急召见。以后的几天里，马天水、王秀珍也多次召见他们，名为听取汇报“学习班”的情况，实为阴谋策动记者去进行反军乱军活动。从1974年2月到10月，马、徐、王“召见”这两名记者就有18次之多。在徐景贤第3次听取记者汇报、确定了行动计划之后，马天水在“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上，向大家正式介绍这两名记者并大肆吹捧，说他们是“中央派来的”，“记者来上海是中央对上海的支持”，等等。当有人认出这两人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记者时，王秀珍慌忙掩饰说，这同分社记者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是“中央特派记者”。徐景贤要“市革会”各组、办为这两名记者的活动“开绿灯”，提供一切方便。会后，新华社上海分社有“中央特派记者”，“中央特派记者受命采访各方面‘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直接向中央汇报”等消息，在全市流传开来，到新华社上海分社找“中央特派记者”反映情况的人也就多起来了。在“四人帮”和马、徐、王的指使下，这两名记者着重收集驻沪部队特别是上海警备区领导机关的情况。在短时期内，他们搞到了大量文件、情况简报以及各种发言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个人递送来的，其内容涉及到许多军事机密材料。他们接待和处理过部队来访或来信或代转信件的有170多人次。3月15日，马天水、王秀珍又把这两名记者找去布置任务。他们开列了一份名单，其中有张宜爱（警备区副司令）、李彬山（警备区副政委）、王日初等一些在地方

上“支左”人员，明确指示记者依靠这些人开展活动，把火先在警备区外面烧起来并准备向里烧。随后又指使这两名记者进入上海警备区机关大院进行“采访”活动，物色“批林批孔”积极分子，来个里应外合。

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提到王秀珍3月20日秘密赴京，目的是窥察全国“批林批孔”运动形势，以便进一步贯彻“四人帮”意图。在京期间，她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密商，其中重点问题之一就是怎样反军、乱军、篡夺军权的问题。王洪文说：“军队里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是这次‘批林批孔’中要解决的重点所在。”他猖狂地攻击“几个总部多次运动盖子没有揭开，人换了路线没有换，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变”。他俨然以党中央自居，说“中央（‘四人帮’自称）的态度是支持广大革命群众。领导去点火，群众起来就好办了”，“我现在到处放火，把军队‘批林批孔’搞起来”。谈到上海警备区的情况，王洪文说：“你们不要着急，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下面也解决不了。（对警备区）我有炮弹没有放，要看什么时机批转下去放火。”张春桥、姚文元提醒王秀珍“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不要被人（指部队）把你们抓起来”。王洪文重申要把民兵组织搞成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姚文元说路线斗争是长期的，不是一次斗争

就能解决的，并具体地指出要把市委机关驻地、电台、报社、机场、车站、港口、水电、煤气厂等要害单位控制好。王洪文立即接上去说：“你们要把市委警卫处（人员）抓好，不好的要调回去。”姚也认为警卫处一定要可靠，如果出问题，“不要说搞暗害，就是造一点谣也够你呛的了！”姚文元又具体交待“中央特派记者”进入上海警备区机关后“接触面要广一些”、“左、中、右（人物）都要接触，这样比较主动”。

王秀珍3月25日返回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及市委常委会传达了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的内容。这些人要搞乱在上海的部队的气焰更加嚣张。马、徐、王决定，除已经派了记者去上海警备区外，还要以市委名义，派出联络员，去“联系、了解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开展的情况”。他们派了市委办公室的两名干部充当联络员，由王秀珍亲自向他们交待任务，要他们“先去熟悉人头，了解情况”，“中央特派记者去后，工作开展得很好，已熟悉了很多人，了解到很多有价值的情况，你们两个可以先向他们取经”，“你们要密切配合”。

这两名记者和两名联络员因为是“四人帮”和马、徐、王指派的，虽然没有军职，却可以出席警备区召开的有关“批林批孔”的各种会议，可以任意找人谈话，了解“情况”。警备区司令部有一次征求意见性的座谈会没有通知他们参加，主持会议的参谋长即受到训斥，胡说什么“向记者封锁，就是向中央

封锁”。粉碎“四人帮”后，据警备区后勤部一位负责同志揭发，一个市委联络员曾对他说：“过去你被整过，是警备区错误路线的受害者，现在有中央首长（指“四人帮”）和市委的支持，应该发扬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精神，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一些“支左”人员也揭发“中央特派记者”传来的马、徐、王影射攻击南京军区领导同志的话：“要揭开警备区错误路线的盖子，靠警备区机关内部的力量是不行的，因为近几年来，他们（指警备区领导）把看不惯的（干部）基本上都搞掉了，现在要靠你们‘支左’干部带头去冲。”“警备区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都有问题，周司令到上海以后到底怎么样？他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看来是有人给他交了任务的。”

（三）一封诬告信的出笼

为了从上海警备区机关内部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马、徐、王要求“中央特派记者”等到那里后注意“发现和培养批林批孔积极分子”。警备区政治部秘书处有一个干事谢世诚，受当时“四人帮”控制的反动舆论宣传影响，曾到过新华社上海分社找“中央特派记者”，反映上海警备区“批林批孔”太一般化，比地方上差得太远了，等等。对这个找上门来的积极分子，“中央特派记者”非常赏识，称之为“警备区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以后就经常联系，极力拉拢，鼓动谢“要敢于造反”。他对谢打气说：“有张春桥、王洪文支持，有市委支持，不要怕！”

5月9日谢世诚写出了一份《谈谈我对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的几点看法》的材料。记者看后感到这个材料的攻击火力不够猛烈，亲自进行修改“加工”。6月2日，一份由谢世诚署名的诬告信正式炮制出笼了。这封诬告信，罗列了警备区领导的7条大罪状，什么“转移运动大方向，对抗中央和市委领导”；“不批林，不批孔”；“刮经济主义妖风”；“搞条条框框压制群众，企图欺上瞒下、蒙混过关”等等，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这封信很快献给了马、徐、王，并立即转送去北京王洪文、张春桥那里。

（四）策划召开“两个常委会”，大整上海警备区领导干部

谢世诚的这封诬告信，正是在“四人帮”要大乱上海警备区的关键时刻出笼了。6月7日，诬告信寄出后的第5天，张春桥即在信上批了意见：“警备区的问题，现在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了。”“建议将这封信由市委印发市委常委、警备区党委常委，并请市委召集一次有两个常委委员参加的会，议一议。”又假惺惺地加了一笔：“还是帮助警备区领导同志取得主动权为好。”王洪文当天将张春桥的批文转批给马天水“阅办”。

马天水接到张春桥、王洪文的批件，立即把“批示”和诬告信印成影印件，强令在警备区机关、部队层层传达。马、徐、王紧张地多次密商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以下简称“两委会”）的开法，亦即阴谋策划大整上海警备区领导人

的策略和方法。参加密议的有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宜爱、李彬山等。他们认为司令员周纯麟、政委刘耀宗、副政委章尘“表现都不好”，“跳得最高”的是章尘；另外有几个“也要轰他们一下”；其它还有几个“可以争取”。他们确定“两委会”上要狠批章尘，“批章促周（纯麟）、促刘（耀宗）”作为主攻方向。同时他们又认为：“两委会”的“目的不只是整（上海）警备区的领导，而且要从算廖政国（原司令员）的老账，一直批到南京军区”。

6月10日至12日，打着市委一元化领导的旗号，马、徐、王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了“两委会”。当时周纯麟司令员因心脏病发作，华东医院诊断急需住院治疗。然而马天水等却要他开过会再住院。周愤慨地说：“市委一定要我去开会，只要有一口气我就去。”10日，他是抱病带着医生和急救药品到会的。马、徐、王精心策划的会议一开始就剑拔弩张，气氛紧张。他们拿张春桥、王洪文的“批示”当“令箭”，以“诬告信”为“弹药”，大肆围攻警备区的周纯麟、刘耀宗、章尘等同志。王秀珍首先“开炮”，她诬陷“警备区党委路线不正，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得力，捂盖子很得力。”徐景贤气势汹汹地指责章尘说：“你来警备区是谁派你来的？带着什么感情来的？带着什么任务来的？”章尘愤怒地说：“我参加这样的高级组织生活会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表示了对“四人帮”的强烈

不满，他针锋相对地说：“我要（向你们）开一炮！”王秀珍听后叫嚷：“锦江小礼堂这屋顶不高，你用重炮轰吧。”李彬山、张宜爱、张敬标等一起帮腔围攻。这次名曰“帮助警备区领导争取主动权”的会议，实际上开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批判会，直至第三天把周纯麟整得当场心脏病严重发作，会议无法进行时，才不得不休会。

周纯麟病重，住进了华东医院。但对周的迫害继续加紧，乱军在升级。马、徐、王恶毒地利用周的秘书岳道培^①监视周的行动。他们要岳陪同周住进医院，以“关心”周司令的病情为名，挡住前来探望的人，以隔断周纯麟与警备区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触，封闭外界消息。王秀珍曾不打自招地说：“等他（指周纯麟）病好了，警备区的火也放大了，即使他出院了，也难以收拾了。”

（五）召开“军人大会”，乱军活动进一步升级

“两委会”后，消息传开，上海警备区机关里虽然也“动”了一下，如有少量大字报等，但广大指战员是有抵制的，马、徐、

^① 岳道培是周纯麟的秘书，后曾任警备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从1971年起，王洪文、马天水、王秀珍等就有意识地做岳的“工作”。先是王洪文通过其秘书廖祖康接近岳，以后发展到马天水、王秀珍亲自找岳“谈话”。岳多次向他们反映警备区的情况，表示“坚决按照张（春桥）王（洪文）政委和市委指示做工作。”1974年马、徐、王大乱上海警备区期间，岳道培把周纯麟的全部活动记录，密报马天水。周察觉岳有问题，提出撤换秘书，马天水与王秀珍密商要把岳留在警备区机关，最后由廖祖康通过王洪文，以岳要替王洪文保管文件为名，把岳保留了下来。

王深感乱得很不够。他们又与张宜爱、李彬山等密谋策划召开警备区的军人大会，在战士中特别是中层干部中把火点起来，使反军乱军的活动进一步升级。张宜爱说：“要揭开警备区运动的‘盖子’，很不容易，机关里都是‘清一色’，非得进一些人，才能冲破局面。原来在机关里受过迫害，敢于斗争的同志，情况熟悉，要回机关参加运动。”6月16日马天水亲自下令给“市革会”各组、办，要动员一批人，包括从警备区调来的支左人员，人民武装部工作的人员，以及已经转业分配在上海各单位工作的原警备区干部，回警备区机关去参加运动，各组、办都要“给予方便与支持”。阴谋唆使这些人去搞乱警备区。马、徐、王又怕由自己出面叫警备区开大会会使他们的阴谋露馅，便又布置“市委联络员”和“中央特派记者”，要他们研究出一个促使警备区党委自己提出开大会的办法来。6月17日，在新华社上海分社住地，张宜爱、李彬山等人共同策划，定下了诡计，即由两名区人民武装部的干部在翌日警备区党委召开的南市、黄浦、卢湾3个区武装部干部的座谈会上发难，以要求向干部、战士传达张春桥、王洪文的“指示”为名，逼迫警备区党委召开军人大会，并由张宜爱、李彬山和“市委联络员”、“中央特派记者”表态，表示支持。接着，他们又在“市革会”郊区组、民兵指挥部、新华社上海分社等“联系点”多方串连，秘密策划，详细研究确定了“军人大会”的会议程序、参加人员、打击对

象和斗争重点，等等。

经过一番幕后策划，由马天水亲自“出马”，以将“群众要求”向警备区党委“通气”为名，胁迫警备区党委召开军人大会。当时，主持警备区党委工作的同志提出开大会会有困难，马天水横蛮无理地说，有困难可以让新华社记者“做工作”，马还“建议”大会发言名单要和“中央特派记者”商量，发言稿要记者参与审查、修改。

6月21日晚，张宜爱、李彬山和记者、联络员等人撇开警备区党委，擅自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内召开所谓“积极分子”会议，检查大会准备情况，研究修改大会发言稿，确定会议中“哪些情况该鼓掌”，“揭到什么问题时要追下去”。还布置“积极分子”坐在一起，台上台下相呼应。

6月22日下午警备区“军人揭批大会”被迫召开。马天水躲在康平路市委机关内通过记者、联络员遥控指挥。张宜爱和李彬山把一名“中央特派记者”拉到主席台正中去坐，以便一起控制会场。那个记者居然坐了下来。（粉碎“四人帮”后，那个记者自己检查“当时头脑发昏”“狂到如此程度！”“回想起来非常羞愧痛心”。）会上，事先布置好的“发言人”，大批特批许世友、周纯麟、刘耀宗、章尘等同志，污蔑上海警备区执行了一条“没有廖政国的廖政国路线”。当天会议结束后，马天水、王秀珍把张宜爱、李彬山和两名记者召到康平路市委机关会议

室听取汇报，表示非常满意。并继续策划第二天大会的开会。王秀珍则要张宜爱、李彬山两人第二天要表态讲话，做些“自我批评”，骗取干部、战士对他们的信任，以掩盖其带头乱军的真面目。6月24日下午会议进入了第3个半天。岂料受马天水煽动起来的那些人，成为“脱缰之马”，不按原定阴谋计划行事，提出要把会议继续开下去。马天水等人慌了，不得不急忙宣布这次名为上海警备区党委召开的、而实际上上海警备区党委无权决定任何事宜的“军人揭批大会”到此结束，草草收场。

“军人大会”结束的当晚，徐景贤、王秀珍得意忘形地赶到新华社上海分社，接见了那一批乱军“有功人员”，继续为他们鼓劲。徐景贤说：“看来突破比较艰苦，我们脑子里要考虑更大的战斗。”叫嚣“要解决路线问题，代表人物不在警备区。”把矛头直指南京军区。王秀珍不无惋惜地说：“会（指军人大会）开得太好了，可惜没有录音，要是有了录音，送给中央首长（即“四人帮”）听听就好了。”

3个半天的“军人大会”，在警备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后果极其严重。大会以后，在警备区机关内进一步掀起了反军乱军恶浪。一时间，各种揭发警备区领导所谓“执行错误路线”、“要揭开警备区阶级斗争盖子”的大、小字报纷纷出笼。同时，马天水又指使张宜爱、李彬山改组了警备区的“批林批孔”办公室，篡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权。并以发“邀

请书”的形式，把警备区的某些领导同志“请”到处、室小组去解答问题，实际上类似“批斗”。马、徐、王一伙多次窜到警备区机关看大字报。徐景贤指着一张长篇大字报叫嚷：“这张大字报，指明了警备区‘批林批孔’的方向。所谓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一贯正确的神话破产了。”“对许世友的迷信打破了。”他看到已经乱起来了的警备区机关，按捺不住心中的高兴，狂妄地说，对上海警备区的这种局面，他表示“支持”。

这段时间，由“中央特派记者”和“市委联络员”编写，抄送给马、徐、王的《警备区大字报情况》、《整章尘会议情况》、《军人大会后的反映》等各类简报、信件共有100多份，其中一部分由马天水再“转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六）向南京军区送大字报，阴谋倒许乱军

1974年6月中旬，马、徐、王经过秘密策划，又把张宜爱、李彬山找来一起商议，积极准备执行张春桥、王洪文关于“南京军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上海可以送大字报”的“指示”。他们组织人员炮制有关“南京军区镇压造反派”等内容的大字报，贴到上海警备区机关大院里去。之后，马、徐、王又亲自到警备区机关看大字报，对那些恶毒攻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倍加赞赏，认为“质量很高”。王秀珍对在身旁的张宜爱说：“你们赶快派人向军区送大字报，越快越好。”“路费不好报，拿到‘市革会’来报。”

6月24日，“军人大会”结束的当夜，张宜爱、李彬山在“市革会”大楼4楼召集曲增言等人开会，研究贯彻马、徐、王下达的任务。王秀珍、徐景贤赶来“接见”，进行煽动。徐景贤说：“现在很清楚了，警备区问题的根子在南京军区”“大字报浙江军区已经送了，我们再不去（送）就不好了。”王秀珍说：“这是当前最急的事。”会后这伙人又起草了《致南京军区党委的一封信》、《许司令、廖政国是怎样镇压上海造反派的》、《许司令、廖政国在上海“四·一二”炮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大字报，送马、徐、王审查。马天水对这几张大字报从标题到内容都进行了反复的斟酌、修饰，并向张宜爱授计说：“向军区送大字报，事先不要报告军区，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如果哨兵不让进，可以冲。”“如果他们抓人，那就更好。”马天水意思是造成军区抓人犯“错误”。说送大字报的人“要冲劲足的，要穿军装，要尽量找（警备区）机关里面的同志”。

6月28日晨，张宜爱、李彬山在“市革会”郊区组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传达马天水关于送大字报的人去后要“摸军区的底”，把“火”点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等指示，研究确定去南京送大字报的人的名单。晚上，张、李又在市民兵指挥部内召集往南京军区送大字报的曲增言等13人开会。张、李对他们说：“这次送大字报是市委决定的。”“送大字报是去点火的，要有突然性，一定要进机关大院，一定要把大字报贴在明

显的地方，一定要让军区首长接见你们。”而且要司令员丁盛和政委杜平亲自接见，“别人不行”，“以便了解他们的态度”。又要曲等到南京后“赶快把情况报回上海，但不要军用电话”。带队的曲增言当场记下了张宜爱的保密电话号码。

29日晨，曲增言等人到达南京后，兵分数路去南京军区政治部、新华社南京分社、南京大学以及南京市闹市街头等处，抄录大字报，收集乱军材料。30日，这伙人置南京军区派来的接待人员的劝告于不顾，强行跑进南京军区机关大院内，到处张贴诬蔑、攻击许世友等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和煽动性的大标语。7月1日，南京军区新任司令员丁盛赶到曲等人的住处表示欢迎，并再三表示“要向上海市委学习”，说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跟不上形势”。在丁盛的支持下，这伙人在南京军区整整闹腾了3天。在他们自认为已经达到目的后，7月2日中午回到上海。

曲增言等回到上海后，马、徐、王连夜召见，听取汇报。马天水对他们这次行动备加赞赏，说他们“冲南京军区冲得好，打开了南京军区的缺口”。还说“你们要做好第二次去南京军区送大字报的思想准备”，“以后要组织更多的大字报，去更多的人”。马、徐、王还一致赞扬了丁盛的态度。9月，张春桥、王洪文要在军内不担任任何职务的马天水去南京参加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帮助丁盛解决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临

行前，马天水对徐景贤等人说，他要“抓住机会，把许世友那股势力再搞一下”。在会上，马天水与丁盛相勾结，对许世友大肆诬蔑。

以上从召开“两委会”“军人大会”到向南京军区送大字报前后，是马、徐、王阴谋搞乱上海警备区活动得最猖獗的一个时期。到了同年8、9月份，他们不得不逐渐有所收敛。这是因为上海警备区机关干部和广大指战员对他们是有抵制的，除了受他们利用的如“支左”人员中少数人以外，警备区机关内部响应他们的“运动”的人很少。马、徐、王都感到阻力很大。而更重要的原因是7月中旬，“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受到批评，他们处境不利。^①8月下旬，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说：“对警备区的运动，在国庆节前要解决，不要再乱下去了”。“就说是我王洪文说的，周司令他们检讨也好，不检讨也好，不能揪住不放”。9月初，王洪文又密派他秘书廖祖康回上海，催促马、徐、王采取措施，对警备区的“运动”“不能再拖”。于是马、徐、王等亲自出马，于9月9日、13日、14日、20日、23日连续召开所谓“积极分子”会议，做“思想工作”，说什么“警备区运动形势很好。按军队系统（能）搞到这样是不错（差）的”，“不要怕打击报复”，“有顽固派也不要紧，以后慢慢‘再斗’”，

^①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并第一次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的问题，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捆绑不成夫妻，不愿检查就算了”，“斗争是长期的，不可能一劳永逸”，“不能一次革命论”等等。他们要等待时机，进一步反军乱军。

（七）“反回潮风”和揪“军内资产阶级”阴谋的破产

1975年，“四人帮”又策动上海的党羽们在上海警备区搞反“回潮风”。这可以说是马、徐、王掀起的第二个反军乱军浪潮。所谓的反“回潮风”，就是认为上海警备区在“批林批孔”中乱得还不够，“组织路线”方面没有解决问题，各方面有“回潮”表现，因此要“反击”。这是他们想再一次乱军夺权而挖空心思制造出来的一种借口。

上海警备区“批林批孔”告一段落后，“四人帮”马、徐、王一伙未能将上海警备区的领导权真正夺到手，张宜爱、李彬山按照王秀珍的指示，在警备区机关内部大肆宣扬警备区的路线不正，原因就是“警备区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他们派出亲信秘密串连，散布流言蜚语，搜集整理所谓警备区“回潮成风”的材料。在他们的一手策划下，1975年3月11日一封由4个“积极分子”炮制的诬告信出笼了。在这封诬告信中，造谣污蔑，颠倒是非，罗列了警备区有14种所谓“回潮”的表现。如：“对‘批林批孔’不满”，“派性发作，阻碍政策落实”，“‘军党论’的流毒影响很深”等等。信中还提了4条“建议”，要警备区党

委“重视和培养使用”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这就道破了他们“反回潮风”的真实用意。张宜爱拿到信后，立即派人送给马、徐、王。李彬山则托人将信转交南京军区党委，并要岳道培交一份给住院治疗的周纯麟。

3月30日晚，马、徐、王把警备区党委5位常委召到市委。马天水说：“信上反映的情况该支持的要支持，该批评的要批评，关键是领导。”徐景贤则压警备区党委对诬告信中所列举的所谓“回潮”问题，要“承担责任”，常委要开交心会“统一认识”。王秀珍要常委学习张春桥在总政座谈会上关于“反经验主义”的讲话，并“联系实际”。马天水还交待，要当时正在南京军区参加理论学习班学习的章尘回来参加会议，示意对章尘要狠整。召见之后，张宜爱、李彬山马上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收集整理“回潮”表现的材料，为开常委“交心会”准备“炮弹”。

丁盛收到诬告信后，4月5日在军区理论学习班上大放厥词，说“最近我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反映经过‘批林批孔’运动，现在有些单位领导思想上有‘回潮’苗头”，“有的要秋后算帐”，并威胁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你拖不过去，滑不过去，赖也赖不过去。”与马、徐、王遥相呼应，对周纯麟、刘耀宗、章尘等施加压力。

在马、徐、王、丁盛的压力下，4月9日至12日，上海警

备区党委召开了有副司令员、副政委参加的扩大的常委“交心会”。会上，张宜爱、李彬山对上海警备区领导同志乱整一通，企图逼迫他们承认搞“翻案”、“回潮”。张宜爱、李彬山又多次召开司、政、后机关所谓“积极分子”座谈会，并要求警备区领导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实质是接受“批判”。5月下旬，李彬山、张宜爱在警备区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召开大小会议上反“回潮风”，叫嚷要把“错误路线的基础”扫除掉，砸“土围子”，痛击“保守势力”，要揪“回潮的总代表”，挖“回潮的总根子”，矛头对准周纯麟和刘耀宗。

他们除了在警备区机关大搞阴谋活动外，还到基层“点火”。这里以警备区八五医院为例：在他们的煽动策划下，八五医院反了57天的“回潮风”，迫使该院党委开了28次常委会、8天加3个晚上的党委“交心会”、13天加3个晚上的党委扩大会、7次支部书记联席会、3次全院大会以及18次各类人员座谈会。在这些会议上，除整了该院的主要领导外，还点名整了40多名基层干部，一时搞得人人自危。

在“反回潮风”后期，张宜爱、李彬山又部署了从基层开始的夺权活动。他们趁警备区机关各处、室支部改选时机，提出改选时“要吸收新生力量担任支部领导”。他们所说的“新生力量”，就是指那些跟着他们搞反军乱军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有一些此类“积极分子”被塞进了新改选的支部委员会和机

关党委会。为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李彬山还搞了一份78人的名单，其中提拔的有50人，准备把他们安插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把重要岗位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但由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抵制，这一阴谋未能得逞。这股“反回潮”的阴风，一直刮到1975年年底。

1976年初，“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为了篡军夺权又掀起了第3次反军乱军恶浪。他们抛出“军内资产阶级”谬论，诬蔑军队中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什么“军内走资派”、有一个所谓的“军内资产阶级”。当年2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李彬山在北京参加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王洪文多次召见他们，秘密策划在部队开展“军内资产阶级”的大讨论。王洪文并露骨地攻击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一些负责人是“还乡团”的“分团长”。马天水等人回到上海后，即向张宜爱、李彬山等进行传达，选中警备师三连为“点”，开展所谓“军内有资产阶级”的大讨论，指派警备师政治部副主任去“蹲点”。马、徐、王多次窜到三连，并背着部队党委先后6次派人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材料送到三连。4月份，徐景贤私自把几个国务院副总理的讲话材料翻印送给三连，唆使三连战士进行批判。5月26日晚，王秀珍跑去要指战员学习《红旗》杂志刊登的《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加强学习深入批邓）等文章，“联系部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的实际”，开展大批判。那个蹲点的师政治部副主任说：“有个连队研究军队走资派的问题，因为多数同志反对没有研究成。他们不敢研究。我们三连研究嘛！”并说：“中央（指“四人帮”）有这个精神。”但他这个“建议”，遭到三连指战员的反对。于是，他要求警备师党委表态研究这个问题。5月底，在一次师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上提出要研究“穿军装的走资派”问题，当场遭到多数同志的反对。6月4日，他再次提出要党委同意讨论“军队有资产阶级、有走资派”的问题，同样也遭到反对、抵制。

他们的阴谋在三连和师党委接二连三碰壁后，仍不死心。张宜爱亲自出马，多次到三连宣读“四人帮”关于“军队有资产阶级”谬论的“内参”。去蹲点的师政治部副主任对连队干部说：“师党委不让研究，不管它，我们继续研究”，要“蹲点组”的成员给战士作“军队有资产阶级、有走资派”的辅导报告，散布反军乱军谬论。

1976年6月9日晚，徐景贤窜到三连，表态支持开展“军内有资产阶级”的讨论。他称赞三连五班“学习批判搞得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为了扩大影响，推广介绍三连的“经验”。经张宜爱、李彬山策划，6月29日在三连驻地召开了有师、团两级党委中心学习组成员参加的大型“理论讨论会”。会后，连夜起草了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以师政治部名义上报马、徐、王和警备区党委，

下发到各团，要警备区各部队进行学习。同时，还要三连派人到守备一、二师、警备区教导队和警备区后勤机关等单位，介绍讨论“军内有资产阶级”的“经验”。与开展讨论相配合，一些内容为揪“军内走资派”的毒草文章和文艺作品也相继出笼。这些文章和作品，胡说什么“军队最危险”，“复辟主要危险来自军队”。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污蔑军队各级领导，说他们是“剥削士兵，吸士兵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发誓要和“军内走资派”“斗争下去”。字里行间，刀光剑影，杀气腾腾。8月13日，马、徐、王又和丁盛等人一起窜到三连，对连队讨论“军队有资产阶级”问题大加赞扬，进一步煽动连队要揪出“军内资产阶级”。徐景贤说：“三连讨论这个问题，有极大的尖锐性。”这个问题，“不是头脑发热提出来的，是头脑清醒提出来的”，“对今后的长远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8月26日，王秀珍又在三连战士面前露骨地说：“你们警备区领导路线不端正”，“批邓的阻力主要来自警备区领导”。极力煽动战士把矛头指向警备区领导。9月8日，蹲点的师政治部副主任在三连作了所谓“警备区两条路线斗争史”的辅导报告，他敲着桌子叫嚷：“我们不斗争不行，一定要斗争，要把他们这些不革命的军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揪出来，这是我们的任务。”看！他们反军乱军的阴谋活动，进行得何等猖狂！

第三次反军乱军的活动，维持到1976年上半年，这时，

“四人帮”的日子已很不好过，他们预感末日之将临，加紧反军作乱。“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与丁盛、张宜爱、李彬山等人活动更加频繁，他们阴谋对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从组织上“动大手术”。这年8、9月，丁盛窜来上海，他在上海的短短一个月中，同马、徐、王接触密谈达8次之多。在密谈中，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策划要改组警备区领导班子，妄想实现张春桥所说的“改朝换代”。与此同时，他们对民兵突击下发枪支弹药，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准备。

三十二、马、徐、王等组织策划“炮轰” 国务院的几个突出事件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力排“四人帮”的干扰，坚持不懈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端做法，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转机。而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却极力反对。他们这伙人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乘机扩大帮派势力，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对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恨之入骨，特别是周恩来主持了党务和国事，更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于是，他们肆意制造事端，炮制诬陷材料，妄图打倒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阴谋由江青“挂帅”、“组阁”，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在“四人帮”的策动下，他们在上海的党羽们跟得最紧，跳得最高，自觉地卖力地充当反党先锋。他们以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为名，捏造事实，栽赃诬陷，颠倒是非，无限上纲，大批所谓“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爬行主义”、“投降卖国”、

“修正主义路线”等等，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一再“炮轰”国务院，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 1973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难

1973年初，国务院通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前，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简称《经济工作十条》）。这个规定中提出：要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各行其事；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物价的控制权属于中央，各地、各部门无权变动；按照“鞍钢宪法”整顿企业；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加强纪律性，纠正不正之风等。“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颠倒是非地把这些规定诬之为“右倾回潮”，唆使其党羽寻找攻击的借口。马天水、黄涛在赴会前多次策划，准备发难。早在1972年9月，马天水就要“市革会”财贸组搞过一份《关于外贸价格情况的报告》，以有关外贸出口价格问题为“炮弹”，以外贸部为“突破口”，“炮轰”国务院。马要求材料要搞得“击中要害”，“一针见血”，“弄痛他”，“要弄他个睡不着觉，下不了台”。

1973年1月，全国计划会议开幕，余秋里作了报告，他讲了1972年全国生产情况，提出1973年国家计划，着重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会议征求各地、各部门对《经济工作十条》的意见。在1973年1月15日全国计划会议华东大组会议上，马

天水离开会议主题，放肆地集中攻击外贸部。他说什么“出口价格这样低”是“低价倾销”。责问外贸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外贸部究竟对谁有感情？”“你的屁股坐在哪里？”等等。他恶毒地谩骂外贸部是“卖国部”，是“西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部里有一批“洋奴卖办”，“外贸部要改组”。张春桥对马天水的发言连声称赞，说“批得好，需要这样批”！张春桥，马天水等人，明知调整出口商品价格的最后决定权不在外贸部，是在国务院，他们口头上攻击的是外贸部，实际矛头指向国务院领导同志。

随马天水一起参加计划会议的黄涛，根据张春桥会前交待的任务也被挂上阵了。他攻击计划会议只讲“人心思定”，不讲“阶级斗争”，诬蔑《经济工作十条》是“十条王法”，“整群众”，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等，表示强烈的反对。会后，国家计委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张春桥私下对黄涛说：“你不知道呢！这些人想要整人，可也真厉害！他们（按：指国家计委）把你们会议（按：指全国计划会议）上全国各省、市、区除了台湾省，共29家，对《十条》的态度列了一张表，用这个形式送给政治局。从那张表上看，清清楚楚，全国28家都赞成，只有上海一家反对。”是“28票对1票！”是“光荣的孤立”！黄涛得到张春桥的称赞，得意忘形，以“一票击败了全国的28票”的“英雄”自居。马天水也赞扬黄涛有“反潮流”精神。

（二）大闹“春交会”，制造“大平板汽车事件”

全国计划会议后，马天水等人还揪住外贸部不放，继续寻衅闹事。1974年初，外贸部在广州召开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春交会”）。他们在“春交会”上，再次攻击外贸部，矛头指向国务院。会前，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根据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况，认为我国出口厂丝的价格如不下降，将对我非常不利。该公司总经理为此专程来沪征求上海的意见。马天水大耍两面派手法，他一面叫黄金海对来人说：“价格是部里掌握的，由部里去定”；一面又攻击外贸部要在“春交会”上刮“降价风”，逼国务院表态。同时，马天水派黄金海带了一帮人去广州，在会上搞突然袭击。他们把厂丝降价和对外贸易中原有的“奖励友好商”、“佣金制度”、“回扣”等惯常做法，都列为“变相降价”的“降价风”，胡说什么“过去批判的东西，又都想恢复过来”，“完全是‘克己复礼’”。由于马天水、黄金海等人的捣乱，外贸部在“春交会”上所定的商品价格方案全部被推翻，出口成交额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外贸部会前已通过驻外商务机构向友好商报了价，会上未履行自己的承诺，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到了“秋交会”，为了争取出口，我方被迫对许多商品实行大幅度降价，使国家受到重大的经济损失。

继两次攻击外贸部后，黄涛等人又在上海制造了“大平板汽车事件”，攻击交通部和国务院。原来在1973年，交通部为

了国内生产建设的需要，布置上海生产大平板汽车。黄涛一口拒绝，说上海生产不了。于是，交通部于1974年2月报请国务院批准进口。交通部公路局还专门要上海交通运输局派两位有经验的老工人去京参加选购和谈判工作。在洽购中，两位老工人认为国外生产的大平板汽车设计并不怎样先进，建议少进口一些，省点经费自己试制。老工人的这个意见是中肯的，但他们不知道交通部本来就主张要上海试制，拒绝自己制造的正是黄涛。紧跟“四人帮”的黄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竟把老工人的这项建议作为攻击交通部的“材料”。1974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黄涛在会上抓住进口大平板汽车问题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盲目进口”，还造谣说交通部有人刁难、责问参加选购的老工人，把两位老师傅气得当天就跑回去了，等等。会后，交通部公路局查清了事实，写信到上海驳斥了黄涛的谎言。黄涛见信后又反咬一口，说：“看！这才两个月，就想翻案了。这封信是备忘录，我们也要准备一个备忘录的备忘录”，扬言要“迎头痛击右倾思潮的反攻”。粉碎“四人帮”后马天水供认：“就是我们能够生产这种大平板汽车，也不能满足国内数量上的需要，因此进口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也知道交通部无权批准进口，交通部只能提意见，进口要经国务院审批。”承认他们这样做，是把攻击、诬蔑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

（三）炮制“风庆轮事件”

1974年，马天水、徐景贤和黄涛等人，蓄意制造“风庆轮事件”，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大造舆论，攻击国务院，诬陷中央领导人。

为了适应我国远洋航运事业发展的需要，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从1972年起我国进口了一批船舶和成套设备。周恩来多次指出，在立足国内造船的前提下，可适当向国外买一些船，以改变每年化费大量外汇向国外租船的局面，这是符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的。又指出，自己造船，“需要有条件，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争取在5年内不租船，少租船，再过若干年，争取不买船，少买船。”1972年，周恩来在陪同访华的本田中首相来沪时，对马天水说：“以后国际环境有变化，要引进一点外国技术，这对我们还是有利的。”1974年初，交通部部长叶飞向政治局打报告提出买船建议。经政治局成员圈阅，同意购买250万吨船舶。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叶飞指出虽然化了9亿元买船，但每年可以减少3亿元租金。他问这算不算“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黄涛听后，恶狠狠地说这些话都是针对上海的，蛮横地咒骂买船的人是“当代的李鸿章，70

年代的‘赵大爷’、‘假洋鬼子’”^①。上海市委写作组也配合进行所谓“买船情况”的调查，追查花那么多钱买船是谁批准的？当他们知道王洪文、张春桥也在交通部买船报告上划圈表示“同意”时，感到不好再谩骂了，只得草草收场。但他们心犹不甘，不久，他们就制造了“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1973年12月27日轻载试航后，计划在1974年1月10日再重载试航，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接收该船时，发现主机一号套缸磨损，出现“咬缸”现象，提出要求调换。江南造船厂有些人却认为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技术上要求过高，双方发生争执。此事为“市革会”工交组陈阿大知悉，他乘机煽风点火，上纲上线地说：“上海同六机部的斗争是路线斗争，对有些人就是要批！”“这就是阶级斗争！”他怂恿江南造船厂那些人写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贴到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处，并复写后分送给《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大字报诬告“远洋公司对外轮检验松，对国产轮不信任，国产轮即使质量再好也不能出海远航”等。姚

^① 李鸿章，清末淮军军阀，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逐步扩大其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扩充淮军势力，建立北洋海军。对外一贯妥协投降，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赵大爷”、“假洋鬼子”，是鲁迅著《阿Q正传》小说中的人物，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四人帮”及其党羽以这些人物来影射、攻击周恩来。

文元、马天水、黄涛等人纷纷表示支持，并由市工交组和《解放日报》社主要负责人出马去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兴师问罪，说分公司“躺在外国人身上，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责令分公司作出检查，并扬言要追查“后台”。在“四人帮”及上海党羽的高压下，分公司被迫作了检查。但马天水、黄涛等醉翁之意不在酒，3月22日，在市工交组的策划下，又召开了批判“崇洋媚外”大会，点名攻击交通部，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马天水对此连声喝彩，说“批得好”，“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等等。在马天水等人的煽动下，一些人又贴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的大字报，想挑动一些船员去北京，妄图大闹交通部、国务院。

可是出乎这些人的意料，当时，中国远洋公司党委已于4月1日向交通部写了报告，报请批准“风庆轮”远航。周恩来对此事极为重视，指示“这是我们造的第一艘全部国产万吨轮，要经过好望角，好望角风大，要好好检查”。交通部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对待“风庆轮”这次远航十分关心，凡有关远航的技术安全和船员政治思想工作等都作了具体部署。还派远洋总公司负责人专程来上海安排开航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派总公司的两名干部李国堂和顾广文上船任副政委和实习三副，协助做好远航工作和总结远航经验。

国务院的一系列决定，揭穿了“四人帮”及上海党羽的阴

谋。马天水极为恼火，大骂交通部，说交通部“开始不同意远航，是刁难整你”，“以后又让你远航，故意让你作几万里的远航，路上风浪很大，有危险，是有心想要我们好看，这也是整你”。马天水、黄涛等人不但对“风庆轮”的远航准备工作漠不关心，还说远洋总公司派到船上帮助工作的人是“来者不善”，要“在航行中注意他们的言行，掌握动态”。

5月4日，“风庆轮”离沪远航。7月下旬，“风庆轮”尚未返航，张春桥就在北京对朱永嘉说：“要继续批洋奴哲学，这次‘风庆轮’出去即使沉了，也是胜利，回来后要好好写一点东西，（看看）究竟那一条路线对？”张还对在北京的黄涛说：“马克思主义难道不允许沉船吗？船就是沉在大海里，也是胜利。”张春桥的这些话，全是对着周恩来发的。8月，“风庆轮”通过地中海，驶抵罗马尼亚，新华社为此发了消息。“四人帮”看到“风庆轮”远航即将成功，又开始了新的阴谋活动。他们贪天之功为己有，似乎远航成功是他们“斗”出来的，张春桥嫌新华社发的200字的消息太简单，对朱永嘉说：“‘风庆轮’要很好宣传，这是个路线问题，不要只发一条消息。”张又对马天水说：“‘风庆轮’是个路线问题，要大宣传，不要光发消息。”王洪文从北京打电话给马天水：“‘风庆轮’远航归来，市委常委、列席常委都要到码头上去迎接。”姚文元要徐景贤开足马力造舆论，宣传“风庆轮”远航归来。在8月13日召开的市委扩大会

议上，徐景贤专门就宣传“风庆轮”问题作了部署。9月29日晚，“风庆轮”抵达吴淞口，20多名新闻、摄影记者先被送上“风庆轮”进行采访。30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带领了上海市委常委、列席常委、“市革会”副主任、在沪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等到轮船码头热烈“欢迎”，马、徐、王还登船“慰问”。在这以后，“四人帮”的各种宣传工具就一拥而上，借“风庆轮”大做文章。市委写作组盗用“风庆轮”党支部名义写了《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一文，说“风庆轮”的远航“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此文刊登于1974年《红旗》杂志第11期）。《解放日报》、《文汇报》以29个版面，先后发表了110篇、近20万字的文章的报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40多种书、画；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在一些文章、报道中，胡说什么“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的斗争史”，诬陷攻击交通部搞“崇洋媚外”、“爬行主义”，是“典型的洋奴哲学”等等，影射交通部这些问题的“根子”在国务院，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马、徐、王又组织了10余万人“上船参观”，并派船员到70多个单位作报告，混淆视听，到处放毒。张春桥对此还不满意，说“‘风庆轮’宣传得不够，规模太小，要组织各行各业学习‘风庆轮’”，吵吵嚷嚷一直闹到11月底。

在一片攻击交通部、国务院的鼓噪声中，“四人帮”和马、徐、王等又进一步制造了一起“李国堂事件”。在“风庆轮”航行途中，该轮政委按“四人帮”一伙的布置，在船上组织船员批判什么“崇洋媚外”、“当代李鸿章”等，借买船问题攻击交通部。远洋总公司派在船上帮助工作的李国堂、顾广文表示了不同意见，当众说明了买船是毛主席、周总理及国务院的指示。他们反对“四人帮”上海党羽事先策划的在船上搞“大批判”那一套做法，反对不顾事实的诬陷和谩骂。当“风庆轮”航行在印度洋上时，轮船主机曾发生故障，停车检修50小时，漂离航线50哩，引来美国飞机在船上低空盘旋，形势比较危急。李国堂等建议向国内发报报告情况，但该轮政委不同意，反而违反中央军委关于远航船舶不搞“四大”的规定，煽动一部分不明真象的人贴大字报，谩骂李、顾是“假洋鬼子”，组织人监视李、顾的行动。后来，他们又把监视记录改写成文，归纳为8个问题，54条罪状，1万多字，其中包括诬陷李、顾在途经好望角时“强迫船长发求救电报，制造国际事件”等。船抵上海后，该轮政委立即以“群众来信”名义，派人把文章面交《解放日报》记者，说“赶快转市委，是很重要的问题”。马、徐、王见信后，立即转送“四人帮”。姚文元即要新华社转发《国内动态清样》。“四人帮”得此件如获至宝，装扮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大放厥词。江青在上面批道：“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

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这种洋奴思想、爬行主义，不批行吗？”“交通部应检查。”“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除了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外，又加批：“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揭发批判。”张春桥在批语中胡乱上纲，说“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姚文元跟着挥舞大棒，说“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叫嚷要揪“大后台”。在上海的马、徐、王也跟着学舌，说要追查李国堂的来历，扬言“要狠批这小子！批得他臭不可闻才能放他回北京，批不臭就留在上海不准回交通部！”江青抓住“风庆轮”大做文章，曾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借机发难，无理取闹，一定要邓小平表态，蛮横无礼地逼问邓小平对批“洋奴哲学”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气愤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吗？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会议不欢而散。

根据“四人帮”的旨意，马、徐、王对李国堂、顾广文两同志大施淫威，进行残酷批斗。从10月15日到11月14日的1个月中，组织大会批斗3次，小会批斗22次，对李、顾扣上

什么“假洋鬼子”、“特务”、“孔老二徒子徒孙”、“洋奴、汉奸”等“政治帽子”，并诬陷他们有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

以后，“四人帮”一有机会，便抬出“风庆轮”来作文章，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四届人大”期间，王洪文窜到上海代表团小组，胡说象李国堂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是“一股思潮”。“这个势力还不小”。1974年下半年起，毛泽东连续不断对“四人帮”一伙进行批评，并警告王洪文不要和江青等混在一起，王洪文于1975年8月溜回上海，11日由马、徐、王陪同登上“风庆轮”，王洪文恶狠狠地说，他“要与假洋鬼子再斗30年”，发泄其内心的不满。在一旁陪同的徐景贤献媚地说：“上海有两条船，毛主席视察了‘长江轮’，今天王副主席又视察了‘风庆轮’。”吹捧王洪文。1976年3月2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一些省、区负责人开会，发表又臭又长的讲话，重新搬出“四人帮”在1974年对“风庆轮”的“批示”，从李国堂一直批到交通部，批到国务院。并说要把有关“风庆轮”的材料和“四人帮”的批文转发全国。江青的言行事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针对江青要印发“风庆轮”材料一事明确指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中央又通知收回江青在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规定“各地一律不作传达”。马、徐、王这才不得不稍作收敛。然而“四人帮”复灭前夕，他们安插在文化部的党羽于会泳还来电话，

指令上海搞一个创作组，于国庆节前搞出“风庆轮”事件的电影剧本，以配合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准备为“四人帮”粉墨登场之用。

（四）1975年在中央召开的两次会议上作乱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青妄图由她“组阁”的阴谋宣告失败。“四人帮”个个气急败坏，江青把中央政治局的许多委员都骂了。周恩来病重住医院治疗，党中央、国务院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对各条战线的工作进行了整顿，使1975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四人帮”对此更是仇恨满怀，窥测方向，伺机反扑。

1975年9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财贸工作座谈会，决定两个会议在大寨同时开幕，先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一并致开幕词，然后分开开会。上海市由“市革会”副主任周丽琴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由黄金海带队参加财贸工作座谈会。临行前，马天水对黄金海说：“现在有一股风，过去有些人不敢讲的，现在气候到了，都跳出来敢讲了。”影射攻击国务院的一些主张搞整顿工作的领导同志。他布置黄金海在会上，对“一般问题不要去纠缠，多听、多记、少讲。但对原则问题吃准了的，还是应该表明我们的态度，原则问题是不让的”，示意黄金海在会上寻机发难。黄金海在赴大寨途中，先绕道去北京，利用在北京逗留6个小时的时间，找了“四人

帮”安插在中央部、委的金祖敏，周宏宝、祝家耀等那帮“小兄弟”，摸了北京的“政治气候”，然后再去大寨开会。15日，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邓小平在会议上讲了话。黄金海看到江青参加了会议，说：“外面谣传江青如何、如何，她不是很好在这里嘛！”他自以为摸准了“气候”，在第一天的小组会议上即大放厥词，攻击邓小平，说邓的“讲话有问题，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提？农业连续10年丰收也不说”，“却一口气讲了7、8个整顿，好象文化大革命搞坏了，现在都要整顿了！”说邓小平的讲话是“翻案”。

各地代表回到北京后，继续开全国财贸工作座谈会。10月5日，李先念在接见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时作了重要讲话。黄金海在上海小组内对李先念的讲话进行恶毒地诽谤和攻击，他说：“先念同志讲的上半年抓了一个敢字，我看敢字也要作阶级分析，怎样敢法？敢做什么？”李先念在讲话中斥责洛阳拖拉机厂的“派头头”大吃大喝等恶劣作风，说那些人甚至端起酒杯公然强辩：“当头头的不吃喝嫖赌行吗？”李先念严肃地指出：“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但黄金海竟颠倒地指责李先念“扩大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方面”。当会议发下一些部门提出的关于如何进行整顿工作的规定让大家讨论时，黄金海在小组中攻击说：“这次会议原来是通知财贸学大寨的，现在味道不对头嘛，怎么发了本本，都要整顿了，真是有股风，我看就是

从昔阳大寨会议上刮下来的一股‘整顿风’”。他煽动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跟着跑。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粮食工作通知》的草稿中，要求粮食工作要贯彻“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说这几年来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吃粮水平还很低，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并形象地说“现在还是要走平衡木”。黄金海造谣攻击国务院在粮食问题上卡上海，不让上海的日子过得太痛快。

黄金海在会内外还进行秘密串连，搞阴谋。会上发了《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几个问题（草稿）》（即“财政十条”征求意见稿），规定会后收回修改。黄金海未等会议结束即派人回上海向马天水汇报，把它诬之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典型”、“右倾翻案的罪证”。马天水即要他写出大会材料，并要他和正在北京开计划会议的黄涛联系、通气。黄立即将会议材料以及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讲话记录稿寄给马天水，又窜到黄涛处密商。两人对会议、对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进行恶毒攻击。黄涛说财贸会议是计划会议的预备会，最后要拿到计划会议上拍板，说计划会议“斗起来才热闹呢！”要黄金海在会议结束后，留下来同他一起斗，“我们两个人唱双簧”。会议期间，黄金海还3次窜到京西宾馆金祖敏处。金祖敏告诉黄金海说：“不只财贸几个部，各部都差不多，现在有气候了，都跳出来了，可厉害呐，根子在上头。”

会议结束后，黄金海10月16日回到上海。当晚，王秀珍、

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等一帮人在王洪文（王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当时躲在上海避风头）那里喝酒。黄金海跑去向他们汇报了会议情况，攻击会议刮起一股“整顿风”，对邓小平、李先念、王震的讲话一一进行诽谤攻击，王洪文、王秀珍对他大为称赞，说他“还能看出一些问题了”。黄金海问王洪文，为什么会议简报没有发给他？王恶狠狠地说：“好嘛！让他们表演、表演嘛！”“我看啊，再过几十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围绕着‘文化大革命到底搞好了还是搞糟了’来进行的，不要以为现在解决了。”

再说黄涛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表演”。这次会议于1975年10月召开，到1976年1月下旬才结束，历时3个半月。王洪文早在1975年9月就要黄涛“注意这一时期中央各部召开什么会，刮什么‘风’？”黄涛指使上海参加国家计委召开的全国20个重点企业党委书记座谈会的两个人，偷抄了国务院草拟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若干问题（草案）》（即“十八条”，后又改称为“二十条”），认为这是可以攻击国务院的靶子，即密送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等人。为在会议上捣乱，黄涛准备了大量资料和发言材料。临行前一天，王洪文把马、徐、王及黄涛找到他的住处进行密谋策划。王洪文说，“这次会议他们想整上海，围攻上海”，要黄发言时注意不要让人抓住把柄。王洪文关照黄涛：“你要多听，少讲，可以打太极拳。”马天水

也说这次去开会处境相当困难，在方法上要讲究一下，避免把斗争的目标引到自己头上来。王秀珍说：“你要沉住气。”黄涛向他们表示决心：“反正经风雨，见世面。”第二天王秀珍到机场为黄涛送行，对黄涛说：“这次会议斗争很激烈。”黄涛露出一副赴汤蹈火的样子说：“有了昨晚王副主席一碗酒垫底，我什么都不怕！”

黄涛去北京参加会议后不久，王洪文认为政治气候要变了，在马、徐、王的“劝驾”下，也回到北京。黄涛即赶去汇报开会情况，说“二十条”的讨论推迟了，可能这次会议上不拿出来，目前会议正转入要有关地区、部门介绍经验。王洪文冷嘲热讽地说：“‘二十条’为什么不拿出来，拿出来才好呢！”他令黄涛不要发言，说：“现在不到时候，你可以睡觉，会议让他们开去，叫别人去应付。”黄涛领“旨”，参加会议时一言不发，甚至重要会议也叫别人去代开。

1975年11月5日，张春桥召见黄涛，阴险地说计划会议是“卡上海”，上海是“攻不倒的”。他诽谤“内、外贸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是些买办资产阶级。”王洪文也打电话叫黄涛“不要再打太极拳了”，要在会上“争项目”“争投资”，“给投资就干，不给投资就拉倒”，采取“撂挑子”的态度要挟国务院。

接到张春桥、王洪文的指令，黄涛一反常态，连夜准备发言稿。他气势汹汹地指责国务院给上海的投资太少，但又胡说

他不是来争投资的，“而是争建设、争公平、争贡献的”。黄涛以威胁的口气说“我今天把承担的任务讲清楚，把问题摆出来，该列的项目希望列上，已经列的项目投资要落实。”这哪是地方干部对中央领导讲话的口气，简直是训斥要挟的架式。黄涛会后对别人说，在这次计划会议上，“我发言是斗争，不发言也是斗争。”王洪文、张春桥利用黄涛提供的材料，在政治局听取计划会议情况汇报时无理地攻击国家计委。

1976年1月计划会议结束，黄涛回沪后又和黄金海一吹一打唱“双簧”。黄金海说：“全国财贸工作座谈会是右倾翻案的前哨战。”黄涛说：“全国计划会议是右倾翻案风在经济领域的总进攻。”黄涛在向市委常委汇报会议情况时，对这次会议进行恶毒攻击，胡说什么“方向、路线不正”，“路线未变，垮了下来，一蹶不振，陷入全面被动境地，但阴魂不散。”还说：“会议原来的指导思想是大搞整顿，强化条条专政，二十条是总纲，都已准备了文件”，但“由于我们的反对，二十条未能在会议上讨论”。

（五）“更新轮事件”始末

“更新轮”，原名“凯赛轮”，是比利时于1957年制造的一艘远洋客货轮，后出售给英国。1975年，由于我国远洋航运事业的需要，国家交通部根据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利用香港“游资”以低于国际市场废钢船的价格购买了这

艘船。按重量计，每斤价格只折合人民币一角钱。1975年12月初，交通部就该轮的分配问题征求上海海运局意见，上海海运局认为该局需要，两次打电话给交通部要求将该轮分配给上海，并建议接船地点改在上海。交通部研究后同意上海海运局的意见，1976年1月22日通知上海海运局接船。

就是这样一件原本对国家有利的事，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四人帮”上海党羽颠倒是非，大作文章，成为肆意攻击交通部和国务院的“炮弹”。

1976年2月，上海市委召开区、县、局党员干部会议。会上，上海海运局党委书记孙黎说“邓小平上台后，利用手中权力，大买外国船。”他举“更新轮”为例，说海运局急需装运木材的船，而交通部却给了一条资产阶级用的海上“游览船”，船上尽是资产阶级的设备，有跳舞厅、电影院、酒吧间、咖啡厅，等等，根本无法装木材。说买这条船“就是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批林批孔’的案，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大帽子”一顶接着一顶。王秀珍、黄涛听到发言后，认为“情况重要”，立即向马天水、徐景贤汇报。2月15日，对所谓“更新轮”问题专门发了《简报》，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

2月18日，“更新轮”经装修后首航大连回沪。黄涛把该船作为“崇洋媚外”的“典型”，组织“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金传德、陈佩珍、汪湘君等一帮人上船“参观”。海运局党委书记孙

黎下令船员写批判大字报，满船张贴，让上船参观的人受“教育”。（据不完全统计，全年组织上船“参观”的人达2万余人次。）3月9日，就“更新轮”问题专门发了一期《工交简报》（107期），标题为《邓小平投降卖国路线的恶果：一条被遗弃的游览船被当作宝贝买来》，简报中造谣中伤，胡说什么这条船是“高度近视”“瞎眼船”。船上“每一块铁板都散发着资本主义臭气”。攻击说在邓小平的影响下，“交通部的某些人花了95万美元买了一堆废铁”，“糟蹋人民血汗”，“这样搞下去，中国岂不成了外国老板的旧货摊？”等等。王洪文见到这期简报后，立即批示转发。张春桥借题攻击国务院领导同志，批道：“你们崇洋媚外，买了那么多破烂货，不知外国公司给你们多少钱？”在马、徐、王策动指挥下，上海一些报刊杂志上连续抛出《一只游览船，一副洋奴相》、《国产万吨轮与进口轮的对比调查》等所谓批判文章，恶毒攻击国务院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六）1976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又一次作乱

1976年7月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这时，“四人帮”磨刀霍霍，急于抢班夺权，他们当然不放过这次会议作乱的机会，会前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策划，妄图打倒除张春桥以外的国务院所有领导同志，由他们一统天下。

会议召开前夕，马天水分别给张春桥、王洪文去电话，打听会议有关事项，摸张、王的意图。张春桥说：“这次会议，除

讨论下半年计划外，主要批条条专政。”向马交了底。马天水要黄涛在会议上提问题注意方法、策略。在方法上，要指出“条条专政是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他们专毛主席的政，专党中央的政，专地方的政，专群众的政，也对相当多的一部分部（指国务院各部）专了政。”在策略上，对各部要“争取多数，多做工作。”“重点批国家计委、交通部、外贸部和财政部。”准备的材料“要过得硬，打得中，搨得响，富有爆炸性的典型”，要准备“能说明问题的重磅炮弹”。他特别关照黄涛：“选例要注意，不要有春桥、洪文他们同意或圈阅过的事，”以免被动。黄涛按照马天水的交待，布置工交组炮制了3.5万多字的20份“炮弹”材料，内容涉及国家计委、建委、外贸、交通等12个部、委。

会议开始后，黄涛又去“晋见”王洪文。王洪文对黄涛说：“现在要想经济战线上那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一个时候，搞了那么多条条，每一个部都搞。”王洪文怕黄涛领会不了他讲话的意思，又露骨地说：“今年不是开了好几个月的务虚会吗？”“国务院务虚会务的什么虚？务的那一家的虚？”“本来是研究长远规划，结果看！务出这些东西来，搞管、卡、压，搞翻案。”“‘二十条’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王洪文这一番话，使黄涛感到原来准备的发言稿大大不够，化了2、3天时间，又重新修改，上纲上线，准备在会上抛出。

黄涛为了在会议上发难后能得到别人的响应，四处串连。他多次找了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春甫，要他响应，形成“南北呼应”。又两次找了冶金部部长陈绍昆，要陈支持。此外，他认为一机部一位负责同志“态度较好”，准备利用，结果遭到冷遇，碰壁而回。对交通部一位负责同志“又压、又打”，也未能得逞。他还派人到国家计委和建委去煽风点火，策动两委的机关同志起来“造反”，均吃了闭门羹。黄涛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了，他到华东各省代表团去串连，但反映均很冷淡。最后，黄涛只得命令上海的代表，要“人人上阵”，配合他的进攻。事先，他逐个布置每人的发言内容、攻击的对象；会上，他指手划脚，吆五喝六；会后，一一讲评，说谁的发言“火力太小”，谁的讲话“太短”，谁的语调“太软”，谁是“无的放矢”，等等，胁迫发言人加强火力，攻击国务院。

经过这一番精心策划后，7月13日，黄涛登台表演了。他秉承王洪文的旨意，攻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是“来自邓小平指挥下的国务院的务虚会”。攻击“条条专政”“对中央是分庭抗礼，对地方是竭泽而渔，对群众是搞尖锐的对立，对洋人是卑躬屈膝”，是“复辟倒退”“卖国投降”，是“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专了多数人的政”。他攻击“二十条”是“经济领域中全面复辟的一面黑旗”，“集修正主义路线之大成”。最后，黄涛攻击国务院和国家计委领导同志的讲话是“官样文章，敷衍

过关”，是和邓小平搞“大合唱”。接着，他指挥上海代表在会上连续几天大吵大闹，攻击一些部、委领导同志对邓小平是“政治上跟得紧，思想上合拍，工作上出谋划策”，是“台上叫，台下跳”，“他（指邓小平）伤风，你们就感冒”。污蔑一些部、委“根本不代表天安门”，是“剥皮主义”，“比《半夜鸡叫》里的周剥皮还剥皮”。并搬出“造反派”的语言说：“非要砸烂狗头不可，还要踏上一只脚”，云云。

对黄涛等人的这番“表演”，响应者寥寥。黄涛的发言在送政治局的简报增刊载出后，被政治局扣住不让发给到会代表。黄涛知悉后十分恐慌，经与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联系后，非法取出简报增刊，核对证实确是他的发言全文。他趁王洪文来到上海代表团时问王洪文为什么不让印发？这时王洪文却说：“我不发表意见”。黄涛更急了，写信将此事告诉马天水，马天水回信认为批务虚会的简报不发到会代表“实际上是捂盖子”。马又打电话给黄涛，说“应该出简报，争取出简报”。后来王洪文打电话给黄涛，说简报还是要出的，但“‘风源’是国务院务虚会”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少数人”这两段话要改，说这个意见是他和张春桥商定的。黄涛追问是部分修改还是务虚会这一段都不提，王洪文说“全部去掉”。“四人帮”一伙毕竟作贼心虚，他们虽然想砸烂国务院并取而代之，但众怒难犯，也不敢在简报上写得太露骨了。

7月30日，计划会议因唐山地震而提前结束。当晚，张春桥召见了黄涛，黄到深夜才回。第二天，黄涛对忙于整理会议记录的几个上海代表说：“整理它干什么，你们要好好动动脑筋，这里面有文章。”又说，对这次会，“我看是‘走资派还在走’的会议”。回到上海后，他攻击这次会议说：“会议开了半个月，打了一个回合，是一场攻防战。”国务院的领导是“风头上认输”，“不肯认帐”。说他自己的发言“把一潭死水，冲击了一下，搅搅浑，起到一定影响”。黄涛的这句话，倒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情况，“四人帮”及其上海的党羽，就是要把水搅浑，他们好混水摸鱼。计划会议上他们的阴谋未能完全得逞。与此同时，他们策划的“铜牌事件”又出场了。

（七）外贸“清仓查库”和“铜牌事件”

“铜牌事件”的背景是外贸部门开展清仓查库工作，“四人帮”与马、徐、王等乘机捣乱。1976年6月6日至9日，外贸部召开了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辽宁等6个省市的外贸局和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关于开展清仓查库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通过清理仓库，推销库存商品30亿元，增收外汇5亿美元。这是为解决当时外汇收支平衡问题的一项积极措施。到处破坏捣乱的“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又借机制造事端。张春桥写信给马天水，说“姚依林（当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很坏，外贸问题严

重”，“清仓问题要解决”。王洪文打电话给黄涛，说：“政治局最近开会谈到外贸问题，要搜集这方面的材料。”马天水立即对手下人下达动员令，他在6月21日召开的“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上布置说：“这次清仓查库，不要就事论事，不能单纯清一些商品出来，这次一定要从路线上发现问题，解决外贸的路线问题。”又说：“清仓一定会发现外贸的许多崇洋媚外、卖国投降的东西，要抓住这些问题开展大批判。”“市革会”财贸组限市外贸局3天之内搞出“材料”，借清仓查库问题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方面来抓，同时提供给黄涛，作为去北京捣乱、破坏全国计划会议的“炮弹”。

6月中旬，上海外贸运输、服装、食品、轻工等进出口公司，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准备清仓查库工作。这些公司为了发动职工分析出口商品积压原因，研究处理的办法，分别举办了“出口积压商品实物展览会”。从展览会上，反映出上海外贸系统的一些问题。黄金海一看大为恼火，说“这是方向错误”，要这些单位立即变换展览内容，编写别有用心的解说词。外贸局党委书记白光标说要使人们“一看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展览会”。

6月24日，外贸部派清仓工作组来沪，协助上海外贸局搞好清仓查库工作。“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骨干对外贸部工作组百般刁难，封锁消息，阻挠工作组的正常工作。他们之所以这

样做，是怕他们借清仓查库反对国务院的阴谋暴露。6月26日，外贸局召开清仓查库誓师大会，会议开成了向国务院、外贸部“开炮”的动员会，也是对外贸部工作组的“示威”会。黄金海在会上叫嚣说：“这次清仓查库，一定要从路线问题入手，用大批判开路。”又说：“清仓时，仓库东西少了，没有积压，也不一定说明好，相反还可能正是个路线问题。”他诬陷去年出口纺织品搞“低价”销售，库存被挖空了。按照黄金海的逻辑，仓库积压，是路线问题；仓库无积压，也是路线问题。总之，问题都出在国务院和外贸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上海市外贸局按这个基调搞了一个“清仓展览会”，展览会分13个馆，展出大小展品230件，他们借展览内容，攻击外贸部“卖国投降”、“美元挂帅”、“条条专政”、“崇洋媚外”以及“盲目进口”等。各进出口分公司都要向“展览会”提供展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由于库存逐年下降，拿不出积压商品和霉变物资的实物去展出，于是就按黄金海提出的“仓库无积压，也是路线问题”的调子，写了《对美坯布出口卖了低价》、《三好客户奉送优惠折扣》、《进口美棉低价再出口》等4张大字报，送到展览会展出。白光标等在审查展品时，认为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只展出4张大字报，虽然内容对头，大方向正确，都是“高射炮”，但就是“太单调”、“粗糙”了。于是该公司又把一美商送给公司的一块铜牌及有关资料送去参展。“四人帮”在上海的党

羽抓住此事，制造了一起“铜牌事件”。

这块铜牌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常常向对方赠送一些礼品，如奖杯、奖牌等以表示感谢。1975年9月18日美国宝通华行经理陈绍华偕同美国克兰斯顿印染公司董事长洛克菲勒等人来沪洽谈业务时，为了感谢我方卖给他们的一批细布品质优良、交货及时，赠送了一块刻有表示谢意字句的铜牌。上面刻字的译文是：“对你们1000万码1127棉布作出的无私劳动，谨表我们的敬意和谢意，送此尊贵的礼品，聊表友谊。”此事在美商抵沪前，公司曾在接待方案写明并上报外贸局审批过。公司接受这块铜牌后，一直放在业务组内，并未引起任何人关注。1976年7月19日，白光标等人再次前往展览会审查展品内容，对纺织品进出口公司送展的这块铜牌及大字报大加赞赏，说“这很能说明问题，方向对头。”并别有用心地指出：“要讲清对美出口是由总公司负责成交的，上海口岸只负责交货。”

7月28日，上海市外贸局印发了第59期《外贸简报》，以《破坏平等互利的原则，大搞卖国投降主义》为标题，报道了“铜牌问题”，说“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8月6日“市革会”财贸组又编发了《财贸情况》（第180期），以《美商送的27斤重的铜铸“感谢状”成了外贸硬是有条修正主义路线铁的罪证》为题，诬蔑“在外贸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不正是代表

了这些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吗？总公司是否有这个资本家的实际代理人也值得深思”。“四人帮”见到这些《简报》，正适合他们“炮轰”国务院的需要，一个个加注加批。张春桥在《财贸情况》上批写：“请财贸组向陈绍华原在上海的单位了解一下此人在上海和国内的关系。”姚文元批：“这个铜牌奖状请拍一张照片送我，附英文颂词和说明。”王洪文批：“上海外贸可以将这份材料修改后写成大字报，连铜牌感谢状送外贸部展出，以供批判。”马天水根据这些“批示”，马上命令“市革会”财贸组照办，并叫市委写作组帮助搞大字报。黄金海说：“光一个铜牌、一张大字报，太单薄了，可以将清仓（清）出来的问题，分它几个专题，一批一批地送去。”“四人帮”及其上海的党羽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舆论工具，以各种诬蔑不实之词，连篇累牍地报道和批判上海外贸清仓查库的情况，把“铜牌事件”作为“重磅炮弹”，攻击外贸部和国务院。

“市革会”财贸组写出第一张《“铜牌事件”——外贸部领导投降卖国的铁证》大字报的草稿后，黄金海进行修改，在上面加了“李强部长为爬行主义制造理论根据”、“按姚依林看来，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社会主义都毫无意义，只有美元才是目的”等许多恶毒诬蔑、攻击外贸部领导人的话。陈佩珍主张加上“外贸部某些大官们，吃的是人民的饭，穿的是人民的衣，住的是人民的房，挂的是共产党员招牌，做

的是中国外贸部长，想的是外国资本家的利益”。为了掩人耳目，马天水决定以“外贸系统群众”的名义作为大字报的署名。他们还计划再写7张大字报。朱永嘉提出一套反革命策略，说：“目标要集中，点名点到李强、姚依林，下面不要点”，“观点要含蓄，不要光扣帽子”、“事情要一件一件讲，这样，一张（大字报）就是一榔头，要一榔头一榔头敲”，“调子要一次比一次高，问题要一层深一层，炮弹不要一次用光，要逐步升级”，“帐要挂到邓小平身上”，等等。第一张大字报经财贸组、写作组等部门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由冯国柱定稿，于8月30日派人送到北京外贸部张贴。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外贸部和外贸进出口总公司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反映冷淡。马天水知道后，怕进一步闹下去会露出“马脚”，要财贸组通知去北京送大字报的人立即返沪。黄金海见“铜牌事件”，没能闹出什么名堂，恶狠狠地说：“看来外贸部非派1000个工宣队员去不可”。他心不死，又抓紧组织炮制另外几张大字报，准备继续往外贸部送。但他们的大字报还未写成，“四人帮”就垮台了。

“铜牌事件”一事也就宣告结束。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为了篡党夺权，费尽心机，炮制多起“事件”，攻击中央各部，炮轰国务院，反对周恩来，但是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种“事件”都成为人民群众清算他们所犯的滔天罪行的罪证材料！

三十三、“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搞的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初，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对工业、交通、农业、财贸、科技、军队等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将“文革”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遭批判的正确的方针、政策重新恢复过来，实际上系统地纠正着“文革”的错误。依靠“文革”发迹起家的“四人帮”及其党羽们，早把邓小平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邓小平倡导的全面整顿工作更加引起他们的极端仇恨与恐慌。江青、毛远新等人在毛泽东面前不断进谗言，造谣中伤，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发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人帮”又利用这个运动，妄图彻底搞掉邓小平，并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全面篡夺党与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为在上海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行了特别猖獗的活动。在全国各省、市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四人帮”企图以他们的“基地”的示范作用，“推动”全国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然

而，由于“批邓”很不得人心，“运动”实际上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各种不同形式的抵制。“四人帮”、马、徐、王等的处境是孤立的、脆弱的，最终只能加速了他们的覆灭。

(一)“四人帮”诬蔑攻击邓小平由来已久

“四人帮”一伙处心积虑地要打倒邓小平并不是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的。他们早就把邓小平同志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1973年3月，经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批准，重新安排了邓小平的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对邓小平的复出，“四人帮”及上海的党羽，十分不满，蓄意进行恶毒攻击。王洪文特地打电话给马、徐、王说：对邓小平“以后还要看实际行动”。徐景贤摇头晃脑发泄不满说：“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的代表人物，报纸上等于点了名的，全世界都知道，现在却出来工作，有些人肯定想不通，要不是毛主席决定，我也想不通。”马天水说：“他是二号走资派，这个人搞起‘独立王国’可凶哩，叫他任副总理（我）不放心”。王秀珍紧接着说：“邓小平都可以出来工作，其他走资派都可以翘尾巴了。”他们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在上海迟迟不传达关于邓小平任职的中央〔1973第14号〕文件。以后，马、徐、王看到其它省、市纷纷向中央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才迫不得已地在市委全体会议中进行传达。但在传达时煽动继续反邓，于是陈阿大、朱永嘉、叶昌明等一伙相继跳出

来对邓小平进行疯狂攻击。会后，马、徐、王等以市委名义向中央发电报表态时，竟仍然加进了“（邓）检讨不触及灵魂，我们不满意”，“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是摇鹅毛扇的人，是决策人，要看实际行动”等等猖狂攻击邓小平的话。

同年夏天，邓小平陪外宾来上海，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来上海。送走外宾后，邓提出要去金山石化总厂看看，马天水别有用心的叫王秀珍、陈阿大一起陪同参观。参观回来后，马天水对王秀珍说：“我叫你和陈阿大去陪，就是要你们了解了解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你看见邓小平了吧，他对群众（按指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一些人）是冷冰冰的，根本没有话，他现在的表情、举动和文化大革命前一样。”

1974年初，姚文元窜回上海，把马、徐、王召到住处密谈。姚文元在马、徐、王面前煽动说：“毛主席把邓小平请是请出来了，今后再看吧，……文化大革命我们同他较量过，没什么可怕的。”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经大会选举，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选举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以

后，周总理病重，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面对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挺身而出，在不少老革命家的协助下，开始对全国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为消除“文革”动乱，实现全国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如“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纪律性”、“建立规章制度”等等。1975年5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钢铁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提出了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对捣乱，闹乱子的人，要进行坚决打击，毫不让步”，沉重打击了那些“闹而优则仕”的大大、小小靠“文革”造反起家的一伙人。这伙人正是“四人帮”所依靠的搞乱全国的社会基础。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姚文元和王洪文分别在6月和7月灰溜溜地到上海来“避风头”。姚文元在徐景贤等人面前颓丧地表示：“要我挤挤公共汽车，上上五·七干校还是可以

^① 1974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借机塞进“私货”，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口号。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不良意图有所察觉。1975年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不和200多名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两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的。”王洪文一到上海，就要秘书廖祖康找有关方面给他准备一间办公房子，表示要在上海长期呆下去，不准备回北京了。并发牢骚说：“我有什么权呀！政府的权，军队的权都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指邓小平）的，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学习班的权。”7月底，姚文元回北京前，对马、徐、王说：“今年下半年，中央可能要出事。”又对王秀珍说：“王秀珍啊，我们都是新干部啊，我们要注意呀，要有精神准备啊。”并居心叵测地给上海的党羽们出了个题目，要他们考虑：“要是中国象苏联那样变成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变修了，怎么把它变回来。”王洪文在上海期间，多次召集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施尚英等一帮小兄弟开黑会，频繁串联。王洪文煽动说：“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内战，苏修进攻要准备打外战，要准备内战、外战一起打。”“上海要准备打巷战。”王洪文还多次到市工会、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上海柴油机厂、江南造船厂、5703厂、风庆轮、市百一店、崇明农场等单位，疯狂进行反革命煽动。8月7日，王洪文在市工会召见他的一批小兄弟时狂叫“当前中央斗争很复杂，要有上山打游击的准备”“我是准备被赶回上海的”等等。8月19日，王洪文在第三十棉纺织厂大吹他的所谓“造反史”，进行自我标榜，临走时叫嚷：“只要我不被打倒，我不死，下次还是要来的，右派上台我就来不了啦。”“我是压不下去的，即使压下去，也总有一天会起来的。”王洪文并在马、徐、

王面前恶毒攻击中央军委和邓小平，说什么“邓对军队的干部熟悉，下手快，一下子把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班子都搭好了，安插了他所熟悉的人”，“军队提拔新生力量最保守，军队领导班子根本没有老、中、青”。又说：“军队不可靠，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传出的。”姚文元，王洪文和上海的党羽们聚集在一起，一面发泄对邓小平的强烈不满和仇恨，一面在暗地里进行阴谋策划，寻找反扑的机会。

（二）派密使去北京摸情况

1975年11月初，北京清华大学在“四人帮”的干将迟群、谢静宜的控制下，掀起了一场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国家教育部长周荣鑫，罪名是“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实际上，斗争的矛头是对着邓小平的。王洪文在上海看到了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简报》，兴奋地告诉马、徐、王说清华大学辩论很激烈，“提到了‘走资派还在走’！”当时马、徐、王，就劝说王洪文赶快回北京去。但王洪文说要再看几天。不久，王洪文又告诉马、徐、王，说毛主席对教育部、七机部都有批示了。这时报纸上报道了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出场接见外宾的消息。王洪文和马、徐、王都认为“风向转了”，形势对他们有利了。于是，一直赖在上海不肯回北京的王洪文，突然决定马上离沪回京，去参加他后来称之为“一直和邓小平对着干的战斗。”

那时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也被北京传来的消息刺激得手舞足蹈，几个人多次秘密商谈。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跳出来向邓小平反扑。他们商定，让徐景贤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为借口，去了解北京的政治气候，并直接听取张春桥等的指示。当徐景贤打电话请示张春桥时，张春桥却认为这样做太显眼了，说：“现在北京很敏感，徐景贤来了不好办。”徐景贤去不成，马、徐、王商量改派徐的秘书张家龙以给周恩来送药为名，进京探摸情况。

张家龙11月15日到京，按照徐景贤事先的交待，先后找了清华大学迟群、文化部于会泳、教育部周宏宝、《红旗》杂志社胡锡涛等人，摸清清华大学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背景和北京开展“批邓”的部署。当他了解到12月份的《红旗》杂志将要发表“重要文章”，“指导”全国“教育战线大辩论”，开展所谓“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息后，急忙于18日中午返回上海，将情况报告徐景贤。当天下午，马天水在上海市体育馆召开全市技术革新经验交流大会，徐赶到会场，将张家龙从北京刺探来的所谓最新“精神”，迫不及待地塞进马天水总结发言稿里，在干部群众面前进行煽风点火。

当天晚上，马、徐、王又把张家龙召到锦江小礼堂，让他详细汇报在北京摸来的情况。当张说到邓小平已被指责为周荣鑫、刘冰的后台，在教育界的这场“大辩论”中邓小平开始挨

整时，马、徐、王兴高彩烈。马天水诬蔑说，周荣鑫“原来胆小如鼠，现在却气壮如牛了，原来后台是邓小平”。王秀珍则不无惋惜地说：“老王（指王洪文）这次回北京太晚了，又没赶上。”徐景贤叫张家龙马上将上述情况向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翼德等人“通气”。朱永嘉等人立即根据这些“精神”，以市二中学党支部的名义代庖赶写了一篇题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通过胡锡涛，赶在1975年第12期《红旗》上发表。徐景贤要“市革会”文教组通知全市文教系统组织学习这篇文章。上海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此开场了。

（三）设置“窗口”，树立“诬邓”样板

1975年11月下旬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后，还未等中央同意把会议精神向下传达（按当时只限于省、军级党委常委讨论，12月10日才扩大传达范围），马、徐、王便迫不及待地于11月30日上午把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侯赞民召到康平路办公室密商；同日下午，由徐景贤主持召开了有朱永喜、王成龙和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两校党委书记及“大批判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徐景贤介绍了北京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窗口”的做法，正式宣布上海要以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为“窗口”，“要搞得更好一些，要想得深一些”。他下令这两所学校当晚就要行动起来，突击赶写

一批大字报，造成声势；“写大字报时要公开点清华大学刘冰、教育部长周荣鑫的名”。最后徐又指定朱永嘉、王成龙两人分别联系两校，抓好这两“窗口”的运动。

复旦大学侯赞民回校后，把朱永嘉给他的有关周荣鑫的一些讲话稿作为“批判材料”，突击打印了230份，下发各支部，要求连夜搞所谓“大批判”。（以后又翻印了700多份转发上海各高校）第二天复旦大学校园里就出现了一批横幅标语和大字报。在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杨希康当夜布置人把周荣鑫的讲话断章取义地编写成所谓“摇头派言论”，抄成大字报在校园内张贴。12月1日上午，杨又召开了总支书记会议和全校党员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强调“这场斗争不光是教育战线的斗争，而是一场否定和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斗争”，同时抛出所谓的《摇头派言论》集，煽动大家批判。

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都层层召开动员会，举办各种“学习班”，煽动干部、党员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等所谓的“反动”论点。在校园里贴出了大量造谣中伤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

马、徐、王多次窜到这两个学校，亲自指挥“战斗”。12月3日，徐景贤说：“教育界的人不能只看到教育界这块天地”，“要想得深一点”。1976年1月8日，徐景贤看到复旦大学校园里贴满大批诬陷邓小平、周荣鑫、谷牧等领导同志的大字报，洋

得意，神气非凡。但当他发现复旦大学印发的材料有的将中央领导同志的名字略去，只用×××来代替时，又大为不满，批评复旦大学党委做事“太谨慎”，下令马上把全部名字补上重新印发。徐景贤还多次把从张春桥、迟群和谢静宜，以及外地的一些帮派分子转来的所谓“批判”材料，转手给王成龙和两校的负责人，要他们抄写成大字报在校园内四下张贴。徐景贤说：“你们的印刷机要24小时开动。”据统计，从1975年12月起至粉碎“四人帮”前共翻印了诬陷、诽谤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各种材料和大字报选有76万余份之多。

“窗口”开张后，马、徐、王利用各种手段，竭力扩大“窗口”的影响，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恶浪。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年初，“市革会”文教办公室连续3次召开全市文教系统干部大会，卖力地介绍、推广两个“窗口”“批《摇头派言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做法和所谓“经验”，树立样板。要求各校都要按照两校的“经验”去做。

在“四人帮”和马、徐、王所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上，经常用整版的篇幅连篇累牍地刊登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大批判文章，鼓吹两校的所谓“先进经验”。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以朱永嘉、王知常为头头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捉刀的，并且明显地与北京“梁效”（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

判写作组)的文章相呼应。如1976年1月11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大辩论带来新气象》的文章,详细报道了清华大学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徐景贤对此文大为欣赏,他以此文为样板,要上海师范大学也搞出个经验来。1月21日,一篇题为《风雷滚滚旌旗奋》大肆吹嘘上海师范大学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做法的报道炮制出来了,刊登在《人民日报》和上海两报的头版位置上。文章发表后,徐景贤亲自到上海师范大学表示祝贺,对那里党委负责人说:“中央首长(按指“四人帮”)挥动了旌旗,在大干了”,“(你们)还要继续批出新水平,做出新贡献”。这些文章的共同的特点,就是极尽歪曲、诡辩、诬陷之能事,诬蔑邓小平及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是“摇头派”、“还乡团”、“复辟狂”。把1975年以来的整顿工作说成是“右倾回潮”,是“资本主义复辟”。

马、徐、王多次在大会、小会上提出“工厂、农村可以(组织人)到‘师大’、‘复旦’去看大字报”“文教系统和工厂互相交流经验”,煽动搞全市大串联活动。马天水甚至还煽动部队的同志参与串联,说什么“到大学里去受教育”。1976年1月6日,他们下令两校的大字报“向社会开放”,搞好对来参观的本市、外地甚至外宾的接待工作;编印好《大字报》选,向来校串联的人散发。于是上海的工交、财贸、农村、大中学校等大批人员被动员到两校来参观了。据统计,从1976年2月6

日至19日的14天“高潮”期间,去两校“参观”的人数就达到100多万人次(估计先后全部参观、串联人数约有160多万人次)。两校的一些师生反映:“比文化大革命初期搞大串连时还要热闹”。两校的一切工作都让路于搞“窗口”了。如在“师大”,每天来“参观”的人数高达5、6万人,开始时,外来参观的人都由党委负责人出面轮流接待,后来由于串连的人数太多了,接待不及,校党委不得不制作一盘介绍情况的录音带,在大礼堂内轮番播放。校党委负责人亲自布置各系动员一切力量写大字报,并规定指标,几天一换,高潮时每天一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绝大多数奉命被组织来“窗口”参观的广大群众,对大字报的内容并不关心,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不过是来逛一次校园,看看热闹而已。这从他们回到本单位后反映冷淡,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迟迟搞不起来,可以证明。来两校看大字报的,除本市的以外,还有许多外省、市的一些帮派头头。

3月底、4月初,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派人专程来沪拍摄《复旦大学校园卷狂飚》的记录影片,详细介绍复旦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片中特意安排了有徐景贤、王秀珍领头游行、诬蔑咒骂参加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群众、恶毒攻击邓小平的场景和内容。这部影片于6月底在全国各地播放,影响极坏,流毒甚广。

(四) 大量翻印、散发“白头材料”

所谓的“白头材料”，是指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由“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徐、王等，部署“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手段，收集并进行加工篡改的中央和地方一批领导同志的讲话材料。他们对这些领导同志肆意进行诬陷攻击，妄图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他们统统打倒。由于他们作贼心虚，翻印时不注明材料来源，不署翻印单位的名称，因之，群众称之为“白头材料”，以区别于党内正式文件的红头材料。印发“白头材料”本身就说明炮制者是不择手段搞阴谋诡计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和色厉内荏。据若干大口和大专院校的粗略估算，从1975年11月设置两个“窗口”起到1976年10月，马、徐、王在上海共约抛出了7百多万份“白头材料”。1975年12月中旬，市委召开区、县、局、大专院校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马天水事前与王洪文、张春桥通电话，王洪文说：“凡是错误论点都可以批”；张春桥说：“发批判材料不要用市委名义，要用下面的名义发。”会议期间，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频繁穿梭在各小组煽风点火，胡说什么：“对错误论点，可以批判。‘清华’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既然是一股右倾翻案风，那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大家要议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于是，会上出现了一股歪风，大家都来回忆和整理

中央和省市一些领导同志的讲话材料，或断章取义，或肆意歪曲，造谣中伤。会后，马天水要搞简报的同志将会上收集到的各种攻击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部委领导同志的材料，整理后密送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徐景贤还布置文教组将一部分材料送到几个大学去大量翻印，然后散发到其他单位。

1976年2月8日到12日，市委再次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马天水在会上公开煽动说：“他（指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总后台、总代表。我们常委在春节前点名批判了，在这次会上可以点名批判。”马、徐、王还将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收集来的12份材料，如《科学院汇报提纲》、《邓小平在钢铁会议上的讲话》、《中央首长接见中央学习班第四、七期学员的讲话》、《工业二十条》、《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同志的讲话》等，印发给到会的600多人，要大家联系实际“批判”。当时一些同志询问材料的来源，马天水说：“材料是清华（大学）搞的，要批判修正主义，当然要材料。”徐景贤气势汹汹地说：“这些材料外地早就传达了，过去是对我们封锁，现在我们就是要冲破封锁线。”会议结束时，马天水公然布置各单位可以自行翻印会上发的材料。

1975年12月8日，马天水在“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上进一步煽动各系统收集、整理“白头材料”，作为“反击右

倾翻案风”的炮弹。他交待对收集来的材料，“不一定要打字、发简报，可以手抄。”对翻印的材料，“不要说是市里来的，就是开专业会议带来的。”徐景贤阴险地授意各系统“翻印材料时，不要一个版本，版本越多越好，让大家不知道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在马、徐、王的指挥下，窃据“市革会”各组、办领导岗位的帮派党羽们如叶昌明、黄金海、朱永嘉、马振龙等倾巢出动，在各自的系统中，大肆收集翻印各种“白头材料”。在叶昌明的指挥下，市工会在12月中下旬，抢先翻印了从马、徐、王以及文教组王成龙处拿来的《周荣鑫言论摘编》和《周荣鑫的讲话汇编》，《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胡耀邦同志的讲话》等一些材料，立即下发给市工会机关和各区、局工会。除此之外，叶昌明还指令各级工会都要注意收集“材料”及时上报。不久，冶金局、建工局、海运局、邮电局、上海铁路分局、长航局等各级工会纷纷报来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务院以及各部、委负责同志在一些专业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这些材料到了叶昌明手中，就立即被“加工”，突出所谓“右倾”“修正主义”论点，进行所谓“批驳”，然后，大量翻印、散发。掌管财贸系统的黄金海，布置财贸系统各局把自1975年以来到北京参加各部、委召开的会议时拿到的各种文件，以及听报告时所作的记录整理上报，从这些文件、讲话记

录中，断章取义的汇编了一本《反映在财贸战线上的一些奇谈怪论》，其中收录了33份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涉及的内容有财政、商业、粮食、水产、外贸、海关等7个方面，点了27位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同志的名，铅印了800多份散发至全系统。

在轻工局，马振龙一伙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摘录，汇编成两本小册子，大量印发给全局系统直到基层生产小组。马振龙猖狂叫嚣：“大量印吧，发下去让群众识别。”从1975年底到1976年上半年，轻工业局翻印、散发了各种“白头材料”53万多份。

在共青团市委，从1976年1月至4月间，由团市委书记陈新发布置翻印了诬陷邓小平、胡耀邦等13位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的15种材料，计15万6千多份，在全市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中散发。

马、徐、王将各系统收集印发的“材料”分批密报“四人帮”。王洪文看了连声叫好，说“有些材料（过去）还没有看到过”，对马、徐、王等人大加夸赞。

当大批“白头材料”下发到干部、群众手中时，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责问，“为什么材料没有签发单位？”“为什么不具名？”许多干部群众还提出“这些讲话，不是很正确吗？为什么要批？”一些基层干部公开进行抵制，将材料搁置起来。

消息传来，引起了马、徐、王及其一伙帮派骨干的恐慌，纷纷出马，向下施加压力。

当轻工业局下属的一些基层单位对“白头材料”采取不要、不批的抵制态度时，马振龙气势汹汹地说：“（对）不要、不批的要追查、批判帮助。你们在这场斗争中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按市委的部署办。”

1976年2月，冯国柱在科技系统的一次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上叫嚷：“你们看到的没头没尾的材料，有人说这是小道，这不是小道是大道。”

黄浦区许多基层单位对上面发来的“白头材料”反映很大，认为这种做法不正常，有的单位拒绝接收。黄浦区委急忙打电话向马、徐、王请示。市委办公室回电传达马、徐、王的话，“不要以区委组织的名义印发材料”，“收回是不对的，销毁更是错误的，现在批判还刚刚开始，还要狠狠批。”王秀珍对一些帮派党羽们面授机宜：“如果问起材料从那儿来的，你们就说是从大学拿来的。如果问材料怎么不具名，你们就说材料人家可以向下传达，我们为什么不好批！”上海马、徐、王等人用谎言加专制手段，企图扑灭群众对他们搞阴谋诡计的抗议怒潮。

（五）“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诬邓大串连活动

1976年1月下旬，王洪文、张春桥分别召见了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后即将回沪的黄涛。1月29日，黄涛向上海市委常

委会传达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他说王洪文给他看了只发政治局的内部简报，其中说清华大学已经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王洪文关照说中央最近要开个会，每省来3人。上海要抓紧准备来开会的材料，“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邓小平批倒批臭！”张春桥特意关照“下次来开会不能空着手来，尽讲些空话，材料准备要搞扎实些”。

接到张、王的指令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立即忙碌起来。他们四下收集材料，拼凑诬邓的“炮弹”，准备去北京开会时“大干一场”。

1976年2月19日至25日，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了“打招呼会议”。上海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除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外，还有经王洪文通知增加的黄涛、李彬山，共5人。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和“市革会”工交组的秘书组负责人翁俨若，作为随行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活动。

会议期间，京西宾馆里上海代表团的住处，成为“四人帮”和党羽们以及某些追随者大搞阴谋串连活动的场所。加上江青、张春桥又各自召马、徐、王等人去钓鱼台住处密谈，只见他们穿梭般往来于京西宾馆与钓鱼台之间，好不闹猛。每天晚上，京西宾馆马天水所住的那个套间里，“高朋”满座，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不到深夜不散。短短几天内，王洪文来了3次，张春桥来过2次，江青、姚文元各来1次。座上客有从上海调

去安插在中央国家机关的金祖敏（当时在全国总工会，他来的次数最多，几乎每晚在座）、祝家耀（公安部），周宏宝（教育部）、于会泳（文化部）等人；有国务院部、委和外省市一些负责人毛远新、魏秉奎（辽宁）、迟群与谢静宜（清华大学）、陈绍昆（冶金部）、刘庆棠（文化部）、鲁瑛（人民日报）、陈佳忠（福建）、涂烈（江西）、丁盛（南京军区）等人。他们在那里兴高彩烈地庆贺反邓“第一回合”的胜利，交换各地“批邓”的情报，制造与扩散诬邓的谎言谰语，阴谋策划掀起更大规模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是“四人帮”导演并亲自参加演出的一出空前露骨的结帮大串连闹剧。根据粉碎“四人帮”后马、徐、王等人的供述和翁伊若等的揭发交待，现在将他们的主要串连活动跟踪记录如下：

2月19日是打招呼会议开会第一天。当晚张春桥、王洪文就窜来上海代表小组住处，张春桥实际上是来为上海代表小组定调子，作部署的。他张口就诬蔑邓小平，说：“邓小平很难改过来了……他提不起纲来，不抓阶级斗争，他根本不想搞生产，也不想要安定团结。他是（搞）分裂嘛！”紧接着张春桥大谈什么“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大谈“民主派”变为“走资派”。他把那些坚决要求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大力进行整顿的中央和地方上领导同志说成是邓小平的“基础”，胡说“这些人相互起作用”，“对民主革命的要求是懂得的，战争一结束，就

带来利益，再前进就不行了”。要马、徐、王等看清“现在的阶级关系”，“对走资派要好好议一议，这一条不解决，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谈不上”。张春桥阴险地一再“启发”，要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这些老同志。

这天晚上，张春桥还唆使马天水准备到全体会议上发言、“放炮”。他说：“老马你准备到大会上发个言，揭发批判。他（指邓小平）说他不搞阴谋诡计，到你那里讲一通不是阴谋吗？你的材料（指1976年1月马天水写给王洪文诬陷邓小平“策反”他的材料）我和洪文没用，因为他对你讲的，要由你来讲。”

2月20日夜里，江青和王洪文分别窜到马天水的套间。江青一面把徐景贤、王秀珍、黄涛和李彬山召集拢来，一面又把已经睡觉的南京军区丁盛和辽宁省的魏秉奎也找来。江青进门时就大声嚷嚷：“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啦！”不难听出她这里话中有话，既表示了她在上海党羽们的特殊亲密关系，以示笼络，又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对“四人帮”的批评的猖狂反扑。她歇斯底里大发作，咒骂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对我迫害，不让我出来，不让我讲话。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又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污蔑邓小平“有所觊觎”，恬不知耻地诬栽说：“他们整我，是要整主席。”

王洪文对上海以市委常委扩大会的名义发给中央的“表态”电报不满意，嫌“火药味”不浓，他布置马、徐、王：“市委扩大会，还可向中央写个报告，还是要反映会议的情绪”。他在马、徐、王等人面前直接攻击一些来参加会议的外省、市领导人，说什么“5个省（领导人）来了十几天了，有些地方冒火了，有的还捂盖子，……这次搞得最厉害的是江西、云南、福建。……福建办了3千多人学习班，层层办，批派性，把一批新干部整下去”，“他们陷得太深了，弯子不容易转过来，如廖志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他大肆诬蔑说：“我们党许多高、中级干部，大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受压迫，参加革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有些人不想革命了。……‘三四百元一幢楼，汽车警卫样样有’，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不想革命，甚至反对革命，一部分人民主革命是动力，社会主义革命是阻力。……邓小平的表演，很能说明问题。”等等。在江青和王洪文面前，马、徐、王等群起附和，慷慨激昂地表示要打好“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仗。

2月21日深夜，江青又偷偷地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等召到钓鱼台她的住所里去密谈。这一夜，在这伙亲信面前，江青得意忘形，丑态百出。她摇头晃脑、又叫又跳地“庆贺”扔掉了“紧箍咒”（指毛泽东、邓小平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她对这伙人恩宠有加，又是放电影，又请去

参观她的花房，又向大家送书，特别送给马天水一套有她签名的《词综》。江青这一番举动，使马、徐、王等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纷纷地献媚讨好。徐景贤肉麻地说：“祝江青××身体好！领导我们继续战斗”。王秀珍也媚谄地说：“请江青××保重身体！盼望江青××到上海来！”江青则“告诫”他们“现在（只）是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不能松劲，还要继续‘打仗’”！

对于帮派势力难以插手进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四人帮”放不下的一块“心病”。在这次见面密谈中，江青又在这些党羽们面前发泄其对人民解放军的不满和仇视，她说：“在军队，军以上新干部很少，都是老的。这些老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革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得到好处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不肯革命了”，她咬牙切齿地说：“现在，军装我不穿，帽徽我不戴，什么时候军队的问题解决了，我戴上。”她要那些党羽们乘“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机，插手军队，搞乱军队，篡夺军权，反动气焰嚣张万丈。

2月22日夜里，马天水套间里分外“闹猛”。先是姚文元窜来和上海的同伙们见面，隔了半个钟点，王洪文又来到了马的房间。过后不久，辽宁毛远新和冶金部的陈绍昆也相继来了，而金祖敏是几天来的常客，早就坐在那里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又疯狂地唱起了攻击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大合唱”。

姚文元来后，马、徐、王便问他此次斗争算不算第11次路线斗争？他不作正面答复，阴阳怪气地说：“不管叫第几次（吧），反正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邓小平上台才多久？可见毛主席讲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当王洪文、徐景贤等人攻击说去年那一阵政治谣言，主要是从军委扩大会上刮开时，姚文元按捺不住内心的仇恨，恶狠狠地说：“去年，纪念长征4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刘伯承的那篇文章也给登了。《红旗》杂志不给他登，他们（指老一辈的革命家）就骂。宣传长征的文章，是有他们的目的的，他们是借此‘反左’，要新干部下去。”接着他阴险地提出：“搞革命传统教育，主要放在全国解放后的几次大的路线斗争，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在哪里！”姚文元说有事先走。他走后王洪文、毛远新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以及黄涛等人又借所谓“石油出口”等问题，大肆造谣污蔑，恶毒攻击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

毛远新胡说：“大庆的石油，看着关外大面积停电停产，就是不给调用，卡死了！”马天水说：“这些人根本不考虑国内生产，宁可叫国内工厂停下来，搞石油出口，这完全是给外国资本家输血！是洋奴才！”王洪文接腔谩骂：“是些卖国贼！”

王洪文话锋一转说：“邓小平是个挂帅的。凭他一个人就搞得起来？我才不相信！”马天水接上说“在北京，可有许多人对

邓小平无限崇拜呢！（说）不管有多复杂的问题，一到了邓那里就迎刃而解！对邓小平崇拜得五体投地！”徐景贤和王秀珍也跟着附和说：“有一帮人吹喇叭，抬轿子。”马天水又恶毒地说：“邓小平，这决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在中央和中央各部是有基础的！”“有他这么一个人上台一呼，马上就搞起来了，快得很！”

王洪文又提到民兵问题。1974年，张春桥、王洪文利用民兵搞“第二武装”妄图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遭到了邓小平的坚决反对。在1975年7月的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又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自成体系另搞一套的做法。王洪文一直怀恨在心。此时，他恶狠狠地攻击说：“民兵问题，他在军委扩大会上就开炮了，实际是对我不点名的点名。……他要廖志高搞个材料，企图用这根棍子把辽宁、上海的民兵打下去。”王洪文贼喊捉贼地污蔑邓小平“要推行修正主义，当然要抓民兵这个权”。

2月23日下午，江青不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擅自召开了在京的17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以后在3月2日，她又私自召开了12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在这两次会上江青都发表了长篇讲话。一会儿装扮出一副所谓“受迫害”的“可怜相”，一会儿又趾高气扬地骂人，淋漓尽致地施展了她的“表演”才能。

她说她要控诉邓小平对她的“迫害”，“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

“（邓小平）这个人出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成果，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不仅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都翻。”她还污蔑邓小平把石油、煤炭、棉布压价出售给大资本主义国家，是“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在讲话中，江青多次拿电影《创业》、《海霞》、《园丁之歌》以及“风庆轮”等事件来恶毒地攻击邓小平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她还气势汹汹地点名攻击一些地方上领导同志“不听她的话”“执行邓小平那一套，搞翻案”，并恐吓说：“有些省有些问题，要作深刻检查，我很不希望象廖志高那样，一下飞机就给（造反派）抓起来。”

江青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是“处处紧跟主席的”“经常作自我批评的”，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准备杀头坐牢”。讲到得意忘形之时，说漏了嘴，竟以“女皇帝”自喻。她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不简单啊！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这一番话，确是她内心的大暴露，把她篡党夺权、梦想当中国女皇的阴谋野心和盘托出。

江青在会上的“表演”，引起了与会很多同志的反感。特别对她那种狂妄自大、胡乱点名、乱打棍子的蛮横作风，当场就

有同志起来予以抵制和反驳。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坚决反对向下传达江青的讲话。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回去一律不准传达江青的讲话内容，并慎重地要这些负责人一一签字为凭。

江青2月23日下午召开的会议散会不久，张春桥匆匆来到马天水那里，召拢了马、徐、王等人谈话。这一次谈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点，第一是张春桥摆出一幅严肃和急迫的神态，批评了马、徐、王等人。他对马、徐、王等人说：“你们在上海还有气，到北京怎么没有气了，你老马也没有气，邓‘策反’你，你也不揭发，你们要对邓恨得起来。你（指马天水）不在华东大组发言，（按：当时中央决定大组会不开了）在上海小组可以发言嘛！出简报，到会的都可以看到。”并强调“调子要高、气势要足”，心急火燎地鞭策他的同伙们“加温、加油”继续批。张春桥还哀叹：“5个省的第一书记都在考虑回去传达怎么说，在文字上斟酌来斟酌去，但思想没有真正解决，弯子不易转好。”他接纳不住内心的仇恨，向马、徐、王等发泄道：“那些（都是）还乡团头子，在九次战线斗争时，他们就是一伙的，弯子难转，已经不行了。”又说：“这些人怎么办呀！周荣鑫还能当教育部长啊？！廖志高搞得很凶，江渭清开始还好，后来不行了，他们与邓小平本来就合拍。”第二，他一再“告诫”马、徐、王“现在外部的压力轻了，内部的团结可能出现问题。不

团结、不谨慎，这个侧面要注意啊！”并引用柳宗元的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提醒他们“注意市委内部的团结”，稳住阵地，团结对“敌”。

张春桥走后，黄涛马上说：“春桥批评得很严肃，我们晚上要开会，火力猛一点批。”当天晚上，马、徐、王等便又开了上海小组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和李彬山一个个加足了劲，慷慨激昂地“揭发批判”，着实表演了一番。会后发言稿修改后编上了《会议简报》。

江青23日讲话中曾提出要参加会议的人到清华大学去看“批邓”大字报，2月24日上海参加会议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和李彬山都去了清华大学。参观以后又参加了由清华大学负责人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会上，迟群和谢静宜大谈一通所谓“经验、做法”，同时狂妄地指责一些省、市委领导批邓不力，攻击那里刮“右倾翻案风”，给这些地方施加压力。马天水也跳出来跟着起哄说：“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阻力很大，要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是那么容易，不下工夫不行，不冲破阻力不行。”

第2次“打招呼会议”于2月25日结束。当天晚上王洪文又一次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房间，把上海的出席代表召集拢来，对回去后如何开展运动作“指点安排”。他反复叮嘱马、徐、王等人：“上海运动搞扎实一些，抓住批邓不放。过去几次运动不

深，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遗留问题，干部问题，没有解决。”想借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一步巩固他们的上海“基地”。

王洪文又借机对警备区的领导施加压力，责骂“警备区有些人对邓小平的话感兴趣，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从南京军区回来把张宜爱、李彬山整下去，还把批林批孔积极分子整下去。”“军队有没有阶级斗争？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企图趁此机会再一次把手伸向军队，搞乱部队。

2月26日下午，马、徐、王离京返沪前一天。张春桥又特意把他们3人召到钓鱼台住所，对回去后如何贯彻“打招呼会议”精神“面授机宜”，作“精心”的安排。张春桥强调：第一，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邓小平，说：“我这几天看鲁迅著作《阿Q正传》，阿Q与小D打架，赵七爷坐山观虎斗。要劝阿Q与小D别打了，团结起来斗赵七爷。”第二，企图在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以及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打下去。他攻击老干部说：“参加民主革命的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这是必然规律。”第三，特别强调所谓“理论问题”，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理论根据。张春桥对马、徐、王说：“你们回去在开市委常委会的同时，可以开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那个会吸收理论队伍、文艺创作人员，报纸、出版社编辑记者、工农兵理论骨干参加，另外编组。他们提出

什么问题，可以为下阶段开县、团级（干部）会议作准备。”他并提出会议要把“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等这些“重大问题”讨论深透，要让这些“理论骨干”早作准备，“因为他们要写东西”。

张春桥还对马、徐、王说：“我想从上海选几个人到我身边来，搞些秘书工作。”据徐景贤在自己笔记上的说明，说张“实际上他是想‘找个伴’”。①

最后，简要地说一下那些来马天水套间串门的人物的言谈。尽管记录下来的文字不多，但也可充分暴露出那次反革命串连的疯狂劲头，发人深思。来得最勤的是金祖敏、祝家耀、周宏宝等人。他们坐下来就纷纷“发牢骚、叹苦经”。什么“保守势力厉害，批邓阻力很大”，什么“老家伙势力大，批邓搞不下去”，什么“自己势单力薄，没有实权，日子不好过”等等。

金祖敏向马天水等人诉说：“全国总工会（班子）难产了，

① 1976年2月26日张春桥在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中，提出要替他找个秘书。回上海后，徐景贤积极物色，选了2个男同志，整理了材料寄给张。3月份，张春桥给徐景贤寄来一封亲收信，信的大意是：“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徐景贤接信后，这才真正明白张找个秘书的含意，便又卖力地物色了一个对象。张春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找个“伴”呢？原来张的老婆李文静历史有问题，一直是张的一块心病，为了避免给人抓住把柄，张早就打算和她离婚。现在张春桥认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时机到了，急于要撇开历史上有污点的李文静，另找一个。

权被人家夺走了。被邓小平他们干扰、破坏”，“去年七、八、九（月）那时候，全总的一些老的可活跃啦！现在批邓又都不响了。”

祝家耀则攻击“前一阶段追查谣言，查不下去，都是邓记谣言公司传出去的。”“有的地区在马路上公开出现攻击‘中央领导’（指‘四人帮’）的大幅标语，完全是现行反革命，完全该杀，可我们的部长就是不批！”

福建陈佳忠来串连时攻击廖志高紧跟邓小平，在福建大刹派性，对造反派残酷镇压等等。马天水、徐景贤马上对他说你们那里事例生动，可以写个电影剧本，我们上海帮你拍。当陈佳忠说“我们家里已经准备等廖志高一下飞机，就给他挂上牌子，游街示众。”徐景贤马上叫好说“廖这种人属于顽固派”。马、徐、王提醒陈注意“树倒猢猻散，树树猢猻聚”这句话，“现在邓小平这棵大树倒了，别的什么邓几乎再上台，猢猻马上又聚起来了”“这些还乡团团团长是不会罢休的！”

22日晚上冶金部陈绍昆来串门，刚进门，马天水就向他打听“冶金部的运动搞的怎么样？”当陈说“阻力不小”时，马天水立即挑动说：“邓小平讲你这个人‘软、散、懒’，我看一点也不错！你就是怕字当头！”陈绍昆在他们面前起劲地攻击冶金部的一些主要领导和老干部，说这些人搞翻案，是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支持的，马、徐、王马上给他打气，煽动他要大胆干。徐景贤说：“今天部长总的来说不错，还是不软的！”王秀珍也

鼓动他“希望你就象今天晚上的精神状态，斗下去！”马天水则要他“拿出钢铁部长的样子！”和邓小平及那些“老家伙”斗。

(六) 马、徐、王赤膊上阵，力图掀起“批邓”高潮

“打招呼会议”结束，马、徐、王等回到上海。经过会议中间这一番大串连，他们一个个鼓足了劲，迫不急待地想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借以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老干部，并为自己争得新的“功劳”。粉碎“四人帮”后马天水招认：“开会以后，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反动地认为在中央、在地方、在国务院各部有一批右的势力，在批邓中要冲一冲，有的要批判，有的要转弯子，有的要打倒。”

按照张春桥、王洪文的部署，马、徐、王等接二连三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2月29日到3月4日，有“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等参加）、理论工作座谈会（2月28日到3月3日，宣传、文教系统代表和理论队伍、文艺写作骨干等参加）、区、县、局负责干部会议（3月9日到3月11日）。他们几个人或直接在大会上带头“批判”，或在小组讨论中煽风点火，声嘶力竭地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鼓噪加温。

这些会议的突出的共同点有3条：

第一，大肆贩卖“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

马、徐、王把这一条作为进一步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理论”王牌。他们借口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信口雌黄，极其恶毒地诬蔑和攻击党的老干部，歪曲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的形象。按照他们的说法，老干部“从来”都是“民主派”，而“民主派”又“必然”要变成“走资派”，说这是一条所谓“客观规律”。马天水说：“参加民主革命的同志，入党时也讲为共产主义奋斗，但在个人来讲，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如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产主义。土改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认为差不多了。党内高级干部也有他的共产主义，他们推行的是资本主义。”徐景贤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出身小资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革命胜利了，就不想革命。”“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我们把他们叫做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尤其在“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徐景贤、朱永嘉等人走得更远。他们污蔑“老干部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党‘同路不同心’”，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个“剥削劳动人民果实的特权阶层”。号召与会的人拿起笔来“战斗”，大写特写“走资派”，特别要写“大走资派”、“高级走资派”。当时不少人就提出，生活中找不出象徐景贤提出来的那种“走资派”，如果写，只好按照这套固定的“理论模式”去套，这样写出来的“走资派”形象必然会苍白、类同。徐景贤就抓住会上一个老干部的发言（这位老干部在发言

中谈到自己参加革命以来，从来都是跟着党，工作勤勤恳恳，清清白白的。在学校工作时关心学生，春节放假也不回家，和学生一起过春节等等，不理解自己路线上怎么会犯“走资派错误”）说：“你们说写走资派会雷同，你们看××不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走资派吗？这样的走资派迷惑性最大。”他提出要写“不是叛徒、特务的走资派”、“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勤勤恳恳、清清白白的走资派”。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走资派是从何时开始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喋喋不休的争论，徐景贤、朱永嘉等都“热烙”地参加争论。徐说他主张从1949年建国时起党内走资派就是革命主要对象。写作组的一个成员不同意徐的看法，认为是“三大改造”以后才变为革命对象的。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朱永嘉后来训斥写作组那个成员：“你怎么今天发这个言，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你这样讲，人家以为写作组都是这个看法。”当这些争论不休的“情况”通过会议简报反映到张春桥处，张春桥认为会议走了弯路，大为恼火，立即叫人传话给徐景贤、朱永嘉“不要把会议引入学术讨论，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

第二，大肆造谣诬蔑，把“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等等帽子强加在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头上。

马、徐、王把在北京京西宾馆反革命串连中搜集拼凑的那整套谎言胡说，如什么“风庆轮”事件、“石油出口”“外贸价

格”“进口设备”等等问题，添油加醋地都搬了出来，恶毒地谩骂中央、国务院大批领导同志是“党内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马天水攻击说“国务院那些人，搞石油出口，是地地道道的洋奴才”，“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王秀珍说：“大量石油出口，使国内燃料紧张，造成停工、停产，（证明）党内有个资产阶级，而且还有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特别卖力的还有黄涛。黄涛在多次发言中，借批“崇洋媚外”为名，咒骂国务院和交通部向国外买船“是修正主义死灰复燃，买的是复辟船、翻案船！”诬陷“邓小平代表买办资产阶级，把我们的产品廉价出口卖给外国人。”等等。

第三，大肆鼓吹邓小平有社会基础，煽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深挖猛批，从组织上连根拔掉。

他们反复强调“邓小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还乡团’总团长之下有分团长，上上下下都有人”还说“‘右倾翻案风’不仅仅是邓小平一个人，一个人怎么会成‘风’呢？！”徐景贤说：“他（指邓）的社会基础是雄厚的，支持他的势力相当大。”王秀珍也说道：“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条路线。有一批人跟他刮右倾翻案风。他的基础很大。”她还杀气腾腾地叫嚷“右倾翻案风上面有，下面也有。要上到下，全面反击”“要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他的基础搞垮。”

开罢区、县、局负责干部会议，“四人帮”和马、徐、王的

整套部署开始逐级传达贯彻，但进展并不顺利。原来，上海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风”不仅不感兴趣，而且颇为反感。不少人从阅读“四人帮”组织撰写的批判文章中感到被批判的恰恰是正确的东西，是党的好传统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不应该批判的。这是“四人帮”和马、徐、王等始料所不及的。马、徐、王等人1975年底以来大量印发“白头材料”，设“窗口”，把经过整顿开始好转的形势再次搞乱，广大干部、群众是有意见的，不满的。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抵制的态度。马天水等人从北京一回到上海就听到下面纷纷反映，“上海前一时期搞过头了！”“如果说要转弯子，上海不是向左转，而是向右转；不是向前转，而是要向后转”。这实际上反映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对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拥护的，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愤恨的。诬邓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批邓”不得人心！马、徐、王等为此非常恼火，十分着急。

正在这段时间，“四人帮”和马、徐、王直接控制的喉舌《文汇报》，在版面上连续出现两起严重的政治错误。3月5日，《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电讯稿时删去了周恩来为学习雷锋所作的题词；3月25日，又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用上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词句，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这两件事激起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

强烈愤慨，抗议、责问的函件和电话怒潮般涌向报社。3月25日后短短几天内，报社编辑部收到读者抗议信400多件，电话上千次。邻近的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群众也纷纷提出抗议。马、徐、王等坐卧不安。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撑腰、打气下，使尽了狡辩、抵赖以及镇压迫害等手段，来对付提出抗议的群众。

一方面是“批邓”不得人心，“反击右倾翻案风”掀不起所谓“高潮”，另一方面透过《文汇报》事件表现出来的民心民意，热爱和怀念周恩来，痛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抗议的浪潮日益高涨不可抑制。（不久，在首都爆发了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愤恨“四人帮”的抗议运动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马、徐、王等经过紧张的策划，又征得了张春桥的同意，决定召开一次“批邓”万人大会。针对下面反映上海前一段批邓“搞过头了”，马、徐、王商量一定“要肯定（上海）前一段的做法”。马天水嚣张地说：“现在下面有些思想问题，这也是批邓的阻力，说市委过去批邓过头了，也要转弯子，所以这次万人大会我们要把批邓的旗帜举得更高，批得更有力”，并决定由他们那几个“市委书记”亲自带头批，赤膊上阵，这就成为那次万人大会的一大“特色”。除马、徐、王外，常委与所谓列席常委的黄涛、朱永嘉，以及黄金海都表示要在万人大会上发言“批邓”。他们都“精心”准备了诬邓的发

言稿。尤其是黄涛，发言稿长达2万多字，罗列了大量所谓“投降卖国、崇洋媚外”等诬蔑诽谤之词。黄金海要求黄涛把发言稿中的事例“让几个”给他“批”，黄涛硬是不肯，争执起来，黄金海说黄涛“风格太低”，不欢而散，演出了诬邓抢功的丑剧。常委会原决定马、徐、王的发言稿要送张春桥审阅后定，其他人就不送了。黄涛自己又把稿子寄送张春桥，活现其趁机邀功的迫切心情。1976年4月2日、3日，“批邓”万人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在两个半天的会期中，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朱永嘉、黄金海等人一个个激昂慷慨地发言，为推动基层“批邓”作“表率”。但他们发言内容，其实只是过去的一些陈词滥调，如马天水又大谈邓小平对他的所谓“策反”，徐景贤大谈“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王秀珍大谈“还乡团总团长下面有分团长”，黄涛大谈“崇洋卖国”等等。除了造谣诬陷谩骂攻击外，实在没有什么货色。大会之后，马、徐、王等又将他们的发言，精心修改后作为市委文件下发到全市各基层单位。

万人大会之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分别窜到上海机床厂、上海电表厂、大众制药厂、上海照相机三厂、新闻、文艺和大专院校等基层单位“抓点促面”，妄图进一步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恶浪，但尽管他们声嘶力竭，“面”上还是冷冷清清，明显地反映人们对诬邓的厌倦与抵制。

(七) 马、徐、王奉“四人帮”之命，插手外省市

马、徐、王积极地贯彻执行“四人帮”“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策略，插手外省、市，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就开始了。他们曾派出大批人员以记者、作家、函授教师等名义到外省一些地方去，利用这些人摸动向，收集情报，甚至散发材料，煽风点火，企图“推动”当地夺权斗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们插手外省、市的活动更加公开化，更加猖狂。马天水气焰嚣张地说：“我们要用一切机会宣传我们的观点，各省、市和国务院各部来人我们都要去做工作，使得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们，他们回去也能按我们的做法去搞。我们印的材料，可以送给他们。”马、徐、王大量地把张春桥、王洪文以及迟群、谢静宜等转给上海的各种整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材料翻印送给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辽宁等地一些帮派分子，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电视工作会议和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向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硬塞各种“材料”。他们与各省市的角刺人物、“闹派”、“震派”，频繁串连，互通情报，出谋献策，千方百计地搞乱兄弟省市。

1975年10月，福建省陈佳忠多次写信给徐景贤、陈阿大、汪湘君等人，诬告省委和廖志高“压制新干部”、“否定文化大革命”、“借批派性大翻案”等等，还派专人送来了廖志高的一些讲话材料及诬邓材料，要上海转给“中央首长”。徐景贤和王秀珍急忙将材料转给了王洪文。王洪文立即要徐景贤转告陈佳

忠“材料收到了，要保密”“内容是好的，不要急躁”。以后在1976年2月打招呼会议的大串连中，王洪文当面称赞陈佳忠：“上次你送的材料，我在政治局全部念了，很好。”并给他打气说：“你今后可找上海同志，也可直接和我写信，我们支持你。”

江苏省华林森也多次来沪，频繁地和马、徐、王等人联系接触。马、徐、王在和华谈话中，多次挑唆说：彭冲对点名批邓不表态，省委是“没有江渭清的江渭清班子”，鼓动华林森到省委去闹。为了给华鼓劲，还多次把华林森送来的攻击彭冲、攻击江苏省委的一些诬告信和所谓“材料”，转给江青、王洪文等人。

1975年底和1976年初，徐景贤收到了江西省涂烈给他的两封信。信中反映江西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是严重的”，“与江渭清（当时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是有关系的”，“看来没有中央的指示江西的问题是解决不好的”。徐景贤立即将信转给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1976年1月底，涂烈来上海，马、徐、王安排他到诬邓“窗口”——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去看大字报，把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摘编和大字报选编等材料送给他，要涂烈把上海的所谓“经验”“做法”带回江西，照那一套去搞。

上述陈佳忠、华林森、涂烈等人都是靠“文革”动乱造反上台窃据中共省委或省“革委会”高位的人物。马、徐、王等

与此类人物的往来不仅遍及华东各省，甚至延伸到河南、四川、黑龙江等地。马、徐、王力图通过这种串连活动，煽动一些人反对中央和有关省、市的主要领导同志，“推动”那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但是，尽管“四人帮”和马、徐、王等卖力地到处煽风点火和挑拨，由于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人心，总的说来，全国各地搞得冷冷清清。为此，徐景贤沮丧地哀叹：“看看全国各省、市报纸，真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几家，大多数省、市根本不搞！阻力是很大的！”

1976年清明节前后，北京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花篮、悼词、祭文来悼念周总理，从而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实质上是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消息传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如坐针毡，心惊肉跳，寝食不安。他们用几条线打电话和北京王洪文、迟群、祝家耀、金祖敏等人保持联系，打探各种情况。4月5日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遭到了血腥的镇压，4月7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消息传来，马天水等人看到他们打击邓小平阴谋一时得逞，欣喜若狂，手舞足蹈。立即召集市委常委开会祝贺“胜利”。王秀珍拿起装白开水的杯子狂叫“干杯！干杯！”当时徐景贤正在宴请外宾，也急匆匆赶来，连声高叫“有没有酒？拿酒来！”张敬标立即捧

来了江青送的油莎豆酿的酒，他们一伙又蹦又跳，叫嚷着为所谓“胜利”干杯！顿时，市委小礼堂里一片乌烟瘴气。马天水一面找人碰杯狂饮，一面咬牙切齿地说：“闹吧！你闹，就撤你的职；再闹，就开除你的党籍。”黄涛大呼“为胜利干杯！”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还歇斯底里地指名邓小平喊起了“打倒”的口号。

“四人帮”一伙阴谋的一时似乎是得逞了，刺激得马、徐、王等得意忘形。他们利令智昏地大叫“要乘胜前进”“夺取最后胜利”。但是，他们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唾弃。他们彻底垮台的日子临近了。

三十四、张、姚直接控制的 “上海市委写作组”

“文革”时期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下面简称写作组），在“四人帮”的统治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得力的工具。写作组的核心成员都是张春桥、姚文元亲自物色和培育的，张、姚倚之为心腹，他们也以张、姚的嫡系部队自居，死心塌地为“四人帮”效劳效忠。倘以为写作组顾名思义只是写写文章而已，则大谬不然。它除了主要地抓舆论、“造”舆论以外，其黑手几乎触及社会各个领域。尤其在1971年以后，它羽毛丰满，自成体系，活动猖獗，有人形象地说它“既是宣传部，又是参谋部，又是情报部”。连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市委、“市革会”头头对它也敬畏三分。虽然，名义上写作组是在他们领导之下，但它受命于张、姚，直通张、姚，其地位和权力超过当时市委、“市革会”的一个组、办。它秉承张、姚旨意，控制上海的宣传、文化阵地和舆论工具，篡改马列主义理论，伪造中共党史，兜售“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猖狂地恶毒地攻击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无耻地

吹捧“四人帮”，搞乱思想，软刀子杀人，祸国殃民，其破坏作用和恶劣影响远远超出上海市的范围。

（一）从协助搞《评〈海瑞罢官〉》到一月反革命风暴时的张姚工作班子

为了全面地、历史地了解写作组，有必要把它在1971年7月正式成立之前的胚胎“发育”的过程，作简要的回顾。它的几个头目和张春桥、姚文元的“结识”，要追溯到“文革”的前夜。

早在1964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内刊编辑室管辖之下，有几个分散的写作小组，其中，一个是以徐景贤为首以“丁学雷”为笔名的小组，一个是以朱永嘉为首以“罗思鼎”为笔名的小组，借丁香花园为办公地点搞写作活动。那“丁学雷”“罗思鼎”的署名，据说是取义于“丁香花园学雷锋”“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1965年5月左右，“丁学雷”小组、“罗思鼎”小组的一些成员被吸收参加了市委写作班子的工作，徐景贤（文艺组组长兼写作班党支部书记）、朱永嘉（历史组组长）成为骨干，办公地点在武康路2号。

他们自然是在张春桥领导之下，因为张接任了市委宣传部部长，后又是分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至于姚文元，他在写作班子中并没有具体职务，因张春桥之媒介，却也在武康路2号的二楼，紧挨着朱永嘉等占了一间房子。姚文元曾与朱

永嘉等合写了一些文章，发表时用了“伍丁”的笔名，意思是他和朱永嘉、王知常等五个人合写的，可见早有交往。

但“丁学雷”“罗思鼎”那伙人为张、姚所赏识，日见宠信，这是从协助搞《评〈海瑞罢官〉》和写有关批判文章整人开始的。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诸人曾协助姚文元寻找资料。《评〈海瑞罢官〉》见报后，“丁学雷”“罗思鼎”又炮制多篇“批判”文章，对那些正直的以及不识张、姚钓鱼狡计而上钩的所谓“学术权威”大张讨伐。又参与了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撰稿和校订工作。到1966年冬，写作班子的“丁学雷”、“罗思鼎”等在上海的舆论界已经令人侧目而视了，因为他们学到了抡棍子打人的本领并因此出了名，还因为他们的后台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也是张、姚起家的资本。

1966年12月12日晚，姚文元自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写作班赶快“造反”，为张、姚他们打倒上海市委上第一线。14日，写作班宣布集体造反。在张、姚的幕后策划指挥下，徐景贤等联络《支部生活》王承龙、朱玉佩、市委宣传部刘耀忠等人，演出了12月18日的“后院起火”。“后院起火”大会后，以写作班为骨干力量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宣告成立。当时推选徐景贤、郭仁杰、程绮华、王承龙四人为头头。前三人都是写作班内造反的。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乘机飞来上海，未暇休息，

下午即到武康路2号召见“联络站”主要成员。参加那次召见的有徐景贤、王承龙、王知常、朱永嘉、陈冀德、王绍玺、朱玉佩等13人，除王承龙、朱玉佩外全都是写作班的造反人马。在这次召见中，张、姚进一步明确“联络站”是他们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的工作班子。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即“市革会”宣告成立，张春桥、姚文元当上了第一、二把手。徐景贤成为公社的委员，后又擢升为“市革会”副主任。原来写作班子的一帮人，除了郭仁杰被张春桥派回复旦大学去抓“复课闹革命”的点（实际上是要郭去“整顿”“红革会”）外，不少人参加了“公社”的政宣组、调查组、群运组、接待组等等的工作，是那些组的核心领导或骨干成员，他们都借“造反”之风上了舞台，成了各组头面人物了。特别是徐景贤、朱永嘉等几个头头，从此跌进了张、姚“嫡系部队”的深渊，与张、姚沆瀣一气，共命运，同生死，什么“学雷锋”“螺丝钉”，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二）“专题写作组”、“大批判写作组”的成立和撤销

1967年3月间，张春桥召徐景贤谈话，要徐“化功夫写好‘市革会’的文件和决议”。姚文元也对徐说：“还是要组织一些人专门写文章。”徐即与吴瑞武、朱永嘉商量，以原写作班骨干为基础，但不限于老人马，重新把写作班子拉起来。4月初，徐将已经分散在“市革会”各部门和“联络站”等处的一些人召

集回来，在荣昌路（现德昌路）60号，成立了“专题写作组”，指定吴瑞武为组长，朱永嘉为副组长，王绍玺为党小组长。组员有王知常、陈冀德、肖木等，大多数都是原写作班的人。

1967年8月，张春桥叫秘书何秀文传话给专题写作组：北京已组织了100多人的班子在写大批判文章，上海也应立即集中写作力量写重点文章。朱永嘉即起草了《关于建立大批判写作组的打算》，8月28日“市革会”常委会讨论通过，9月4日张春桥来电表示同意，9月20日“大批判写作组”宣告正式成立，办公地址在宛平路11号。由朱永嘉兼任组长，成员约30人，主要来自原写作班、华东局内刊编辑室和本市一些大专学校。这些人员除极少数基本骨干外，都不列入“市革会”固定编制，并且按写作任务作定期的轮换或增减。

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对外是两个组，对内实际上是一个组。当时统归徐景贤管辖，张、姚没有直接过问。在它们存在的时间内，究竟干了些什么呢？综观其主要的罪恶活动，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炮制诬陷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同志的文章、宣传材料，为“市革会”起草决议、讲话稿等。

他们诬陷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上海市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如1967年8月5日炮制出笼的《动员千军万马，围歼刘、邓、陈、曹》；同年12月又炮制了《高

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的专题广播共十一讲。1968年2月出版了《彻底打倒刘少奇》《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农村版）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俗讲话》；7月又编写了以普通工人为读者对象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文章竭尽诽谤诬陷之能事，流毒深广，危害严重。为“市革会”起草的文件有《关于掌握斗争大方向，用大批判推动一切的决议》（1967年5月20日）；《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革命新秩序的五项决定》（5月26日）；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大会”上的《发言稿》（7月9日）；《关于迎接文化大革命全面高涨的意见》（8月5日“市革会”通过，被称为《八五决议》）；《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迎接市革代会的召开的决议》（1968年2月5日），等等。

第二，收集情报，充当张、姚耳目。

徐景贤等为张、姚搞情报活动积有时日。“文革”之乱起，张、姚进入“中央文革”赴京时，徐已经是他们安置在上海市委机关的坐探。一月反革命风暴期间，徐等编印绝密简报，把上海各方面的动态集中起来，每天打印后直送张、姚。这个简报送阅范围极小，除张、姚外，只有“联络站”的几个头头能看。简报的编写工作是由王知常负责的。出了100期。粉碎

“四人帮”后，徐景贤在其交代中还说王知常编简报“他也立了一功”。

专题写作组成立后，为张、姚等提供情报和小报告越发成为它的主要“业务”之一。组内有专人分工向各群众组织等搜集和刺探情况，逐日先向徐景贤汇报后再上报张、姚。最突出的情报活动是派遣人员以“市革会蹲点小组”名义，常驻《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简称“北办”）收集各方面情况，密报徐景贤等。首先派去的是朱维铮等二人，以后陆续去的有七、八人。

1967年5月3日，朱等到京，即与“北办”负责人艾玲接上了头，明确在艾玲的领导下，以《文汇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朱等以通电话、寄信、编简报、送材料等方式，每天与上海保持“热线”联系。“热线”的上海一头，是徐景贤指定的陈翼德，“北办”来的材料，都由她整理后报徐，再由徐报张、姚。（但“北办”同时也向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递送简报，打小报告。）

从1967年5月初到同年10月底，驻“北办”人员发回了大量的情报，大体上有以下几类：①“中央文革”一些人内部讲话和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如康生、陈伯达等人的讲话等；②恶毒诬陷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③北京动态，如北京各派斗争情况；文化系统主要批斗对象名单等；④传播“经验”，如北京对所谓“修正主义分子”的“批斗方法”有“包斗”、“游

斗”、“补斗”等等；⑤提醒上海要注意的问题，如在北京串连的上海红卫兵的动态；北京学生“突然极其关心”上海的“联司”“红革会”“郭仁杰”，可能对“市革会”来一次“冲击”；复旦大学在京学生中出现“徐景贤算老几”“打倒徐老三”的口号；“红革会”有人在京作调查，“据猜测可能涉及张春桥”，等等。

1967年10月22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突然来电查问“北办”《情况汇报》发送范围，并通知以后每天只送“中央文革”四份，其他停送。到了11月初，张春桥要徐景贤把在“北办”的人员撤回，就此告一段落。

这里说一下朱维铮其人和徐景贤的“杀一儆百”。朱本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早就参加市委写作班，又一起造反。在“北办”那些日子，他也算有点“功劳”。但他回大批判写作组后，在“4·12炮打”张春桥事件中，也有某些“炮打”的言论，当即受到吴瑞武、朱永嘉、王知常的严厉训斥，朱维铮表示忏悔，并于4月18日写了数千字的检讨书。朱永嘉事后对人说：“我们都是复旦出来的，要保小朱”。但徐景贤不同意。粉碎“四人帮”后，徐景贤在交代中曾说：“我认为，写作班人员是张、姚的嫡系部队。在嫡系部队内部是绝对不能容忍心怀异志背叛张、姚的人物的”。过后，就把朱维铮放到《文汇报》社去写文章。后来在审查艾玲的同时又把朱审查了一下，最后送回复旦大学。徐景贤承认“这是我搞的杀一儆百的实例，让其他

人看到对抗张、姚者的下场！”

专题写作组连同大批判写作组到1968年8月就被撤销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那几个造反上台的头儿们内部争权斗争的结果。

专题写作组名义上是“市革会”的一个机构，实际上是徐景贤一手控制的“私人班底”。专题写作组的事，包括它收集的情报、小报告都经徐上报张、姚，又通过徐接受张、姚的批示和操纵，别人插不了手。徐景贤由此在不少事情上得“风气”之先，可以借口“中央文革”和张、姚指示以自重，不能不使别人侧目而视。在上海滩的众多造反组织中，一度称呼徐景贤为“徐老三”，这个绰号十分流行。这既反映人们对徐景贤到处鼓舌、指手划脚的不满（按上海人俗语“老三老四”是含贬义的），也包含徐景贤将坐第三把交椅（张、姚之下就数他了的意思）。这就触发了帮体系内部的矛盾争斗，特别是引起市委机关另一个造反头头、已任“市革会”常委兼办公室主任的王承龙的嫉妒和恼恨。王承龙其人也是个自命不凡的野心家，他是《支部生活》编辑部造反的，一窜窜上了“市革会”常委的高位，掌握“市革会”办公室的大权，当时正在搞“清队”，抓专案，凌驾于“市革会”各组、室之上，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对“徐老三”得张、姚之宠很不服气，曾对很多人说：“出道是我早，运气是他好”，“我现在上有老（指王少庸、马天水），下有

小（指徐景贤），要“扶老携幼”，表白他造反比徐景贤早，并对仅做个常委和办公室主任不满。随着时间推移，他同徐景贤的矛盾逐步激化。

粉碎“四人帮”后，在王知常的交代中有这样一段话：“写作组成了徐景贤一手控制的嫡系部队，只听徐一个人的指挥，引起‘四人帮’上海帮派体系内其他人的不满。随着1967年冬，‘11·10’事件和‘12·19’事件的发生，徐景贤与王承龙、王洪文之间发生尖锐冲突，加之李文静一时站在王、王一边，徐在张春桥面前（暂时）失宠，而写作组也因其属于徐的私人班底而成为众矢之的”。徐景贤本人的交代则专讲他与王承龙的矛盾：“1967年底到1968年初我和王承龙的内部矛盾激化，他搞了一次联络站内部的心脏爆炸，接着借所谓炮轰南京路事件、郭仁杰事件等多次将我的军，并借口吴瑞武的历史问题等准备向专题写作组开刀。我就避开他的锋芒，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把专题写作组成员分散到各大学去参加工宣队，以在工宣队中受锻炼为名，把这支队伍保护了下来。”在这里王知常所讲“11·10”事件、“12·19”事件和徐景贤讲的“联络站内部心脏爆炸”是同一回事，指的是1967年12月19日经王承龙策动，由外事口造反头头丁庆丰等人伙同交通大学红卫兵“反到底”兵团，冲击了“联络站”，罢免了头头程绮华等人职务，改组了“勤务组”；而这事的起因又与11月10日“联络站”集中100余

人要求“市革会”领导接见、听取机关干部反映有关。机关干部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对于很多人无事可干，对于“群众组织”歧视“机关造反派”把他们看作“留用人员”，对于王承龙专横狂妄（虽然王也是“联络站”头头之一），一朝掌权即小轿车进出，对人颐指气使，等等，都很有意见，诱发了那次要求“接见”。适值王少庸、王洪文等在友谊电影院咖啡厅召开“市革会”常委扩大会议，“联络站”的人跟踪到了那里。王少庸、王洪文、王承龙（徐景贤托故未参加这次会议）虽然不得不接见了“联络站”的人，但王少庸大发一顿脾气，不欢而散。第二天，王洪文小兄弟们就外滩刷出了“谁反对新生的‘市革会’就打倒谁”“谁反对新生的‘市革会’就砸烂他的狗头”的大幅标语。徐景贤交待的所谓炮轰南京路事件，是捏造的假案，迫害了当时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同志致死，而搞张六吉又涉及程绮华，因张是程的丈夫。关于郭仁杰事件主要是指郭支持了“红革会”。总之，这些事直接间接都与徐景贤有关，是为了打击徐的势力，徐处境不利。狡黠的“徐老三”很懂得耍弄权术的要领，不利情况下他就以退为进。1968年7、8月间，市里正值动员大批工宣队员进驻大中学校和上层建筑，他就主动提出解散专题写作组和大批判写作组，把两组主要骨干分别介绍去各大专院校的工宣队。这就是徐景贤所说的“化整为零”“避开锋芒”。

王承龙旋即以“市革会”名义发文，正式宣布撤销专题写作组和大批判写作组。

(三) 建立《红旗》上海组稿组

1968年9月下旬，姚文元来上海，对徐景贤说上海要找几个人专门给《红旗》杂志写文章和组织稿件。姚、徐商量决定，立即把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三人分别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的工宣队中叫回来搞这件事。于是，距专题写作组和大批判写作组撤销仅一个月左右，基本上还是以原来的骨干为核心，又成立了《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起初，这个小组就叫“朱永嘉小组”，其组织关系挂在“市革会”办公室的联络组党支部之下，在联络组有一间办公室，但不受“市革会”办公室的管辖，而由张、姚直接控制。当时兼“市革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承龙不承认有这个组，因此不让朱永嘉参加“市革会”的会议。这个小组的牵头人开头还是徐景贤，他不仅审稿、改稿，并且在向张、姚写信送稿时，由他领衔署名。1969年以后逐渐由朱永嘉直接向张、姚送稿、写信。姚文元还令徐景贤把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三人的“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写成单项材料报去。姚又起草了一个文件，以中央名义发下来，把朱、王、肖正式封为《红旗》上海组稿小组成员。这个小组是姚文元控制了《红旗》杂志编辑部后特意在上海设立的分店，全国唯此一家。

从1968年9月下旬筹组了《红旗》组稿组，到1971年7月“市委写作组”正式建立，中间约有近3年的时间。对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帮派体系的最后形成来说，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时期，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搜罗党羽，把写作组的机构骨架逐步搭了起来。

在这段时期内，徐景贤、朱永嘉等悄悄地、有计划地扩展自己的帮派体系。不仅把原来写作班的主要骨干一个一个抽调回来了，而且招募了新的人员。

1968年底，张、姚命令搞“批孔”资料。徐、朱趁机说人手不够，向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抽调人员，在上海图书馆借了两间房子，成立了历史组，组长吴瑞武。

1969年夏，他们又以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批判周扬等所谓“四条汉子”的需要为名，在《解放日报》社借了两间房子，成立了文艺组，组长陈冀德。小组之下有小组，如文艺批判小组、文学概论编写小组等。

1969年10月还趁张、姚批示要搞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组。在《文汇报》社内借了两个房间办公。组长王绍玺。

1969年12月，徐景贤、朱永嘉根据张春桥的旨意，搞了一个“学习毛选五卷文章小组”，组长章树焜，组员有郭绍绪等7人，借康平路181号办公和活动。这个小组后来成为市委写作

组下属哲学组的前身。

1970年12月7日，由张春桥、王洪文召开会议，成立“上海市第四届党代表大会决议起草小组”，除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外，还抽调顾澄海等十人参加。这个组后来成为写作组下属经济组的前身。由于顾澄海同时是“市革会”工交组工作人员，起草小组就在工交组借房子办公。

把这些小组分散在各地，这也是“徐老三”的狡计。对此，王知常有一段生动的供述。他说：“《红旗》上海组稿组在报馆、图书馆等地建立‘飞地’，这种怪现象的出现，是徐景贤的黑主意。并由徐下令各有关单位提供各种方便。徐还规定写作组的人对外进行组稿、调查、开座谈会等活动时，要以报社记者身份，或以‘市革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身份，或以工宣队员身份，不准亮出写作组的牌子”。“徐所以如此，是由于他认为写作组的重整旗鼓，势将引起上海其他帮派体系的嫉视和注意，而将写作组分散在他所直接管辖的宣传、文教系统各单位内活动，便可使写作组在重新养成羽翼的过程中不走漏风声，特别可以瞒过王承龙当时控制的‘市革会’办公室帮派体系的耳目”。

这样，打着《红旗》上海组稿组的旗号，徐景贤、朱永嘉等招兵买马，逐步把历史组、文艺组、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经济组等整套机构、人马都配备齐全，比以往更具规模气势。一切就绪，市委写作组只等待亮出牌子择吉开张了。

第二，张春桥、姚文元对核心成员的思想灌输与笼络。

在这段时期内，张春桥、姚文元蓄意“培养”朱永嘉、王知常、肖木等人，要把他们塑造为得力可靠的工具。其中突出的是张春桥以陪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样本为名，对朱、王、肖三人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的思想灌输。

1969年7、8月间，张来上海，每晚派车把朱、王、肖三人接到兴国路招待所张的住处，以学习《毛选》五卷样本为名，谈“党史”，议现实，前后达一个月之久。

这个活动，徐景贤没有参加。他后来表示“当时我没有被叫去读书，对朱、王、肖能够在张的身边伴读，不胜羡慕”。据王知常交代，徐景贤当时没有能参加，“主要是由于张春桥怕摆不平徐与王洪文、王秀珍等人之间的关系。为此，徐规定我们三人必须于次日向他汇报前一晚上张讲话的内容。”徐自己交代：“他们头天读过议过，第二天我就到朱、王、肖的办公室去，请他们回忆上一天聆听过的张的‘精彩论点’”。王知常曾得意地对人吹嘘：“你们研究了多少年的党史，还不如我这几天知道的多。同春桥××读《毛选》五卷那些天，是我一生中得益最大的。”粉碎“四人帮”后，王知常又供认：“我们三个人通过这一段时期，被进一步训练成了‘四人帮’得心应手的工具”。

张春桥在这一个月中对朱、王、肖（间接地也对徐）究竟

灌输了哪些思想？阐发了哪些“精彩论点”使徐景贤、朱永嘉等深受“教益”？据徐、朱、王、肖等交代中透露，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恶毒地造谣污蔑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篡改、歪曲毛主席著作的原意。张春桥说《五卷》提到总理的地方太多了，要删去几处；而原来提到林彪的地方一篇也没有，还是他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发给林彪的一个电报。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就是张的“思想交底”、“路线交底”。其二是吹嘘自己。如张说自己“一九五八年给柯老（柯庆施）起草一个报告，一两万字，只用了一天就一气呵成；那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也只用了一天，写得很顺”等等。据徐景贤交代，他听了朱永嘉等的转告，“居然和朱、王、肖一样，对张十分钦佩”。“一心以张春桥作为自己心目中的‘学习榜样’”。

除了“路线交底”这一手“熏陶感化”的办法以外，张春桥的另一手就是给以权位，恩宠有加。这里，我们以写作组核心的核心朱永嘉为例，看一看张春桥是怎样笼络那些核心成员，使之成为“四人帮”忠实鹰犬的。

我们在前面已说过，张、姚赏识朱永嘉等，在搞《评〈海瑞罢官〉》时已开始了。张后来多次说过：“要说老造反，写作组早从参加《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就已经造反了。批《海瑞罢官》就是造刘少奇的反”。一月反革命风暴时，朱永嘉自告奋勇，以“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的身份，参加了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工作。后来张春桥一再夸奖他说：“搞学问（？）搞写作的人，能够搞政治、抓火线指挥部，真不错呀！”成立专题写作组，朱永嘉为副组长（兼大批判写作组组长），组长是吴瑞武。据说这是因为吴在写作班后期率领王知常、朱维铮等“罗思鼎”成员回复旦大学造反，从红卫兵“牛棚”里救出朱永嘉有功，故被徐景贤指定为组长，朱为副。但张春桥还是更中意于朱。在酝酿“市革会”委员名单时，经徐景贤对吴瑞武说：“先向你打个招呼，春桥××提出，要把朱永嘉摆进‘市革会’委员名单中。”建立《红旗》上海组稿组，姚文元曾令徐景贤摘报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三人的情况。在朱永嘉的简历中写明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反动资本家”，“朱自己在复旦的表现不好”，等等。按当时情况，朱永嘉是可以归入“黑六类”开除出“造反派”的。但上报张、姚后，非但不作为问题，而且正式封朱永嘉为《红旗》上海组稿组的负责人。张春桥曾对人说：“朱永嘉这个人的出身和情况，我不是不了解，但是这种人还是要用。”1968年年底，“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张春桥在上海，看到出席名单中没有朱永嘉，就问当时负责“市革会”办公室工作的王承龙，为什么朱没有参加会议？王承龙说：“（专题）写作组已经撤销，朱永嘉就没有代表性，所以没有叫他参加。”张春桥一听大为恼火，就责问王承龙：“你有什么代表性？”王承龙看到张春桥发火了，不得不立即通知朱参

加了这次会议。从那时起，朱永嘉参加了“市革会”的一切重要会议。

这是张春桥赏识、提携朱永嘉的一些情况，至于张春桥、姚文元与朱永嘉之间函稿、批件密札的往返，从《红旗》上海组稿组建立时起就愈来愈频繁了。

粉碎“四人帮”后，朱永嘉曾交代：“建立《红旗》组稿小组，宣布我是负责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按指张、姚）进一步重用我了，给我各种名誉和地位，让我当市委委员、市革会常委，让我当（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做主席团，最后还提拔我当（市委）列席常委。对于他们的提拔和重用，我是感恩戴德的，对他们也更加忠心耿耿，拼死拼活去为他们效劳”。

第三，更积极、更自觉地为张、姚阴谋篡党效劳，干了大量坏事。

在这段近3年的时期内，朱永嘉等根据张、姚的布置与意图，为《红旗》杂志写稿、组稿。据不完全统计，为《红旗》所采用、发表的有四十一篇。其中，组稿组自己撰写、以“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官效闻”、“齐永红”等署名的二十二篇；由组稿组帮助撰写或改写、以基层单位署名的十九篇。这些文章，大都打着“批判”的旗号，割断历史，断章取义，打倒别人，抬高自己，造成极坏的影响。

除了为《红旗》撰稿外，他们还奉张、姚之命，直接参与

一系列罪恶活动。其中突出的有以下几件事：

撰写《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话，是为了“要给一月革命留点东西”；徐景贤强调“这是为了准备和‘不见得派’^①辩论用的”，朱永嘉说“就是拿来对付‘二月逆流’那些老家伙的”。1969年1月27日朱永嘉等拿出《大事记》的初稿，经修改后印发，约一万余字。它突出地吹捧张春桥、姚文元，为他们树碑立传。全书从张、姚撰写《评〈海瑞罢官〉》开始，到一月反革命夺权，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用于记载他们两人的活动和言论。它极力兜售“打倒一切”“改朝换代”的反动谬论，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进一步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它大肆诬蔑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同志，还攻击了“红革会”、“赤卫队”等反对张、姚一伙的学生、工人群众。在这份《大事记》的基础上，又“充实扩展”，搞了一份《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的“长编”，长达七万余字；又搞了《张春桥、姚文元××1966年12月至1967年2月讲话记录摘要》。

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

^① 1967年8月9日，林彪不顾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革”的不满，强词夺理地说“文革”的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许多人特别是众多老干部对他的这种说法持反对态度。林彪、江青等人疯狂镇压这些干部、群众，企图用“不见得派”这顶政治帽子封住大家的口。

1969年11月14日，张春桥把朱永嘉召去布置编写一份关于“文革”期间各种“反动思潮”的资料。张在举例中特意把所谓“二月逆流”列为资料的专题之一。于是，在朱永嘉、王知常、肖木的策划下，由历史组组长吴瑞武具体负责，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各地的小报、传单等等资料。当时社会上各种造反小报、造反传单多如牛毛，造谣生事，公开诬栽，谎言连篇，转辗传抄，越传越离奇。吴瑞武等就是根据这些“资料”进行摘编，七拼八凑，于当年12月就印出了初稿。

这里所谓“反动思潮”“反革命论点”指的究竟是什么？从他们罗列的分类标题中就可以见其大略：有些是无中生有，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是颠倒是非，如“刘邓工作组”、“二月逆流”；有些事其始作俑者本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倒打一耙诬陷别人，如“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革命经济主义”等；有些是歪曲原意，肆意诬陷，如什么“多中心即无中心”“民族分裂主义、地方分裂主义”等。这份资料的主要矛头指向一批中央领导同志。初稿中就收入了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聂荣臻、乌兰夫等同志的“讲话”共有40条之多。1970年1月，又编出二稿，增收了李先念、徐向前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3条。同年2月对二稿又要作修改，说是领导意见编得太庞杂了，但吴瑞武私下透露：“叶剑英、李先念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不能再放进去”。于是又编了《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动思潮资料简编》(三稿)作为定稿报送张春桥。在这一稿中，仍然收进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等同志的讲话，计有7条。

炮制对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文章。

在这段时期出笼的如：《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1969年7月1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署名丁学雷)；《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评大毒草〈兵临城下〉》(发表在《红旗》杂志1969年第9期)；《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来龙去脉》(发表在《红旗》杂志1969年第11期)；《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发表在《红旗》杂志1970年第4期)(以上3篇都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还有未定稿《机会主义路线的招魂曲——评夏衍的反动电影〈革命家庭〉及其反动的艺术风格》，《评曲波的小说〈桥隆飙〉》(说“小说为王明路线翻案，美化流寇主义”)等等。这些所谓“批判”文章，无例外地割断历史，乱扣帽子，牵强附会，蛮横无理，与姚文元的腔调一模一样。事实上许多文章的确是姚下令撰写又经他修改后发表的。所有这些所谓“批判”，有文化专制主义为之保驾，只许我批你，不准你申辩，不准你反驳。上海市煤气公司管线所的一个青年技术员桑伟川，由于对丁学雷

《评〈上海的早晨〉》一文影射攻击陈毅等同志有不同看法，写了“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由此大祸临头，在近一年半时间内被残酷游斗二百九十余次，被拘留、抄家、逮捕，最后判刑七年。

撰写《上海市第四届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1970年12月初朱永嘉等奉命成立起草小组，张春桥、王洪文对起草小组说：“我们的对立面就是刘少奇、陈丕显、曹荻秋”，“（我们）肚子里要有股气”。这成为起草决议的指导方针。

撰写《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1971年3、4月间，张、姚下令组织一些人为中央两报一刊撰写纪念“七一”的社论稿。这个起草小组除朱、王、肖外，具体撰写工作由吴瑞武、胡锡涛、顾澄海等七、八人负责。任务结束后人员被保留下来从事编写（实质是篡改、伪造）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工作。

（四）写作组的正式开张和张、姚对它的控制

1971年7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康平路办公室找徐景贤谈话，决定正式建立市委写作组，要徐起草个通知。7月7日，以中共上海市委名义发布了《关于建立市委写作组的通知》。从这时起，市委写作组（也称“市革会”写作组）进入了长达5年零3个月的活动最猖獗的时期，也是它作恶多端，随着“四人帮”的覆亡而最后覆亡的时期。

写作组机构、人员概况：

写作组正式成立后，在前几年经营的基础上，招兵买马，扩充力量，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层次复杂的帮派体系。写作组本部在康平路141号。领导核心之下设有历史、文艺、哲学、经济、自然辩证法、秘书等6个组，属于机关编制的正式成员约40余人。这是第一层次，是掌握实权的。第二层次是外围组织和附属机构，分别由6个组或本部领导核心分工去联系和指挥，其人数约有340人左右。这些下属组织不少顶着别的单位的牌子，实际上完全为写作组所控制。第三个层次是名目繁多的各种联系单位和临时性组织，如什么编辑部、编委会、编写组、资料整理组等等，它们曾被称为“临时工”“外包工”，人数难以统计，至于以“培养理论队伍”“发现新生力量”为名，举办各种“学习班”，抽调基层工、农青年参加，学习后又与其中不少人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提要求、交任务，则尚未算在层次之内；据统计参加“学习班”的学员有870多人，散处全市各个角落。

领导核心情况：从1971年7月到1973年5月，写作组的核心成员仍是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三人，与《红旗》组稿组相同。1973年4、5月间肖木被调去北京“王洪文办公室”工作，写作组增补了王绍玺进领导核心，成为朱永嘉、王知常之下的三把手，王绍玺仍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到了1976年5月，又

增加顾澄海、陈冀德、章树焜三人进领导核心，于是，核心成员为六人。本部6个组的组长有吴瑞武、陈冀德、章树焜、顾澄海等分别担任。

对本部各组和下属组织，核心骨干和一般成员，给予的待遇各不相同。如发不发工作证，可不可以写作组人员身份进行活动，能不能参加写作组的会议、学习、听传达报告等等，都有内外亲疏之区别。除少数骨干知道一些别的组的大的活动以外，各组之间是不那么通气的。尤其是张、姚布置的任务，只让朱永嘉等极少数人明确掌握其意图，对下面人员“交底”交到什么程度，都有严格的限制。写作组这种机构层次设置和活动方式，显然是适应它搞阴谋诡计的需要。

张春桥、姚文元控制写作组的情况：

写作组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的（但江青、王洪文有时也插手）。张、姚与写作组的联系频繁，据朱永嘉等交代，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是直接找写作组头头们开会，听取汇报，布置任务，这主要是姚文元抓的，每年至少有1、2次，开2、3天的会；二是通过《红旗》杂志编辑部的胡锡涛，经常传达张、姚的“精神”（胡原来曾和姚文元一起在华东局内刊编辑室工作过，“文革”初造反，并被吸收为写作组正式成员，后又被姚调去《红旗》编辑部为领导核心之一）；三是信函往来，送书、送刊物给张、姚时，总要写信给他们，张、姚总要作批示，批的

内容有时与信有关，有时就根本没有关系；四是要写作组经常送调查报告、情况报告，张春桥对此类批文较多；五是朱永嘉、陈冀德等有机会上北京开会，张、姚以及王洪文都要召他们面谈；六是通过张春桥、姚文元的秘书何秀文等，经常给朱永嘉等“讲一点上面的指示精神”；七是肖木调北京“王洪文办公室”工作后，也经常通消息给写作组；八是通过徐景贤，因为徐是市委书记，有许多情况都是从徐那儿知道的。徐景贤自己供述：“我与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肖木的关系是同生死、共命运、互相依存、互相利用的关系。在上海，他们需要我这个市委书记做他们的保护伞，我也利用我的职权，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我知道方便他们就是讨好了张、姚。而我也需要他们经常给我通一些消息，看一些张、姚的批件，问一问《红旗》杂志的精神，我就可以据此来‘指导’上海的舆论工作”。以上可见张、姚与写作组联系渠道之多，粉碎“四人帮”后，从写作组查出的张、姚的批示、信件、电话记录、文章改稿等（其中包括少量的江青、王洪文的批件），共有401件。这还是很不完整的，因为写作组过去不建立档案，而且那些核心骨干分子得悉“四人帮”覆亡后，又亲自和唆使别人销毁了许多罪证。但从这些查到的函电，不仅可以看到他们间的频繁联系，而且可以看到写作组的许多罪恶活动，直接出自张、姚的布置。

张、姚对写作组人员特别是核心头头们的政治思想动态抓

得很紧，唯恐这一支御用队伍跟不上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部署。1975年11月间张春桥命令肖木打电话给朱永嘉，要写作组“莫作桃花源中人”，就是一例。这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动大规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时刻，鞭策写作组要紧紧跟上。11月28日，张春桥在朱永嘉去信上批道：“你们（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路线斗争上去。”12月10日又给朱永嘉、陈冀德等一封长信，信中警告他们：“从肖木的谈话中，知道你们这一段压力不大，甚至没有感到多大压力。我觉是这是一个危险，‘敌存灭祸，敌去召过’，不注意阶级斗争，或者这方面的观念淡薄了，总要犯错误的。”

张、姚对写作组的控制，还表现在不允许别人染指对写作组的领导权。写作组人事安排等事，都必须得到张、姚的批准。1971年写作组正式成立时，徐景贤曾请示张春桥，市委要不要成立宣传部？张一口回绝说，“不要了”，后来朱永嘉两次请示张春桥，提出要恢复社会科学院，都被张、姚顶了回来。据写作组一些人的分析，如果恢复宣传部、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大概张、姚的直接控制就不那么“灵活”了。

在“四人帮”党羽们内部派系的矛盾斗争中，张、姚竭力支持和保护写作组，拒绝马、徐、王和王洪文小兄弟们插手写作组的事务。1974年4月发生的“《朝霞》事件”，就是张、姚偏袒写作组的典型事例。事件的起因是：《朝霞》创刊号上登载

了《初试锋芒》和《红卫兵战旗》两篇小说，前者为所谓“文攻武卫”、民兵“第二武装”制造舆论，后者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全面内战的罪责强加于革命老干部，并竭力吹捧张春桥式的野心家。两篇文章其实都是道地的帮腔帮调的毒草。但王洪文的小兄弟们“出于宿怨”，认为这两篇小说有严重问题，前者讲了民兵对公安局起配合作用，这是“贬低民兵”，后者讽刺攻击了当年“工总司”要“纪念成立半周年”而遭批评的事。反映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那里，马、徐、王都作了批示，支持王洪文的小兄弟们，认为：“问题十分严重”，“写作组、《朝霞》编辑部应即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查明原因，认真听取总工会和市民兵指挥部同志的意见，严肃批判，并连同过去其他作品中的错误一起，向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作出检查报告”。马、徐、王三人批示发出那天，朱永嘉连夜写信，把《朝霞》的问题和马、徐、王批示内容报告张、姚。张、姚接信后，令肖木打电话给朱永嘉，要朱告诉马天水紧急煞车，把马、徐、王三人的批示收回。紧接着张、姚在朱的那封信上作了长篇的批示，支持写作组，批评马、徐、王，说什么“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说《朝霞》的小说是好的，没有什么问题。张春桥还说他是市委第一书记，有错误他负责，为什么不向他报告？这样逼得马、徐、王只好收回他们的批示。张、姚又要朱永嘉等把《朝霞》事件前前后后的经过报告他们，朱遂与陈冀德、王

知常、王绍玺几个人把事情经过一天一天写下来，“把王秀珍如何指挥的，徐景贤如何‘倒戈’的，详详细细写了报告”（朱永嘉交代中的话）。张、姚一方面要马、徐、王分别找朱谈话，另一方面又要朱报告马、徐、王找他谈话的具体情况。显然，张春桥在这次内部纠纷中不仅竭力袒护写作组，批评“工总司”一伙人，而且还着实“教训”了马、徐、王几下子。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写作组、“工总司”小兄弟、马、徐、王继续互相牵制，对张都更加驯服，以有利于他的控制。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一场风波是被压下去了，但王洪文小兄弟们还是不服气的。全国“四届人大”期间的一天晚上，王洪文通知王秀珍、叶昌明、黄金海、陈阿大、马振龙、金祖敏在他钓鱼台住处聚会。王秀珍讲了《朝霞》问题张春桥批得很凶，哭了起来，大家都没能讲下去。王洪文说：“现在讲你们组织‘炮打’，东西都被人家拿到手了（指小兄弟们借工人文化宫名义召开批判《朝霞》的会议的通知，被写作组偷去一张）。”但王洪文又说：“文章我看还是有问题的嘛，不过现在这么搞会影响‘批林批孔’的大方向。”经过《朝霞》事件，张春桥要朱永嘉等把每期《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帮刊的大样送马、徐、王审阅同意后再印。这是唯一的变化。但马、徐、王都深知这是禁脔，提不得意见的，照例在大样上划个圈表示同意退给写作组了事。

（五）写作组的主要罪恶活动

第一，编写政治经济学、哲学辞典等书籍，篡改马列主义理论。

从写作组正式开张起，就开始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本毒草书。“四人帮”对这本书十分重视，正如朱永嘉所说：“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本书站得住脚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了。”他们把它看作是“挂帅”的书。到“四人帮”覆灭为止，此书一共写了5个稿本，一版比一版更迎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总共印了160000册。在本市党、政机关，曾被用作干部学习的参考材料；在大专院校，曾被用作辅助教材。

这本书挂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招牌，实际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贩卖张春桥“全面专政”等谬论，其突出的错误观点：首先，它胡说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阐明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帮助干部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它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东西，说它就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新老资产阶级的命根子”。它按照张春桥的腔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说成是“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它完全阉割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历史任务。它又用“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整人，片面地大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很少讲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诬蔑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干部、群众“只埋头生产，不抬头看路”。把现代化生产经营管理必需的规章制度一概斥之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它疯狂地用“党内资产阶级”来影射攻击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最后一版指名道姓攻击邓小平的有近百次之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哲学小辞典》于1973年2月开始编写，同年9月就出书，9月和12月各印一版征求意见稿，都是20000册。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为了“密切配合现实斗争”，从中国哲学史词目选出120条，加上与中国哲学史无关的所谓“儒法斗争”词目70条，拼凑了一本《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11月出版，连印两次，印数达550000册。1975年春张春桥、姚文元分别炮制了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毒草文章，写作组下令辞典编写组按照张、姚文章的腔调改写一些条目，如“全面专政”“资产阶级法权”等等，塞进《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5月出版，印了100000册。同年9月开始，《哲学小辞典》进行总修改，进一步大量塞进“四人帮”的反动哲学观点。总修改稿于1976年5月完成，未及审定完，

“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因此，总修改稿没有来得及出笼。

这一本《哲学小辞典》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提供反动理论根据的又一部毒草书，许多条目内容充塞着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在《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这一分册中，形而上学猖獗，口头上标榜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如“政治和经济”条目中，割裂了两者的辩证关系，片面强调政治的作用，否定抓经济的重要性，否定经济归根到底决定政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总修改稿中则干脆把此条目改为《政治》，根本不谈经济，以迎合“四人帮”空喊“革命”，破坏物质基础，反对“四个现代化”的反革命需要。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中，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并宣扬领导权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为“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制造的反革命舆论。在这个分册中，原来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这个条目，但在总修改稿中，却砍去了这一条目，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条合并为一条，片面地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片面地强调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不提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它引述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话时，只引“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却故意不引“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

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句话，宣扬“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的反动谬论。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法权”等条目中，彻底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是非颠倒，敌我混淆，完全是一派帮腔帮调。

《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部分）这一分册，更是直接地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服务的。它大搞影射史学，任意篡改、伪造历史，批宰相，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大造舆论，根本没有科学性可言。例如江青曾以吕后自居，辞典中就吹捧吕后成了一个“有卓见、有魄力、有功绩的女政治家”，什么“亲自执政，继续执行刘邦的法家路线和政策”，“能从大局着眼，维护国家利益”、“为维护全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当时有数以万计的人上书拥护她当皇帝”等等，抬出吕后这个历史的亡灵，来为江青当女皇鼓吹、劝进。仅此一例，已可见该书的反动本质。该书向全国大量发行，流毒深远。

1976年7月，又编写出版了《儒法斗争史话》一书。这是一本宣扬“四人帮”那套关于“儒法斗争”反动谬论的通俗读物。全书240000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青年自学丛书”出版发行，印数300000册。编写此书也是姚文元的主意。他曾

对上海的青年自学丛书出版发行情况作批示：“如能增加一种儒法斗争简史更好。”朱永嘉即布置写作组历史组举办的第一期学习班16个青年集体编写。朱说：“这本书要按照已发表的罗思鼎文章的观点来写。”因此，实际上成为罗思鼎“批儒评法”文章的普及本，照抄了一系列反动观点。例如：在《楚汉相争》、《女皇帝武则天》篇中，通过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当女皇造舆论；在《吕不韦和吕氏春秋》、《大泽乡风云》篇中，通过批“宰相”，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等等。朱永嘉还要求绘制插图，亲自审定图样。该书出版后大量分发给各地的知识青年。由于利用了通俗生动的形式，诱人阅读上当，危害极大。

1976年8、9月间，又炮制《谈谈党内资产阶级》一书，由顾澄海策划组织经济组人员编写。全书共分8章，约70000字。计划10月出版，因“四人帮”垮台而夭折。但前5章已于8月31日起，以《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为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节目中广播过，流毒很广。它捏造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说“党内资产阶级”是继“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之后的“第三种历史形态”，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主力部队”；它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荒谬地把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说“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同分配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密切关联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

的重要经济基础”；它宣扬“四人帮”提出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妄图把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打下去；它疯狂地诬陷攻击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挂帅人物”，说邓“在全国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等等。

第二，私编和伪造中共党史。

前面我们已提到过，1971年春张春桥要《红旗》组稿组凑集一些人为中央两报一刊撰写《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当时张曾授意朱永嘉私编党史。他说：“中央暂时不会编党史”“你们可以找几个人先搞起来”。他明知编写党史的权在中央，仍说：“你们这个班子不要散，但也不要成立（公开？）机构；否则将来搞起运动来难办。”朱永嘉得到张的这些话，叫嚷“写《党史》的‘令箭’拔来了！”积极筹划成立了“党史组”，由写作组历史组的吴瑞武具体抓。朱对党史组的人员说：“要注意保密，公开的说法是为大学编一本党史教材。”后来成书出笼时就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名称。从1971年7月开始编写，1973年7月出书，1975年出修订本，内部发行各版合计15000部。此外，朱永嘉、王知常还指令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搞了两种缩编本（一是教师用书，一是学生课本），取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提纲》，塞进中学政治课当教材。缩编本仅在上海

市的使用量即达1000000册，还流传到外省、市。

这部私编的党史，其主要问题是伪造党的历史，为“四人帮”鼓吹“改朝换代”，篡夺党与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历史”根据。它放肆地攻击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否定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是“五四运动”时期无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把他们光辉的名字从党的创建史页上完全抹掉。它诬陷、攻击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以后都犯有路线错误。它在讲到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时极少提到革命老干部的名字，如解放战争时期，甚至连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的名字都被抹掉；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历史功绩，更是以诬蔑刘少奇在那里推行一条错误路线为借口，几乎全部抹煞。它打着“突出毛主席”的旗号，全书基本上只写毛泽东一个人的活动，割裂了毛泽东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恶毒地诬蔑、贬低、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同时，它却硬把“四人帮”塞进党史，竭力加以美化吹捧。如以“突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为名，吹捧江青“直接领导了文艺革命的伟大斗争”“直接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伟大斗争”。全书提到江青的名字，竟有10处之多。还把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塞进了党史。

第三，办帮刊，写黑文，大造反革命舆论。

在写作组的创办或直接控制下，办起了8个刊物，即《学习与批判》、《朝霞丛刊》、《朝霞月刊》、《摘译（外国文艺）》、《自然辩证法》、《摘译（外国自然科学）》、《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和《教育实践》。

《学习与批判》是写作组竭力经营的起带头作用的主要帮刊。在党的“十大”前后，张春桥、姚文元等为加快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策动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肖木等在上海办一个“理论刊物”，认为“上海理论队伍要有自己的阵地”。徐景贤说“外地有一个刊物叫《理论与实践》，我们的刊物可叫《学习与批判》”。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民间刊物”的形式，挂了复旦大学学报的名义，实际上完全由写作组控制。朱永嘉说“这样进退可以比较主动”。“说错了话可以不承担政府的责任。”这样搞就是涂上复旦大学编辑的保护色，以便说出“四人帮”在别处不便说的话。显然，这本身就是搞阴谋。自1973年9月创刊到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后停刊为止，共出了38期。据不完全统计，38期刊物共发表文章774篇，其中写作组自写的448篇，占59%，组稿249篇，占31%，转载31篇，占4%。重点文章180篇，作者仅为15人。3年中共收到读者来稿7600多件，采用的仅46篇。刊物出版初期，发行数为30万份。1974年初起，由邮局向全国发行，逐步增加到每期95万份。为了扩大《学习与批判》的反革命影响，从1975年下半年起，还陆续

编辑出版《学习与批判》丛书，已出6本，收入的大部分是《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过的“重要”文章。

《学习与批判》积极地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流毒全国甚至国外，其反动作用和恶劣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不择手段地、隐晦曲折地诬陷攻击周恩来，猖狂地指名道姓地诬陷攻击邓小平。它集中宣扬“四人帮”的“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妄图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它与受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南北呼应，人称小《红旗》。凡《红旗》上一时不便刊登的文章，往往率先在《学习与批判》上抛出，影响全国；有些重点文章则由《红旗》和全国报刊转载。因此，它确实起了反革命舆论导向打头阵的急先锋的作用。

《朝霞》丛刊与《朝霞》月刊是写作组炮制阴谋文艺的重要阵地。1972年下半年，张来上海时召见朱永嘉、肖木、王知常，说“文艺创作队伍是客观存在，问题是要有人去组织”。于是，写作组即由肖木、陈冀德负责积极筹备出版刊物。1973年1月，写作组举办“创作学习班”，参加的30余人。他们根据“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选择一批题目，叫学员去“深入生活”，有目的地搜集材料，然后回来“讲故事”，搞创作。《朝霞》丛刊第一辑中的主要作品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这期“学习班”的大多数学员后来成为《朝霞》编辑部的成员或主要作者。这个

编辑部名义上属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实际上完全由写作组直接控制。刊物从选题、组稿、编辑到定稿、付印，都由肖木、陈冀德决定。1973年5月肖木调北京“王洪文办公室”工作，姚文元仍多次要肖多关心《朝霞》，因此，每期刊物清样由飞机送北京，经肖木“审阅”后才能付印。写作组组织《朝霞》的编辑们参加《学习与批判》的选题讨论会，使两个帮刊的口径统一，相互配合，炮制出适应“四人帮”反革命政治需要的作品。

《朝霞》丛刊从创刊到“四人帮”垮台停刊，共出14辑；《朝霞》月刊共出34期。丛刊每辑发行180000到400000册；月刊每期发行300000册左右。两刊共发表文章800篇。许多恶毒地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耻吹捧“四人帮”的文章，由于它们以小说、故事、散文、剧本等文艺形式伪装着，更能蒙骗人、腐蚀人，确实毒草丛生，毒汁四溅，流毒全国甚至海外。

《自然辩证法》杂志是“四人帮”下令写作组筹办的又一个帮刊。1972年10月21、22日，朱永嘉在写作组连续召开“自然辩证法问题”座谈会，公开叫嚷周培源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撰写的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里刮的阴风——理论风”。会后以《会议记录摘要》的形式上报张、姚。10月26日张即批示：“可以开座谈会、出刊物、在报上发表文章，同不同观点的人百家争鸣。”11月7日姚也批示：“同意春桥××意见。”朱永嘉等立即着手创办了《自然辩证法》杂志。

它和《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帮刊一样，都是在各自分辖的领域中，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

《自然辩证法》杂志从1973年6月创刊到1976年10月止，共编辑14期，出版了13期，分为16开、32开两种版本，每期印200000册。杂志中共刊载文章250多篇，资料和外论选择30多篇。一部分文章后来又汇编为10种《自然辩证法丛书》。

1973年年底起先后创办了三个登载翻译文章的刊物——《摘译（外国文艺）》、《摘译（外国自然科学）》、《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到“四人帮”覆灭时为止，《摘译（外国文艺）》出版发行28期，每期印数15000册。（“四人帮”被粉碎后，经中央工作组同意，将原已编好的3期作了部分改动后出版发行，则共有31期。）《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出版了9期，另有两本专辑，每期印数9万册。《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共出版22期，每期印数为100000册。三刊都向全国发行。

这三个刊物，也都有鲜明的“四人帮”的“帮性”。它们遵循“洋为中（帮）用”“批外修为了批内修”的原则，搞所谓“触及时事”“以苏修为镜子”等阴谋诡计。它们通过选择外国的文艺小说戏剧以及写“小评论”、“编者的话”等形式，影射攻击“大走资派”，攻击四个现代化。它们攻击的矛头总是指向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一般说，三个《摘译》是跟着

《学习与批判》《朝霞》《自然辩证法》三个帮办杂志走的，杂志上有什么新动向、新栏目，《摘译》就物色选译有关“外论”文章。

《教育实践》月刊是最后创办的一个帮刊。先是上海师范大学（按当时的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合并而成）要求出版学报。朱永嘉于1974年5月规定：“可出一种教育杂志，但不能与《学习与批判》唱对台戏”。《教育实践》名义上由“师大”与市教育局派人组成编委会，但审稿定稿全部要经过写作组。从创刊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停刊，共出版13期，发表文章280余篇。每期发行数为63000册。有些文章是朱永嘉、王知常直接授意炮制的，如1975年第4期刊载市二中学的一组文章，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出笼，又据此炮制《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一文，在《红旗》杂志发表，为大肆诬邓提供炮弹。又如1976年第4期《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值得注意》一文，恶毒攻击邓小平为“纳吉”，把参与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广大群众诬陷为反革命，受到朱永嘉的赞赏，下令《文汇报》4月15日全文转载。

第四，培训所谓“理论写作骨干队伍”，毒害工农青年。

写作组建立之初，张春桥、姚文元就下令务必在几年内训练出一支200人的“理论写作骨干队伍”，作为写作组的一项“战斗任务”。在以后的5年中，直到“四人帮”覆灭为止，写

作组为此举办了各种学习班29期，抽调基层工、农青年参加“学习”，总数达870余人。学习班的类型：按专业分，有党史学习班，政治经济学学习班，哲学理论、哲学历史学习班，自然辩证法学习班，文艺创作学习班等；按专题分，有评《水浒》学习班，“儒法斗争史”学习班，“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等；按时间分，有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的学员集中“学习”2、3个月，结束后即回本单位；长期的平时在原单位，每逢星期五来班“学习”。

举办这些学习班是写作组培养、招募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新生力量”的重要手段。朱永嘉一再强调学习班“要联系实际”，“要触及时事”，“要卷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去”，“大家来这里不光是学习，主要是为了战斗”。王知常曾经赤裸裸地宣称：“我们现在办学习班，就是用我们的观点去影响一大批人。当年蒋介石也办黄埔军校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嘛！”顾澄海也在学员中宣称：“到了我们这儿工作，就卷进了斗争的漩涡，你要跑也跑不了。搞我们这个工作，就要准备坐牢，准备杀头！”

在学习班中，他们对青年学员进行反革命政治灌输和思想毒害，名义上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实际上“学习”和宣扬的都是“四人帮”那套反动的“帮理论”。他们把张、姚的一些话作为“重要指示”，组织青年学员反复“学习”，培养对

“四人帮”的感情，鼓吹要做紧跟“四人帮”、与“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战士。有些青年学员受他们毒害，写了一些附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需要的文章和作品。写作组及下属各组的一些青年成员中，有40多人就是从各期学习班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又在每期学习班结束后与学员们建立经常联系的制度，为“四人帮”搜集基层动态情报。然而，绝大多数青年只是一时受他们蒙蔽，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教育与学习，很快觉醒过来，与“四人帮”及写作组头目们划清了界限。

第五，搞所谓调查工作，为“四人帮”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

写作组秉承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等的旨意，搞了多次调查工作，有专题性某一方面工作的情况调查，也有广泛的社会调查。炮制的调查报告，有的被直接用作向中央、国务院发难的“炮弹”，有的更阴险地为“四人帮”作反革命决策以及拼凑反动思想体系提供所谓依据。

朱永嘉等人搞这些调查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他们根本不是从实际出发，弄清客观情况，进行研究，然后得出结论与意见，而是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目标出发，迎合张春桥等反动观点，到“实际”中去寻找“根据”。现把几次重要调查列举于下：

(1) 上海城市民兵调查

1973年7月，王洪文调中央工作不久，下令写作组搞这个调查，为“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的反革命阴谋服务。

(2) 造船调查

1974年10月21日肖木打电话给朱永嘉，传达王洪文的话，要写作组“对上海造船工业作全面调查”，“造船、修船、租船、买船都要调查”。当时的背景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四人帮”在经济领域里刮起了一股批所谓“崇洋迷外”“洋奴哲学”的妖风，诬蔑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写作组头子们对“四人帮”要搞这次造船调查的阴谋目的心领神会，在布置任务时，朱永嘉说“这是告状用的状子”，王知常叫嚷“这是上面打仗用的‘炮弹’”。他们抽调了经济组、哲学组、文艺组以及新华社上海分社、造船公司的人员共17人，经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15份调查材料，陆续报送“四人帮”。这些材料都是“矛头向上”，借各种问题给交通部、六机部、远洋公司等扣上“崇洋派”的大帽子，胡说那里领导压制了上海造船工业的发展，而“根子在国务院”。

(3) 外贸调查

共进行了两次。

1974年10月朱永嘉在给张春桥的信中，提到要进行“关于外贸支援国内工农业生产问题”的调查，张春桥看信后在这一条下面划了一道杠，在旁批着：“我对这个题目有兴趣”。朱永

嘉、顾澄海得了这支“令箭”，积极组织写作组的经济组、哲学组、文艺组人员从11月初开始进行所谓“外贸调查”。这个调查，正如顾澄海讲的，一开始就“有针对性”。朱、顾他们把李先念、李强、姚依林等的讲话记录给参加调查的人员看，要求“找一找有什么‘错误观点’，以便有的放矢地写材料”。到了12月，写出10份材料。后来，据顾澄海说：“‘四届人大’刚开过，李先念还是副总理，部长都是新的，人家刚上任，我们就告状，不好，材料也不送了。”

第二次外贸调查从时间上又可分为两段：

前段是从1976年2月到5月。朱永嘉定调子说：“这次是搞政策性调查，要研究方针、政策、路线方面的问题”。他诬蔑外贸部是“洋行买办部”，“是搞修正主义最起劲的一个部”，“那里的头头实际上就是买办资产阶级”。顾澄海说：“调查重点放在1974、1975两年，要挂到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的帐上。”他们断章取义地摘编了外贸部李强、姚依林、柴树藩等的讲话材料，作为这次调查的攻击“靶子”。在他们的指挥下，调查组搞了电站设备、机床、造船、汽车4个行业的进口情况，以及钢材进口、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比例结构变化等6个专题。其中，电站设备进口和机床进出口两个专题写出了调查报告。这些报告迎合“四人帮”的政治阴谋，严重歪曲事实真相。如说当时电站设备进口太多而阻碍了国内生产的发展，说什么国内已经能

够制造60万千瓦的电站设备，而国务院有关部门还要向法国进口。事实上当时国内生产30万千瓦电站设备尚未过关，60万千瓦电站设备正在试制，而且这次向法进口谈判也并未成功。又如我国进口一定数量的大型精密机床，是具有技术引进性质的，而出口中小型机床则主要销往港、澳和发展中国家，有经济上占领市场和政治上支援的意义。但调查报告却夸大了我国生产大型精密机床的能力，又荒谬地攻击生产和出口中小型机床压制了大型精密机床的生产。这两个调查报告经朱永嘉审定后，于8月上旬报送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市委马、徐、王等人，并提供给黄涛带到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当作“炮弹”使用。

后段调查是6月至10月。当时马天水、黄金海利用外贸清查库，组织对国务院和外贸部的猖狂攻击。朱永嘉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旨意，指使写作组人员参加了所谓“调查”。这一段一个突出的事件是批判所谓“铜牌事件”向外贸部送“大字报”。8月初，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利用一个在美国的代理商向我外贸部门赠送一块表示感谢的“铜牌”这件事，诬陷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和外贸部“崇洋媚外”。王洪文批示要上海向外贸部送“大字报”。马天水接到批示就要朱永嘉派人协助黄金海执行。朱永嘉、顾澄海亲自找市外贸局的人开会策划。朱说：“目标要集中在李强、姚依林身上；观点要含蓄；调子要步步高，8张大字报分期分批送；要一榔头一榔头地敲”。还说：“外

贸部(问题)的关键在政治局里头。”第一张大字报经冯国柱审阅同意后送出。后段的调查还搞了一些专题,有些写出了调查报告初稿,有的尚在“调查”过程中,那时“四人帮”彻底垮台了,“调查”才中止。

(4) 上海县基本情况调查

1975年3月至11月,写作组搞了上海县的情况调查,目的是为“四人帮”上台“制定方针、政策作准备”。调查到最后分别整理了10份报告,其中《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由朱永嘉授意改写成《从我县农业生产的规律性看唯生产力论的破产》一文,以上海县委的名义,发表在《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9期上。文中竭力鼓吹“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也能上去”的谬论。

(5) “过渡”调查

所谓“过渡”调查,即郊区各县人民公社从三级核算向二级核算“过渡”问题的调查。名为“调查”,实际上搞了“过渡”的试点工作。这完全是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背着党中央搞的,是为张春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服务的。从1975年11月,断续地进行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止,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大体上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1975年11月到1976年3月。朱永嘉在马天水那里获悉,“市革会”副主任周丽琴在北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

张春桥曾对周谈过,要周搞“过渡”的试点。朱摸到张对此感兴趣后即带写作组经济组的人员去嘉定县马陆公社搞试点,又到金山县枫围公社、青浦县练塘公社、奉贤县钱桥公社召开有关“过渡”的座谈会,整理了记录材料送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马天水。

第二段,1976年3月到5月底。朱永嘉认为“过渡”是在所有制问题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项重大措施,张春桥一定会有兴趣,虽然第一段调查座谈的记录材料送张后未见回音,还应继续搞。在朱永嘉等鼓吹下,据说当时郊区有几个大队“自发过渡”或“县委领导下”搞试点,朱乘机做文章,利用复旦大学经济系学员毕业实践的机会,抽调十几名师生去“过渡”的大队搞调查,又指使那些师生去江苏、浙江、安徽等邻省作调查。朱一面在搞、一面心里也不踏实,到底“过渡”的步子要迈多大?主子的意图如何?尚不清楚。适值陈冀德去北京参加鲁迅著作注释会议,朱就叫陈去见张时当面汇报“过渡”的调查情况,摸清意图。5月3日陈冀德进入钓鱼台。张对“过渡”问题谈话大意是:“上海不能落在后面”,“你们送来的材料,都是富的,要关心穷队”,“要研究昔阳县过渡的经验”。陈立即把这些话传给了朱。朱即于5月18日召开了11个大队和有关县社干部的座谈会。会后,写作组会同“市革会”郊区组一起整理了《目前郊区11个大队过渡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

《关于过渡问题的座谈会记录》两个文件，由朱永嘉于6月2日写信上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市委马、徐、王等。

第三段，1976年6月上旬到10月初。对朱永嘉6月2日上报材料，张春桥6月5日即下达批示，说“赞成对过渡问题采取积极态度，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现在是5个县、10个公社、11个大队，今年秋后可否做到每个县都有试点单位？可否有几个公社全部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只是富社、富队，也要有穷社、穷队。”“不要两只眼睛老是看着富社、富队。”后来姚文元在另一封信中指出：张春桥对过渡的批示是他们共同研究过的。朱永嘉得批示后高兴万分，对写作组人员说：“批得这么快，领导上很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抓对了。”从6月9日起，搞穷社、穷队的调查。6月26日到29日，由写作组与郊区组共同主持，召开穷社、穷队座谈会，朱在会上提出各县都搞穷队“过渡”的试点。会后整理了3份材料上报。朱按照张春桥的意图，还要编一本象毛泽东编《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那样的书，每篇前面都加上评语，发一通议论。这是要把张抬到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地位。其野心之大，昭然若揭。随着“四人帮”的覆亡，这一妄想才告破灭。

(6) 阶级关系变化调查

写作组遵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搞阶级关系的调查先后有三次。

第一次在1973年，由经济组、历史组去上海第一钢铁厂、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搞工人队伍状况调查。上报材料不符合张春桥意图，1975年初张要求重搞。

第二次在1975年2月15日到3月上旬，选择上海机床厂作为调查的点，着重调查工人干部队伍状况。他们把工人中提拔上来的干部分成三部分：1952年至1957年、1958年至1965年和“文革”中提拔的。说第一部分干部对苏联管理企业的理论和经验熟悉，用“一长制”来管工人、搞“管、卡、压”起劲，喜欢物质刺激；第二部分干部有“旧观念”，留恋过去的规章制度，在“文革”初期全部站错了队；第三部分在“文革”中提拔的新干部“对社会上出现的右倾思想比较敏感”“敢闯敢上的斗争精神强”，但“党的组织观念差，有些入党的老造反家庭政治历史有问题，有的把资产阶级派性带进党内，少数人没过好劳动关”。材料上报后，张春桥说“说明了一个方面的问题”。从3月下旬到8月中旬，朱永嘉、顾澄海又派人“深入”上海机床厂第二车间调查工人队伍的状况。朱永嘉先定下调子，把工人按进厂时间分成四个部分：解放前，解放初到1958年，1958年到“文革”前和“文革”中进厂的。他胡说第一部分老工人工资高，是工人中的上层分子，解放后经济地位变了，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逐渐小了。第二部分人解放前后当艺徒，“三反、五反”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是厂里的主要骨干，但“受苏

修一套影响大，搞管、卡压、物质刺激”。第四部分是1968年进厂的青年工人，幼稚，没经过锻炼。只有第三部分“路线斗争觉悟高，造反精神足”。调查就是根据这种调子去进行的。7月9日，姚文元在上海召见写作组汇报工作，也听了参加调查的人员的汇报。当时谈到1958年进厂的工人，其中有些“老造反”带有某些共同的问题，姚听了很不满意，他说对“老造反”要“从路线斗争上进行分析”，注意到他们的“先进性”，调查要“给人以信心，不要完全是黑的”，总之，不准讲“老造反”的“坏话”。

到了1976年春、夏间，张春桥又要搞阶级关系变化调查，这是第3次了。5月3日，张春桥把当时在北京开会的陈冀德接到钓鱼台密谈，要她转告朱永嘉，组织人马再搞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把它作为一项“交办任务”。朱永嘉、王知常得到陈冀德带回的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并写信向张表忠心，还说以前作过两次调查，“都由于没有摸清盘陀路而遭到失败，这回决心三打祝家庄，搞好这次调查。”6月12日，张春桥在朱的原信上作了一个被朱、王称为“多年少见的”“极为重要”的400多字“长批示”。他在批示中说自己在重读《毛选》一至四卷，“越读越感到自己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真是不甚了了，越是觉得应当弄清楚”。朱、王接到批示如获至宝，以章树焜为首的哲学组人员为主，抽调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学员，凑了二、三

十人的调查工作队伍；确定调查工作的四个步骤：第一步，先调查老资产阶级的现状，第二步调查知识分子，第三步调查工人，第四步调查干部、“走资派”。

从朱永嘉、王知常等多次谈话可以看到，张春桥下令搞这次调查的罪恶目的在于进一步鼓吹“阶级关系变动论”“民主派必然成为走资派”，直接为“四人帮”篡夺党与国家最高领导权炮制所谓“理论依据”。朱永嘉秉承张春桥的旨意，在调查开始时就明确提出：“这次调查不是搞一般的阶级组成情况，主要是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阶级关系的变化，重点是变化！”他又胡说：“社会总是成帮成派地交往，一个个小圈子有共同语言。都是一荣俱荣，一枯俱枯，象《红楼梦》里说的一样。老干部以前被打倒，落实政策后，总想把自己圈子里的人也安排妥当。”“划分阶级，从政治上看，就是看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经济上看，就是看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王知常则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老干部是全国粮票，这些人已经吃到仙桃的人了，新干部是上海粮票，这些人则是想吃仙桃的人。”企图说明干部怎样变为“走资派”。（但当时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工”字头黄金海、马振龙那些人作些调查，朱、王都连声说：“不行，不行，谁批准你们去调查，你们向谁调查！”）朱永嘉并且透露，调查到最后，可能由张春桥写成一篇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炮制、拼凑“张春桥思

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张春桥通过朱永嘉等的“调查”要写一篇《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狼子野心，不言自明。

第三次调查到1976年9月进入第二步，即对知识分子的材料收集和分析，但不久“四人帮”垮台了，调查中止。

第六，猖狂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长期来反对周恩来总理，把周恩来看作他们篡党夺权必须排除的最大障碍。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等紧跟“四人帮”的阴谋部署，连篇累牍地炮制攻击周恩来的毒草文章，成为反周的急先锋。他们这种反革命罪恶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量地采用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造谣诽谤、颠倒是非的手法。尤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评法批儒”，“评《红楼梦》”，“评《水浒》”，借“题”发挥，大搞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隐晦曲折地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写作组在这方面罪行的突出事例：

(1) 借围攻周培源的文章，反对周恩来。

周恩来早就提出过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正确主张，1972年夏与杨振宁教授谈话中，再次讲了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要切实抓下去。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投寄《人民日

报》。张春桥、姚文元污蔑周恩来的正确主张是刮“理论风”，组织围攻周培源的文章，实际是攻击周恩来。他们先把周培源文章的清样寄给朱永嘉，并要《人民日报》记者到上海来“征求意见”。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对张、姚的意图心领神会，“实际上是不赞成文章的观点，是他们不便说，要我们替他们说。”于是他们召开各种会议，组织围攻周培源。同年10月21、22日，朱永嘉在写作组连续召开“自然辩证法问题”座谈会，公开叫嚷周培源的文章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里刮的阴风——理论风”，反对周培源文章见报。年底，姚文元来上海，对朱永嘉说：“周培源的文章有背景，不发不好，不发要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12月19日徐景贤、朱永嘉对侯赞民（侯奉调去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的谈话中又讲了周培源文章问题，胡说“要顶住理论风，要注意右倾回潮的倾向”，更加明目张胆把矛头对准周恩来。1973年上半年他们乘周培源来上海参观时机，明枪暗箭攻击周，直到1974年还在报刊上不断地发表围攻周的文章，并利用文艺形式，演出独幕话剧《抗寒的种子》，把周培源丑化为资产阶级教授，恶毒攻击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为“西伯利亚寒流”。

(2) 炮制《论尊儒反法》一文，为“四人帮”的“评法批儒”打响了第一枪。

正如王知常交代，这篇文章“明靶子打郭老（沫若），暗靶

子是对周总理的。”文章中抛出“儒法斗争延续2000年，一直到今天”、“党内有儒”、“法家受压”以及“尊儒反法”就是“复辟思潮”、“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等等谬论。含沙射影地诬栽攻击周恩来是所谓“党内大儒”。从这篇毒草出笼开始，在“四人帮”的策动下，全国报刊上连续不断地出现批所谓“党内大儒”的毒草文章。

此文发表于1973年9月《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同年10月《红旗》杂志第10期转载，全国报纸也纷纷转载。

(3) 炮制《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在全国首创“批宰相”批“折中主义”之风。这是写作组搞影射史学的又一篇代表作。江青、姚文元多次夸赞此文写得好。江青说“文章好就好在批了吕不韦，吕不韦是个宰相”。文章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搞“折中主义”。据王知常交代：“所以如此，是由于姚文元曾对我们言及胡适曾著《西游记》九十九回事，此文载《胡适论学近著》，名《唐僧割肉度鬼魂》，我体会姚意在于诬蔑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革命老干部是唐僧割肉度鬼魂，在路线斗争中搞折中、调和、包庇走资派。”这篇毒草文章就借批吕不韦来批所谓“折中”“调和”，说“这时在秦国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中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从这篇开头，写作组连续不断地抛

出批宰相、批折中主义的文章，如批李斯、田千秋、霍光、公孙弘、陈眉公、司马光、诸葛亮等，这些都曾是历史上各个皇朝的宰相。用的言语刁钻尖刻，诱发人们妄加猜测，如说李斯“私心重，骨头软”；说汉丞相“田千秋是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说明朝宰相陈眉公“以善于处世著称”等等，以达到含沙射影诬蔑诽谤的目的。

此文发表在《红旗》1973年第11期，署名罗思鼎。

类似此文的还有《评〈吕氏春秋〉》一文，也是姚文元直接授意朱永嘉、王知常炮制的毒草文章，出笼于《红旗》1974年第4期，可以说是前文的姊妹篇。1974年2月4日姚文元批示朱永嘉：“规划上批判《吕氏春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用折中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搞分裂的内容，结合批林。”朱永嘉、王知常就布置历史组王守稼等人搞初稿。初稿不合他们的意图，王知常批评初稿作者太“迂”，说“现在不是搞学术讨论的时候，文章都是从政治上去讲的。吕不韦是个宰相，又是战国末期最大的尊孔派，但又不能公开打出儒家的旗号，只能采取折中主义的手法。总结这种复杂的历史经验，是很有意义的。”写作组内部骨干成员都知道文章是攻击周恩来的。

(4) 借评《红楼梦》搞影射红学，攻击周恩来等。

姚文元于1973年底、1974年初在上海3次找朱永嘉、王知常去谈话，要写作组在评论《红楼梦》方面抢旗帜。他说“批孔、评红都是大问题”，鼓吹写“评红”文章“要同现实斗争联系起来”“触及时事”“吸取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根据姚的授意，朱永嘉、王知常积极地炮制文章、整理资料、举办“评红学习班”，竭力把评论《红楼梦》纳入“阴谋红学”、“影射红学”的反动轨道，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服务，很热闹了一阵子。

他们在文章中牵强附会、随心所欲地指贾政是“贾府里孔圣人”，薛宝钗是“封建末世的女儒”，王熙凤“对孔老二这套骗人哲学倒确是心领神会，学到了家”，等等，不一而足。

《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一文，刊载于《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4期。王知常叮嘱写初稿的作者“文章要写贾政在大观园里的地位，贾政是制定政策路线的”。

另一篇《大有大的难处》发表于《红旗》1974年第4期。按王知常原先的布置，打的幌子是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在起草过程中，王知常十分诡秘地对作者郭朝绪说：“文元最近有个精神，讲这篇文章中要夹一点批判崇洋思想的东西”。郭开头觉得塞进批崇洋思想有点不伦不类，但“为了体现姚文元的‘精神’，触及时事”，便“硬装斧头柄”塞进了这么一段话：“有些人由于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往往在一个时期内被种种

外强中干的假象所迷惑，因而看不见或过低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反动的庞然大物的力量，盲目迷信所谓西方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就有点象刘姥姥盲目崇拜当时的贾府一样”。用以影射诬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负责同志。

姚文元还要写作组写大观园厨房的夺权斗争，后来取题名《大观园里的厨房之争》。据朱永嘉1977年3月7日交代：“其实，这就是江青说的，《红楼梦》里有二派，一派是母系，是王夫人、王熙凤、贾宝玉他们，一派是父系，就是邢夫人、贾赦、林之孝他们。‘四人帮’为什么对厨房里的夺权斗争那么有兴趣，因为那里是母系得胜了。他们是要借着这个事情来抒发‘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江青那个以母系自居的野心家，想夺的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另外还有什么《贾探春的新经济体制》《评反革命两面派王熙凤》《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王熙凤的烦恼》《贾府的大观园与赖大的花园》等等，有的发表于《学习与批判》，有的写了没有发表。

(5) 借评《水浒》为名，连续炮制出笼所谓“投降派”的毒草文章，实际上在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1975年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7月14日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

缺少文艺评论”。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反映“四人帮”给这部电影安了十大罪名的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是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四人帮”及其党羽十分惊慌。8月中旬，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的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立即利用这个讲话，认为转移毛主席对“四人帮”严厉批评，变被动为主动的好机会来了。他们极不寻常地以中央名义，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等文件发给北京梁效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他们的策动下，在全国刮起了借评《水浒》批揪所谓“投降派”的恶风。他们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央和省、市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领导干部，首先是猖狂地对准着周恩来。

朱永嘉8月17日下午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指名发给“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亲收的文件，晚上又接到姚文元秘书胡鼎君转来姚的“指示”，要写作组集中力量搞《水浒》的评论。他欣喜若狂，立即紧张地活动起来，接连召开新闻单位、出版社、各大专院校的会议，进行传达与部署。并在两天内突击赶写了一篇《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直送姚文元，抢先在《红旗》1975年9月号上刊登出来了。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打着学习鲁迅的旗号，宣扬“四人

帮”的那一套反动观点。它一开始就着眼于所谓“路线”，还提出什么“领导权”问题，说宋江“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等等，极尽影射诬陷之能事。

《三百年来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刊载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0期，署名罗思鼎。文章中胡说“定案和翻案的斗争将贯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全过程中”。

《〈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10期。别有用心地突出宋江“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主题。

《灵牌小议》，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0期，署名廷风。这是一篇杂文，阴险地提出了一个“继承权”的问题。说什么宋江违背晁盖遗言，搞灵牌，这是因为在梁山泊上，晁盖是老大，宋江是老二，兄终弟及，梁山泊主，舍宋江其谁？文章竭力反对这种“正统”继承，鼓吹“四人帮”抢班夺权。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表在1975年第11期，署名罗思鼎。炮制这篇文章时，王知常搬用姚文元的话，打着学习鲁迅的幌子，大谈什么“在鲁迅看来，辩论不可怕，围攻不可怕，谩骂不可怕，孤立不可怕，有人淘汰了也不可怕，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到后来队伍就愈加

精干了，淘汰了沙子，金子会更加闪光。这是思想文化战线斗争的一条规律。30年代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这一连串的“不可怕”，实际上是对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的谈话和批示的猖狂反扑。

到了1975年年底、1976年年初，写作组炮制的评《水浒》批宋江文章，更加公开地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挂在一起，明目张胆地诬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是什么“现代宋江”。如发表在《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期的《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中说：“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是又一种形式的投降主义思潮。”“教育战线的这场大辩论，又一次证明了批判投降主义思潮的必要性。”朱永嘉自己得意地承认“评论《水浒》为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思想准备。”

据统计，从1975年8月中、下旬到1976年上半年，写作组借评《水浒》炮制的毒草文章有40余篇，大部分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

(6) 从多方面进行捣乱，炮制黑文反对周总理。

早在1972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现在有些企业处于自流状态，要整顿，要加强企业管理。1973年计划会议上发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通知”。张春桥、姚文元指使写作组炮制了《谈谈

企业管理》一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12期。他们恶毒攻击搞企业管理、建立规章制度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倾回潮”，荒谬地鼓吹规章制度还破得不够，宣扬“革命抓好了企业管理自然而然会好”等谬论。

1974年年初姚文元在上海，临去京前把朱永嘉、王知常叫到兴国路招待所，拿出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工艺品分公司编印的向国外发行的一本《中国画》画册，气势汹汹地一幅一幅进行挑剔谩骂。他指着一幅题名《迎春》的画说：“这只大公鸡尾巴翘到了天上去，两只眼珠往上翻，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又指一幅名叫《秋》的国画说：“这个放牛娃，身上穿的是什么朝代的衣服？头上五头老牛，那么大，那么凶，想干什么？”又翻到一幅《荔枝熟了》的画，说：“这个少数民族妇女象卖弄风情的外国贵妇人。”又翻到一幅名《山区》的画说：“社会主义的新山区，画成了黑山恶水。”等等。姚说：“要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这里就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还潮。”姚文元在这里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反对国务院领导同志。原来，国务院领导同志曾经说过，美术品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的，内容上不是黄色的，一般都可以出口。张、姚直接反对这个正确的指示，后来还掀起了一个查“黑画”的运动，把在各大饭店、招待所所悬挂的画重新进行检查。“四人帮”在文化部的党羽于会泳还要搞“黑画”的展览和陈列，这样就进一步把矛头直接指

向周恩来。因为当年接待尼克松时，那些画曾逐一由周总理审查过。

朱永嘉、王知常从姚处回来，即向写作组作了“传达”，并指使历史组、文艺组的人“联系（这个实际）弄点批孔文章”。文章取名《新国画“新”在哪里？》，最后送徐景贤审定。徐特地在末尾一段中删去“《中国画》的编者”这个主语，加上了“拿出这样的一些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题为《中国画》，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此文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3期。

1974年“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徐、王、黄涛等制造多起事端，诬陷攻击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崇洋媚外”，其中一件即著名的风庆轮事件。朱永嘉按照姚文元的指示，伙同顾澄海、陈冀德等人写了《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一文，刊登在《红旗》1974年第11期。姚文元在该文中亲笔加了“风庆”轮远航“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朱永嘉又令上海两报转载并继续发表文章影射诬陷中央领导同志。

周恩来曾同意在东北个别农场实行工资制和工分制相结合的试点。张春桥得知此事后，对朱永嘉、王知常、肖木说：“国营农场为什么要退回到工分制？难道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反而不如集体所有制？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灵了！”1974年9

月朱永嘉亲自带领写作组经济组的人员去崇明前进农场，名义上是帮助农场搞规划，实际上搞阴谋反对周总理。后来就炮制了《前进农场宣言》一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1期。文章中把张春桥的话完全照录进去，说“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农场，到底有没有优越性？这是一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国营农场这个问题上到底灵不灵的重大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还说：“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散布‘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的谬论，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优越性，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阴谋走资本主义道路。”

《前进农场宣言》发表后，在全国流毒甚广。1975年3月在宁夏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会议上，曾作为大会文件印发，有的省、市曾提出了“学习上海的方向，宁夏的干劲，黑龙江的贡献”的口号。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重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使大家从“文革”长期动乱中看到了希望。但“四人帮”对之疯狂攻击不遗余力。张春桥胡说搞“四个现代化”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们一伙多次提出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谁抓生产，就给谁扣上“唯生

产力论”的大帽子；“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干扰和破坏国民经济，制造社会动乱，以便他们趁乱篡党夺权。写作组亦步亦趋，不断地炮制了多篇文章攻击四个现代化。如《教育革命“拖现代化的后腿”吗？》发表于《红旗》1976年第2期，署名“复旦大学大批判组”，实际上是由王知常具体布置提纲，郭朝绪等执笔，最后由王知常修改审定送《红旗》的。王知常根据姚文元的授意，确定文章的“重点要对现代化作分析”。说：“我们不能走苏联那条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道路。”“现在世界上还只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个什么样子还没有看到哩！”等等。1976年7月17日，《文汇报》出笼一整版毒草文章，这是吴瑞武派人直接找写作组下属《中国近代史》编写组撰写的。其中，杂文《药方只贩古时丹》荒谬地炮制了“四个现代化”=“实业救国”=“崇洋卖国”的反动公式，胡说“四个现代化”“其源盖出于李鸿章之流所创始的‘洋’字号药铺”，恶毒地攻击周恩来。

第七，紧跟“四人帮”抵制毛泽东的批评和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

在姚文元直接指使下，朱永嘉等于1975年7月炮制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毒草文章却又未敢出笼；同年

10月写作组与“市革会”文教组共同出面召开“上海文艺工作座谈会”。此两事有密切联系，都是对毛泽东的批评的猖狂反扑。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同志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7月间，姚文元、王洪文先后灰溜溜窜来上海。

姚文元来上海后，先后4次召集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等人谈话。第一、二次有朱、王和王绍玺；第三次有写作组领导核心和其他成员共20多人；最后一次是7月21日，有朱、王、王和陈翼德、顾澄海5人参加。就在这最后一次密谈中，姚说他同张春桥通了一次电话，“收到了一件东西是政治局发来的”。姚所讲政治局发来的东西正是上面提到过的毛泽东7月14日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姚气势汹汹地只准王知常一个人作记录，不准外传，说“如果传出去，无非杀我的头”。他每念一句毛泽东的话，都按自己反革命的需要加以“解释”。他说“现在要调整文艺政策，一定会跳出来许多牛鬼蛇神，到时就要进行反右”，繁荣创作也会“冒出毒草来”。“右派进攻，一是不可怕，一是（要）锄毒草”，“要准备挨点骂”，“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姚布置要写文章，把自己装扮成是拥护

“双百方针”的，却又要陈冀德收集“文革”以来长、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创作、出版的情况给他，炮制文艺创作繁荣的假象，对抗毛泽东的批评。

为了赶在姚离沪返京前给他审阅，写作组抓紧写了一篇题为《坚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文章。姚看后批：“面太广”，应“缩小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一点上，“要讲不怕，讲历史经验，如鲁迅、五七年”。王知常就大加删改与重写，题目就定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突出强调“不怕”。说“共产党就是在骂声中诞生，在骂声中发展的”，“真理是骂不倒的，骂倒了就不是真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众必非之。”“马克思主义者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不怕撤职，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还能怕围攻和谩骂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这篇文章送上去后，姚批了“留待后用”四字。可能是由于文章写得太露骨，明目张胆地把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批评，姚未敢在当时抛出。

接着又传来7月25日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对电影《创业》的错误态度的批语，“四人帮”及马、徐、王都慌了手脚。徐景贤开头竭力封锁抵制，以后迫于形势，不得已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匆匆作了传达。不料张知道后打电话给马天水大发雷

霆，说“这件事情关系到江青”，批评上海不先请示就传达。

到了9月，姚文元利用《诗刊》复刊的机会，给写作组转来了一封关于诗歌问题的信，借诗歌的体裁、押韵等问题，大发议论，转移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朱永嘉、王知常看后心领神会，王多次叫好，说“这是领导非常高明的艺术！”“现在完全从被动转为主动了！”朱永嘉就去找徐景贤，经过紧张的密商策划，串通马天水、王秀珍，决定以市委写作组和文教组的名义，召开一次大型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海文艺工作座谈会1975年10月8日到14日召开，参加的有文化、艺术、电影、新闻、出版等单位的代表以及专业和业余文艺创作、评论人员共217人。在开幕式上，徐景贤作了动员，在闭幕式上，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相继大发谬论。整个会议，根本不传达毛泽东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和关于《创业》的批示，却大肆宣扬姚文元关于诗歌的信。明明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四人帮”，尖锐地揭露了“四个缺少”“百花齐放都没有了”，马天水、徐景贤一伙却把“四人帮”打扮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进行肉麻的吹捧，叫嚷“现在我们的作品有很大发展”，“从上海来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文艺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出了许多革命样板戏以及其他一大批革命文艺作品”，叫嚷“文艺界要从思想上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对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

方针和政策的认识”。

会议结束后，徐景贤、朱永嘉把会议情况上报“四人帮”邀功。10月下旬，当文化部刘庆棠来上海时，徐景贤与之密谈了两个晚上，徐景贤得意地对刘说：“文化部传达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是一大失策，使自己陷于被动。本来是不应该传达的。文化部向上请示要不要传达，也使领导（按指‘四人帮’）为难，他们当然只好同意。上海这次文艺座谈会，没有传达关于《创业》的批示，而是传达主席关于《诗刊》的批示和文元的信，这样做就很主动。”

第八，无耻地吹捧“四人帮”。

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一伙人为其主子“四人帮”吹喇叭、抬轿子是一贯的。他们早就把“四人帮”吹捧为最最革命的“左派”。在写作组内外以及历次“理论写作骨干队伍”学习班中，他们肉麻地宣扬什么在张、姚领导下工作是“最最幸福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们字里行间把“四人帮”推之为当代“法家”。“四人帮”彻底垮台前的最后两三年中，写作组对他们的吹捧越发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捏造历史，牵强附会，声嘶力竭地为“四人帮”篡夺党与国家最高领导权帮腔造舆论。这里介绍两个事例可见一般。

其一，捧吕后实为捧江青，借历史的亡灵为江青上台当“女皇”造舆论。

写作组炮制了《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刊载于1974年《红旗》第8期）等毒草文章，不仅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更露骨地吹捧江青。朱永嘉在炮制这篇文章时说：楚汉战争，刘邦不是项羽对手，屡战屡败，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为什么终于打败项羽？是因为吕后在关中领导建设根据地，作了刘邦的“坚强后盾”。还说：“汉高祖废惠帝是对的，吕后在根据地，这套班子只有吕后管得住，中央班子没有动，刘邦把后事交给吕后”。“秦始皇法家路线中断，是由于没有吕后这样的助手；刘邦的汉朝传了七代，关键是靠了吕后”。刘邦死后“形成了以吕后为核心的法家领导集团，稳定局势”。原先的稿子完全体现了朱永嘉这套“论点”。有人提出经营关中后方支援前方是相国萧何等的功劳。“罗思鼎”听了很不是味，不得已才勉强说是“在吕后、萧何的领导下”，萧何又只是作个陪衬。然而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楚汉战争中，吕后很长时间是项羽的俘虏，在刘邦称帝前3个月才回到汉营，她怎么能和萧何一起建设根据地，作刘邦的“坚强后盾”呢？这完全是捏造历史，真是无耻之极！

无独有偶，姚文元也在文章中加了两处吹捧吕后的话，说“刘邦与吕后一起平定了异姓王”，于是把吕后与刘邦并提。

类似的为江青当“女皇”造舆论的毒草文章还有《儒法斗争史话》中《楚汉相争》、《女皇帝武则天》等等。

其二，拼凑和吹捧所谓“张春桥思想”。

臭名昭著的所谓“张春桥思想”，是由写作组朱永嘉、肖木等人竭力吹捧出来的。在1975年4月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之前，这种吹捧已经露头。如1974年11月《学习与批判》刊登了写作组一手炮制的《前进农场宣言》后，朱永嘉曾对市农场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叶定海说：“《宣言》中好多话不是我们能说的，是体现了‘张春桥思想’。”但当时在程度上还没有到拼凑成什么思想体系并四出游说、大肆吹捧的地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报后，“四人帮”那些亲信喽罗们借口“谈学习体会”，掀起了一场肉麻的吹捧风。他们更“鲜明”地抬出“张春桥思想”，甚至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拟。1975年4月10日，肖木在上海到写作组大肆吹捧张春桥，他说：“列宁仅仅说过‘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张春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认为列宁的说法还不够，他认为只有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因为怕人家看了会认为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才没有把这句话写上。”“象春桥那样明确地从‘四个一切’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第一次，是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在春桥这篇文章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明确地阐述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还存在资产阶级

法权。”朱永嘉说：“张春桥思想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顾澄海说：“在理论上有两个重大突破：一、在所有制上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二、从时间到空间上论述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提法新，过去马列都没有讲过”，等等。

反动的“张春桥思想”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四人帮”的亲信党羽们说法不一。从他们过去的吹捧以及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中他们的交代来看，大体上似乎包含以下一些“观点”与“主张”：①“否定一切”，“改朝换代”。说“文革”前十七年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文革是改朝换代”。②“全面专政”。说“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而“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因此要在“一切领域”“一切阶段”实施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③所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④“阶级关系变动论”。说阶级关系变动的核心是党内老干部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⑤“过渡”论。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过渡。

朱永嘉等在此期间不断炮制文章，鼓吹“张春桥思想”的那些反动主张。如《回顾“三反”“五反”运动》《旧事重提》，分别刊载于《红旗》和《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5期，署名都是翟青。两篇文章都吹捧张春桥“打土围子”的反动口号，矛头指向革命老干部。《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连续刊载于

《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3期到第6期，署名任农、龚进。《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改造文化队伍》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6期。此文打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3周年的幌子，说什么“对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反限制，就成为在文化队伍中改造与反改造的重要内容。”还有一篇文艺评论《走出“彼得堡”》，是朱永嘉根据张春桥1968年接见上海工人作家时引用列宁的话，授意文艺组二人撰写此文。文章歪曲篡改列宁的原意，把我国解放后的文艺队伍说得一团漆黑，宣扬了张春桥的“改朝换代”论。此文在《朝霞》1975年3月号上出笼后，《人民日报》4月6日转载，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全国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朱永嘉得意地称赞此文为写作组近几年文艺评论文章中的“高峰”。

拼凑和吹捧“张春桥思想”的目的何在呢？早在1973年年底，朱永嘉就露骨地叫嚷过：“理论上的权威必然会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这就最清楚地说明了其罪恶用心。

第九，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打头阵、抢头功。

在“四人帮”指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写作组朱永嘉等人扮演了打头阵的角色，特别活跃，特别狠毒。

1975年年底，《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文在《红旗》杂志上抛了出来。这是朱永嘉受姚文元指使写的一篇“思想评论”。

未接任务后就敏感地对人说“风要转了”。这篇毒草文章批判否定“文革”的所谓“错误言论”，矛头指向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祭起了“信号弹”。

1976年2月底到3月初，写作组全力以赴地参与张春桥授意马、徐、王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宣传、文教系统代表以及工农兵业余理论、创作骨干代表共120多人。会议由朱永嘉主持，顾澄海、王绍玺为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写作组有24人作为出席代表，另外还有9人担任大会工作人员，真可说倾巢出动了。

会议第一天，徐景贤作动员。他说召开这次会议，是要“搞理论和创作的先走一步，为区、县、局负责干部会议做点准备”。他提出会议要讨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哪里？资产阶级民主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和文艺战线如何深刻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怎样分析和表现走资派？”等问题。

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弥漫着大量的谬论（会议出了18期简报），乌烟瘴气，极力“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鼓吹“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从建国起，“走资派”就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鼓吹“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鼓吹“写走资派是当前文艺创

作的主攻方向”，鼓吹反军乱军；鼓吹教育战线“两个估计”^①，恶毒诬陷邓小平等。

同年3月，根据张春桥授意，炮制了《由赵七爷的小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在《学习与批判》上出笼。张春桥一月间叫肖木传信给朱永嘉、王知常，说他最近读了鲁迅的小说《风波》，“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好象离我们很远，又好象很近。说远是因为这场风波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说近，赵七爷之流的人物至今仍在活动着”。他说“阿Q和小D不应该相互揪住对方的小辫子，而应该去揪赵七爷的大辫子、张勋的大辫子”。张恶毒地攻击邓小平是赵七爷，还说赵七爷上面还有一个辫帅，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恩来。这是张对写作组党羽们的露骨的交底。王知常具体组织了文章的拟草、修改和最后定稿，不仅完全照搬张春桥那一套影射诬陷周、邓的话，而且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打成所谓“辫子党”“盘辫党”，叫嚷要把他们“打翻在地”。文章改定后，在《学习与批判》正式出版前，徐景贤就下令《文汇报》提前转载，流毒极广。

^① 所谓“两个估计”是指1971年8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点严重违反事实的错误估计，即（一）“文革”前17年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教师中的大多数和17年中培养的学生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同年4月，《读一篇未及发表的文稿》（《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选批》同时出笼。这三篇毒草文章都刊登在《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4期上，又广泛地为报刊所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学习资料”。它们在“四人帮”发动的诬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当作“重磅炮弹”使用。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宣扬“四人帮”那一套极“左”的陈词滥调，反对搞四个现代化，反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反对全国的安定团结，恶毒地咒骂当时迫切需要的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是布下“天罗地网”，“是杀气腾腾一副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的腔调”，疯狂地诬陷攻击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央与地方领导同志，并且诬蔑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这些文章炮制出笼后，朱永嘉得意洋洋地说：“这下子我们抢到了3个头功！”

在这段时间内，写作组炮制出笼的大块毒草文章还有：

《汪精卫卖国记》上、中、下三篇，分别刊登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2期和1976年第1、2期。它是1975年夏季以来借评《水浒》煽起的批所谓“崇洋迷外”“投降主义”那股妖风的继续。它借批汪精卫的投降卖国，无中生有、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邓小平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此文在帮刊《学习与批判》连载后，张春桥叫肖木传话说：文章“只写了汪精卫的后半生，没有写他前半生，一部历史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恶

毒诬陷攻击说：“过去有功劳，有资本，所以今天才成为走资派，成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根据张的这番话，王知常赤膊上阵，亲自炮制了《革命与资本——读汪精卫卖国记有感》，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7期。这篇文章极为反动地“论证”“历史上功劳越大的人，做投降派的危险也越大”；污蔑我们党的大批革命老干部是什么“半截子革命派”，前半生革命，后半生“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便跳出来疯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成了走资派”；胡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也可以革命那么一阵子，但一旦革命触犯他们的阶级利益时，便很快地由革命的同路人转化成革命的公开敌人了”。这篇毒文指名道姓诬陷邓小平，同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蒋介石是怎样起家的》和《蒋介石上台的头十年》，刊登在《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3、4期。

这是朱永嘉、王知常策划炮制的所谓“上台”文章中的两篇，同他们炮制的《司马光登台一年》等毒草文章一样，用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蒋介石是怎样起家的》一文，1975年3月由朱永嘉布置撰写。当时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朱阴险地授意文章的作者要写出蒋介石“一手抓军队，一手抓组织”，从而“篡得最高领导权”的特点，进行影射攻击。文章于4月底写成。

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四人帮”，朱、王见形势对“四人帮”不利，不得不将文章压下，直到10个月之后，趁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这篇文章又抛出来，他们删去了原有批判林彪的文字，并赤裸裸地谩骂：“右派上台，不能长久”。《蒋介石上台的头十年》，其恶毒影射的用心与前一篇同。且特意选定在转载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文件的同期杂志上抛出。文章中还突出攻击了“整顿”。上述两篇文章，都采用了影射史学与阴谋文艺相结合的形式，寓反动性于生动性之中。

到了1976年8、9月份，写作组奉命加紧编写《赫鲁晓夫上台》资料，并翻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写作组原计划《战后世界史长编》按年份顺序编26个分册，约需8至10年才能编完。1976年8月，第2分册出版。姚文元批示朱永嘉，要求把若干年后才能编到的赫鲁晓夫上台事件提前编写。张春桥也在信上划圈表示同意。朱永嘉即于8月31日召开会议，布置“长编组”具体落实。并打算把《长编》印数增加一倍。

与此同时，马天水派秘书房佐庭找朱永嘉、王知常，要求搞一本《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当时顾澄海说经济组已有一份译稿，即于9月2日翻印了50份，分送马、徐、王和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金传德、陈阿大等，分发写作组核心成员并各组。

在那个时候，“四人帮”及其党羽为什么对赫鲁晓夫那么感兴趣？这完全是为了加快篡党夺权反革命步伐的需要。当时，正是毛泽东病重期间，他们要大造所谓毛主席百年之后可能出现赫鲁晓夫上台那种局面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的矛头是指向还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这仍然是他们的惯用手法，即诬陷别人是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加以打倒，以便自己上台。所不同的是时机问题，他们急于最后地篡夺党与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写作组的核心、骨干们对此都是清楚的。历史组组长对“长编组”的人员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张、姚）作这个批示时，是知道主席病重的，只有深刻领会编写这个专题的意义，才能提高编写的思想深度”，“毛主席逝世后，编写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更大”。

写作组炮制的《愈经磨炼意志愈坚》、《山崩地裂视若等闲》、《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地震论〉》在9月份同时出笼。前一篇刊登在《红旗》1976年第9期，是姚文元授意，朱永嘉指使郭朝绪、王知常执笔炮制的。它把党中央领导唐山抗震救灾的斗争污蔑为“唯生产力论”，继续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美化“四人帮”。后两篇刊登在《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9期，胡说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他们趁毛泽东主席病危和逝世、党与人民面临巨大困难的危急之秋，为“四人帮”篡夺最高领导权敲响密锣紧鼓。

上面，我们记述了写作组九个方面的主要罪恶活动。除此以外，它还积极配合了反军乱军的阴谋活动（借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恶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制《八路军的“样子”》《刁小三的逻辑》等毒草文章）；它大搞阴谋文艺攻击所谓“走资派”，吹捧“四人帮”（特别如主持摄制毒草电影《春苗》《欢腾的小凉河》、话剧《盛大的节日》等）；它积极参与教育战线所谓“两个估计”的鼓噪（如炮制《从“受压”说开去——读刘丽华的谈话纪要有感》等）；它借口办“函授教育”和“慰问”知青，插手江西、安徽等省，攻击那里的领导，并收集情报向国务院发难，等等。总之，“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部署与行动，写作组几乎事事积极参与，件件都有罪责，真不愧它以张、姚嫡系部队自命，这里不再赘述。

（六）写作组最后一段日子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审查。7日凌晨，中央通知马天水同周纯麟去京开会。徐景贤、王秀珍等与“四人帮”的联系中断，他们感觉情况异常。8日上午在与马天水秘书房佐庭通电话中得到“我的老胃病复发”的暗示，证实江青一伙出事，估计已被拘禁。“四人帮”的这些上海党羽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按照他们蓄谋已久的部署，策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写作组的头目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等人，同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马振龙、戴立

清等王洪文的小兄弟们，成为武装叛乱最疯狂的煽动者和执行者。朱、王为叛乱鼓噪尤为凶狠，孤注一掷，铤而走险，表现了为“四人帮”殉葬的决心。另一方面，朱、王等在写作组又积极部署所谓“应变”活动，订攻守同盟，销毁罪证，搞假“投降”，妄图蒙混过关。他们在这方面的鬼点子特别多，一会儿故作镇静，一会儿又装疯卖傻丑态百出。他们那些罪恶活动，将在本书最后一章《武装叛乱的策动和破产》中作具体的记述。

1976年10月中旬，上海千百万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热血沸腾，奋起与“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作斗争，迅速形成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10月下旬，中央派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来上海，接着成立新的中共上海市委，开展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与事的清查运动。写作组帮派体系成为清查工作的重点单位之一。1977年8月10日，市委派工作组进驻，人员集中学习，要求把清查运动搞深搞透，同时正式宣布撤销写作组建制。正如大部分提高了觉悟的原写作组人员反映：“写作组十年来干了大量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可谓‘恶贯满盈’，撤销理所当然。”然而，写作组秉承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的意旨，霸占上海宣传舆论阵地，在思想、理论、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流毒深远，影响极其恶劣，却不是短时期所能清除的。

三十五、扑不灭的抗争烈火

——上海人民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几则事例

“文革”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横行肆虐，人民群众备受煎熬。有压迫必然有反抗。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党和人民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以陈丕显、曹荻秋为核心的中共上海市委，除马天水、王少庸等个别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忠于党和人民，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站在与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正确方面的。陈丕显蔑视江青的威胁利诱，坚决拒绝江青、张春桥的阴谋拉拢，曹荻秋“文革”开始即同江青、张春桥等搞乱上海、趁乱夺权的阴谋活动作坚决斗争；他们两位虽然遭受了难以置信的长期的残酷迫害，但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同“四人帮”一伙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绝不屈服。他们这种斗争精神，无疑对全市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有重大的影响。许多干部和党员特别是许多部、局以上领导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先后恢复工作的，也都以各种不同形式和“四人帮”、马、徐、王等进行过斗争。凡此都给全市人民群众很大鼓舞和积极的影响。随着“四人帮”反革命面目的逐步暴露，上海人民同“四人

帮”及其党羽马、徐、王等的斗争的烈火也越烧越旺。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反革命高压政策，当年斗争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很少，或残缺不全，或被肆意歪曲，如今要较完整、详细反映当年斗争的真相很困难。现在所收集到的一些事例，仅仅是当年干部群众奋起同“四人帮”及其党羽进行斗争的一部分。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人民群众针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及其反革命罪行，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坚持真理，针锋相对的进行抵制和斗争的大无畏的精神和气概。尽管“四人帮”一伙残酷镇压，企图扑灭斗争的火焰，然而，越是压迫得厉害，蕴积起来的反抗的能量也越大，群众抗争的星火最终燃烧成熊熊烈火。

（一）人民群众不畏强暴怒斥江青、张春桥等

“文化大革命”初起，在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煽动下，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泛滥。党、政机关受冲击，干部靠边挨批，城乡武斗频繁，铁路交通常断，港口物资积压，工厂生产下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的忧虑和思索：“这是为什么？”不少人写大、小字报，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有的具名或以化名写信给有关领导机关，提出意见和看法。信中有的指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几乎90%的原领导干部都被审查批斗，差不多都曾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太扩大化了”，提出“这笔糊涂帐应

该分清楚”。有的公开赞颂刘少奇“对革命有贡献”，亲切地称陈丕显、曹荻秋为“同志”。有的尖锐指出“文化大革命窒息了传统文艺”，张春桥等人搞的是“愚民政策”等等。张春桥、徐景贤等人读到这些信件和“市革会”办公室根据这些来信编印的《情况反映》，掩饰不了内心的恐惧和仇恨，常常在批语中惊呼“当前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抬头”，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1967年5月，上海第五钢铁厂青年工人周千俭写出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提出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为什么有人却把广大党员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党员？”为什么有些人把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描绘成“漆黑一团”？为什么许多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被诬蔑为“大军阀”、“大土匪”、“大右派”，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7月，他又写出《历史不容颠倒！》大字报，观点鲜明地对前一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逐一作出了回答。他在大字报中写道：“有人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鼓吹‘全面夺权’，（说）文化大革命是罢官‘运动’，（要）砸烂‘长’字号，这是别有用心，是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他们把大庆的王铁人打成最大的‘政治扒手’；把北京清洁工人、劳动模范时传祥打成‘钢杆老保’；把大多数老干部游斗、戴高帽，是颠倒敌我关系。”他认为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的

口号，是“挑动各地武斗的总根子，使亲者痛、仇者快，严重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反动口号。周千俭在大字报里为保护老干部而呼号：“周总理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谁炮打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几十年来始终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愤怒责问“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难道只有极少数干部是好的？”

大字报还驳斥张春桥诬蔑“上海是修正主义的堡垒”，“老干部统统不行了”的谬论，认定张春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对历史的反动，对中国革命的反动”。这几份大字报在厂内贴出后，引起了轰动，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赞同。

同年7月25日，上海第五钢铁厂青年技术员钱西平（女）也贴出一张题为《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江青》的大字报，说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一文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欺骗群众”，责问：“她有什么资格在军委扩大会上点老师的名？”大字报还指出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口号！”

周千俭和钱西平的大字报旗帜鲜明地说出了对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深深刺痛了他们。他们凭仗手中把持的权力，疯狂地进行镇压。1967年8月，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以“配合二月逆流翻案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

革命”罪名，将周、钱两人拘捕入狱，残酷地刑讯毒打。面对张春桥一伙人的高压，这两位青年没有屈服，钱西平坚定地说：“我是准备死的，不过我相信，江青一定会被揪出来。”周千俭坚信“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表示“迎曙光，庆胜利，无所求”。最后，周被判徒刑12年。钱被毒打致残，还被判徒刑10年。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系19岁的乒乓球队队员段翔，看到林彪、江青、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肆意摧残党的宝贵财富；看到他们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败坏社会主义的家业，极其愤慨。他在小组会上或在公开场合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在我们国家里，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现在那么多干部被打倒，结论只有两个，要么我们国家是修正主义国家？要么就是搞错了！”“老干部革命了几十年，功劳很大，对革命有贡献，对党是忠诚的，……不能因为执行‘资反路线’就打倒，将几十年的功劳一笔勾销”。他针对张春桥讲的：“上海是黑文艺的据点”的谬论，反诘道：“作为旧市委文教书记的张春桥，会没有问题？”他提出：“江青等中央文革封左派的做法是玩弄权术。”这位19岁的青年，因此遭到严重的迫害与打击，被扣上“十恶不赦的新生反革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小爬虫”等帽子，变相隔离，大、小会批斗。但段翔坚持认为自己是说真话，始终不屈服。

1969年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后，得意非凡。当他的

发迹地——上海第十七厂棉纺厂建立党委时，王洪文想以“全票”当选为党委委员。选举开票结果，大出王洪文的意料，竟然有人敢不投他的票。王洪文暴跳如雷，狂妄地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说：“我王洪文能当中央委员，难道就不能当厂党委委员吗？”“现在有人反我，就是反党中央。”他下令杨浦公安分局派出公安人员，打开投票箱，查对笔迹，追查是谁不投他的票。这位不投王洪文票的人，就是“文革”前与王洪文同在保卫科工作的一名干部。“文革”初期，这名干部就对王洪文等一伙造反分子在工厂挑起武斗，抢档案材料，破坏生产，揪斗干部的行为表示不满，而今更觉得不能违背党性原则，选这样的人当厂党委的领导。他由此遭到王洪文等人的迫害，被隔离“审查”。当审讯人员讯问他“为什么不选王洪文？”时，他理直气壮地说：“不投王洪文的票是党员的权利”、“反对王洪文，不是反对党中央，不是反对毛主席。”

1969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徐景贤炮制的一篇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署名“丁学雷”）文章喋喋不休地谩骂刘少奇，还恶毒攻击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文章见报后，引起群众强烈的不满。上海市煤气公司管线所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写信给《文汇报》社要求刊登。桑伟川的文章反驳了丁学雷把陈毅、谭震林等在上海领导的“三反”、“五反”运

动中正确执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诬蔑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为资本家披红色外衣”，“向资本家屈膝投降”等谬论。报社将桑文和来信登载在内部简报《文汇情况》上。张春桥见到后，为了杀一儆百，压制人民群众说话。马上批道：“要抓住桑伟川这个活靶子不放，批深批透，批一个时期”。又说：“桑文可以考虑发表，报社要写编者按语”。徐景贤马上要《文汇报》社制订批判桑文的计划。经过一番策划，11月20日在《文汇报》上登载了桑伟川的文章和来信，文前加上了经张春桥、徐景贤精心修改的“编者按”。按语中称桑文是“新长出来的毒草”，要“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化毒草为肥料”。于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围剿”开始了。

桑文见报后的两个月内，仅《文汇报》上就登了18个版面、37篇的“批判”文章，还加了4则“编者按”和一篇报导，疯狂对桑文进行围攻。同时也加剧对桑伟川的政治迫害。从桑文发表至1970年3月23日张春桥下令将桑伟川“拘留审查”，桑在全市范围内被拉出批斗290余次，有时一天要被批斗六七次。批斗会上，对桑肆意谩骂，拳打脚踢，乱施体罚。桑稍有争辩，就被诬为“气焰嚣张，不老实”，稍有反抗，就被诬为“殴打革命群众”。残酷的迫害，把桑搞得病倒在床，而徐景贤手下的一伙人竟毫无人性地将桑从家里抬到会场继续批斗。无休止的批斗和迫害，没有使桑伟川屈服，他在批斗会上针锋相对地说：

“你们现在不要声势很大，纸老虎总是要拆穿的”。“你们这些人都是修正主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桑伟川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行为得到了上海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许多人写信给他表示声援。就连桑所在的煤气公司和管线所内“革委会”的一些成员，对批斗桑也思想不通，在讨论桑的问题会议上不表态，在批斗桑的会上不上台。一次，煤气公司“革委会”奉张春桥、徐景贤等的命令召开研究批斗桑的问题的会议，19个“革委会”委员只来了5个，其余的人不告而走。甚至一些搞桑专案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批斗桑是错误的，有的干脆写信要求不干。这些情况反映到张春桥一伙人那里，他们十分震惊，居然有这么多人公开反对他们，于是迫害进一步升级。张春桥、徐景贤等人不仅加强火力对桑批斗，上纲上线加重罪名，给桑戴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7年徒刑。还残酷地打击迫害煤气公司和管线所内同情、支持桑伟川的干部群众，株连迫害了40多人。

（二）党员干部在党的会议上同“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1年5月24日至6月2日，南汇县召开第三届县党代表大会。会上，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万辉（原县委书记）和祝桥、万祥等公社党委书记，反对把“夺走资派的权”问题写进“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去。他们认为，南汇县的领导干部中，

没有一个被定为“走资派”，他们现在都已“结合”重新工作了，工作报告中再提“走资派”，不符合南汇县的实际情况。他们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这一下可不得了了。该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以及一些靠“造反”上来的人，纷纷向王洪文和马、徐、王“告状”。王洪文恶狠狠地说，这是“右倾翻案”事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事件。6月2日他和马天水、王少庸、张宜爱等人赶到南汇，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党员干部进行打击迫害，逼迫万辉等人在大会上作检查。并威吓说：“这一问题不解决，（县）党代会不结束。”6月4日，他们又把全郊县的600余名县、镇以上党委书记集中到南汇，把南汇县“党代会”上发生的事作为全郊县“复辟”“倒退”的典型，要他们围绕“农口有没有走资派”的题目，进行“揭发”“批判”，胁迫到会的人都要承认自己是“走资派”，给自己戴一顶“走资派”的帽子。但是南汇县众多党员干部没有屈服。他们是长期坚持搞社会主义的，不是“走资派”，抵制了这方面的种种压力包括王洪文等粗暴的所谓“批判”和马天水等自称犯过“走资派”错误的所谓“诱导”。直到1976年3月中旬，南汇县委召开的社、镇、局党委正副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时，许多同志又尖锐地提出：不能把老干部打成“走资派”，“批邓”不能再批下去了。消息传到马、徐、王那里，使那伙人既恼怒又惊慌，决定对郊区要从南汇县“开刀”。

市水产局也出现了南汇县的类似情况。1971年7月初，水产局在准备召开局“党代会”时，工作报告的草稿中有“走资派”、“夺权”等字眼，该局主要负责人王德祥审稿时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说：“凡是‘解放’了的干部，不能再提‘走资派’。”在学习《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文章时，机关里的许多党员也在讨论中提出：“本单位没有‘走资派’，不应该（提）‘夺权’。”这些情况被作为“右倾翻案”的表现反映到市里，王洪文马上批示说：“（要）把这些论点逐条进行批判，决不允许为刘贼（诬蔑刘少奇）招魂，为陈、曹翻案。”致使该局许多党员干部在工、军宣队和造反派头头的控制下，被强行办了48天的“批修整风”学习班，期间多次举行“思想交锋”，鼓动一部分人搞所谓“揭批”，逼迫王德祥作检查。变相批斗的学习班结束后，王德祥被下放劳动，不少同志遭到打击迫害。

在市轻工业局皮革塑料工业公司（简称皮塑公司），也爆发过一场尖锐的斗争。王洪文的“五虎将”之一马振龙窃据了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的职位后，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拉帮结派，把他的汽车驾驶员杨镇国封为皮塑公司党委副书记。1971年7月中旬，皮塑公司举办了有190名党员干部参加的“批陈整风”学习班。杨镇国在班上大放厥词，说凡是执行“资反路线”的就是“走资派”。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纷纷反驳。有的问，造反派搞派性，挑动群众斗群

众，这也是搞“资反路线”，这些人算什么？有的说，你们讲上海的夺权是由于旧市委刮“经济主义妖风”引起的。但我们看，这股风正是造反派刮起来的。许多人责问杨镇国，上海的“一月革命”到底是对还是错？杨镇国招架不住，急忙向马振龙汇报，并上报“市革会”。王洪文得知情况，恼火地说：“这是新形势下的一股右倾翻案风，必须刹住。”马天水也气势汹汹地说：“他们哪天开会？我参加。”面对王洪文、马天水的压力，轻工业局党委书记王文锐（老干部）以缄默加以抵制。皮塑公司党委书记周俊杰在讨论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公司党委会上表示说：“经济主义妖风是造反派刮起来的嘛！”一些基层干部也纷纷在会上揭发、批判造反派对于部搞批斗、游行、戴高帽子等行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反映，揭露造反派“为私造反”、“有野心”等等。杨镇国听了坐立不安，大叫“停止讨论！”马振龙知道后，诬蔑周俊杰是皮塑公司刮“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8月11日，马天水带了黄涛、陈阿大、叶昌明、何宇生（市直机关党委副书记）赶到轻工业局“救火”，马天水一到就扣帽子说，轻工业局有人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右的倾向。马振龙跟着跳出来指责王文锐、周俊杰等同志说：你们是“一月革命”的反对派，“二月逆流”的顽固派，“文化大革命”的取消派。这些同志不卖他们的帐，举了大量事例进行争辩。马振龙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不承认犯“走资派”的错

误，这证明了我们夺权夺对了，现在你们要翻案，那我们再夺权，把你们第二次打倒。这些同志虽然不久后都受到打击，王文锐被调离轻工业局，周俊杰被停职检查，几十名基层干部遭到各种迫害，但他们的斗争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维护陈毅光辉形象，抗议张春桥等对陈毅的诬蔑

陈毅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转战大江南北，为中国革命立下赫赫战功。他又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在上海工作期间，为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作出巨大的贡献。上海人民对陈毅怀有深厚的感情，十分爱戴这位能文能武的元帅，亲昵称他为“陈老总”。“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特别是江青、张春桥之流视陈毅为眼中钉，他们知道陈毅在上海人民心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是他们篡夺上海、乃至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巨大障碍，于是把一盆盆“污水”泼到陈毅身上，胡说什么“陈毅是老右”，“只会下棋，不会打仗”“陈毅一贯反毛主席”，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上海人民对“四人帮”的这种卑鄙行径十分愤慨，为维护陈毅伟大形象，以各种形式与“四人帮”展开了斗争，这种斗争在陈毅逝世后达到了高潮。

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陈毅的一生，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这一切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上海的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时也无情地戳穿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诬蔑陈毅的污言秽语。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张春桥一伙诬陷陈毅的罪行早就强烈不满，当电台播出陈毅逝世的消息后，马上有人打电话给报社、电台，或直接到上级机关提出责问，抗议“四人帮”诬陷陈毅的行为。他们说，张春桥、王洪文等过去对陈毅极尽诬蔑之能事，这种情况“中央是否知道？”责问“这些人在搞什么鬼？”上海运动鞋厂一名工人一针见血指出：“外地没有（人）讲陈毅同志不好，只有上海那伙人讲他不好，这样看，上海有人在里面夹带私货”。上海第三服装厂一名党员干部打电话到公司问：“陈毅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为什么上海过去有意把陈毅说得那么坏？”原江南造船厂党委副书记姚哲、上海锅炉厂党委副书记王文奎、机电一局办公室副主任戚国经、轻工机械公司经理陈惠林等同志，听到陈毅逝世的电台广播后，说：“中央讲陈毅同志是优秀党员，过去张春桥讲陈毅不会打仗，是个草包，只会下棋。陈老总不会打仗，怎么能当新四军军长、野战军司令员呢？”他们公开抨击张春桥没有资格评论陈老总，说：“当司令员的下下棋有什么？诸葛亮还下棋呢！有的人（指张春桥）还没有打过仗呢？”他们指名抨击王洪文“过去讲陈毅是党内右的代表”，而这次中央悼词说陈毅是优秀党员，“右的代表怎能说是优秀党员？”表示他们对张春桥、王洪文污蔑陈毅

的义愤。群众的愤怒象烈火一样燃烧着，威胁着那些谎言制造者们，使他们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张春桥及其党羽们拼命压制群众对陈毅的悼念活动，说什么：“要注意动向”，“要警惕有人为陈毅翻案”。并威胁：“谁要是提到主席对陈毅的评价，就是翻案，严加追查。”同时对许多不满“四人帮”一伙对陈毅的造谣污蔑的同志，施以打击迫害。

上海闸北电厂化学车间的一些同志，在陈毅逝世后的一次学习讨论会上，对“四人帮”一伙污蔑攻击陈毅的一系列卑劣做法，气愤地提出责问，说：“你们讲有人要为陈毅同志涂脂抹粉。照这样说，不是毛主席、党中央在为陈毅同志涂脂抹粉吗？”由于这句话触犯了他们的禁令，马天水、徐景贤等责令电管局作为重大政治问题，立即追查，加害这些同志。

上海市财政局顾志新等几位同志，看到了报刊上登载的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亲自致悼词的消息后，回忆了陈毅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所做的功绩，同时也对“四人帮”过去对陈毅的诬蔑，姚文元没有参加追悼会，张春桥参加追悼会表情不庄重等情况，进行了议论。此事传到了黄金海那里。黄认为这是“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马上批示说财政局有一股“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暗流”，下令财政局党委立刻追查。由此搞出一个所谓“顾志新严重政治问题的典型”，使顾志新同志横遭无辜的陷害。

陈毅逝世后，在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劳动的一些当年长期追随陈毅进行革命活动的老同志聚在一起纷纷进行回忆悼念。冯文彬、龙跃等同志说：“过去听传达报告中说，陈老总不会打仗，从来没有指挥过一次象样的战斗，只会下围棋，这真是莫名其妙！48年前，陈老总指挥战斗时，他（指“四人帮”一伙）还不知道在那里。……说这话的人自己不会打仗。”“蠢人嘛，认为只有贬低别人，才能抬高自己。有些人就是和陈老总过不去，为什么只说坏话，给他脸上抹黑？”这些议论传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使他们暴跳如雷。王洪文马上下令对冯、龙等人要“痛加批判，肃清流毒”。并派金祖敏、冯国柱带队进驻“五七”干校，抓“整风重点”，打击迫害这些同志。冯国柱一到干校，就在干校全体人员大会上杀气腾腾地谩骂道：“陈毅死有人哭，哭什么！是哭自己。不要以为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陈毅就没有问题了。”并自欺欺人地说：“毛主席参加他的追悼会，是表示毛主席对亲者严、疏者宽，是对犯错误的干部宽大为怀。”嗣后，冯国柱、金祖敏等人以“整风”为由，对冯文彬、龙跃等同志进行“重点围剿”，大会批、小会斗，连续搞了一个多月。

上海人民在为陈毅伸张正义，向“四人帮”作斗争中，朱锦多是突出的一名战士。朱锦多是上海越剧团的武功教师。他生长在苏北黄桥，从小就敬仰陈毅。陈毅逝世后，他在单位里

公开唱“黄桥烧饼黄又黄”的歌曲，抒发对陈老总的缅怀和尊敬的心情。张春桥及其上海的余党散布“毛主席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只不过是落实对犯错误人的政策，不等于说陈毅没有问题”等流言蜚语，朱锦多对此十分反感，说“人死了，还揪住不放”。并指出：他们对陈毅的污蔑、攻击，决不是对陈毅一个人的，而且是对准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的。张春桥在陈毅逝世后的“表演”，是他阴谋野心的一次“大曝光”。联系到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用为，朱锦多感到有责任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从1973年7月到1975年8月，他先后6次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粟裕等中央领导同志（信上均署真名和工作单位）。揭露张春桥的问题。1973年7月28日，朱锦多写信给邓颖超转毛泽东，揭露张春桥攻击、诬蔑陈毅的罪恶目的，张春桥说什么陈毅“只会写歪诗”，“是个常败将军”等完全是胡说，尖锐地提出“张春桥今天可以整陈毅同志，他明天又将整谁呢？”他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都打倒。在1975年8月3日的一封信中又指出，张春桥“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共产党员。他是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基础，现在他要做的首先不是教育人家，而是解剖自己，把思想上的阴暗面公之于毛主席，公之于党”。朱说：“有些人惯于反面文章正面做，他们上欺老，下欺小，他们比林彪有‘远见’，他们正在积累力量，一旦‘大树倒了’，就要兴风作浪，对于这些危害革命的

‘革命者’，我们不能不引起注意。”在另一封信中，朱揭露张春桥吹捧江青是别有用心的，是“借助吕后”“欲霸天下”。朱锦多的一些信，落到“四人帮”的手中，使他们胆颤心惊。未隔几天，迫害的狂风就向朱锦多扑来。1975年9月9日朱被拘留审查。朱关押在狱中，仍继续宣传自己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公安干警的同情，他们认为朱的信中“无恶毒攻击言论，算不上敌我矛盾。”并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了朱许多照顾。这种情况在当时是罕见的。上海越剧团的许多同志，纷纷要剧团组织出面“保释”朱，说：“朱一不反毛主席，二不反周总理，构不成反革命罪行。”朱锦多被关押期间，家属在农村生活困难，剧团还给予补助。由此可见人心所向，反映出上海人民对“四人帮”的憎恨。事实总是事实，不管“四人帮”一伙怎样下禁令，也不管他们怎样戴帽子、打棍子，都是徒劳的，因为人民对陈毅的热爱和怀念是建立在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丰功伟绩的事实基础上的，陈毅在上海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是任何人无法抹煞的！

（四）在沉痛哀悼周恩来的日子里

在沉痛哀悼周恩来的日子里，上海全市进一步掀起了反抗“四人帮”的斗争怒潮。下面，我们记述的是当时全市人民在开展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中反抗“四人帮”的几则事例。

（1）冲破“四人帮”的禁令。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15分周恩来逝世。马天水请示王洪文后，以“市革会”名义向各单位下达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四个不准”的禁令，即：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制花圈，不准开追悼会。为了干扰和破坏悼念活动，马、徐、王在当晚召开各组、办负责人会议，强调继续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别有用心地提出什么“悼念总理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批邓大方向”等。

1月9日，上海人民沉浸在一片哀悼之中。娱乐场所门可罗雀，商店里冷冷清清，南京路上人车稀少，车辆缓行，喇叭声咽。寒风在呼啸，人民在哭泣。大街、小巷、工厂、学校，贴出了横幅和挽联：“惊闻噩耗！”“巨星殒落！”“沉痛哀悼敬爱的周总理！”“深切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八亿人民戴黑纱，誓把遗愿化宏图！”……。商业部门不顾压力，打开仓库免收布券供应黑纱。印刷厂工人义务加班赶印周恩来的遗像。纸张商店不限量供应悼念用的纸张。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以及街道里弄，到处设置了悼念周恩来的灵堂。甚至在“四人帮”上海羽党严密控制的单位也不例外。如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在工人的一致要求下，厂党委不得不同意工人戴黑纱、制花圈、设灵堂。市委、“市革会”的机关干部也纷纷组织了各种悼念活动。面对广大群众的自觉悼念行动，马天水等非常惊慌，马上再次打电话给王洪文请示如何办？王洪文也无计可施，回答说：“不要再

问了”。由王秀珍再请示，王洪文的答复是：“以批邓的实际行动悼念周总理。”其实，马、徐、王等早已这样做了。他们又是组织交流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又是组织看“阴谋电影”《决裂》。但所有这一套，都淹没在人民群众自发的、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的汪洋大海之中。急得王秀珍跑到市总工会对一帮小兄弟们说：“什么人都在哭，好人哭，坏人也哭，我们哭，资本家也哭，对哭也要作阶级分析。我们不能光哭，要化悲痛为力量，就是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她又跑到市直机关党委，听到海运局大楼内在放哀乐，恶狠狠地说：“如果他们再放，我叫民兵镇压。”但马天水感到“众怒难犯”，不得不在1月14日通知各单位“15日中央召开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海也要搞悼念活动”。然而他们又规定不能用党委会或“革委会”的名义送花圈、写挽联，妄图淡化悼念气氛；同时又规定在悼念活动结束后，不准把花圈送到上海市委机关来，等等。后来，这些禁令都被群众一一冲破，人民群众跟本不理他们那一套。

(2) 黄浦江畔汽笛长鸣。

1976年1月15日上午9时15分，正是周恩来在7天前逝世的时刻。上海黄浦江上数百艘船只同时汽笛大鸣，时间长达37分钟之久。悲壮的汽笛声，刺破了上海阴霾、寒冷的长空，激励着人民斗争的意志，也震惊了敌人。马天水亲笔下令：一、防止敌人破坏；二、要追查拉汽笛的第一条船。市委办公室、市

外事办公室、江交组、港务局纷纷派人追查谁是第一个拉汽笛的？怎样布置的？谁指挥的？并由港务监督通知所有船只不准再拉汽笛。追查的人下去后，受到的是群众的冷讽热嘲和指责，什么名堂也没有查出来。

在黄浦江畔汽笛长鸣时，上海港务监督涉外组、政工组的有关人员打电话向中央港务监督报告此事。对方接话后，要上海把电话筒放置在窗口处，当他们听到汽笛声后连声说：“好，我们听到了！上海很好！”表示对这一行动的热情支持。上午10时，交通部副部长于眉打电话给上海港务局和港务监督党委，讲了当天下午3时召开周恩来追悼大会时中外船舶注意的有关事项：一、由港务监督通知在港国轮下半旗致哀，不鸣笛；二、上述关于国轮的规定，由港监于中午12时通知外轮，如有外轮仍坚持提出要鸣笛致哀，表示感谢；三、我港于事先在码头、锚地指定个别国轮作好准备，届时如外轮鸣笛致哀，可分别就地鸣笛答礼。对这个“鸣笛答礼”的规定，马天水看后不得不执行，但他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天下午3时整，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黄浦江上的中、外船舶再次鸣响了汽笛，汽笛鸣得更响，鸣的时间更长。这笛声，事前没有布置，也未有串连，却在同一时刻，不约而同的拉响，人们的感情如此相通行动如此自觉，在“四人帮”及其余党施行高压追查下，人们不为淫威所屈服，充分表达了全

市人民对周恩来逝世的深切哀悼，也吐出了上海人民对“四人帮”的万分憎恨。

(3) 千万人走上街头。

1976年1月15日下午1时左右，在上海繁华的南京东路上，一支10余人的队伍，每人臂上戴着黑纱，胸前佩着黄花，人们捧着一只不大的花圈（花圈上署名是上海静安区陶瓷杂品公司）和一幅周恩来的遗像，举着悼念周恩来的横幅，由西向东缓慢地行进。队伍中的人低着头，眼中含着泪花。路上行人见到这支队伍，自觉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怀着敬意向他们行注目礼。有些人看着看着，泪水不禁从脸颊上向下流淌。

在外滩“市革会”大楼左侧对面的停车道上，整齐地排列着数10辆客车和卡车。车上放着花圈，但人很少。而在黄浦江边的堤岸上，却伫立着不少人，他们好象在向江面上眺望。江上行船很少。马路阶沿上也坐着许多人。“市革会”大门紧闭着，门前有两三个佩戴黑纱、持枪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市革会”左侧的边门半扇开、半扇闭，寂无人声。海关大楼上的大钟，指针在一秒、一秒地移动。不久，从南京东路转过来一支10余人的队伍，他们走到海关大楼前停了下来，在凛烈的寒风中巍然不动。当！当！当！海关大楼大钟敲响了。这3下钟声如同发出了号令，黄浦江上汽笛声大作，沿江各大楼的窗口突然大开，高音喇叭伸向窗外，同时放出了哀乐。汽笛声、哀乐声响彻长

空。大楼里的人如潮水般地涌了出来。刹时间，大街上就汇集起浩浩荡荡的庄严肃穆的哀悼队伍。这队伍以数十人为纵列，从海关大楼门前一直排列到南京东路转弯到江西中路，不断扩大，再向南北方向延伸，真是人山人海，队伍中的花圈成千上万，无法计数。这些花圈上的署名，大都是以基层群众的名义出现的，如某某单位的党小组，或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复员军人，全体工作人员等等。突然，在九江路市财政局对面的一家仪表厂，有数百名职工走出厂门，高举着该厂中共总支委员会和“革委会”的横幅，加入了哀悼的行列。在南京东路外滩路口，有一支由数百名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前有装着高音喇叭的手推车开道，后是若干名女干部手捧着五星红旗和中国共产党党旗，紧跟着的是大花圈和周恩来的遗像，花圈上署名中共华东电业管理局机关总支委员会。接着，无数打着单位名称的队伍，走进了哀悼的行列。交通民警早已显示红灯让来往车辆停下来，自己站在岗位上和全市人民一齐哀悼敬爱的周恩来。整个外滩，除了哀乐声、汽笛声、啜泣声外，肃静无声。此时此刻，无声胜有声。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真实写照。

在群众怒潮的巨大威慑力量下，马天水不得不允许群众将花圈送入“市革会”大厅。可是，大厅的正门不开，只开东边狭小的边门，大花圈无法进入，只能拆下，由数十人合力捧进

大厅。大厅内既未设灵堂，又不放哀乐。这一切，群众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但人们还是秩序井然地走了进去。人流绵绵不断，大厅外面的哀乐一直放到深夜。

这时的马天水深知众怒难犯，不得不假惺惺地声明说，他准备将全市人民的意愿，写成唁电发给中央。但又说，“中央是否发表，何时发表，采取什么形式，我们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在他用谎言欺骗群众的同时，又凶相毕露地命令把印制出来的诬蔑邓小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白头材料”，加紧散发，大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

(4)《文汇报》事件。

1976年的3月，上海发生了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文汇报》事件”，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一伙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3月5日凌晨，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事迹的新闻报道和通讯。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稿件时，删去了文中周恩来在1963年3月5日为学习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3月25日，《文汇报》社党委副书记沈国祥将17日仪表局党委一个副书记在“批邓”会上的发言稿中的“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句话，加上“党内”和“至今”4个字，改成“党内那

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刊登在《文汇报》第一版的突出位置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两起报导引起了全国和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3月13日起，群众纷纷来电、来信抗议《文汇报》反对周恩来的罪行。提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南京、杭州等地群众把这两天的《文汇报》张贴在街头，刷出大幅标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不能抹杀！”“《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罪责难逃！”“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在开往上海的火车车厢上，用柏油刷上：“《文汇报》‘三·五’、‘三·二五’的文章居心何在？！”“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审查《文汇报》的政治立场！”“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等等。马、徐、王得此消息慌了手脚，急忙派出大量民兵去洗刷火车厢上的标语，但哪里能完全刷洗干净呢？短短几天里，仅《文汇报》社就收到群众的抗议信达420余封，来电上千次。仪表局也收到许多责问的来信、来电。《文汇报》社和仪表局门前人流如潮，抗议声、斥责声不断。仪表局和《文汇报》社那些头头乱作一团，互相埋怨，推卸责任。马、徐、王心惊胆战，慌忙向北京的“四人帮”告急。“四人帮”得报，强词夺理要保护《文汇报》社过关。王洪文胡说什么：“删掉总理题词是屁个小事。”张春桥说：“全国删掉题词的不只《文汇报》一家，你们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姚文元狡辩说：“哪有编辑不删稿子

的？”马、徐、王于是紧紧跟上。4月1日上午，徐景贤在“市革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有人以《文汇报》3月5日、3月25日的报道大做文章，矛头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重事件。”对群众进行威吓。同日下午，徐景贤、朱永嘉、王成龙等窜到《文汇报》社，徐在报社党委的扩大会议上，公然代表市委对《文汇报》社表示“慰问”和“致敬”。《文汇报》社那些头头原来吓得准备发“更正”启事，这下子腰杆子又硬了起来。他们把从南京寄来的40多封抗议信交给马、徐、王转送给“四人帮”在南京的亲信，使不少群众受到打击迫害，仅南京大学为此事被非法审查的就达340余人。杭州因此事被审查、拘留的有25人。

(5) 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周恩来的逝世，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为党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人民对“四人帮”的反抗和斗争更为激烈。

1976年1月16日，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教师章群在写给他人的信中说：“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心情十分沉痛。60年鞠躬尽瘁，死后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怎能不享受崇高的威望和尊敬！”，“然而尤使人难过的是黄浦江上刮起了一股不小的风，恐怕是围绕‘权’吧！学校的大字报和广播几乎把绝大多数的副总理、副委员长都列入右倾翻案，调子已上到资产阶级

司令部，当年文化大革命躲在红卫兵背后当小特务的朱××（指朱永嘉）、徐××（指徐景贤）一下成了先锋。就在举国哀悼之时，（还）一再开座谈会，说要想得宽些、深些，要壮胆，上揪政治背景，下扫社会基础等等，无怪乎他们对周总理逝世是那么冷静和沉默，这些人上台，我们便没有好日子了。”这信落到了徐景贤的手中，徐马上指令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亲信动手，把章群作为“有攻击性言论的分子”，进行长达9个月的审查，企图把章打成现行反革命。

2月12日，上海铁路局共青团员傅文礼贴出小字报，说这次搞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给我们提供一种把光辉词言与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并套用“四人帮”一伙的话：“现在要想得深一些，看得远一些了”，“林彪第二不是还在活动吗”，直指江青、张春桥一伙人。黄涛得知后，下令“立即追查”，傅为此遭受严重迫害。

同日，徐汇区茶陵中学教师陈胜美在张春桥所写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一书封面上写到：我要“炮打张春桥”，说：“我观察了好长时间，这个人有问题，同林彪一样”，是个“罪魁祸首”，在书上作了许多眉批。王少庸知道后，说陈是“政治疯子”，把陈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上海化工机械厂陆国梁，看了上海马、徐、王等人散发的诬蔑邓小平的“白头材料”后认为，“邓副主席的讲话是完全符

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他写了一万余字的《坚持革命原则，反对诬陷邓副主席》的《对照论文》，公开批驳了“白头材料”中诬蔑邓小平的谬论。马天水看后下令作为“防扩散”材料，并将陆拘留关押。

2月17日，市人民银行营业部会计科丁金国，写信给毛泽东，揭露“四人帮”一伙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攻击中央和地方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阴谋篡权活动。他信中说：“警惕有人架空毛主席，警惕有象野心家、阴谋家赫鲁晓夫那样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信落到马、徐、王手中，他们凶相毕露，说这封信是把矛头指向“上海到中央去的领导同志”。丁同样受到了批判迫害。

2月至4月，普陀区公安分局干部刘忠良多次写信投寄党中央和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搞诬邓的两个“窗口”）以及新华社上海分社。信中指出张春桥一伙现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抢班夺权”，“当前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斗争目标是夺总理和军委的权；斗争的手法是搞阴谋诡计；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纲领是所谓回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要求，把一批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政治家、革命家搞下去。”信中最后说：“修正主义分子、黑秀才张春桥是个野心家、阴谋家，是林彪式人物。”信中的剖析，真是一针见血。刘因此而遭到“四人帮”

在市公安局的亲信薛干青、姚纪英的残酷迫害。

从3月下旬开始，全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悼念周恩来和革命先烈、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最后发展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四月五日那天，数十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以各种形式表达怀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愤恨“四人帮”的强烈情绪。“四人帮”预感到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连连向上海的马、徐、王下达血腥镇压群众的命令。斗争越来越尖锐了。

4月1日，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的一些职工反对上海市委对《文汇报》事件所作的狡辩，冯国柱立即赶往追查镇压。4月2日，上海铁路局“七·二一”大学一些学生贴出“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周总理”的大幅标语。4月3日，上海染料化工三厂拉出了悼念周总理的横幅。马、徐、王立即下令复盖，并进行追查。

4月8日凌晨，在市中心人民广场的中心旗杆上，高高悬起了一面由3尺白色绢纺制成的悼旗。悼旗中贴有周恩来的遗像，下垂长长的黄色绉纸，旗上写着“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9个大字。旗杆下，一位青年捧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周恩来所致的悼词，大声朗读。这位青年，就是徐汇区服务公司建新机修厂工人黄水生。这一情景，吓坏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们，他们如临大敌，采取紧急行动。市公安局头头薛干青、徐成虎赶到现场，指挥民警将黄水生的外衣脱下，用衣服蒙住黄的头，

把黄拉进吉普车，押送黄浦公安分局。接着，调来消防车，架起云梯，扯下了悼旗。马天水一天3次电话，要公安局“严加审讯”，要追出谁是黄的“后台”。黄水生在受审中，义正词严地说：“悼念周总理犯了什么罪？”“你们执行了资产阶级专政！”拒不回答问题，由此遭到残酷的迫害，23人对他轮番大战，拳打脚踢，弯腰折背，黄以绝食表示抗议。马天水又下令：“不吃饭，可打葡萄糖。”黄水生在惨无人道地被强灌葡萄糖液时鼻腔竟被这伙人插破。

4月14日、15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干部林惠芬到上海丝绸分公司联系工作和看望挚友时，讲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揭露了“四人帮”的造谣、污蔑，许多人听了后都予以支持。黄金海批评该公司：“竟然大家都听了几个小时，而且人越来越多，说明了什么？要该公司“肃清流毒”。马天水将情况亲自写信报告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在马的信上批：“此人应审查，建议报告有关单位。”对这名干部进行了迫害。

声讨“四人帮”的怒火，熊熊燃烧。“四人帮”一伙惶惶不可终日。尽管他们赤膊上阵，疯狂反扑，但烈火越烧越旺。面对人民群众怒潮般的抵制和斗争，张春桥私下对他的女儿哀叹说：“毛主席百年之后，那就跟他们斗吧！斗得过就斗，斗不过就千刀万剐。”这是张春桥等人在垂死之前的哀鸣。

三十六、武装叛乱的策动和破产

1976年1月到9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帮”认为篡党窃国时机已到，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露骨。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认为必需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1976年10月6日，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日常联系突然中断，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不惜孤注一掷，决定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制订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下令集中民兵，枪支弹药配套，上下串联，四处吹“风”，进行反革命煽动，作垂死挣扎。一时间，腥风血雨，黑云压城。上海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上海人民奋起声讨“四人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伙策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被千百万群众欢庆胜利的示威浪潮所淹没，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一) 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与其上海的党羽加紧策

划作乱

1976年毛泽东病情加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他们制造舆论，宣扬“暴力解决问题”。姚文元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斗争还是暴力解决问题”，叫嚣要用民兵武装“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6月27日，中央发出毛泽东病重的通知。王洪文以电话一再催促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赶紧给民兵发放武器，还在一件有关上海发放民兵武器的文件上批了“立即发”三个字，王洪文交代马天水说：“不要等批文，明天就发。”8、9两月，马天水等突击发给民兵武器计有枪74220支，60迫击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8月间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来上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延安饭店同他密谈。丁盛告诉他们：有人传出消息，“毛主席病重，等逝世以后要打内战”。“我在南京是‘空头司令’，驻在无锡、苏州一带的6453部队，军长、政委都不听我的，我指挥不动，对上海威胁很大，你们要有所准备。”丁盛表示他“决心干到底”，“准备杀头”。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表示“准备杀头”。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张春桥等多次要上海的伙伴们在思想上以至行动上作好准备，要“经受考验。”9月9日上午，王秀珍布置市民兵指挥部全部领导成员留在机关，要各区、县民兵指挥部领导加强值班。10日凌晨3时至晚上11时，市民兵指挥

部又向下增发了各种子弹 600 万发，炮弹 15000 发。接着王秀珍窜到上海第三十一、三十棉纺织厂等单位去叫嚷：“中央路线斗争很激烈”，我们一定“要同走资派斗下去”，“杀头坐牢都不怕”，“民兵不要丢掉武器，枪支弹药要保存好，当心被坏人拿去”。马、徐、王一伙人活动频繁。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写信给张春桥说：“不管今后有多大风浪，我们将跟随你们战斗到底。”1976年9月18日晚，张春桥对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谈话，说：“从参加天安门广场 100 万人的追悼大会，我想，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好的领袖。追悼大会这天，我甚至想，苏修就是一颗原子弹把北京炸平了，各地还会出领袖。”张春桥这些似乎隐晦的话实际上在露骨地表示“四人帮”将要上台当“领袖”了。张春桥叫肖木带口信给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要他振奋起来，做好工作”。9月23日，肖木在北京写信给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等 6 人，把张春桥谈话的内容告诉给他们。信的结尾是：“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小人苦哉。”

1976年9月21日晚，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参加卫生部会议的徐景贤，听取了上海突击发枪、准备打仗和丁盛到上海密谈的情况，问了 60 军领导人的情况，还查问了上海警备区的情况，他对徐景贤说：“你们要谨慎小心”，“人家已经叫我们是‘上海帮’了”，“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还说他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9月23日，王洪文电话通知王

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没有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抬出邓小平的。”叫嚷：要准备“上山打游击”，“上海没有退路，两边一夹击，只能死守”等等。9月下旬，张春桥给写作组核心一封密信，信首注明“阅后即焚毁”。信中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恩逝世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还说：“现在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人物”，“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于党内资产阶级”，“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对上海的党羽们进行反革命煽动。9月28日，肖木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冯国柱、王少庸等人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肖木还传达了张透露的“中央最近不会开会”等情况。

张春桥的这些话的含义是什么？根据 1980 年 7 月 24 日审问张春桥时徐景贤的证词交代：“张春桥派肖木来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 9 月 21 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

的指令。”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所谓战斗部署”，“提醒我们要注意行动的时间和行动的方式，不要轻易暴露自己。”“在这里，张春桥暴露了‘四人帮’想要夺权挂帅的野心，但又觉得别人还有力量所以估计还会有曲折。他要我们经常分析形势，鼓励我们提高警惕，提高信心，就是要抓住适当的时机，把反对‘四人帮’的力量当作资产阶级打下去。”

到了九月底、十月初，上海社会上风风雨雨传说中央将有“特大喜讯”，准备“红白喜事一起办”。这些“传闻”主要是通过王洪文小兄弟控制下的工会头头和“写作组”一些人放出来的。为了准备“热烈庆祝”，一些商店的鞭炮、红纸曾被抢购一空。“四人帮”要篡夺最高领导权、“挂帅”当领袖，已经“箭在弦上”。这就是张春桥对党羽们所说“上海有大考验”的背景，他“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徐景贤交待中语）

（二）热锅上的蚂蚁

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第二天，马天水被召赴京开会，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与“四人帮”联系中断，四处刺探中央情况未成，他们预感大事不妙，象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

10月7日凌晨3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去北京开会。马天水接到通知，感到很突然，就问：“开什么会？”回答说：“你来了就知道开什么

会。”过去开会只通知马天水一人，这次还直接通知了周纯麟司令员一起去；按惯例去中央开会预先会得到张春桥等的通知，而这次没有；又联想到肖木传达张春桥讲过最近中央不会开会。因此，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感到情况“异常”。马天水当即与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通电话联系。但电话打不通，联系不上。王秀珍又打电话找王洪文的秘书，电话也打不通。

马天水上飞机前，王秀珍托马的秘书房佐庭“向三位领导问好”。徐景贤要房佐庭抵京后按惯例报一次平安电话来，点一下会议是哪方面的问题，郑重交代要完成这个任务。飞机到南京降落后，马天水借口周司令有病，要房佐庭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提出把周调下来，换徐景贤出席。中央不同意调换。

马等到北京后，房佐庭没有挂平安电话回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左等右等等不到电话，越等待越焦急，这一急真是非同一般。于是，他们通过多方面渠道，妄图刺探中央情况。

晚上9时左右，王秀珍打电话到北京中央公安部祝家耀处问情况，祝说不了解情况。9时30分，王秀珍通过金祖敏在上海办事的秘书缪文金，打电话通过京西宾馆的熟人找到了房佐庭。王问：“会议开始了吗？”房说：“还没有消息。”王问：“来了那些单位？”房答：“会议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和三个军区。”王问：“那三个军区？”房答：“有南京军区、济南军区、

武汉军区。”王问：“马老身体好吗？”房答：“有点感冒，正在洗澡。”晚上11时左右，徐景贤给文化部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说：“我原定8日带文化代表团出国，忽然接到华总理指示不出国了。”徐景贤听了这消息惊住了，他凭反革命敏感，认为出了什么大事了，因为毛泽东逝世时有些代表团还照常出国的。半夜，徐景贤又给卫生部刘湘屏打了电话，她正在找上海去的同志讨论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她说没有什么事，不过人民日报鲁瑛昨晚也打电话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10月7日夜，马天水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10月8日凌晨2时左右，回到京西宾馆住处。马天水对房佐庭说：“你找不到人（按指“四人帮”），人已被人家隔离了。”这时，马天水神情紧张，双眼发红，气急败坏。房佐庭说：“你慢慢地讲，你在会上情绪怎么样？”马天水说：“我在会场上和他们热烈握手，热情招呼，和平时一样。”房佐庭问：“人为什么隔离？有什么精神？”马天水说：“材料不足，江青的材料，生活上的多，王、张、姚没有什么材料。”房佐庭又问：“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怎么一下子四个人一锅端了？”马天水气势汹汹地说：“这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房佐庭说：“你轻一点，防止窃听。这样一锅端的处理在历史上是少有的。”马天水说：“我看是先搞起来再搞材料吧！”房佐庭问：“为什么不采取辩论的方法呢？”马天水说：“他们辩论怎么辩得过呢？”房佐庭又问：“那么怎么

办呢？”马天水说：“我可能回不去”，“搞一个假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有人也要大干或小干的。”“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看来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房佐庭说：“你回不去，怎么办？”马天水说：“如你能回去，要转告徐景贤、王秀珍不要乱来，乱来要受镇压的，要搞‘合法斗争’。”歇了一会，马天水继续说：“我要求调动工作，到西藏去，到新疆去”，“你如果能回去，（对）我的家属要照顾一下”，并提了对家属安排的要求。马天水象热锅上的蚂蚁在盘算如何对付中央，他对房佐庭说：“很难表态。表态难，不表态也难，表示拥护吧，回家怎么说，不拥护吧，恐怕回不去。”马天水问房佐庭：“怎么表态好？”房佐庭反问马天水：“‘四人帮’是什么性质的？什么性质就表什么态嘛！”马天水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些人在一定范围里批判检查一下，帮一帮是需要的。”房佐庭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这样讲拥护不拥护的问题回避了，但与中央精神不一致，要考虑一下。”马天水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说：“中央对他们隔离审查一下，将来要分配工作的”。后来，马天水写了个治病救人的表态“提纲”。这个“表态”当即受到周纯麟的批评，说他的“讲法不妥”。马拒绝接受，说：“我的调子不能再高了。”……

这时在上海，10月8日一早，王秀珍去张春桥老婆李文静家，送张的儿子乘9点的火车上北京。李文静说打了一夜电话

给张的秘书，打不通。王秀珍着急了，上午在康平路市委机关小礼堂找徐景贤、冯国柱、张敬标商量。旋即又将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和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肖木找来。何秀文说：“从5日开始就没有收到张春桥的批阅文件。”徐景贤、王秀珍要他们分头给姚文元秘书，姚的老婆金英，王洪文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服务员打电话，廖祖康甚至给8341部队二科打电话，都打不通。徐景贤给迟群、徐海涛打电话，也都打不通。徐景贤和肖木分别给《人民日报》社鲁瑛打电话，鲁语调反常，旁若有人。又打电话到辽宁、浙江、福建等省，都了解不到情况。他们越发惊慌，坐立不安。最后，张敬标给马天水秘书房佐庭的电话打通了，张大声地问：“你们好吗？我们不放心，我们怎么联系？”房在电话中语音诡秘，连呼“老胃病复发，你们以后少来电话。”廖祖康抢过电话讲：“见到我们的人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人没有？”房一直只是说“没有没有”，“会议有纪律，不好打电话。”徐景贤想了一个点子，借口马天水是主持上海工作的书记，有极其重要的事要请示马，一定要马接电话，房去请示后答复：“马老不能听电话。”徐问：“马老究竟在不在？”房答：“马老身体不大好。”徐景贤再问：“你那里情况究竟怎么样？”房强烈地暗示：“我的老胃病重犯了。”徐景贤也暗示说：“你胃病，我们这里很多人头痛你知道吗？”后来，张敬标的秘书去找房佐庭的家属核实房过去有无胃病，回答说：“房根本没

有胃病”。

正在此时，市委收到市警备区作战处的电话记录，内容：“军委首长指示，部队战备工作转入正常后，发现有的单位有些松懈，请检查一下，战备工作不能放松，仍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边防、沿海，防止内潜外逃……。”当时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何秀文、肖木、廖祖康、朱永嘉、张家龙等人。大家读后议论纷纷，一级战备刚撤销，为什么又要加强战备？而且要防止“内潜外逃”！联系到“老胃病复发”暗语，引起了极大惊慌。王少庸说：“内潜外逃不是追捕一般逃犯的用语。”这时，又有人来汇报说：“中央开会只是部分省、市去的”，“祝家耀、周宏宝没有参加会议”，“金祖敏又找不到”。徐景贤首先叫嚷：“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了”，“可能发生军事政变了”。又说：“马天水不能接电话，房佐庭说话反常，初步判定江、张、姚、王被扣起来或软禁了。”王秀珍说：“可能右派上台。”朱永嘉叫嚷说：“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马上准备对着干。”

（三）垂死挣扎，策动叛乱

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虽然尚未得到“四人帮”垮台的确切消息，继续从各方面刺探情报，但已经开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了。

8日上午，张敬标通知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的秘书岳道培

到办公室，企图从警备区那里了解中央开会的动向，请岳打电话去北京问开会的情况到底怎样？中午12时左右，岳道培到张敬标家中说，已接通周司令医生的电话，说周司令身体还好，没有发心脏病，其他情况医生不了解等。张即向岳说：“你那里以后如有情况，随时告诉这里。”12时1刻左右，王秀珍决定派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随宋庆龄副委员长的专机到北京去刺探情况。缪文金被叫到市委小礼堂会议室，里面空气非常紧张，在座的有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廖祖康等人。他们正在纷纷议论。王秀珍说：“说不定马老他们一到北京就被人家扣起来了。”接着王秀珍向缪文金交代任务说：“你到北京后先去公安部找祝家耀，公安部总归能知道一点情况，打听到消息以后马上打电话回来，如果电话打不出来的话，想办法打电报，如果情况一般说肚子痛；情况严重就说胃痛；最严重的情况你就说‘病情严重，心肌梗塞’，我们就知道了。你打来电话可找市委警卫处政委康宁一，打电报写警卫处的门牌号码，写康宁一收。”

缪文金走后，在下午2时许，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找警备区张宜爱、李彬山等在康平路小礼堂开紧急会议。徐景贤问他们军委的电话记录知道吗？两人说知道，徐景贤说：“里面有一句防止内潜外逃很值得注意。”“我们要有所准备。”接着王秀珍问：“部队有什么情况吗？”回答：“没有。”又问“政

委李宝奇有什么动静？”回答：“没有。”又问：“周司令给家里打过电话吗？”回答：“不知道。”王少庸问张宜爱到时候能调动多少部队。一个团？一个营？张宜爱只是摇头，表示很为难。王秀珍那时就说：“我们还要找市民兵指挥部和市公安局谈话，你们先走吧。”

下午3时，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召集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市公安局负责人薛干青、徐成虎在市委小礼堂开会，徐景贤介绍了情况，说：“现在看来出事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右派政变了。马天水去后也被软禁了。否则不会有这种不正常情况出现的。”徐景贤说完就匆匆离开，由王秀珍给他们看南京军区传达军委首长指示加强战备的电话记录。王对他们说：“叫马天水去北京开会事出突然，与张、姚、王又联系不上。房佐庭来电话说‘老胃病复发’，于会泳原定今天出国也不出去了。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大事了，可能出修正主义了，我们要加强‘战备’”。施尚英问怎么传达布置“战备”工作，要求有个统一的口径。王秀珍说：“照电话通知去传达。”一面读，他们一面记。在读到防止内潜外逃时，王少庸插话说：“这两句拿掉，换上‘空飘、海漂’两句。”王秀珍说：“再加上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接着王少庸详细问了施尚英关于民兵值班、弹药装备等情况。施尚英回答说，战备值班2500人，分散各厂待命。还有生产值班民兵35000人，

就是在厂跟班生产，晚上回家睡觉，有事通知集中。弹药装备半个基数，共400万发。王少庸又进一步问：“仓库在那里？”施答：“在警备区”。王又问：“打起仗来能拿得出吗？”施说，“靠不住”。“但生产弹药的两个工厂的仓库里还有800万发。”建制情况，施尚英答不出。说半个基数的子弹，也还没有发到值班民兵手里，是由各单位另外保管的。王秀珍问薛干青：“你们那一级战备怎么搞？”薛干青说：“准备一些机动力量，现在一级战备刚撤销。”王秀珍说：“要抓紧准备”，“机动中队可以组织起来。”施尚英问：“民兵听谁的指挥？”王少庸说：“马天水不在，听徐景贤、王秀珍的。”王秀珍说：“有事找我联系。”又交待：“你们还要准备找不到我们”，“要准备独立作战”。

下午4时，召集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徐景贤介绍情况说：“马天水去北京开会了，是凌晨3时接到的通知。去后，失去联系，情况反常。”“马天水的秘书、鲁瑛等接电话时，旁边肯定有人在监视。”“马天水的秘书根本没有胃病，他说老胃病发了。”“估计是出了问题，说不定枪杆子出了问题，发生了‘军事政变’，看来枪杆子很重要，掌握在人家手里就难办了。”接着讲了苏修侵占捷克时，捷克的一位电台台长表现“不差”，“只听管他的一位中央委员的指挥，他拒绝广播苏修的文告，而是发表了抗议书，坚持了一天，起了很大作用。”诱导这些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听他的指挥。接着，徐景贤问电台负责

人：“你这个台长怎么样？怕不怕？”徐景贤以传达军委电话记录通知为名，还检查了报社、电台的警卫问题。徐景贤说：“电台有警卫部队警卫。两报由自己的民兵警卫，如不够，可与民兵指挥部联系加强。”接着下令：“新华社发什么重要消息，要及时报告。”“我们还是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有新情况再与你们联系。”

徐景贤、王秀珍在对民兵、公安及新闻单位“文”“武”两套班子作了准备叛乱的初步布置后，于下午5点多，召开常委（包括列席常委）会议，进一步打了“招呼”。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应列席的驻沪空军和海军东海舰队领导同志参加。

晚上6时左右，王秀珍吩咐康宁一，缪文金来电话就马上告诉她。傍晚，王秀珍打电话到辽宁省“革委会”去，企图通过毛远新的秘书了解毛远新的情况。那边回电话说一切正常。

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乘飞机下午5时多到达北京后，直接去公安部找祝家耀，祝不在。缪文金去了全国总工会招待所，探到消息是：“6号晚上来了7、8个解放军，把金祖敏带走了，说是中央办公厅的，把房间里的东西全部包走。”缪文金感到情况严重，便去开金的房间，见里面已被搜查得干干净净，表明金祖敏是被抓走的。

7点过后，缪第二次到公安部见到了祝家耀，缪告诉祝：“金祖敏已被抓走。上海市委那边因马老来北京开会电话也联系

不上，很紧张，要我到北京打听出了什么事情，马上给上海打个电话回去”。祝家耀一听慌了手脚，忙说：“肯定出事了，我给小沈那里（指王洪文那里）打电话也打不通，今天下午中央通知我们部派人出席会议，过去都通知我去，这次没有通知我去，根据这些情况分析，看样子那是政变了，肯定的！现在赶快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祝到办公室直拨上海市委，接通后由缪文金对康宁一说：“我娘病很重，心肌梗塞了，我还可以，就这样。”声音很沉重，说完就把电话挂掉了。康宁一马上向聚集在市委小礼堂的徐景贤、王秀珍、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朱永嘉、何秀文、廖祖康等人，报告了缪电话中讲的四句话。在座的个个象猛雷轰顶一般。

晚上7时左右，中央文化部刘庆棠打来电话说：“他给钓鱼台17楼江青那里打通了电话，是一个服务员接的，说首长身体好，现在不在家”。廖祖康听后马上打电话到钓鱼台17楼核实，接电话的说那个服务员今天根本没有去过，廖祖康判定前一个电话是假的。他又告诉了王、张、姚的三个电话号码，让刘庆棠再打一遍。刘打后回电说都打不进。张春桥的电话打通了，但接电话的人说打错了。

这时，这些人象天塌下来的那样，惊恐万状。张敬标等人斥责康宁一说：“为什么来电话就这么几句，为什么不多问几句，心肌梗塞是人不见了呢？还是被抓起来了呢？小缪到底去‘京

西’了没有？（事后得知，缪文金抵京后在京西宾馆和房佐庭见过面）这电话又是从哪里打来的？”张敬标还问王秀珍：“你到底怎样给缪文金交代的？”王秀珍说：“情况最坏、最严重的是心肌梗塞。”徐景贤说：“缪文金一个小小秘书能了解到啥！”有的埋怨康宁一是不是听错了。康宁一说，“我没有听错，哪里打来的，缪文金没有说；“娘病很重，总是指在北京的几位，‘他还可以’，说明他自己没出问题。”为了弄清情况，康宁一又打电话到全国总工会招待所找缪文金，但没有找到。

晚上9时左右，王秀珍又要康宁一跟中央公安部祝家耀通电话，挂通后康说：“小缪回北京你知道吗？”祝说：“小缪电话是在我这儿打的，他到‘京西’去过，现在分析，‘是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好动了’。我家属明天上午的一班飞机回来，请派人去接一下，有些情况回来告诉你们，但是也可能回不来。”康宁一又按照金祖敏的微波电话号码找到了缪文金，缪说：“现在病情不明，还在诊断中，待诊断明确之后，再告诉你们。”王秀珍听了说：“这是最坏的消息，肯定出大事。”徐景贤说：“人集中了，一定抓人了，连马天水也被抓走了，情况严重。”

10时左右，中央文化部刘庆棠又来电话说：“马老不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肖木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冯国柱提出：“现在应该停止向北京打电话了，不然我们打一个，人家记一个，这样把我们在北京的人全都暴露

了。”徐景贤同意冯国柱的建议，举起双手作手势说：“从此以后，谁也不准往外打电话了。”在场的人都如到了世界的末日。朱永嘉突然提出：“我看这次是华、汪两个结合，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廖祖康同意朱永嘉的分析说：“8341 这支部队是很厉害的，听汪主任的，没有汪主任指挥，一下子要搞掉 4 个人是不容易的。”朱永嘉又说：“他们先抓人，然后宣布一个决定，说几个人反党”。“困兽犹斗，我们要干，拉出民兵来，搞巴黎公社，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各地可能会有反映，可以发告全市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还可发一点有针对性的语录，或者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等。”徐景贤则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要根据张春桥 9 月 28 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准备干。”王少庸接着说：“白天问过民兵情况，很分散，值班的 2500 人，分在各厂，还有 31000 人待命的（实际上只有 11000 人）都在家里。而且班长不认识战士，排长不认识班长，根本指挥不动。民兵的枪支弹药都是分开放的，要拉出来连子弹都没有。”王少庸焦急地摊开手说：“我在考虑的是究竟有没有一个团的力量可以形成拳头。”

晚上 10 时半左右，徐景贤、王秀珍等已决定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廖祖康建议：要警备区的张宜爱、李彬山和李仁斋师长参加行动，紧急时可要他们调动部队。冯国柱建议再加杨新

亚副司令员。徐景贤、王秀珍认为：不仅张、姚、王出了事，而且看来要往下抓人了。徐景贤、王秀珍都说：“我们要撤出康平路，这里不能蹲了。”这时，大家都催着快点分散。怕人被抓走，一网打尽。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张敬标等人经过商量，初步决定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紧急部署。

最后，徐景贤拿着一个条子宣布：“免得一网打尽，现在开始要着手做准备了”。他确定（武装叛乱的）指挥班子分成两路：一路由徐景贤率领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张敬标、朱永嘉、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等人在丁香花园‘一号点’，负责总的指挥，并直接抓文的，搞舆论准备；另一路由王秀珍率领冯国柱、杨新亚、李彬山、廖祖康、康宁一等到民兵指挥部‘二号点’，搞武的。还确定“要对部队做一点工作。”

宣布后征求大家意见。王秀珍说要动员民兵，先动员 2500 人巡逻，31000 人待命，都要发枪发子弹。舆论工作要朱永嘉去准备。后来决定张敬标要在康平路市委机关内留守。张说：“有什么事，我通知你们，你们两个点要保密，不对外，由我负责对外联系。”朱永嘉说要去陕西北路经济研究所准备舆论。徐景贤马上写了调动民兵的手令交给王秀珍。手令如下：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 人集中，31000 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廖祖康建议把“工总司”老造反集中起来，组织工人罢工。朱永嘉支持，徐景贤同意召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参加。

徐景贤在康平路市委机关小礼堂学习室等张宜爱、李仁斋前来。这时电台正好广播中央的两个决定（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徐景贤一听要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表示疑虑，认为“这一定是在没有张春桥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因为他在9月2日到张春桥那里去时，张春桥说过考虑不准备分别出五卷、六卷的意见。不久，张、李两人来了，徐景贤说：“要是他们被一网打尽，我们不都是成了爪牙了吗？如果我们成了爪牙，你们怎么办？”张宜爱表示：“反正年纪老了，坚决和他们干。”徐景贤说：“明天可能周司令一个人回来，我们就要问他马老到哪里去了。”王少庸问李仁斋：“你们究竟有多少部队？”李仁斋回答说：“警备师大都是分散值勤的，多的一个连，少的一个班。”王少庸又问：“能拉出多少人来？”李仁斋无可奈何地说：“最多是一个营，另外就是康平路附近的一、二个连。”王少庸又问：“你能调得动部队吗？”李仁斋回答：“调不动。”

12时后，徐景贤、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等人进入了香花园（一号点）。徐景贤在坐车去丁香花园路上，攻击党中央，对王少庸说：“发这两个决定做法很坏，他们捞了‘稻草’，看

来是个阴谋。”

10月9日清晨，冯国柱先到了香花园，接着张敬标也来了，还带来了中央发布的两项决定（关于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选》五卷）电讯稿的清样。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等立即商量如何对两项决定表态。徐景贤看了第一项决定，觉得无懈可击；再看第二项决定，认为一没有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没有写批邓，三没有写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没有写按既定方针办，指出表态电报要把这四条写上。冯国柱建议，我们可以表态拥护两个决定，但不要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徐景贤表示同意。张敬标就转打电话给办公室二组，要他们根据这些意见起草文件。张宜爱、王少庸走后，王秀珍来到了香花园，一起商量决定还要继续给马天水打电话，问如何表态。

10时左右，昨夜分散的人又集中起来。这时，经张家龙与文化部、卫生部电话联系，得知他们已经收到中央的15号文件，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徐景贤又急着给马天水打电话。马天水仍不肯接电话。徐景贤问：“中央的两项决定，听说还有一个15号文件，如何表态？”房佐庭去请示后答复四个字：“热烈拥护”。徐接完电话后，常委们一致不满，说这么重大的事马天水为什么不接电话。于是常委决定推王秀珍去打电话，一定要马天水来接电话。蘑菇了好久，马天水总算

来接电话了，马天水还是要上海表态热烈拥护。王秀珍问马天水见到三位领导（指张、姚、王）没有？身体好不好？马天水撒谎说：“见到了，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和我个别谈了。”

听了马的这一谎言，大家松了一口气。有的说是一场虚惊。于是赶快准备发两个电报，一个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决定，一个是热烈欢呼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当天下午，收到了中央正式文件，3时在市委机关小礼堂由徐景贤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徐景贤说：“马老和周司令到北京开会，刚才通上了电话，见到了上海在中央工作的三位领导，他们身体都还好，工作很忙。马老要我们对中央的两项决定和15号文件表示热烈拥护。”他们虽然发了表态电报，但心中仍然忐忑不安。

电报发出以后，为了避免露马脚，徐景贤于当晚7时要王秀珍打电话告诉施尚英：“战备恢复正常，撤销民兵值班的万位数，保留千位数。”王秀珍再次问施：“你懂了吗？”施回答：“懂了。”接着，徐景贤、王秀珍等要廖祖康通知集中在东湖招待所那里的“工总司”造反头头们暂时不要再聚在一起了。廖祖康表面上答应了。但事实上，东湖招待所（二号点）和武装叛乱两个指挥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指挥，一直搞到13日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时止。

晚上接到了房佐庭从北京打来电话，房说：“马天水要徐景贤、王秀珍两人来北京开会，飞机空军会派，情况来了会清楚的。”马天水紧接着说要徐景贤来接电话。徐景贤在电话中汇报了下午开会情况，还说了给中央的热烈表态报告稍长了。马天水说：“长一点好，还可以在马路上贴拥护中央决定的大标语，但开大会要等我回来。”

这一新情况，又引起了一场紧张的议论：“为什么马天水不回来？”“为什么又要上海去人？”“会议为什么不由中央通知？”认为“情况肯定对我们不利。”王少庸、冯国柱等提出：“可能有问题，是否不去人，或者去一个人。”徐景贤和王秀珍商量后说：“这是马天水通知的，（我们）两人不去不好，去了一定打电话回来，如果没有电话就是出事了。”接着，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黄涛（黄涛刚从山东济南赶回上海）、张敬标一起，胡乱估计事态的发展，策划徐、王去北京开会后如何及时通报消息。徐景贤和张敬标二人拿了报纸悄悄地在议论通电话用的暗语：“按政治局领导同志先后顺序编号，什么人出事就用什么数字来表示”。王秀珍说：“我们走后，你们几位就在康平路集体值班，注意各方面的动向，有问题在一起研究。”最后，要张家龙陪同徐景贤、王秀珍一同去北京，这样，到北京后张家龙可以帮他们在外边了解情况。张敬标还特地和张家龙作了种种设想和对策：“如你们开会出不来怎么办？”“如果你们抓起

来怎么办？”还说：“你可不能再象房佐庭那样，到北京后不来电。”徐景贤嘱咐说：“我们俩人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在场人要保密，不要传出去。”

王秀珍马上又打电话给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说：“我和徐景贤要去北京开会，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要听他们的指挥。”

晚上10时，缪文金在北京全总招待所接到上海康宁一打来说：“小缪，你能不能把情况说具体一点”。缪文金说：“我知道的情况就这么多，我回来以后老金就不在了，现在人仍然找不到，小沈那里（指王洪文处）电话也打不通，情况比较严重，今天下午听到全国总工会去中直机关开会的人说，这是中央采取的措施和部署，什么措施他没有告诉我。中直机关系统的会议是由纪登奎、吴桂贤主持的。”

10月9日晚，马天水叫房佐庭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二人去北京开会时，中央又派人向王一平了解上海的情况。王一平找了张敬标，向他了解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动态。张向王一平讲了他们10月8日一些活动情况。

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张敬标又错误地分析形势，认为社论所说“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可能是有人反对华国锋，而江、张、姚、王是站在华国锋一边的，所

以胜利了。他们怀疑汪东兴出事了。所以上午在于会泳和刘庆棠来电询问时，徐景贤还讲了他那个错误分析，暗示汪东兴可能有问题。

10日中午，廖祖康到“康办”，遇到肖木，谈到社论中“伪造毛主席指示”的事，肖木说：“我刚从徐景贤家里来，徐已得到消息，中央会议精神正向北京部队和8341部队的战士传达，看来部队领导人出了问题。”

下午2时半，徐景贤、王秀珍离沪去京，在机场休息室，警卫处康宁一偷偷告诉来送行的张敬标说：“山东、江苏去京开会的领导同志，都已随机返回原地，唯独我们上海，还要去人。”张敬标感到这个情况确实不正常，其中必有问题，就在徐、王上飞机时将这一情况告知了王秀珍。在回来路上，又对王少庸、冯国柱说了。晚上，徐景贤、王秀珍来电说：“平安到达，一切等他们回来再定。”

（四）叛乱在行动中

10月8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等召开各系统头头会议，进行反革命吹风、准备武装叛乱后，各路人马纷纷出动，这里着重反映他们控制下的民兵、公安、与写作组的情况。

（1）在市民兵指挥部。

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8日下午参加了徐景贤、王秀珍等召开的会议后，到浦东大楼找李彬山。李说：事

情他知道了，但在这里讲话不便，晚上9时到我家。于是施、钟二人就回到指挥部，即通知指挥部的作战组长、后勤组长晚上开会，并叫他们马上下基层去检查“战备值班”和枪支、弹药是否落实的情况。当晚9时，施尚英、钟定栋到李彬山家中共同拟订所谓“加强战备”的叛乱方案，11时左右，施尚英打电话给王秀珍说，要求向她汇报。王秀珍叫施等回到民兵指挥部去。又叫陈阿大通知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等去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集中，然后偕冯国柱、廖祖康去了民兵指挥部。

施尚英把王秀珍等领到他的办公室。施说：“关于加强战备已经研究好了按国庆节的保卫方案。”王秀珍说：“可以，我不懂，李副政委同意就行。情况更严重了，文化部也有病情了，动手抓文化部的人了，我们在康平路蹲不住了，下一步该抓我们了。徐景贤带一些人到一号点，我们几个人来民兵指挥部。”王秀珍把徐景贤的手令给施尚英等人看了说：“民兵夜里集中值班要有13000人（正常值班2100人），要加强对报社、电台保卫。我们已离开康平路机关，机关文件都在那里，你派徐汇区民兵加强对康平路市委机关的保卫工作。”冯国柱说：“康办（按指市委机关，下同）那里警卫很重要，机要档案都在那里，领导家中也有许多文件。”李彬山说：“那里要注意一下，不能出问题。”杨新亚说：“三连在那里，还有警卫处，警卫力量比较强，

那里的警卫是警卫处直接管的，可以要警卫处检查一下，同三连一起把那里警卫搞好。”冯国柱建议由张敬标抓一下这件事。”冯国柱又说：“康办、广播电台是重要警卫目标，还有什么地方？”杨新亚说：“还有‘市革会’、兴国路招待所，这几处按规定是警备师重点警卫目标。西郊招待所，是警卫营专门管的。”王秀珍对施尚英、钟定栋等人说：“上海是一月风暴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血肉相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让全国知道。”廖祖康插话说：“周司令回到上海，可能就到某地指挥抓我们。他们把马天水关在北京。也可能他们到松江某师，叫我们去开会，然后把我们抓起来。”说完，就要施尚英拿出地图来，廖祖康一边看一边气势汹汹地说：“上次就告诉你们了，一张象样的地图也没有，这种地图怎么好打仗。”这时王秀珍要廖祖康打电话把陈阿大等叫到民兵指挥部来。陈阿大带一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三楼接待室。冯国柱问：“这里进出路好不好？”施尚英说：“这里后面是黄浦江，两头一堵就出不去了。”王秀珍说：“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被人家象抓小鸡一样一个一个地拎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军民联合作战。”

在大家议论中，王秀珍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北京派人来怎么知道？”廖祖康说：“坐飞机来，民航局会知道，坐火车来，车站会知道。”王秀珍说：“那可告诉陈阿大。”冯国柱说：

“告诉金传德也行。”廖祖康随即出去，叫人通知机场、车站有关人员注意动向。他们谈到万一有事，如何保持电讯畅通，保证联络得上。施尚英说：“我们有几套设备，去警备区集训的报务员也回来了。”李彬山说：“人防办的那套设备最好，一开动到处可以通。”杨新亚问是不是通过市电话局的？”李彬山答：“是的。”杨新亚说：“那还是电话局重要。”廖祖康特别提到福州路和汾阳路两处（市内电话局分局）是枢纽关键。冯国柱问杨新亚：市话局有警卫部队没有？”杨新亚答没有。王秀珍说：“要派民兵把那里警卫好。”“广播电台要保护好。”李彬山说：“要防止坏人冲电台，跑上去乱讲一通。”杨新亚说：“那里警卫力量比较强，军代表也是警备师的，有事可以叫他统一指挥。”李彬山说：“我看可以，他是政治部副主任嘛，有事可以管嘛！”廖祖康问：那些部队可靠？警卫营怎么样？”冯国柱问：“有那些可以机动的分队？”杨新亚提到市区只有一个连和摩托营。王秀珍说：“要作准备！”杨新亚说：“我给他们连队通点气。”冯国柱、王秀珍还问浙江、江苏部队有什么消息？杨新亚说：“没有什么消息，这次在杭州开会，听说驻杭州的部队要到乍浦地区野营，驻苏州的部队要到昆山、太仓地区野营，杭州是1师，苏州是178师。”王秀珍提到下午已经给公安局打过招呼，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王秀珍和汪湘君把市总工会一帮“老造反”头头和民兵指

挥部一部分人带到南面一间房间里开会。向他们谈了部署民兵和设立指挥点等情况。她猖狂攻击说：“中央出了大问题了，肯定中央出现了右派宫廷政变了”，“修正主义上台了”，“毛主席身边的几位领导（指“四人帮”）统统被抓起来了。”“现在已经向文化部开刀、动手了，接下来就肯定对上海下手抓人了。”又讲：“给总工会的头头打个招呼，要总工会贴大标语，组织工人罢工，发动群众。”最后，王秀珍讲：“你们看，毛主席刚刚逝世他们就迫不及待发动宫廷政变了，真比赫鲁晓夫还要赫鲁晓夫！”陈阿大跳出来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不怕，我们要对着干。”“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死，这次准备死了，反正不怕。”“到时候群众队伍我还调得动的。”“现在和打‘联司’不同，要组织几个小组，保持联系，比较保密安全，上棉三十一厂、江南造船厂、闵行电机厂和上钢一厂可作为点，‘江南厂’有条民兵巡逻艇，要的话可以动用。”又说：“拖一条旧的万吨轮放在吴淞口，打开阀门把船沉下去，航道就封住了。”“到‘上钢厂’拿上二块吨把重的钢锭放在跑道上，飞机就起（飞）不了降（落）不下。”“如果用煤紧张可把一些用煤多的工厂停下来。”“江浙两个口子重要，思想要有准备。”为了掌握交通命脉，陈阿大又提出铁路局、民航机场、邮电局可以找谁的具体名单。黄金海跳起来说：“真没想到，毛主席逝世才二十几天，有人就迫不及待地这样干了，真比赫鲁晓夫还辣手，赫鲁晓夫反斯大林

也没这么快。”“抓这几个人很清楚，矛头正是指向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健在时，他们不敢动，毛主席一逝世就迫不及待干了。”还激动地说：“给咱一杆枪吧，跟你们一块儿干。”并讲：“可以发动工人罢工，组织工人大游行、贴大标语，发《告全市人民书》，让群众都知道。”当王秀珍讲到“马天水回不回来有两种可能，不同意他们抓人，就回不来，或者‘叛变’了，来做我们工作，要我们表态，我们就不听他的，自己干。”黄金海接着说：“马天水不会投降的，万一真的投降了，我们当然不听他的，自己干嘛。”叶昌明也叫嚷要“对着干”，“不能做投降派！不能当叛徒！”叶昌明接着提出：要赶快把武器发下去，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弹药不能再交给警备区保管；要组织一支机动通讯联络队伍，保证联系不致中断；要派人监视部队动态，防止部队对我们采取行动时措手不及；派民兵进驻水、电厂要害单位；组织一些工厂罢工，发动工人上街游行，刷大标语，造舆论。王秀珍对他们打气说：“你们打过‘联司’，有经验，那时也分一线、二线，如打起来，你们都分配到各指挥点去，大家一起抓。”

这时在民兵指挥部三楼一间大接待室里，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等继续在策划具体部署。冯国柱向他们询问了外省驻军情况和进入市区应由那级军事机关下命令以及可能进入市区的方向、路径。冯国柱问李彬山和杨新亚：“部队调动，能不能知道？”杨新亚回答说：“一般都知道，军委规定，调动部队要经

党委集体讨论，按权限上报批准后，由分工的首长去办。冯国柱问：“外面来部队呢？”杨新亚说：“我们守备部队分散在阵地上，没有命令是不进城的。外面来部队，军区、总部会通报的，不通知那是异常现象。”冯国柱说，“1军、60军要来呢？”杨新亚说：“要有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下令才能行动。”冯国柱说：“1、2师怎么样？”杨新亚说：“不太可靠，部队都分散在沿海岛屿阵地上，两个师长比较别扭。”李彬山还说：“恐怕是相当别扭。”还说了警备师基本上可以掌握。冯国柱说：“警备师李师长好些？”杨新亚说：“李仁斋政治上比较好。”

安排好李彬山、杨新亚去睡觉后，王秀珍和冯国柱找了市邮电局的负责人来，要他借口防地震，加强战备值班和民兵保卫，保证福州路、汾阳路等电话枢纽电讯畅通，有情况立即报告市委。

10月9日凌晨1时左右，施尚英在民兵指挥部同李彬山等人继续研究在李彬山家策划制订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

钟定栋根据王秀珍的指示，为抓好康办的“保卫工作”，把徐汇区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一个副组长叫到市委警卫处。钟对他说：“现在情况十分复杂，今天可能要发生大的事情，在这样的时刻，对我们都是一个考验。”要他马上组织好所谓九、十两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的能听从调动有战斗力的单位，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并要他立即把队伍落实。最后选定了21个

单位，1320名。这些民兵都要听警卫处的指挥。

施尚英、钟定栋等最后决定：

①设立两个指挥点，江南造船厂为第一指挥点，称“基指”，为一线负责指挥；由施尚英、钟定栋负责。中国纺织机械厂为第二指挥点，称“予指”，为二线，也指定了负责人。其任务主要是隐蔽待命，如一线出了问题，由二线代替指挥。

②通讯联络使用电台，两个指挥点各2部，10个区和上钢三厂各1部，合计15部电台。9日下午6时后开始工作，沟通网络，保证通讯。同时，在江南点搞摩托通讯，各区搞摩托“战备”值班。

③确定两个点工作和10个区联络员的人选，作了分头联系的具体安排。

④在市民兵指挥部有人抓总，负责“战备”情况中转。

⑤决定9日上午召开10个区和5个民兵师的负责干部会议，布置“战备”要求。

⑥决定将市指挥部的6支手枪分别带到两个指挥点。

施尚英又指定专人落实所需的作战地图、电台和手枪。

2时左右，施尚英、钟定栋等把筹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向王秀珍、冯国柱作了口头汇报。

2时半左右，在民兵指挥部的廖祖康打电话给徐景贤说：“我们已和李副政委、杨副司令谈了，他们表态很好。王秀珍、

冯国柱他们商量要加强对电台和康办的保卫，建议请李仁斋师长通知电台那个连，注意警卫，由刘象贤指挥；另外康平路的三连也要李师长通知，听从市委的指挥。”

徐景贤随即写了《调动两个连队的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李仁斋根据徐景贤的手令，用电话向各部队下达了命令。

3时半左右，王秀珍、冯国柱等人怕蹲在民兵指挥部遇到情况没有退路，天亮了容易暴露目标，决定带一帮人转移到东湖招待所进行指挥。

9日上午9时，施尚英、钟定栋等召开了原民兵指挥部有关组长、联络员、工作人员以及10个区和江南造船厂等5个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由施尚英传达了王秀珍编造的“战备”理由和策划的方案，向下作了布置。

施尚英说：“今天开会请10个区、有关师的领导同志参加，有一件事同同志们说一下。最近，发现有些单位战备有些松。战备不能松。要提高警惕，要防止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注意海深、空飘。市委指出，请我们民兵检查‘战备’落实情况，凡上次布置过的一定要落实。要把10个区找来，对‘战备’问题

再说一些要求。”施尚英提出：

第一批应急力量 2500 名。60 辆摩托车不变，各区抽调的兵力人数作些调整。交运局准备 100 辆汽车配备正副驾驶员。

第二批应急力量：杨浦 3000；徐汇、普陀 1800；虹口、闸北 1200；卢湾、南市、静安 1000；黄浦、长宁 500。

宣布从今天起领导人全体在位值班；组织好战备值班部队，进行战备动员；做好武器、弹药配套；做好通讯联络的保障，15 瓦电台全部进入战备，频率、呼号密语，市里规定中午 12 时到特种兵组拿取，天线方向市里统一规定。18 时全部沟通联络。电台值班人员加强教育，24 小时值班；抓好重点保卫目标；密切注意社会动向；兵力布置 18 时以前全部落实报市民兵指挥部总值班室，为便于联络各区派一名联络员进驻；指挥部联系点在总值班室。

会后，施尚英和钟定栋带上作战组、后勤组人员携带了作战地图、手枪等，一起到了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两个指挥点上。在这两个点上设 2 个台，6 个报务员，组成两个通信网络。下午 2 时架设电台天线，于晚上 6 时开始与各区（点）电台沟通联络，开始收发电报。10 日晚上，施尚英对 10 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些直属的民兵师部发出提高警惕、继续加强“战备”的电报。以后，特种兵组送来一些区汇报的有关战备落实情况回电，由钟定栋签阅。（电台的收发报活动，到 10 月 15

日凌晨 1 时才停止。）

(2) 在市公安局。

10 月 8 日下午 3 时半，原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在康平路参加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召集的会议后，回到市公安局，立即确定下列措施：当晚召集有武器装备、穿着制服有战斗力的单位开会布置，组织机动力量；确定消防处、边防站、交通处、治保处、政保五处参加会议负责人名单；又向局政治部、局办公室、行政处负责人打招呼，让他们有所准备；晚上打电话给中央公安部祝家耀了解北京动向。

晚上 6 时半，薛干青、徐成虎召集局党委副书记姚纪英、常委宋桂生以及政治部、局办公室、行政处负责人开会。会上，薛干青传达了有关“战备”精神。徐成虎说：“这次‘战备’，你们要想得深一些、复杂一些”。接着就布置了分工、确定政治部组织面上的机动力量；局办公室掌握情况，并由一名负责人负责岳阳路 76 号秘密指挥点；行政处负责服装和枪支弹药的后勤供应。

晚上 7 时，薛干青、徐成虎在建国西路 394 号 8 楼会议室召集部分单位负责人开会。到会的有交通处、治保处、边防站、消防处、政治部、办公室、行政处以及局办公室调研科等单位的负责人。会上薛干青谈了“战备”电话通知说要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然后，由各单位拼凑机动力量，共 1521

名。准备下发枪支 1380 支，弹药 4 万多发，动用汽车、摩托车等近百辆。要求机动力量的全部集中待命，听从薛干青、徐成虎调动指挥。在岳阳路 76 号 5 号楼和防空洞内设置秘密指挥点。规定通讯联络代号：01 代表薛干青；02 代表徐成虎；03 代表局办公室。政保五处的负责人在 9 时半才赶到会议室。薛干青、徐成虎查询了五处机动力量情况，并布置准备通讯联络器材和无线电台车，使用五处业务密码。要他们明暗结合，以暗为主。并批准发给五处民警制服 50 套，备枪 20 支。

深夜，徐成虎在办公室和公安部祝家耀通了电话之后，把祝家耀传来的“北京气候不好”的消息告知了薛干青。薛干青说：“肯定出问题了”。徐成虎说：“搞不好，中央要出啥问题，会不会把王、张、姚搞起来了？”徐成虎凶狠地说：“把这些人搞起来，我是要大干的，杀头也不怕。”

9 日下午，薛干青会同市民兵指挥部钟定栋在静安区“革委会”地下室召开各区公安分局、区法院和民兵负责人会议，进行“战备”布置，叫嚷要“团结战斗、相互通气、协同作战”。薛干青与张敬标通了电话；签发了一份“电话通知稿”，以“战备”为名，向各县公安局布置叛乱行动；通知政保五处电讯组，在岳阳路 76 号安装的铁塔进行通讯试台；派人领取被子、床铺、桌子等所需物品，安放到地下室指挥点去；并通知局办公室设备组 24 小时不能离人。

晚上 9 时，薛干青、徐成虎等去岳阳路 76 号察看五号楼指挥室和地下指挥室。测试了电台和备用发报机。薛干青提出“有两条马路进出就好”。于是按薛干青的主意配了岳阳路 110 号门和永嘉新村后门的钥匙。

10 日晚上，值班室打电话告诉薛干青说，消防处建议今晚机动力量搞个紧急集合演习。薛干青听了很高兴，并要交通处也集合一起参加演习。22 时，薛干青等来到建国西路 75 号现场，下达了紧急集合命令。285 名消防干警，携带 250 支长短枪；120 名交通干警，分乘大卡车、摩托车在半小时内先后集中到达 75 号大院内。薛干青在队前鼓励说：“我们的队伍是有战斗力的，打起来是拉得出的，今天做了一个集合速度的演习，半小时内基本将队伍集中了起来。”现在“大家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事后，薛干青将这次紧急集合演习情况电告了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

11、12 日，市公安局监听台不断传来外电报导“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薛干青等不敢睡在家里搬到办公室里睡。

13 日早晨，施尚英在民兵指挥部打电话给薛干青，问他最近情况怎样？薛说：现在市局“监听情况增多”。施说：“情况是真的。”于是薛要施到公安局来一下。中午，施尚英到公安局与薛干青在办公室密议。施走后，薛干青立即和徐成虎 2 人商谈落实武装叛乱设置二线指挥部事宜，要求明暗结合。他们就

选择了接近消防队的长乐路、虎丘路、汾阳路3个工作点。下午4点多钟，派人查看了3个点的设备情况。傍晚，徐成虎在薛干青家里吃蟹喝酒，两人叫嚷要“战斗在一起，准备流血。”

(3) 在写作组。

10月8日下午朱永嘉去康平路小礼堂参加市委常委（包括列席常委）会议结束后立即来到《文汇报》社找了吴瑞武说：“北京几位（指“四人帮”）接不上消息，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只发上海消息，不发中央消息，行不行？”吴说行。吴问朱要不要在报社进行动员。朱说：“不要，在个别骨干中打一招呼。”朱永嘉接着到《解放日报》社找了王景，又到电台找了刘象贤，谈话内容基本上和在《文汇报》社一样。

朱永嘉从电台回到了写作组。他对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等传达了徐景贤、王秀珍的“指示”，说：“市委几个头头都准备干”，“民兵已作了布置，工字头已进行动员”，“张、姚养了我们10年，总得报答他们，我是准备杀头坐牢也要下决心干。”王知常立即表态：“我与老朱是两个身子，一个脑袋。”王绍玺说：“要干就大干。”他们在策划怎么干时，朱永嘉说：“明天在报上拉横幅，‘坚决捍卫文化大革命’。”王知常提出：“还我张春桥”、“还我姚文元”、“还我王洪文”、“还我江青”的口号，还要以市委的名义发表《告人民书》。接着朱永嘉布置了两件事：一是搞一批毛主席的语录，要有针对性的，二是搞一个

赫鲁晓夫上台的资料，考虑明天见报。当晚王知常确定采用“三要三不要”、“右派上台都是短命的”以及“按既定方针办”（按此系“四人帮”伪造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等几条。还从《国际问题资料》中找出了《赫鲁晓夫上台前前后后》一文，准备使用。

会后，朱永嘉又找了经济组的顾澄海来，在向他进行了反革命的“吹风”后说：总工会已布置了地下指挥部，这里过几天也不能办公，要顾澄海寻找房子充当秘密联络点。顾澄海后来就在陕西北路经济组内设立了1个“联络点”，在漕溪北路历史所内设立了1个“后备联络点”，配备了前后门的钥匙，领取了200元现金，买了米和蔬菜等。

10月9日凌晨，朱永嘉从写作组到“康办”找了张敬标。朱对张敬标说：“问题严重，中央肯定发生了政变，现在看来，这两个决定很坏，他们搞纪念堂，主持《毛选》出版工作是抓旗帜，我们要立即行动，再不动就晚了。”要马上控制新闻、广播、交通、车站、码头等，并发表告人民书。还说：“行动起来以后，对我们有利，逼得他们不得不放人”，“（用）市委的名义正式向中央发个电报，提出抗议”，“这样，对他们（指‘四人帮’）在中央的斗争也是个支持。”之后，朱、张2人分别打电话到了香花园找徐景贤。这时，已深夜2时左右，徐景贤已经睡了。电话都是张家龙接的。张家龙听完电话后说徐已经休息，而且以

“现在情况不明”为理由，挂断了电话。后来，张家龙把这事告诉徐景贤。徐专门打电话给写作组王绍玺，告诉他要朱永嘉稳住，报纸仍要发表两个决定。

10日朱永嘉、王知常、肖木、王绍玺等人在办公室内议论所谓“形势”，并相互鼓“气”。朱永嘉说：“情况已很明显，几位领导（指‘四人帮’）肯定被搞起来了，出了事了。”王知常说，那样“我至少关10年、8年，王绍玺情况好一些，关3年、5年就可以了”。朱永嘉说：“可能马天水被人家做工作做过去了，又怕担不了全部责任，今天把徐景贤、王秀珍也叫到北京去。徐、王回来，就是当钱谦益！”（编者按：朱永嘉是指当投降派。钱谦益在明崇祯时为礼部侍郎，弘光时谄事马士英，为礼部尚书。清兵南下，率先迎降。）“但看来，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3人态度还是很坚决的，民兵、总工会几个人也坚决要干，我们应当干！”肖木进一步说：“上海、辽宁联合起来，还是有力量。”最后，朱永嘉更幻想：“这一乱可好了，肯定会出现辛亥革命后的局面，军阀割据，谁也不听中央的。”

12日，写作组的核心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和肖木继续在一起议论：“马、徐、王回来带着大家投诚，喊‘吾皇万岁！’，还是领着大家干？”肖木认为“干还有一线希望。”王知常表示了“大官们要保乌纱帽，我是流氓无产阶级，不怕死。”朱永嘉向写作组的组长和党支部委员等9人进行“交底”动员。

上午11时，王知常又将9个人召集来说：“风云变迁，王、张、江、姚被一锅端了。现在大局已定，大势已去，右派政变，作出两个决议，抢了旗帜，这次表面上是政方出面，如果是军方出面，一定是四·一二大屠杀。”

晚上，朱永嘉接到通知去康平路小礼堂开市委常委扩大会，顾澄海向朱建议要发动罢工，制造混乱。当朱永嘉到会场后，又打电话通知王知常也来参加。王知常临去时，说：“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王绍玺听了，立即走上来和王知常握手，表示支持。于是，朱永嘉和王知常和王洪文的小兄弟即原“工总司”的那些头头后来演出了大闹市委常委扩大会的一幕。

（五）“帮兄帮弟”们的猖狂活动

“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从各种渠道陆续传到上海，引起了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汪湘君之流，和盘踞在“市革会”各组办、各局、各区、各县占了高位的所谓“老造反”头头们的极大恐慌。他们积极参与徐景贤、王秀珍等阴谋策划的武装叛乱。他们和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等成为武装叛乱部署的最坚决的鼓吹者和执行者。

特别是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后，他们疑虑重重，既怕马、徐、王在北京被扣押回不来，更怕马、徐、王“叛变”、“投降”。他们上窜下跳活动频繁、气焰嚣张，相互鼓励要保持反革

命的“气节”，动手大千。

(1) 叛乱一触即发。

10日晚上，陈阿大等到二号点——东湖招待所内，打听徐、王到北京的消息。他们听说：“徐、王所乘飞机在郑州机场，人统统赶下来了，要登记姓名、职务报北京同意才能进去”，感到“情况更严重了。”廖祖康大叫：“情况非常不妙。”王明龙说：“再等下去一齐完蛋。”陈阿大说：“干嘛！把两个省的电给拉掉。”黄涛说：“我一定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乱哄哄吵成一片。

11日上午，黄金海窜到了他的“老窝”上海三十一棉纺织厂，找了厂党委正、副书记来“吹风”；传达了10月8日王秀珍的讲话精神，说：“我们三十一棉是老造反厂，对这样大的事情，应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就是要同‘修正主义对着干！’并布置加强民兵24小时值班，子弹可以压到弹夹里去了，用起来方便。”

下午，几个小兄弟又在东湖招待所集合，施尚英讲了“警备区南京开会回来了，也没有向市委汇报”，“原来李彬山、张宜爱去南京开会时，我同他们约好的，叫他们到了打个电话来，如果正常没什么事，就讲原来要买的电视机抓紧一点办，如果问题严重，就说原来要买的电视机现在不要了”。但他们“回来后也不打个电话，”（警备区的几个人因南京军区首长的警告不再参与了。）“台湾已经在广播说，四个领导被捕了。”陈阿大对

小兄弟们说“你们怕不怕，到时候大家不要当逃兵、叛徒。”“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后来他们吃点心时，陈阿大又讲：“来，大家宣誓！谁要当叛徒，妈的！我死也要咬他三口。”黄金海说：“好了，什么宣誓不宣誓，当心我组织‘打狗队’。”并开玩笑地做了一个打陈的手势。暗示陈要是做“两面派”就要把他打掉。后来决定由叶昌明负责把正在市“五七干校”参加轮训的戴立清立即调回上海，准备叫他担任武装叛乱的“前线指挥”。叶昌明最后提出：东湖招待所“住的客人不少，不方便，明天在工人文化宫集合。”

12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黄金海、王明龙、廖祖康等人集中在市工人文化宫5楼会客室内召开秘密会议，继续策划确定在上棉三十一厂设秘密联络点和“点”里的工作人员名单，还策划拟订了叛乱用的反革命标语。会上，廖祖康讲：“我们不要乱哄哄的，光讲讲不行，有些事要有人去落实。”于是戴立清、黄金海去上棉三十一厂。黄金海布置一些人搞反革命标语，他说：“标语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两面都可以理解的，如“三要三不要等”，谁也抓不住什么。另一种可以明朗些的，如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还我张春桥……等等。”他们占用了厂民兵值班室，安排好前后门守卫又回到工人文化宫。

4时不到，施尚英说李彬山叫他去，可能谈南京会议的情

况，廖祖康说：“你应该去一下，多听，多问，少讲。”陈阿大说：“不要把我们底给摸去。”施就去了。

廖祖康、叶昌明、陈阿大、施尚英等四人傍晚接到通知，要他们在晚上8时半去“康办”开会。马振龙虽未在通知之列，也挤上车去了。

晚上10时，戴立清、黄金海又带了一批工作人员到上棉三十一厂，他们一进厂就全部换上了工作服，叫人起草《告全市人民书》。11时找了纺织局党委书记唐文兰来，黄与她密议组织纺织系统38万职工罢工问题，还企图和轻工、冶金几个局互相串通，一起罢工，把上海搞乱。表示“必要时可以发点枪”，“死也要死得有点名堂”。黄金海说：“宁可站着死，”语音未落，唐文兰接上说：“不愿跪着生。”

13日上午，上棉三十一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按照黄金海来厂布置的内容，召开有60多人的党委扩大会，提出“五个假如”、“五个怎么办？”（即：“假如正式有文发下来，我们怎么办？”“假如来软的，中央派人来，我们怎么办？”“假如解放军来了，我们怎么办？”“假如来硬的，来几卡车人，我们怎么办？”“假如我们几个书记一个个被抓起来，大家怎么办？”）逼着大家表态，要他们誓死效忠，准备“罢工”、“示威游行”，并准备好“枪枝弹药”，要“干到底”。会议一结束，层层“吹风”煽动。全厂民兵立即进入“临战状态”，枪枝弹药配套，民兵成立两个

梯队，第一梯队100人，第二梯队60人。那个副书记还狂叫“第一梯队人死了，第二梯队冲上去”。第二天民兵进行打靶练习，瞄准射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2日中午，张敬标得到了王洪文的“小兄弟”在东湖招待所活动频繁的一些情况，向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打电话说：“现在我们这里情况很紧张，工会和民兵指挥部的一些人情绪很激动，我们已经很难控制”。“希望警备区派人做做民兵工作，李彬山能否回去抓抓民兵工作。”李宝奇政委对张敬标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们也正在研究。”

在回家吃晚饭的路上，张敬标告诉冯国柱说：“叶昌明来电话，今天晚上他们要到康平路来。”冯国柱说：“他们可能在外边商量好了，要和我们摊牌。”当时两人商定8时半要他们来，并且要王少庸、黄涛8时到，4个老常委先碰头讨论一下。

(2) 大吵大闹的市委常委扩大会。

12日晚上8时半，在“康办”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叶昌明、陈阿大、施尚英、朱永嘉、何秀文、廖祖康、肖木、王日初、马振龙、王知常。本来4个常委拟先碰面研究一下再开会，但黄涛来迟了，常委未能先研究。

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一进来就吵吵嚷嚷，又哭又跳，马振龙一脚跳到沙发上哭着叫嚷：“我从小要饭做工，是毛主席两

次把我解放，是文化大革命解放了我，我拼着脑袋也要干。”接着，施尚英汇报了12日下午李彬山找施尚英去谈话和李彬山在南京军区开会的情况。当施尚英汇报到有人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是“照过去方针办”，而被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时，冯国柱、王少庸、黄涛、张敬标等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有什么两样？”冯国柱叫嚷：“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嘛！凭这一条就成为反党分子了吗？”施尚英说他曾问李彬山“三位领导（指张、姚、王）是否出事了？”李彬山支支吾吾不作表态。施说他还对李彬山说过：“如果‘三位领导’（指张、姚、王）出事了，你李彬山逃不了，我也逃不了。”冯国柱和张敬标二人问施尚英：“李彬山的表情怎么样？”施尚英答：“李彬山脸涨得通红，讲不出别的什么话，到南京军区开会的情况他也讲不清。总是讲要等马天水、周司令两人回来传达。”随后，廖祖康拿出北京来的一份电话记录，说：“‘四人帮’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都被捉起来了。”廖作贼心虚当场把它烧了。冯国柱就说：“这几个人肯定出事了。”

大家听了情况后，何秀文、王知常、马振龙等人纷纷追问冯国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究竟什么时候回来？”

冯国柱说：“你们问我，我不是和你们一样，就是在昨晚接到一个电话，说他们今天回来，但到现在还不回来，也不知道

什么原因？”后来，大家要冯国柱、张敬标再与马、徐、王通个电话，问问究竟什么时候回来？冯国柱、张敬标等人与马、徐、王接通长途电话后，冯国柱传达说：“我与徐景贤、王秀珍接通了电话，马天水也在电话机旁边，马天水讲了一句话说，明天肯定回来的。徐景贤、王秀珍说，他们今晚有一个重要会议，明天肯定回来。要我关照工会、民兵不能动，一切等他们回来再安排。我问马天水明天什么时候？他一会儿回答是上午，一会儿回答是下午。我火了，就说，你等于没有回答。我们这里都十分着急。现在社会上人心浮动，流言很多，有些同志现在很激动，局势无法控制。”马天水说：“你要他们不要激动，不要浮动嘛！”冯国柱说：“你要我们一、二个人不激动可以，其他的人，我们稳不住，不少人就在我身边。”王秀珍还和叶昌明通了话，王要叶昌明等人听指挥，一切等他们回来再说。冯国柱传达完后，问张敬标等人有什么漏掉要补充的。接着马振龙、朱永嘉、何秀文、肖木、廖祖康、陈阿大等人一齐起哄，大骂马、徐、王投降，当了“叛徒”、“软骨头”、“既得利益者”等等。说：“现在是市委领导应该下决心干的时候了。”冯国柱埋怨说：“徐景贤、王秀珍二人在上海时也是热锅上的蚂蚁，可是去了以后倒不急了，只是说叫工会、民兵不要动，一切等他们回来安排。”“我们是等着他们的指挥，但他们又不指挥，只是讲不要动，明天一天叫我们怎么回答？”小兄弟们骂了一通，看看没有结果，

他们有的借口打电话，有的借口要小便，一个个溜出去，商谈会议散后到总工会继续密议。施尚英连续打了两个电话给钟定栋密谋武装叛乱的升级措施。冯国柱估计他们去商量什么，就说：“这样吧，干脆你们一起去商量，4个常委留下也研究一下。”这样，他们就到外面小礼堂去碰头了。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3人一致意见要稳住，一定要等4位书记回来。黄涛既不说不干，也不说不干，只是踱来踱去说：“要准备，要准备。”

这时，朱永嘉找马振龙说：“过去我们有点矛盾，现在要团结起来一起干。”“你们干，我们也干，工会带个头，民兵一动就可以干。你们干我们支持。”并建议民兵先动手，工厂“可以停下来”，我们负责起草《告人民书》。接着，朱永嘉又把陈阿大、叶昌明叫到另一个房间，灯也不开，说：“看来他们（指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等）是不行的，有点靠不住。”准备甩开市委那几个老常委自己来干。又说：“我再去做他们的工作。”

不一会，这一伙人又进了常委会议室。这时，朱永嘉变成后半场的主角。朱永嘉先煽动性地讲了一大段他在8日晚上已经和徐景贤、张敬标说过的反革命叫嚣：“我没有想到张、姚、王会有如此下场，王洪文我不太了解，张、姚我完全了解，我那里有他们全部给我们的批件，可以公布于世界。我认为要起义，北京发生政变，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

瘫痪，同时，夺取电台，天亮之前广播《宣言》和《告人民书》。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王洪文，还我姚文元’。他们怕群众，怕上海瘫痪，只要守3、5天，港口码头一瘫痪，在全世界就造成影响。”“即使象巴黎公社一样的失败，也可以用鲜血教育后一代”，等等。接着，朱永嘉又转过来对几个老常委说：“8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都丧失了！要干要下决心，今晚干！要大干！要以市委名义干！要你们4个人和我们一起干。”“今夜要是不干，到了明天，他们一回来，要干也干不起来了。那时，我看你们只有唱两只歌的份了；要么唱一只‘革命歌’，我就算钦佩你们；否则就唱一只投降歌。但是当你们回忆今晚历史时，将会感到忏悔。”

王知常讲了历次政变因丧失时机而失败的典故。说：“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搞了杀头可以象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冯国柱打断他的话，叫他不要讲了，并讲王知常是“书生气十足”。当王知常讲到徐景贤、王秀珍二人到北京后肯定“投降了”，说因为他们有汽车、有好房子住，又被冯国柱打断，说王这个话，是不利于团结的。

朱永嘉还激动地说：“我已活了40几岁的人了，我是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时把我拉上来的。我这样做也对得起他们

了。”并说：“我平时不大多讲话的，今天我抛出这个方案，准备被马天水他们回来把我抓起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王少庸激动地说：“我监狱都坐过，你朱永嘉不要讲这个话”。冯国柱也说：“你老朱在这里讲这个话有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在这里议论嘛！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谁抓起来的问题”。

朱永嘉这一整套反革命叫嚣，得到廖祖康、肖木等人一致响应。廖祖康极力主张“马上”叛乱，肖木狂叫：“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马振龙还猖狂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拎着头干，这次也要拎着头干。”

这一伙“帮”兄弟们，逼着四个市委常委表态。

冯国柱要黄涛第一个发言。黄涛还是那样阴阳怪气地既不说干，也不说不干。哼哼哈哈地说：“要准备，要准备。”

冯国柱问张敬标。张敬标说：“我们虽然和你们心连心，但现在不能干。我们4个人代表不了市委，没有代表性，没有号召力，7个书记在北京，要干要等他们回来。”

冯国柱问王少庸。王少庸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和你们一起干。现在4个人抓起来了，3个人情况不明，可能有三种情况：一、变成叛徒；二、思想不通；三、在中央拿出罪证面前没有话讲。现在不能随便乱动，一动就暴露，要干，还要等他们回来。”

冯国柱表态说：“同意少庸、敬标意见，要干，但今晚不能

干，一定要等他们回来。”并补充一条意见说：“明天等他们3个人（指马、徐、王）回来时在机场上把他们弄起来。”施尚英插话说：“把注意力去弄他们3个人有什么意思，我看不妥。”冯国柱解释说：“他们3个人回来也好代表市委发命令的。”施尚英马上表示领会，说：“噢！这倒也对，马老的号召力比你老冯的号召力要大得多。”冯国柱说：“我们大家可以商量，要作些什么准备，但不能象朱永嘉讲的那么绝对，好象目前只有两条：要么今晚大干，唱大戏；要么明天唱两只歌。可不可以有第三条，比如明天还是由我们几个人去接他们，看他们回来的态度和材料再说。”

这时，时间已到凌晨2时多，这伙人见无结果，就一哄而散走了。这时，张敬标对冯国柱说：“刚才李彬山打电话来，要来谈谈下午施尚英找他的情况。”他们因王少庸年老要他先去休息，由冯国柱和张敬标把李彬山找来。在冯国柱家，李彬山讲了他对施尚英谈话情况，他强调了民兵行动一定要听市委指挥，一定要稳住，不能轻举妄动。接着冯国柱也介绍了当晚的会议情况，说：“在这样情况下，讲不干又怕他们接受不了，我们说，干，我们主张，但一定要等3位书记回来，他们没有回来前不能动。最后可算勉强统一了意见。”

最后李彬山又谈了“四人帮”被抓和他在南京看到影印件和听到的传达。但李彬山也说不详细。送走李彬山后，办公室

来电话说：“马天水等 13 日上午 9 时由北京起飞，并且关照少数人去机场接他们。”

(3) “捍一”“方二”方案出笼。

12 日夜，正当陈阿大、朱永嘉等等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大吵大闹时，施尚英连续打了两个电话给在民兵指挥部的钟定栋等人，第一个电话，要钟等立即派人检查各区民兵战备值班、枪弹配套落实情况；第二个电话，要钟等在原有叛乱方案基础上进一步拟定作战方案。钟定栋等又起草了以“捍一”“方二”为名的两个方案。

“捍一方案”为“首脑机关的保卫”。一旦发生情况，“市革会”拟由黄浦区出兵 200 人担任警卫。港务局、建工局民兵师各派 360 名待命。港务局负责福州路口至金陵东路外滩纵深至四川路；建工局负责白渡桥南侧至九江路口，并配合黄浦区民兵师加强电台、报社的警卫。康平路办公室由徐汇区民兵加强警卫。市民兵指挥部机关则计划调虹口区民兵 100 人担任警卫。并提出了标号与口号“火炬”、“东风”等。

“方二方案”为防止“外面来干”，“搞三个保卫圈”。以上海为中心，沿江苏、浙江与上海交界的六个路口，形成第一保卫圈。浏河由宝山民兵指挥部负责。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民兵指挥部负责。金泽由青浦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个路口组织 500 民兵守卫。另备

1 个民兵的预备队。沿海 6 个县（崇明县除外）各组织 1000 个民兵为预备队。沿中山路、邯郸路，加上黄浦江形成第二保卫圈。按行政区分片包干，每个路口都要部署民兵守卫，并由渔业公司民兵团派出六艘渔轮在吴淞口巡逻。北面到十道桥，南面徐家汇路到肇嘉浜路，西面从乌鲁木齐路、石门路到十道桥一圈，形成第三保卫圈，由有关部门分片包干。

马振龙从“康办”回来后，一早就到轻工业局召开了各组室“新干部”会议，积极筹措叛乱的物资。马振龙在会上叫嚷：“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华国锋叛变了，上海到北京去中央开会的几个领导，现在联系不上，情况紧急，我们要作好一切准备，宣传准备、武器准备、物资准备，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要有一个态度。”会后，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杨镇国与生活组、供应组人员按照马振龙的要求一起研究准备武装叛乱的急需物资，决定筹措：电池、电筒、气灯、桅灯、自行车、压缩饼干、气油、油桶、火柴以及汽车和汽车牌照等大量物资。下午，他们开了汽车到各基层单位提取物资。

(4) 层层吹风，煽动叛乱。

王洪文那帮“小兄弟”们在“康办”大闹一阵，得不到明确结果，又回到市总工会四楼会议室开会商量。叶昌明说：“我是坚决主张干的，但他们一定要等马老，周司令等几个人回来后，弄清了情况再干。”黄金海从沙发上跳起来喊道：“我主张

坚决要干，要干就立即干，等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到那时候警备区把部队布置好了，我们只能束手就擒，还搞什么！”戴立清狂叫：“这几个老头子讲要干是假的，不过是拖延时间，他们不干我们来干好了。”马振龙破口大骂：“我刚才在康平路真气死了，这几个老家伙在耍老滑头。”黄金海疯狂地说：“管它，干起来再讲，总比束手就擒好一些。我们完蛋了，索性把上海的水、电等搞掉，一起完蛋算了。”但叶昌明发牢骚说：“这样大的事情，市委不作决定单单由民兵指挥部、总工会发布命令来干是干不起来的，现在是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人家不会听信民兵和工会的指挥的，你民兵还没有动员好，他们（指解放军）就把你解决了。还是赶快向区、县、局工会负责人‘吹风’好让他们思想上有些准备。”叶昌明提出“吹风”，马振龙、黄金海、戴立清立即响应说：要快！立即通知开会。

10月13日凌晨1时半，叶昌明派车分头接人，加上正在机关值班的工作人员，在总工会506会议室召开了有39人参加的吹风会议（其中，有5人到达时已散会，分别进行了补课）。叶昌明在会上宣布不准记笔记，他说：“据外电报导和外国朋友告诉我们，还有外地传来的一些消息，证实我们在中央的领导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以及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都出了事。现在详情还不清楚。据说中央有个文件。情况比较复杂，每个共产党员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相信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最后一定胜利，相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会轻易丧失”等等。会议开了半小时。对尚未到会的人，叶昌明要各组组长负责传达。

凌晨2时，市妇联汪湘君回机关，分批向妇联干部35人吹反革命黑风。

凌晨3时，叶昌明找了王成龙来个别吹风，并要王成龙把风吹到文教系统去，王表示尽力而为。接着叶昌明布置挑选区、县、局工会中信得过的负责人49名来开紧急会议吹风。事先布置几个人在会议中要带头提出问题，由主持会议者答复，用这种办法把风吹下去。

会议开始，先谈学习《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体会和群众的反映，接着，市机电一局、市纺织局、市轻工业局和静安区的工会负责人，根据预先布置，纷纷带头提问题：“听到北京发生了政变，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是反党集团，已经抓起来了，这消息是否可靠？”主持会议的唐行南就证实：“确有这件事”。于是趁势煽动说“我们大多数同志是老造反、新党员，要经得起考验，要提高识别能力，立场坚定”，“总之情况是严重的，大家是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现在这种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大家可以思考思考。”当有人提出应采取什么措施时，唐行南说：“大家可以议议采取什么措施，作什么准备；平时说工会要有战斗力现在就看我们工会究竟有没

有战斗力，这是对我们的考验。”会场就议论开了。一些人讲了恶毒攻击党中央，表示效忠“四人帮”的话，有的说：“王洪文是我们工人领袖，不可能是反革命”，“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希望总工会立即拿出措施来，我们紧跟到底不回头。”有的叫嚷“这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邓小平路线的继续，我们希望总工会带领各级工会斗争，头可断，血可流，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王明龙拿来打印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标语口号共17条，要唐行南“在文字上把把关”。唐把口号拿到401室，由叶昌明、马振龙、黄金海、戴立清共同修改。第17条把“防止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中的“防止”两字，改为“决不允许”。黄金海提出加一条“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戴立清提出加一条“决不允许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马振龙提出要加一点有号召性的字句，经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唐行南等人商量决定，又增加了“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这样，共增加4条，总数21条。由王明龙拿去重印。

13日中午叶昌明等知悉马、徐、王已回到上海。于是，煽动叛乱的吹风活动加紧进行。下午1时半，叶昌明从“市革

会”工交组黄涛那里打电话给唐行南，迫不及待地地下令通知区、局工会，按上午总工会吹风方式和口径迅速扩散到基层工会去。这股黑风吹到了广大基层工会。在市妇联，汪湘君在上午6时就向副主任常委们吹风。还通过妇联系统向各级党委吹风，并通过借到妇联工作的同志到她们原单位去吹了风。

到13日下午，马、徐、王召开市委常委会，陈阿大、叶昌明、朱永嘉去参加会议了。写作组的王知常打电话给黄金海，催促立即大干，把大标语贴出去，把民兵拉出来。黄金海提出要与马振龙、王明龙、戴立清、施尚英商量一下。王知常限下午二时半以前答复。到了二时半，王知常又去电话问怎样决定？“你们干，我带人一起来”。黄金海说施尚英在江南造船厂，不在总工会，还要找到他商量一下。王知常非常激动，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动摇，算了，算了，我们辛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但又说：“好吧，等你们到四点钟，你们动就打电话来”。到了四点钟，王知常又打电话问怎么样？黄金海说：“我们几个还没有碰到一起，定不下来。”王知常说：“算了，算了，束手待毙吧！”

（六）无可奈何，马、徐、王返沪

徐景贤、王秀珍10日晚上到达北京，住京西宾馆与马天水会合。他们先听了周纯麟和马天水向他们作的传达。周纯麟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历来对“四人帮”多次的严肃批判，接着又

给他们看了10月7日、8日华国锋和政治局领导同志接见周、马时的讲话记录。徐景贤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向周纯麟和马天水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周纯麟立即说：“啊！我们还不知道呐！”接着，徐景贤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徐立即将准备与上海通话的内容写了一张纸条，由房佐庭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赖奎，经请示同意后，徐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他和王秀珍已经安全到达北京；第二，一切要等他们回来再定。之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不一会，房佐庭到王秀珍房间送文件，徐景贤跟着也进来了。王秀珍向房佐庭说：“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呀，怎么一下子被他们搞起来了？是怎么一回事啦！老房，你在马老身边几天了，马老是怎么想的？”房佐庭讲了8日马讲的以及在中央表态的情况。徐景贤说：“同意他们的会议精神，就是同意和平演变啊！”王秀珍马上对徐景贤说：“你怎么把调动民兵、分两个点的情况对周司令也说了，不能对他说的，”“周司令是党中央安排在我们市委那里的‘一只钉子’。”后来房佐庭又把徐、王的话告诉了马天水，马对房说：“我这个表态等于不表态，他们还有意见。”

10日深夜，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背着周纯麟，在一起密谈。王秀珍向马天水说：“中央负责同志什么时候见我们？”马天水说：“明天要见了吧！”徐景贤说：“见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问

题要提出来请示的？”马天水说：“‘四人帮’篡党夺权问题还感材料不足，很难说服人。”徐景贤说：“光明日报10月4日的文章^①和姚文元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王秀珍说：“王洪文是一些生活问题，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要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讲讲。”徐景贤、王秀珍都说：“上海动用民兵要讲一下。”马天水说：“是不是一定要汇报？”表示不同意。最后徐景贤说：“我们只能讲希望看到更多的材料。”

11日早晨，徐景贤在京西宾馆房佐庭、张家龙住的房间里说：“昨夜没有睡好，晚上做梦，真他妈的，民兵动起来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象巴黎公社一样搞起来了。”又说：“王洪文、江青材料是充分的，张、姚的材料不足”。又说：“他们不识货，姚文元很刻苦，看书学习很用功。”

中午，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找在北京开会的周纯麟、马天水谈话时，马天水将10日深夜与徐景贤、王秀珍谈的一些问题提了出来。

下午，徐景贤在北京看到张春桥《二月三日有感》时说：“张春桥讲去年的一号文件还是可以的”，“光明日报10月4日

^①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嘱咐”。文中说“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还在“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这篇文章是“四人帮”要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颗信号弹。姚文元当时是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的，《光明日报》发表此文与姚有直接关系。

梁效文章与姚文元有什么关系，姚文元很少自己打电话，不会直接指挥的”，“姚的材料不足。”有人说：“毛主席批评姚文元已很多了。”徐景贤马上说：“毛主席也表扬过姚文元”，“姚文元与自己反动家庭划清了界线，家属搬到北京，不住在钓鱼台，是想脱离‘四人帮’啊！”又说“姚文元是扎扎实实工作的人，他们不识货。”

12日下午，马、徐、王等接到通知，晚上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要接见他们。马天水找了周纯麟和徐、王商量如何向中央领导同志表态。徐景贤又提出关于上海调动民兵的事，准备向中央汇报。马天水说：“不一定汇报了吧！”周纯麟反驳说：“应该汇报的。”晚饭后，中央派来了车子接去，华国锋、叶剑英和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徐汇报了上海调动民兵的情况后，又交代了张春桥准备和李文静离婚，并要徐为张找“老伴”。徐并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马天水也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中央领导要他们继续揭发、交代问题。到了京西宾馆，王秀珍后悔她没有交代调动民兵的问题。第二天一早她找到了会议记录同志，告诉了他上海调动民兵的数字，请他补到记录里去。

马天水等无可奈何地于13日返回上海。

13日上午10时多，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去机场迎接马、徐、王和周纯麟。马、徐、王从下飞机后，和张敬标同坐一辆汽车，冯国柱、王少庸坐另一辆。马、徐、王没有说话，张敬

标一上路就哭起来了，抽泣着说：“这些青年（按指王洪文手下的帮兄弟）很可贵，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情深，……听了你们的电话，才没干，你们再不来，要干起来了。他们都不怕死。”张还说：“中央出事，我是想不通的，他们（指“四人帮”）怎么会反毛主席？”到了丁香花园，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三人都很激动。在马、徐、王向他们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时，徐景贤拿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几张亲笔批示影印件给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看。看着，看着，张敬标跳起来把毛泽东的批示：“你办事，我放心”，往沙发前茶几上一摔，用手拍打着说：“我以为你们带回来什么重磅炮弹呐！原来是这几张东西，上面又没头没尾的，谁拿到了都可以用嘛！”徐景贤说：“这是毛主席的手迹。”张敬标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凭这么几张东西就可以宣布人家反党了！”“你们说服不了我，你们不知道，12日晚上那些青年同志都来了，他们都可爱，他们都不怕死，准备去死（说到这里他又哭了），我们老头子反正年纪大了，死了没有什么，……你们说服得了他们？”“革命革到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弄成这样的下场，培养一批青年干部不容易，他们革命热情非常高。”接着，冯国柱边哭边对马、徐、王诉说这几天的情况和处境说：“自从你们走后，各路情况摸下来都是传四个人被抓起来了，警备区的几个人从南京军区开会回来也不敢来找市委了；总工会、写作组的人都要起来干，

逼着市委表态，而你们在北京不断来电话要家里稳住，一切等你们回来再说。弄得几个在家的人两头受夹，度日如年呵！”

最后决定下午召开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

下午，周纯麟，马、徐、王向常委和列席常委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王洪文那伙“小兄弟”听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放声大哭。冯国柱说：“可以想一想，也可以提些问题。”“如果说（四人帮）有问题，要有重磅炸弹，能说服我，说服上海的工人阶级、党员。”还说：“既然1974年主席指出‘四人帮’，为什么主席生前不搞？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不相信吧！后面还有文件。”周纯麟当即指出：不能这样说！但是，冯国柱还说：“既然是四人帮，主席为什么还叫春桥、文元写文章？”“既然是讲党内的斗争，为什么不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先把人抓起来，然后把材料收集出来？既然讲是‘四人帮’，是四个人的问题，为什么连金祖敏等人都抓起来？”

叶昌明听了马、徐、王的传达，于晚上7时电告总工会，要区、县、局工会转告已吹风的基层，在没有接到进一步通知前，不要上街刷大标语，也不要采取其他行动。但各区、局还在继续吹风。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找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那些头头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传达后会场内议论纷纷。黄金海叫嚷：“就这

些材料向全市讲，上海工人阶级是通不过的。”“毛主席写的三张纸、三句话，其中一句是对华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但这同‘四人帮’罪行又无关，传达下来，有什么意思？无非是叫大家不要讲话。”陈阿大故意挖苦说：“看不出问题，只要立场转过来就看得出来了。”黄金海马上接上说：“你倒是‘活络’，还要什么宣誓！？又是要咬几口？！那么你的立场转到蒋介石那里去，看我们都是问题了。”黄金海还说：“对张春桥这个人我们没有说的，但王洪文有什么重要材料呀！为什么不能区别对待统统抓起来呢？”“听下来没有什么紧急理由，一定要在毛主席逝世才一个月不到就这么干。”“为什么一定要说他们是反党集团呢？”强烈表示了坚持反动立场但又无可奈何的心境。

（七）武装叛乱阴谋的彻底破产和余党们寄希望于未来

“文革”十年，上海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遭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们的荼毒，灾难深重。人们对“四人帮”一伙早已满怀仇恨，深痛恶绝。十年中人们以各种形式反抗他们倒行逆施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丧尽人心，实际上是极端孤立和虚弱的。就在那些上海余党们猖狂策动武装叛乱的同时，“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也从各种渠道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开来，不胫而走。10月10日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

文章点出了“要同违背三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指所谓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作坚决的斗争”，明眼人已经在公开议论这是有所指的。

11日、12日，从北京、南京等地来人，从国外广播，沸沸扬扬，都证实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确已拘禁。这个特大喜讯，象狂飚，象怒潮，迅速传播到学校、工厂、机关、街道、农村各个角落，上海人民奔走相告，喜逐颜开。

13日深夜已有人在街道上刷出了“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等点名道姓的大标语。交通大学的校园内一片沸腾，灯火通明。14日清晨，不少公共车辆上已被写上“打倒‘四人帮’”、“打倒王、张、江、姚”的大字标语，行驶在各条交通线上，把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传遍到全市。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开始贴出各种声讨大字报并迅速蔓延到街头。一支支自发的游行队伍开始出现在大街通衢。上海人民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转化为各种声讨行动，群众的激愤如火山一般地爆发了。千百万张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砸烂“四人帮”的漫画迅速地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街小巷、商店橱窗。浦江两岸，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等处人如潮涌，彩旗飞舞，锣鼓喧天。被“四人帮”及其余党篡夺了领导权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已被愤怒的群众游行队伍一层一层地包围起来。几天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都被广大群

众“责令”揭发“四人帮”并交代自己的罪行。机关干部并将徐景贤、王秀珍等拉到会场内“勒令”他们老实交代问题，低头认罪。参加叛乱活动的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也被群众“揪”了出来，遭受着万人唾骂。曾经在阴谋策划武装叛乱中发号施令的市民兵指挥部，15日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上海民兵的“枪杆子永远听从党中央指挥。”被定为武装叛乱一号据点的江南造船厂的工人群众起来，将这伙人搞叛乱的电台等设备端了出来“示众”。陈阿大、黄金海、王知常等等都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连门也出不去。曾几何时，一场杀气腾腾的武装叛乱，就这样在人民群众奋起的怒涛中冰消雪散。

整个上海和全国一样欢欣鼓舞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数百万群众连日来举行空前规模的庆祝游行。从东方吐白到满城灯火，无数支游行队伍首尾相衔。在潮水般的人流中，有来不及脱下工作服的夜班工人，有风尘仆仆从郊区赶来的农民，有青春英姿焕发的学生们，有威武雄壮地列队前进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有白发苍苍的退休工人和穿着节日盛装的幼儿园小朋友。通衢大街，人头济济，万人空巷。男女老小，全都喜气洋洋。据不完全统计，到10月23日止，全市有650万人次走上街头声讨“四人帮”。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10月24日又举行百万军民的大集会。

然而，丧尽人心、极端孤立的“四人帮”的上海党羽们，以

及那些造反起家、作恶多端的骨干头目们，这些日子来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又在策划些什么呢？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原来，正当他们猖狂地策动武装叛乱的同时，还有另外一手在悄悄地而又积极地部署所谓“应变”活动。

让我们举一些事例：

王洪文“五虎将”之一的马振龙，10月12日夜在市委常委扩大会大吵大闹一场后回到市轻工业局，立即召集杨镇国、徐阿坤等策划“应变”措施，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把“新干部”保存下来。为此布置一些人留在二、三线不要出头露面。过了一些日子马振龙又对一些亲信说：“你们要揭发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把责任统统推到我的头上。”“只要你们保留下来，今后就好办。”

在市纺织工业局，10月27日几个造反上台的把手们密议了一个地下领导班子，名单中还包含基层公司与工厂的一些造反头头，准备“上下呼应，风浪来了，顶一个时期，形势就会好转”。局党委一个负责人说：“我和唐文兰现在不好动了，辰光一到，可以重起炉灶。”他还恶狠狠地说：“有人搞我们，暴露一下也好，将来有一天我要收他们的骨头。”

市商业一局储运公司一个窃据党委书记职务的造反头头10月13日即召开秘密会议安排“应变”。他认为自己可能被捕，于是指定了4个接班人，排定了次序，一个垮台另一个即顶上。

他郑重声明：“这样安排，你们都听到了，到时候不要认为他们是抢权。”

搞“应变”活动最典型的是写作组的那些头目们。正当他们猖狂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同时，却有计划地叫核心之一的章树焜不要参加活动，“免得大家都卷进去”，以备“在必要时出来应付一下局面”。朱永嘉说：“这也算是一着棋子”10月9日傍晚由王知常向章打了招呼。

写作组这几个核心头目10月11日就动手销毁罪证了，把张春桥、姚文元给他们的批件密信烧掉。（急坏在旁的肖木，说王洪文叫他整理过周总理的材料，钓鱼台肯定已被查抄，查出来都是他的笔迹，是肯定要被关死的了。）陈冀德开头装充好汉，说什么“一个共产党员藏的东西，一万个人也找不到”；如把她隔离，“要命有一条，要话一句也没有。”但当天晚上和次日凌晨她偷偷烧毁了张春桥给她的3封密信和她给张的信的草稿和一些其他材料。

10月13日朱永嘉、王知常等先后听了马天水、徐景贤去中央回来的“传达”，14日凌晨，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三人一起密议，提出向华国锋写一封表态信。王知常说：“根据我搞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专案工作的经验，抓紧表态很重要，那怕空一点，只要表态早，就会从轻处理。”朱永嘉、王绍玺表示同意，就由王知常起草。这时，肖木闯了进来，看到这种情况，却信

以为真，躺在地上“打滚”，大哭大闹地说：“难道我们都错了吗？”后来说到信的内容。只是强调写作组工作是摊得开的，是辛辛苦苦工作的，不承认有罪，其中连装装门面的假揭发也没有几条，只是为了利用写信，统一口径的。肖木也不闹了。晚上，他们又议论今后怎样交待？肖木说：“讲得‘中性’一点，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陈冀德说：“我是桌子，椅子也没有，什么也交待不出。”

14日夜，徐景贤叫张家龙到写作组，把朱永嘉、王知常、肖木、王绍玺、陈冀德五人接到了香花园密谈。他们在丁香花园谈话的房间，就是十年前徐景贤、朱永嘉第一次见到张春桥的房间。“十年一觉黄粱梦”，无限唏嘘感慨！徐景贤通知肖木，北京来电要肖木去京。他表示“实在舍不得把一个同志往虎口里送”，肖木则说他们（中央）不会放过他的，办学习班也没有什么，“为了追求真理”。握别时徐景贤祝肖木“追求真理取得胜利”，“十年为期”，不要“相见恨晚”。徐景贤又通知朱永嘉，中央来电同意朱仍按过去安排于15日出国访问日本。徐、朱都提出核心成员“要团结”，“把写作组本部稳住”，“按‘市委’（马、徐、王）的步子慢慢转弯子，争取写作组一个不倒下，渡过难关”。

10月15日朱永嘉走后，王知常按照事先商定意见，召开写作组的骨干会议。会后，又单独留下经济组顾澄海，说今后

“朱和我可能要（被）隔离”，“（对）王绍玺和陈冀德他们也不会放过”，写作组就由章树焜和顾二人出面。并警告顾“不要为了当官而当‘叛徒’”。他们散布“写作组的问题是摊得开的，和‘四人帮’的关系，只是工作关系”。还散布“朱永嘉、王知常曾向华国锋写过表态信”，尤其是“王知常是想交代问题的”。

随后几天里，王知常在写作组表演了一幕又一幕假揭发、假投降的闹剧。他在15日晚上召开的各组组长和支部委员会议上叫嚷：“我出来揭发几件有分量的材料，就可以争取主动，局面就会改变了”。17日王知常积极加紧策划去北京搞假揭发。他对章树焜说：“只要我能到北京，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拿到了‘令箭’回来，就能保写作组过关”。又说：“现在情况很复杂，市委在搞新的阴谋，我要求上北京揭发问题”。说着拿出一份拟好的电话稿给人看。大致内容：“中央：我是一个在‘四人帮’阴谋集团中陷得很深的人，鉴于当前运动呈现复杂情况，市委在玩弄新的阴谋，我要求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来京揭发问题。”王自鸣得意地说：“我们这次再来个心脏爆炸、后院起火。文化大革命初期写作组造反，市委就垮了，这次又要搞垮一个市委，十年搞垮两个市委！”

与此同时，即10月18日，王绍玺与章树焜策划以“革命群众”名义，发信电向华国锋“表决心”。参与起草的有郭朝绪等三、四人，签名的十余人。王绍玺赶到新华社上海分社，企

图通过那里发到中央去。分社的人看了，认为内容太空洞，拒绝了。

王知常又向顾澄海、王绍玺等面前散布“肖木是个伪君子”等话，又与陈冀德吵了一架，骂陈是“写作组里的江青”，表演了要把肖、陈抛出去的架势。18日上午王忽然大叫“失窃”，说张、姚的批件和他的笔记本少了，说“这肯定是肖木、陈冀德干的，卑鄙！卑鄙！他们要害我也没有这么个害法！”王知常装模作样地饭也不敢吃，茶也不敢喝，说怕人家在里面放毒，暗害他。一个人不敢睡，叫两个青年陪他一起睡。究竟谁会加害他呢，他自己讲：“工”字头是一方面，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还有“徐景贤和陈冀德，他们知道王知常脑子里东西多，想杀人灭口”。于是，派顾澄海去延安饭店找到新华社总社来上海的一位负责人，汇报了有人要谋害王知常的谎言，请求他向党中央反映采取措施，并准许王去北京揭发问题。新华社总社那个同志当时就不信，说“徐景贤还有这么大的能量？”王知常千方百计与中央办公厅通上了电话。19日凌晨他果真溜到北京去了，但是，他不但没有拿到“令箭”回来保写作组，连他自己也彻底垮台了。

朱永嘉后来交代，他曾与几个老常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议论“万一”怎么办？他们认为：“看来我们是不行了，将来或许是我们下面第三流、第四流的人还会起来的，现在他们的地

位不高，将来他们会起来的！”他们寄希望于未来！人们可要警惕啊！

后 记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下面简称《史话》)终于完稿了。我们几个整理编纂者算是做完了一件工作,一个不算小的工程。我们基本上都是已经离、退休的干部,仅有的两位在职的年轻同志已提前于去年另行分配了工作。我们能够在离、退休后发挥余热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实在感到非常高兴。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有市委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陈国栋同志曾勉励我们说:这工作要做,再不做没人做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主持召开办公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负责做此项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王尧山同志亲自审阅初稿,逐篇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也给了我们积极的支持。没有这一切,我们显然是做不成的。

我们在整理完最后一章后,曾经酝酿是否要撰写一个结束语,例如要吸取什么经验教训之类。考虑再三,我们感到这个题目太大,涉及“文革”全局性的问题,而我们的《史话》只是收集、整理了“文革”在上海如何进行的一些具体情况。因

此这里只能老实地说:我们写不了。

在整理编纂过程中,我们反复学习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面简称《决议》),去年三季度起,又学习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下面简称《七十年》)。在学习中我们感想很多。特别是联系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作乱的实际,总觉得有些话要说,现在写在下面,为这本没有结束语的《史话》告一个结束吧。

(一)应当如实地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决议》中指出,林彪、江青等人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邓小平同志说:“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①

我们这本《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如实地、比较详细和具体地记述了主要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大量祸国殃民的罪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5页

恶活动。这也是这本《史话》的特点之一。

有没有必要记述得这样详细、具体？我们认为很有必要。这是为了保存史实，使后人知晓“文革”在上海是怎样进行的（而上海的“文革”又是全国“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后人理解“文革”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万万不能再让它发生。为此就要以详细、确凿的事实揭露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奸诈、残暴的本来面目。为了篡党夺权，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许多坏事都是他们干的。王尧山同志审阅《史话》初稿时曾说：“‘四人帮’在上海的这笔帐大致是清楚了。”这也是我们原先的目标之一。

《史话》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记述得这样详细、具体，会不会造成错觉，给国内外敌对分子以“炮弹”来攻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呢？可能正是由于有这个顾虑，有些熟悉“文革”情况的人不愿意具体地多讲这场灾难。要写“文革”，似乎还是让下一代去“发掘”或由外国人去写吧。我们认为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要寻找借口来攻击我们的，过去他们借口“文革”攻击我们还少吗？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分清党犯错误和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而且最重要的终究是我们党自己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使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得到了应得的惩处，终究是我们党自己停止了并彻底否定了“文革”，并且经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文革”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崭新的局面。这正好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我净化、自我改善、自我发展的强大生命力，证明我们党确实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二）作乱十年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是由一些大大小小野心家、阴谋家麇聚到一起后逐渐形成的，这个集团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1）明目张胆地拉帮结派，结帮营私。

江青、张春桥还在“文革”前夜就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互相勾结了，并且因此同林彪相勾结。“文革”开始，张春桥、王洪文等有意识地互相利用，结成一伙。张春桥说过为了“路线斗争”就要利用“工总司”这些人。他因为那些造反头头把他当作“老头子”看待，一切由他说了算而洋洋自得。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等在上海组成了以阴谋家、野心家、投机分子、打砸抢分子为主要成分的反革命帮派领导核心。在中央，江、张、姚、王结成了“四人帮”。张春桥公开宣称：“上海是以江青××为首的‘左’（按‘左’应读为‘帮’）派堡垒。”综观十年“文革”全过程，这个“帮”在上海垄断权力，操纵一切，只要是在“帮”的，就互相提携，互相包庇。以帮代党，以帮篡党。帮内还有派，各派也有矛盾，但又以服从帮的篡党夺权利益为前提。本来，宗派活动、小团体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从来是非法的。“文革”动乱中，搞派性，打派仗，似乎成

为公开合法的了。结帮营私成为“文革”时期一种特产。而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活动最猖獗的就是江青反革命集团。

(2) 靠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踏着别人身躯上台。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都是权欲熏心的人，但他们既无战功，又无政绩，正常情况下决难爬上高位。他们的发迹在于“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靠打击别人扬名起家。他们从此练就了整套的特殊本领，文的和武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只许他整你，不准你反抗，打倒了你，他就上台了。他们疯狂地摧残打击上海市各极领导干部和与我党长期亲密合作的上海各界人士，大批久经考验的优秀骨干被强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帽子，惨遭迫害，许多人被迫害致死，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江青、张春桥一伙迫害干部完全是预谋的。张春桥私下散布“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搞掉老家伙、老干部”的谬论，而且他们真正是这样做的。从实际情况看他们对三种干部特别仇恨，迫害特别狠毒。一是市的以及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务必打倒而且使之永远不得翻身；二是了解江青、张春桥丑恶历史底细的人，他们要狠整得这些人开不了口，甚至杀人灭口；三是虽然挨了他们的整，整而不倒，又坚决不阿附他们的人，他们把这类干部看作“保守、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社会基础”，一整再整，不断地给予打击、

排挤。

(3) 戴着极“左”的面具搞反革命破坏活动。

江青反革命集团一贯地把自己装扮成最最革命的“左”派、社会主义事业的捍卫者。他们利用“文革”的发动，提出种种极“左”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与主张，如全面否定建国以来的十七年；说什么“‘文革’是改朝换代”；提出“文攻武卫”，挑动全面内战；炮制“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又必然是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等等。特别突出的是他们为了诬蔑、诋毁党和国家大批领导干部“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竟颠倒是非地反对抓生产建设，尤其是疯狂地攻击搞四个现代化。

“文革”初期，他们打着“反对以生产压革命”的旗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泛滥，破坏生产。随后，他们炮制了“唯生产论”那个新名词，谁抓生产，谁就是搞“唯生产力论”。他们攻击经济领域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管、卡、压”；诬蔑一切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政策和措施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说那是“利润挂帅”；反对发挥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诬之为“专家路线”、“白专道路”；把一切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联系都诬蔑为“崇洋媚外”、“投降卖国”、“洋奴哲学”；公然大肆宣传“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会上去”，甚至说“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等。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人帮”对之疯狂攻击不遗余力，说搞四个现代化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搞四个现代化是主张“实业救国”，就是“崇洋卖国”。“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要落地”，“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不要以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这些谬论现在听来是多么拙劣，甚至是多么荒唐可笑。在当年，他们的破坏活动曾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以致十年中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体上继续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看问题，不难识破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捍卫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假的。因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就要大大发展生产力，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但他们却要大家安于贫困落后。然而他们那一套貌似“革命、推波助澜搞极‘左’”的叫嚷对于人们的思想不会没有影响。邓小平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左’已经形成了

一种习惯势力。……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①1992年春他在南巡重要谈话中，再次告诫全党：“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当然，人们思想上有“左”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这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搞极“左”是有原则的区别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目的始终是阴谋夺权。

(4) 趁乱下赌注搞政治投机。

江青反革命集团中不少人闯进“文革”舞台首先是政治投机。在这方面他们还确实敢冒风险下赌注。张春桥本人处理“安亭事件”就说过“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特别是王洪文那帮“造反司令”们，他们的信条是“乱世出英雄”，趁乱捞一把，“造反造到市里当市长，造到部里当部长，顶小当个厂长”。他们确实暂时赌“赢”了，走上各种领导岗位，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得力干将，于是他们越加把“宝”押在“四人帮”的得势上，直到最后覆灭时挺而走险，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

他们这帮人并非不清楚他们明里暗中所干的事是违反党纪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1987年2月~7月）第27页

国法的，是在犯罪，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早在一月反革命夺权后张春桥就向王洪文等一些造反派头头公开表示：现在只有搞到底，否则反弹回来就不得了。他后来多次说过他“准备杀头”，还故作姿态地说什么“赤条条来去无挂牵”。王洪文那伙造反起家的小兄弟们更是经常说什么“把脑袋拎在手里，准备坐牢杀头”，不少人称自己为“亡命之徒”。那些舞文弄墨的写作组头目们也不例外。如写作组的二把手王知常曾称自己是“流氓无产阶级”，敢于走险。但他也曾经哀叹：“一期刊物（按指他们编辑出版的《学习与批判》等帮刊）就是一块墓碑，迟早会把自己埋葬掉”。他们中很多人知晓自己在干着犯罪的勾当。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是对建国后历史经验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它从来能够总结错误的经验，从错误中学习，通过错误的教训更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纠正错误，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七十年》的“结束语”中的一段话。

《七十年》叙述党在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问题上，总的遵循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又进一步作了简明精辟的分析，使我们深受启发、教益。《七十年》指出“文革”错误

（当然不是指反革命集团利用党的错误进行的罪恶活动）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这两次大错误、大挫折（按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由于我们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严重偏差而造成的。”《七十年》第八章中多次多处指出“文革”的错误理论指导是“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追求公平完善的”、“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构想以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显然，从这种构想出发，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终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准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邓小平同志说：“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①“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1977年和1978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1978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21页

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基本路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发展形成过程。自从有了这条基本路线，全党和全国人民意气风发，中国社会完全冲破了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约二十年那种停滞、徘徊的状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短短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实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伟大转折。而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文革”的反面经验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四）永远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胜利前进。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最重大成就，在于它全面总结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26页

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把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区别开来，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我们学习《决议》和党史《七十年》，深切地认识到这是《决议》的灵魂，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它的重大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分。

早在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为了克服林彪、“四人帮”以及“两个凡是”^①造成的思想混乱，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他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开始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进程。1979年11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党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到1981年6月，小平同志多次对《决议》草稿发表极为重要的意见，总的说来，就是把“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个《决议》的指导思想的最核心的一条。《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获得通过，

^① 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这一切都同邓小平同志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分不开。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决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江泽民同志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在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如果当时动摇一下，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情况！”（引自江泽民《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求是》杂志1991年第12期）这几年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瓦解。这种历史现象尽管有种种复杂的内外原因所造成，但长期以来不公平地全面否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导致全面的思想混乱，不能不说是致命的原因之一。“殷鉴不远”，确实是触目惊心的。

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而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深信：在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不断地以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必定会指引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胜利前进！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由周克、王城东、李成吾为负责人，日常工作由李成吾主持。《史话》主要撰稿人李成吾，参与撰稿和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有李华、姜东成、冯铭、向顷、陶均增、沈少君、金礼方、方月华。

在这部《史话》中，我们虽力求引用的材料翔实，对“文革”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叙述完整。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对有关材料的运用，事件叙述的详略等方面定有不当、不周之处。我们热烈欢迎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在上海工作过的党内外老同志予以批评，指正史实，补充史料，纠正谬误，以便我们对书稿进一步修改、充实和完善。

上海市档案馆、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档案室和市委组织部档案室曾给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